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 社会运动论

[美]西德尼·塔罗 等◆著  
张等文 孔兆政◆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一书在手 纵览西方学术精华

#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人文译丛

## 社会运动论

本书由知名学者马可·朱格尼、道格·麦克亚当和查尔斯·蒂利等主编，对西方国家社会运动的结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者们自觉超越社会运动在国家政策和政治影响的研究从而探索了一些新的领域，诸如国际和平运动的非国家领域、社会运动对科学研究机构影响的非政府领域、变化着的抗议性政策话语的文化领域、社会运动对生命过程影响的非制度领域等。作者们不仅深入探讨了社会运动的政策结果、制度结果、文化结果、短期的和长期的结果、有意的和无意的结果，而且还比较了当代几大社会运动的政治结果，尤其是不同国家的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和极右势力运动的政治结果。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用制度化的方法解决底层社会抗争行为或集体行动事件的有益借鉴。

ISBN 978-7-206-06945-



9 787206 069451

定价:45.00元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 社会运动论

[美] 西德尼·塔罗等 ◆ 著  
张等文 孔兆政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运动论/ (美)塔罗等著;张等文,孔兆政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8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6945-1

I. ①社…

II. ①塔… ②张… ③孔…

III. ①社会运动—研究

IV. ①C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3078 号

## 社会运动论

著 者:(美)西德尼·塔罗等

译 者:张等文 孔兆政

责任编辑:郭 威 丁 昊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24.75 字数:3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6945-1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产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 导 言

西德尼·塔罗

马可·朱格尼、道格·麦克亚当和查尔斯·蒂利已经整理出一本颠覆性(subversive)的读物。从事社会运动研究的人都知道设法了解社会运动的结果(outcomes)是多么重要,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做这项研究是极其困难的。总之,我们中有些人三心二意地尝试着做这样的研究,或者退却到研究社会运动起源这样经得起检验的领域,或者逃避到现象学的研究中去。

马可·朱格尼、道格·麦克亚当和查尔斯·蒂利有着勇敢的精神。在尽了小心谨慎的责任后,他们及其合作者们勇敢地去发掘、鉴别和阐释社会运动的结果。他们和作者们并没有局限于最直接的、短期的社会运动影响的研究——即民族的和以公共机关为基础的政策结果的研究,好像这样做的颠覆性还不够大一样。虽然像保罗·伯斯坦(Paul Burstein)和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等专家使本书包含了有关直接政策效果(effects)的明确论述,但是他们的论文却是标新立异的——伯斯坦完全质疑社会运动的特殊性,鲁赫特则详细阐述了社会运动对环境影响(impact)的复杂模型——同时这两位专家都通过对政策结果的研究实现了对其的超越。

然而,本书最具颠覆性的思想在于作者们自觉超越社会运动在国家政策和政治影响的研究领域而探索了以下新的领域:诸如,国际和平运动的非国家领域(迈耶 Meyer)、社会运动对科学研究机构影响的非政府领域(摩尔 Moore)、变化着的抗议性政策话语的文化领域(黛拉·波尔塔

della Porta)、社会运动对生命过程影响的非制度领域。(麦克亚当 McAdam)

事实上,本书作者们开拓了与那些在社会运动上有争议的老朋友们进行争论的新领域:诸如,是中断支付更多的利息还是减少支付更多的利息;是国内资源对社会运动取得成功起到更为重要作用还是国外资源对社会运动取得成功起到更为重要作用;是有目的性的社会运动的结果更为重要还是意料之外的社会运动的结果更为重要;社会运动带来的变化是持久的还是短暂的。然而,他们的真正贡献更具有颠覆性:

他们质问社会运动是否区别于利益集团(伯斯坦),或者它们是否根本就没有被视为利益集团,而是被看成组织化的抗争(contentious)行为。

他们没有对无变化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行探究——即没有对历史上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因素的组合进行探寻,(朱格尼和蒂利)而是直接关注那些能将组织决定转化成行动和结果的机制。(摩尔、迈耶和鲁赫特)

他们用比较研究取代那种真实可靠的象征性的案例研究,这种比较研究能梳理出在相同情形下社会运动的重要结果及其区别的原因(克里西、维斯勒、黛拉·波尔塔、盖尔博、哈特、迈耶、库普曼斯、斯坦森)。

通过把社会运动与民主化的进程联系起来(克里西、维斯勒、黛拉·波尔塔),甚至在一种民主理论中引入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假说(伯斯坦),他们使社会运动领域的研究跳出了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

本书的作者们既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主要关注进步的社会运动(库普曼斯、斯坦森),很少论及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宗教运动和衰退的社会运动。此外,由于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发生在美国和西欧的社会运动,所以他们就不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些发生在威权体制里的罕见的但却取得巨大成功的社会运动。举例来说(阿门塔和杨),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社会运动是如何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

蒂利在结论中提出,我们要把对社会运动结果进行研究的种种建议引入到对其研究的“河流”中来,他还号召学者们要同时从“上

游”、“中游”、“下游”进行研究：在“上游”的研究是，通过对社会运动影响的例子的辨别来判断假定的因果关系链条实际上是否起作用；在“下游”的研究是，通过对正在运行的因果关系链条的例子的辨别来判断假定的影响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在“中游”的研究是，检验因果关系链条的内在联系是否像理论所要求的那样运行。对社会运动感兴趣的人要注意了：蒂利想要立即从多个方向来吸引你。

这里有一点吹毛求疵的意见。朱格尼、麦克亚当和蒂利编写的《社会运动何以重要》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现状的线路图，展开这张线路图，我们就能进入一些未知的领域，相当于给引擎加入了有高度挥发性的汽油。如果他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把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抗争政治的一般领域，那么他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会更为丰富。

# 前 言

西德尼·塔罗

在过去大约 10 年间，对社会运动的系统研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然而，在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增长的产业”中，我们对一些领域的研究仍然不足。其中，社会运动的影响和结果无疑是这些相对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之一；研究者们通常对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轨迹给予较多的关注，但却很少研究社会运动对传统政治的影响、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对其他社会运动的影响以及对运动参加者的影响。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呈现一系列专门研究社会运动影响的论文来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关注。

为什么那些有关相对无权无势的社会行动者发起的抗议的公共展现 (public displays) 可能是有效的呢？这些公共展现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呢？在这些公共展现所带来的影响中，哪些是最重要的呢？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弄明白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都充满了这种公共展现。实际上，这已成为常见的国家事务，因为社会运动在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却很少见到——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就像马可·朱格尼将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对社会运动所带来影响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学术分析的文章。社会运动的分析家们既需要研究社会运动带来的预期结果，又需要研究社会运动带来的意料之外的结果。本书就是朝着这一研究方向所做的努力。

本书收录的论文集中探讨的是具体的社会运动，而不是有关社会变化的基本理论和一般过程。由相同的编者编撰的姊妹篇（1998 年出版

的《从抗争到民主》)一书对社会运动的一般性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尽管本书的导论和结论概述了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说,本书收录的这些论文研究的都是具体问题。

在这里,我们衷心地感谢那些对本卷书的写作和出版有帮助的人士和机构。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本书的所有作者,如果没有他们,本书就无法最终成形。我们还要感谢伯特·克兰德尔曼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运动、抗议和斗争》丛书的主编——帮助我们把这本书列入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已很重要的丛书系列中来。我们对帮助本书出版的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所有相关人士也表示感谢。我们的原稿最初是由策划编辑迈卡·博莱特处理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在具体事项上有分歧,但本书的最终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努力和建议。1998年1月,在他离开出版社后,助理编辑詹尼佛·摩尔继续了本书的编辑处理工作。他们两个不仅技能娴熟、讲究效率,而且尽职尽责。总编辑劳拉·威斯特伦把我们的手稿交付出版,从而使本书能与读者见面。塔米·扎姆布熟练地对所有手稿进行了排版。马可·朱格尼参与我们的项目使我们获得了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已得到人们的好评)研究基金的资助。道格·麦克亚当和查尔斯·蒂利还要感谢安德鲁 W.梅隆基金会和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是它们联合资助的一项研究抗争政治的项目才使他们得以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 目 录

导 言 .....	西德尼·塔罗 001
前 言 .....	西德尼·塔罗 001
导 论：社会运动何以重要：过去的研究、目前的问题和未来的 发展 .....	马可·朱格尼 001
1.社会运动和公共政策 .....	保罗·伯斯坦 026
2.施加影响：集体利益标准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论的 涵义 .....	埃德文·阿门塔和迈克·P.杨 048
3.社会运动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对美国 and 瑞士采用直接立法的比较分析 .....	汉斯彼特·克里西和多米尼克·威斯勒 071
4.抗议、抗议者与抗议管理：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共 话语 .....	唐娜泰拉·黛拉·波尔塔 098
5.政治抗议与公共机构的变革：反越战运动和美国 科学 .....	凯利·摩尔 132
6.激进主义的传记性影响 .....	道格·麦克亚当 155
7.敌对环境中的女权主义政治：障碍与 机遇 .....	乔伊斯·盖尔布和维维恩·哈特 188
8.冷战到底是怎么获胜的：20 世纪 80 年代反核运动的 影响 .....	戴维·S.迈耶 206
9.西方社会环境运动的影响 .....	迪特尔·鲁赫特 251
10.种族和公民概念意义上的国家以及德国和意大利极右势力不同	

程度上的成功 .....	路德·库普曼斯和保罗·斯坦森	274
结 语：社会运动从互动到结果 .....	查尔斯·蒂利	304
参考文献 .....		323
作者简介 .....		378
译后记 .....		381

# 导论：社会运动何以重要：过去的研究、目前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sup>[1]</sup>

马可·朱格尼

1963年8月28日，为了游说议员通过约翰·F·肯尼迪总统于7月19日提交给国会的民权法案，有20万到50万人（依据人们对人群规模的估计）参加了向华盛顿特区进军大游行。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政治游行。虽然这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被称为“争取就业和自由的华盛顿大游行”——因而也是把公民权利与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大游行——但是，在此之前发生在伯明翰的民权动员却对人们争取自由的重视超过了对人们争取就业的重视。7月2日，在纽约罗斯福饭店举行了由6个主要民权组织的领袖参加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筹划了这场大游行。经过2个月的紧张筹备，举行游行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妥当。成千上万的参加者——其中大部分是由运动的地方分支机构包车运来的——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参加上午的娱乐演出，这场演出由几位支持运动的歌手参与，其中包括鲍伯·迪伦（Bob Dylan）和琼·拜雅（Joan Baez）。然后，示威者开始游行，前往林肯纪念馆，林肯纪念馆是重要集会的活动场所。对这次运动的组织者来说，它还具有纪念《解放宣言》发表100周年的特殊象征意义。尽管当局害怕暴动——除了其他防范措施外，15 000名伞兵也处于戒备状态——但是运动却以演讲和流行歌曲的和平方式继续进行。最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当时运动的领袖人物，走上演讲台发表闭幕演讲。他的演讲是以



下面这句话开始的：“今天，我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为了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伟大的示威集会”。（qtd.in Kasher 1996: 120）在结束之际，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闭幕演讲却成为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最为耀眼的一刻。作为对人群的响应，马丁·路德·金用“我有一个梦”结束了他的演讲。<sup>[2]</sup>

从 1954 年到 1968 年期间，民权运动处于行动的巅峰期，华盛顿大游行只是这一系列运动事件中的一件。通过联合抵制巴士运动、静坐抗议、自由乘车、游行、示威以及许多其他的抗议活动和不合作行动，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在为恢复正义感而斗争。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成功了吗？1964 年 7 月 2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恰好是在 6 个主要民权组织领导人筹划“华盛顿大游行”之后整整一年。但是，这项禁止在公共设施 and 选举权中设置种族歧视的法案是这次大游行的直接结果吗？或者，就此而论，是整个民权运动的直接结果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到底是运动中的那些行动对产生这样的结果最有效呢？这个法案是由像发生在华盛顿的大规模游行——以和平方式聚集起来的多种规模的游行——带来的结果呢，还是由像静坐抗议和不合作行动那样更具破坏性的策略（disruptive tactics）带来的结果呢？这和当时其他的行动者有什么关系呢？也许运动并不是消除（形式上的）种族歧视的原因；也许是国会中的主流政治家们思想开明或采取策略性手段的结果；也许是外部压力与内部改良倾向相结合的产物。此外，虽然《民权法案》只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却是朝着在实质上实现（非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的更为宽泛的目标迈进的基础性一步。运动在这方面实现了这些目标吗？最后，民权运动的动员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有人认为，如果 1964 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是运动动员的结果，那么这个动员也应该能帮助其他正在斗争中的少数民族争取更多的自由和平等。但是，运动动员也激起南方隔离主义分子的暴行和当局的强烈压制，而这都反过来提高了运动在公共舆论中的正面形象。（Garrow 1978）

有关民权运动影响的种种问题给我们从整体上研究社会运动提供了诸多概念上的、理论上的、实证上的启示。尽管民权运动的影响与其他运动的影响比起来已受到较多的关注，但是对这一主题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sup>[3]</sup> 就像几位学者在不同时期指出的那样，（Berkowitz 1974；Gurr 1980；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88；Tarrow 1993）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是现有文献中最受忽视的课题之一。为了揭示社会运动影响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社会运动的潜在结果、有利于某些结果出现的条件和环境、能引起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过程以及过去和当前的社会运动已取得的实际结果，我们需要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社会运动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引起社会某些方面的变化——即社会运动的根本目标，这些目标虽然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但却很少有人明确论及过，那么对这一主题学术研究的不足会更加令人遗憾。此外，更多地了解社会运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既关系到专业人士，也关系到非专业人士，因为社会运动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尤其是它已成为表达那些没有被充分代表的政治利益的重要载体。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重大空白，本卷书把社会运动的结果作为论述的中心。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拟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上，社会运动改变了社会的哪些方面以及如何改变的？二是在实证层面上，同时代的社会运动曾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后，收录在本书的论文——这些论文贯穿了这两个基本问题——将告诉我们社会运动与更为一般性的社会变化过程是如何关联的，同时还给我们理解社会运动是如何重要的问题提供了一些较好的见解。因而，本卷书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都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中的一个。在导论的余下部分，首先我将作一个简短的概述——即概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对社会运动结果的性质、范围和条件的研究上已经做了什么。其次，通过对那些使研究变得困难的问题和缺陷的讨论，我将对上述两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如果我们想要对社会运动的这一关键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解决这些使研究变得困难的问题和缺陷。最后，我将以对两个重要问题做出

一般性说明来结束本文，本卷书仅部分地论及到这两个问题：即由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变化的趋向和持续性的问题。

##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尽管在研究社会运动的文献中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仍然很落后，但是这个领域并不像很多评论者所宣称的那样一片空白。<sup>[4]</sup>然而，人们几乎还没有对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更没有对其进行系统概述和理论化。虽然我们难以对所有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类，但是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涉及一个或两个相关而又明显不同的问题：破坏/温和的争论（disruption/moderation）、内部/外部的争论。这两个问题是由威廉·盖姆森在其著作《社会抗议的策略》（William Gamson 1990）中提出来的，在这本书初版之后近25年里，它仍被人们视为分析社会运动影响的最富创新性和最为系统性的成果。这本书基本上是以一种批判多元主义的视角来透视美国社会的。<sup>[5]</sup>通过对53个活跃在1800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抗议群体的经历的分析，盖姆森对美国政治系统的可透性和开放性表示怀疑。具体而言，他想要解答几个相关问题：“我们怎样解释美国抗议群体中的代表性集体（representative collection）的不同经验？对不同类型的群体的典型回应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决定着这样的回应？在什么情况下什么策略起作用？什么样的组织特征影响着抗议行动的成功？”（1990：5）事实上，最后一个问题已被证明是分析的焦点，而在何种条件下具体策略才能起作用的问题却是次要的。

盖姆森的研究引来了许多批评，其中大多数都提到方法上的问题。（例如，Goldstone 1980；Gurr 1980；Snyder and Kelly 1979；Webb et al. 1983；Zelditch 1978）然而，除了固有的成就和具体的不足之处，这本书的贡献之一就是它推动了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们展开一场卓有成效的讨论，特别是它掀起了一场关于在社会运动结果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两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下面我对这些问题分别作一个简短的概述。

## 破坏对温和

是破坏性的策略更可能产生影响还是温和的行动更有效，这是研究社会运动结果的主要议题之一。从最简单的形式来看，这场争论由下面的问题构成：破坏性（甚至暴力）的运动比温和的运动更容易取得成功吗？毫不奇怪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

盖姆森的研究直接引起了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他发现了使用暴力策略——更一般地说是破坏性策略——和成功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些回应是对盖姆森的原始资料的重新分析，这些资料包含在盖姆森的书的附录中。例如，斯蒂德里和福利（Stedly and Foley 1979）用更复杂的统计工具，诸如要素分析、多维等级分析、多次回归分析和判别式泛函分析等重复了盖姆森的分析。他们得出的结果支持了盖姆森的研究发现——即抗议者自觉地使用制裁手段能带来积极影响。同样，在试图确定控制运动成功的场所时（这是我将要更详细地探讨的一个问题），米洛斯基和罗斯（Mirowsky and Ross 1981）也详尽阐述了盖姆森有关暴力的影响的研究结果，他们基本上同意盖姆森的说法。<sup>[6]</sup>

与多元主义论者的主张——在政治活动中温和比破坏更有效——相反，其他一些研究者认为，社会运动使用暴力或破坏性策略能提高它们实现运动目标的机率。（McAdam 1983；Tarrow 1998；and Tilly 1975）多数关于抗议者使用暴力或其他强制力的影响的现有的研究都涉及到罢工活动。或许最相互矛盾的结论就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例如，塔夫脱和罗斯根据对1968年在美国发生的激烈的劳资冲突的研究，得出结论：“劳工暴力的影响对工会几乎总是有害的”，并且“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暴力能使罢工者成功地取得相应利益”。（Taft and Ross 1969：361—62）斯奈德和凯利（Snyder and Kelly 1976）在研究1878年到1903年间发生在意大利的罢工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暴力罢工与和平罢工比起来更少能取得成功。然而，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这些结论却是

相反的。例如，肖特和蒂利（Shorter and Tilly 1971）在研究法国罢工时认为，使用暴力和罢工结果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sup>[7]</sup>

以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城市暴动为例，破坏性策略的影响已得到广泛地分析。<sup>[8]</sup> 大多数这种研究都与皮文和克洛沃德有影响力的论文——关于破坏性抗议活动对福利国家的影响——相关联。（Piven and Cloward 1993）<sup>[9]</sup> 实际上，皮文和克洛沃德（1979，1993）都是最坚信社会运动采用破坏性策略能产生成效的学者。<sup>[10]</sup> 根据他们所说，破坏性策略是社会运动以自己的方式达到其目标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因为它们没有其他行动者（诸如政党和利益集团）所拥有的制度上的手段。研究者们诸如苏迈克（Schumaker 1975）认为，在暴力/温和统一体的任何一端，战斗性对运动取得成功通常是毫无益处的。在试图更加细微地说明在何种条件和环境下使用暴力——更加一般性地说是强制力——能带来成功时，苏迈克强调了有效使用强制力的两个条件：当抗议者和他们抗议的对象有直接对抗的时候；当抗议者和某一怀有敌意的阶层有对抗的时候——即当抗议者有零和要求（zero-sum demands）的情形时。（Schumaker 1978）然而，他也发现使用强制力和零和要求可能引起公众的敌意，因而其成效不如温和策略。

因此，如果考虑到不变量，破坏/温和之争可能比实际体现的更加明显。破坏性策略和暴力的成效可能会随着社会运动遇到的情况不同而发生变化。特别是，社会运动的政治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可以利用的政治机会、政治体系中制度特征的多样性以及统治者压制抗议活动的倾向都促进或制约着社会运动的影响。当政权软弱时或有能力容纳抗议活动时，破坏性策略就能发挥作用；反之，当政权强大时或不能容纳抗议活动时，破坏性策略就会被压制。此外，文化背景也可能使破坏性策略更有成效或更没有成效。最后，已被证明的是，社会运动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创造具有创新性的破坏性策略的能力，（McAdam 1983）以及在抗议浪潮中根据时机不同采用不同策略的能力。（Koopmans 1993）

## 内在解释对外在解释

与破坏/温和之争的问题相关的问题是，是社会运动的可控变量还是运动环境的某些方面能更好地解释社会运动的成功。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对社会运动结果的解释存在着内在和外在之争。这第二个争论在盖姆森（1990）的研究中很突出。通过对一系列引起抗议群体成功或失败的组织变量的检验，他指出组织的可控变量或群体的可控变量起着关键性作用。其他一些研究者所做的重新分析也支持了盖姆森的这一结论。（例如，Frey, Dietz, and Kalof 1992; Mirowsky and Ross 1981; Steedly and Foley 1979）类似的对内在因素的强调在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中均有体现，例如在美国发生的集体拒交房租行动（Brill 1971）、妇女运动（Clemens 1993）和堕胎运动（Staggenborg 1988）。

内在/外在之争论是在更为广泛的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之争（pluralist/elitist controversy）的框架内进行的。多元主义者认为，抗议群体是有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体系能对外部要求做出积极回应，从而使这些群体并没有过分远离正当的渠道（Dahl 1961）。然而，精英主义者则认为，抗议群体是很少有影响的，政治体系的反应也是迟钝的（1970; Belush and David 1971）。一般而言，多元主义对政治体系尤其是美国政治体系可透性的假设已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质疑。（Bachrach and Baratz 1970; Edelman 1964, 1977; Gamson 1990; Lowi 1969, 1971; McAdam 1982; Schattschneider 1960; Shorter and Tilly 1974）

在较为狭窄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领域里，这种争论已经转化为这样一种观点：即强调讨价还价对抗议群体取得成功的重要性。（Burstein, Einwohner, and Hollander 1995; Lipsky 1968, 1970; Wilson 1961）在这一点上，李普斯基所做的理论论述可能是最为详细的。（Lipsky 1968）他得出结论认为，从长远来看，不依靠第三方而获取稳定的政治资源（political resources）是抗议者取得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这一争论是在下面两类研究者之间进行的：一类研究者认为社会运动不依靠外部的支持也能取得某些结果；而另一种研究者则认为外部支持是社会运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两种观点从整体上反应了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和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不同看法。前者认为，仅仅依靠自身力量的社会运动不仅是微弱的，而且也缺乏取得成功的本土资源。然而恰恰相反，后者则认为，当遇到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时，社会运动就有足够的资源和破坏性潜力引起社会变化。

与强调组织变量——即社会运动产生影响所必要的组织变量——的重要性的研究相反，有一系列的研究强调了政治环境和社会支持背景的重要性。（例如，Barkan 1984；Goldstone 1980；Kitschelt 1986；Jenkins and Perrow 1977；Lipsky 1968，1970；McAdam 1982；Schumaker 1975）例如，通过对4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核运动的比较，基特斯海尔特（Kitschelt）有充足的理由对决定社会运动取得成功的结构性因素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运动的成功严重依赖于政治机会结构。同样地，塔罗（Tarrow 1998）从个人、制度和文化的三个层面上提出，政治机会在塑造社会运动的长期影响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使用了更易引起争议的方式，皮文和克洛沃德（Piven and Cloward 1979）还是承认更大的运动环境对运动结果的重要性。通过对失业工人运动、产业工人运动、民权运动和福利权利运动的研究，他们发现抗议运动的出现、抗议运动的影响及其动员形式都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尤其是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institutional life）的特征决定的，而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创造了社会运动的机会、塑造了社会运动的形式以及限制了社会运动的影响。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说法，只要社会运动采取了破坏性行动，只要政治环境能使统治者做出让步，那么社会运动就能取得成功。

然而，甚至超过破坏与温和之争，内在与外在之争也许比实际上更加明显。就像破坏性策略的效力随着采用它们时的情况不同而发生变化一样，社会运动的可控变量的影响可能取决于抗议活动的背景。这至少

是科瓦列夫斯基和苏迈克（Kowalewski and Schumaker 1981）以及阿门塔、卡拉瑟斯和莲兰（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近期所做的工作。因此，像有人已经提出的那样，未来的研究应该是探索一种能把策略与结构性制约因素结合起来的综合分析。（Frey, Dietz, and Kalof 1992）本书就旨在探寻一种能把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内在解释和外在解释联系起来的方法。

## 界定和确定社会运动的结果

虽然这个简短的概要还远远没有穷尽现有的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文献，但是它却指出了妨碍这个课题研究的一些问题，并指出了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问题值得论及：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界定（主要从成功或失败的角度来讲）、政策结果的焦点和因果关系问题。

## 着眼于成功或失败

在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结果的研究上存在的首要的局限涉及到“成功”的概念。很多早先的研究都试图确定抗议活动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条件下取得了成功或遭遇了失败。从盖姆森的《社会抗议的策略》一书到对20世纪60年代城市暴动的影响的大量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引领这些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社会运动何时能取得成功？由两名知名学者所写的一本书的副标题证实了对社会运动成功或失败的集中关注，此书的副标题为《它们为何成功，它们如何失败》（Piven and Cloward 1979）。换句话说，学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把观察到的变化与社会运动的要求联系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用社会运动的定期目标来确定其成功与否，无疑是一种探讨这一主题的合理方法。本书有几位作者也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



然而，这种分析视角也是有缺陷的。首先，这种分析方法假定社会运动是同类的实体。因而，成败与否往往归因于整个运动。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适用的，但对那种必须要追寻一定目标的运动通常是不适用的。社会运动是一个由众多群体、组织和行动组成的综合体，而这些群体、组织和行动可能有着不同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不同策略。因此，一种特定的变化未必可以视为一场运动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取得了成功。其次，对成功的集中关注涉及到主观性问题。简要地说，成功通常并不是由人们用单一的方式来评价的。尽管社会运动的成功有客观的一面，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人们主观性的评价。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和外面的观察员可能对特定行动的成功与否有着不同的看法。此外，对同一个行动而言，有些参加者可能视其为成功的，而另外一些参加者却可能视其为失败的。最后，对成功的讨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过分强调了社会运动参加者在引起某些变化时的意图。虽然社会运动的确是旨在引起社会变化所作的理性努力，但是其结果却通常是无意的（意想不到的），并且还不一定与运动的要求相关联。<sup>[1]</sup>此外，对特定的社会运动来说，这种无意的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我们希望，本书收录的这些论文能反应出社会运动的有意的结果和无意的结果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有意的结果至少能被认为是社会运动取得的部分成功，那么无意的结果就没有达到社会运动的目标甚至妨碍运动达到预期目标。虽然一些无意的结果仅仅是由少数且短期的变化构成，但更为有趣的是，社会运动有时却能改变社会生活的某些根本性特征。社会运动可能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而确定这些潜在变化的范围就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项主要任务。例如，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在提交给本书的论文中指出，怎样才能使社会运动不依赖于它们所宣称的更为意外的目标，而又能在人口统计学的社会模型中引起社会变化呢。唐娜泰拉·黛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在其论文中提供了另一个有关运动行动的无意的结果的例证。在某种程度上，有关抗议权利的公共话语的转换和相关的政治行动空间的扩展在德国和意大利



产生了影响，而这些影响是运动参加者和外面的观察员都没有预料到的。社会运动经常带来一些比可能的目标还要广泛的结果，而这些结果通常是无法预见的。通过对有关社会运动过程的解释与有关运动结果的分析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查尔斯·蒂利的结论扩展了这种讨论，他认为研究社会运动结果的学者需要把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来。

## 聚焦于政策结果

与对成功和失败问题的关注相关联的就是学者们对政策变化的普遍重视，政策变化被视为抗议活动的一种潜在结果。前面的文献述评清楚地表明，已有的研究工作在何种程度上关注政策结果。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最近几十年间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些理论把社会运动视为“建立在共同目的和社会连带关系基础上的集体抗议，是同精英、反对者及当局之间进行的持续互动”。(Tarrow 1998: 4; emphasis in original) <sup>[12]</sup>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它们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某些方面。这种把社会运动视作政治现象的流行很广的定义，同对运动结果的某些类型的实证研究遇到的障碍一起，致使学者们侧重于对政策结果的研究。实际上，政策变化比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变化更容易被察觉和测量。因此，通过把社会运动行动与立法变化或政策变化的其他一些指标的变化联系起来，很多研究都集中探讨了社会运动的政策影响。(e.g., 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 Banaszak 1996; Burstein 1985, 1979; Burstein and Freudenburg 1978; Costain and Majstorovic 1994; Gelb and Palley 1987; Huberts 1989; Tarrow 1993)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拥有一些有关反核运动的影响的经验性评估资料的原因，反核运动的影响可以通过由反核运动导致的核能生产的减少与核设施建设的延迟来测量，尽管这些研究结果不太一致。(e.g., Kitschelt 1986; Jasper 1990; Joppke 1993; Midttun and Rucht 1994; Nichols 1987)

此外，应该指明的是，对社会运动的政策结果——更概括地讲是政治结果——的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合理的任务。既然我们在本书中使用了前述把社会运动视作对当局的持续抗议的定义，那么我们就投入大量时间来研究这种类型的结果。保罗·伯斯坦（Paul Burstein）的论文就特别关注了社会运动的政策结果。另外，本书第二部分的所有章节也都对社会运动的政策结果给予了特别关注。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对政治影响的分析，那么就至少在三个方面不能对社会运动的结果给予完整的介绍。

第一，对那些将要取得成功的运动来说，仅仅引起政策变化是不够的。本文认为，真正要紧的是这样的变化：即对受益群体而言能转化成新的集体利益（collective benefits）的变化。因此，一些研究者已经关注在何种程度上运动动员能带来集体利益（或者不能），例如改善经济状况或为少数群体提供更加平等的机会。（e.g., Amenta, Carruthers, and Zyglidopoulos 1992; Burstein 1985; Piven and Cloward 1979, 1993）本书中埃德温·阿门塔和迈克尔·杨（Edwin Amenta and Michael Young）的论文正好提到了这个问题，从而满足了对这种类型的运动影响进行探究的需要。

第二，社会运动的政治成果并不局限于获得政策目标。其他类型的影响也位于政治领域。基特斯海尔特（Kitschelt 1986）曾强调了三种类型的结果：程序上的、实质上的和结构上的。<sup>[13]</sup> 政策结果属于他所称的实质上的结果。这种三分法已得到公认。（e.g., Gurr 1980; Kriesi 1995; Rochon and Mazmanian 1993）我们认为，抗议活动能通过三种方式引起政治变革：通过改变抗议者与当局之间的权力关系；迫使政策改变；在结构和文化层面引起更加宽泛且通常是更为持久的系统的变化。<sup>[14]</sup>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第一部分的所有章节就是根据这种类型学进行分类的。其他研究者也对可能存在的结果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分类，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由苏迈克提出的，他根据政治体系的反应能力界定社会运动的结果。具体来说，他区分了5种反应能力的标准：输入反应能力、议程反应能力、政策反应能力、输出反应能力和影响反应能力。（见 also Burstein,

Einwohner, and Hollander 1995; Rtudig1990) 这种分类避免了由对运动成功与失败的视角的关注所带来的问题。然而，重点仍然在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上。

第三，集体行动并不局限于政治方面。社会运动也有文化维度，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对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e.g., Morris and Mueller 1992; Tohnston and Klandermans 1995) 因此，社会运动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也有各种不同的潜在影响。就像有人最近指出的那样：“为了社会变化所做的集体努力出现在文化、身份、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以及同国家的直接接触中”。(Taylor and Whittier 1995: 166) 当我们论及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时，就更加如此。就像新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多次指出的那样，新社会运动有着强烈的文化倾向。(Brand 1982; Melucci 1982, 1989, 1996) 例如，动员可能会引起内部团结和认同的增强、创造反主流文化以及转变公众对特定问题的态度，等等。虽然从实证上研究社会运动的文化影响比研究其政治影响更困难——因为它们更难以察觉和测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对社会运动的文化结果进行实证研究。尽管本书主要侧重于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但是也有几位作者关注运动的文化影响，并且他们还证明了对文化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可行性。对这一方面进行论述的最为明确的尝试也许是由唐娜泰拉·黛拉·波尔塔和道格·麦克亚当做出的。波尔塔指出，在意大利和德国，涉及抗议权利的公共话语的转换是抗议者和当局之间进行符号性斗争(symbolic struggle)的结果；麦克亚当从个人和微观社会学层面特别论及了由社会运动带来的文化变化问题。

## 因果关系问题

就像本书的一些作者认识到的那样，对社会运动结果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们常常感到自己从事的研究的根基不稳。<sup>[15]</sup> 一些方法上的困难妨碍了研究的进展。我也曾提到，对社会运动的潜在影响进行测量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然而，因果关系问题——也就是怎样在某个特定运动与观察到的变化之间建立一种因果联系的问题，大概是学者们遇到的主要困难。简而言之，我们怎样才能确定某种被观察到的变化就是由社会运动动员带来的呢？我们怎样才能排除那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其他社会力量的产物或者是由那种涉及若干运动和行动的更为广泛的抗议综合体带来的——的可能性呢？我们怎样才能确定某种被观察到的变化是由运动行动带来的还是由政治当局的改革行动带来的呢？

通过做出某些方法上的选择，这个问题能得到部分解决。首先，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不仅要搜集有关某个特定运动及其所宣称的结果的资料，而且还要搜集有关其他行动者行动的资料。在这方面特别相关的行动者有五类：统治者、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和对抗运动（countermovements）（当它们都存在时）。通过广泛地搜集资料，我们可以掌握其他行动者的作用，因而也就能对社会运动给被观察到的变化带来的实际影响做出更好的评价。第二个方法上的选择是，我们不仅要考虑与运动相关的潜在的解释因素，诸如动员水平、策略和组织实力，而且还要考虑其他广泛的社会变化的变量，诸如政治机会结构或社会人口因素。第三，我们需要确立一种比较研究方案。通过对不同情形下的类似运动或相似情形下的不同运动的比较，可以提高我们发现运动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第四，我们可以从那种重视过程——即产生结果的过程——的观点中获取很多启发。换言之，用动态的方法去分析特定运动与其宣称的某些结果之间的联系——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出那些能使社会运动带来变化的机制。最后一个方法选择是，我们不仅要考虑那些能使特定运动引起变化的情况，而且还要考虑那些没有结果能被观察到的情形，这种方法可以增进我们对有关社会运动和其结果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根据运动目标，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研究成功的情形也要研究失败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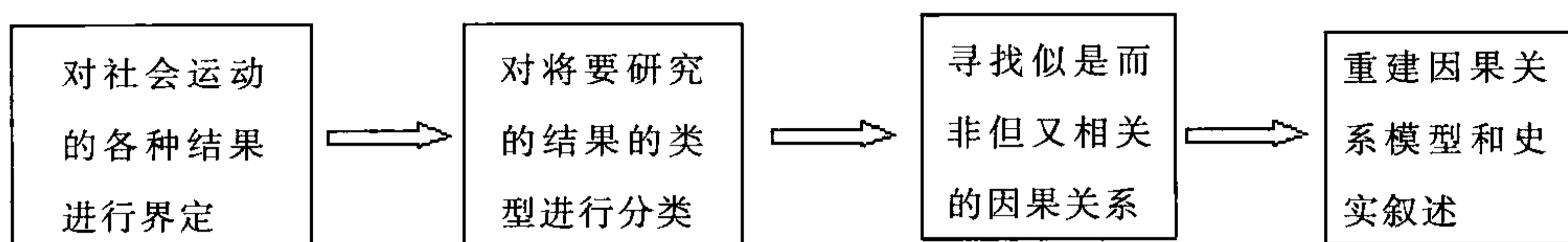
然而，如果研究还像过去那样去探索集体行动的不变模式，那么上



述及相关的方法选择将最多只能缓解因果关系问题。<sup>[16]</sup> 就像蒂利指出的那样：“不变模式的运用……假定了一个在整体结构和程序上基本上以同样的形式一次又一次重复的政治世界。这对理论家来说是一个方便的世界，但却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1995：1596）蒂利的提醒适用于对社会运动结果进行研究的特定子域，因为这一子域的研究人员经常沉迷于寻找一般规律和普遍适用的命题和模式。他们一直在寻找那些决定运动行动成功的因素或一般来说能促进运动发挥影响的因素。

寻找一般原因和不变模式的尝试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不变模式。实际上，当我们论及社会运动的结果时，这可能更加如此，因为我们正面临着社会运动的特征的变化、社会运动起作用的环境的变化以及运动行动带来的结果的变化。代替寻找一般性的解释，如果我们能把那些在历史上塑造着众多可能性的偶然因素的组合物考虑进来，那么将会在社会运动引起社会变化的研究上做的更好。这要求我们要完成4项任务：对社会运动的各种潜在结果进行界定、对那些我们想要关注的影响的类型进行分类、搜寻那些与某种被观察到的变化似是而非但又相关的因素、重构那些从运动行动到被观察到的变化都要遵循的因果关系模式或史实叙述。最后一点包含了对反事实的解释（counterfactual accounts）——即以相关因素为基础的其他可能存在的解释——进行明确的或含蓄的对比。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可以利用的信息去排除其他的因素。图一阐明了这一方法，它也是我们在本书中试图采用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一本论文集里遵循一个共同的框架是可能的。尽管把那些有时遵循不同观点的作者们召集起来是一件难事，但是我们认为，通过遵循这种简单而又必要的方法和摒弃寻找不变的模式，收录在本书的这些论文显示了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将是如何提供一些更好的结论的。我刚才拟定的方法论议程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去寻找在特殊的社会运动影响（我们已关注的）与某些变量之间的广泛的相互关系。然而，这只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第二步是，我们要重建那些能把被观察到的变化与运动行动联系起来的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解

释。经过这两步，我们的研究就能从比较视野中得到大量的启发。



图表一 研究社会运动结果的方法论议程

## 比较议程

许多最新的对社会运动的研究都利用了比较分析方法，越来越多的著作都遵循着比较分析的思路去解释社会运动的出现和发展。（e.g., della Porta 1995; Kitschelt 1986; Kriesi et al.1995;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Rucht 1994; 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政治过程模型在这个领域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特别是，为了阐明运动动员的变化、行动的形式以及较为少见的结果，学者们进行了跨国比较。鉴于我们认识到比较分析对了解集体行动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本书对比较议程给予了足够重视，并设法表明其对研究社会运动结果的有用性。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了两种方式：首先，用间接方式收录了对不同社会运动进行探讨的论文；其次，用直接方式呈现一些对某一特定运动进行跨国比较的章节。

从整体上来看，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那些致使不同地方的不同运动产生不同影响的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例如，我们能发现那些有助于社会运动取得政策结果的因素是否与那些引起公共话语变化或实现制度变革的因素相同。同样地，我们还能确定那些由妇女运动带来影响的过程是否与那些涉及和平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结果的过程相似。如同其呈现的那样，社会运动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历史的偶然因素的组合和事件的进展，而不是一般的、不变的因素的结合。然而，这种间接的比较方法与那种对社会运动结果的变化进行直观描述的方法并无差别。为

了充分发挥比较分析的优势，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更加系统的比较议程。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本书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却设法更接近于真正的比较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求本书第二部分的每一位作者都专注于论述某一特殊的运动并对其影响进行跨国比较。此外，为了呈现更为合理的比较，我们还要求作者们要对具体类型的结果即政治结果给予特别的关注。

因此，本书第二部分的四个章节都尝试着用比较分析方法去评价当代几大主要运动的影响。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提供一种有关所有被涉及到的社会运动的所有类型的结果的权威性评价，而是要表明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历史环境是如何促使社会运动结果的多样化的。此外，由于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有社会运动，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虽然学者们对四个被讨论的运动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有效性对我们的选择形成某些客观的限制，但是我们却特意向一些作者作了交待，要求他们集中探讨那些在最近几十年间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西欧和美国已得到强烈动员的运动。因而，通过采用一个间接的“最相似的系统的设计”，我们希望突出政治体系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或者促进或者阻碍了运动带来某些结果。第二部分的四章中有三章专注于研究新社会运动，就像有些学者（Kriesi et al.1995）指出的那样，新社会运动一直是过去几十年的主角。乔伊斯·盖尔博和维维恩·哈特（Joyce Gelb and Vivien Hart）对英国、瑞典和美国妇女运动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并强调指出这些妇女运动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是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戴维·迈耶（David Meyer）比较了德国、美国和新西兰的和平运动，并侧重于它们对外交政策事务的影响以及说明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制约这种影响的。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通过对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生态运动的比较，用跨国和跨问题的分析视角探讨了生态运动的结果。最后，因为新社会运动是典型的左派运动，所以我们认为涵盖一章关于当代右派运动的内容是有益的。因此，路德·库普曼斯和保罗·斯坦森（Ruud Koopmans and Paul Statham）探讨了德国和意大利与移民政治有关的极右势力运动动员



所带来的影响。尽管把极右势力运动视为社会运动的定义有待公开地讨论，但是，根据这种抗议活动最近在几个西方国家的复活，对其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看来仍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我们相信运用这种普遍的比较分析方法将会产生很多有深刻见解的结论，譬如，有关社会运动的政治结果的结论和有关国情在解释不同运动的不同影响时所起的作用的结论。然而，这种有几分目的性和受到客观限制的选择使我们不得不从我们的讨论中排除当前几大主要的社会运动，例如劳工运动、反核运动、学生运动以及民权运动。基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我们还决定不对发生在西方世界以外的运动进行探讨。尽管受到这些限制，我们仍然认为本书第二部分讨论的各种社会运动能显著表明比较分析方法在研究社会运动结果中的有用性。当然，个案研究也能提供一些有见解的结论，特别是它们能增进我们对社会运动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的理论理解。个案研究的首要价值在于它们能使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分析社会运动引起某些变化的过程。当我们想要显示某个特定的社会运动的结果时，而不是想要确定到底是社会运动的哪些特征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结果以及最终由哪些因素来解释这些结果时，这种个案研究方法是最有用的。然而，当我们想要检验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解释时和想要概括从个案研究得到的结论时，比较分析方法就显得更加可行。一种合理的比较分析方案能使我们检验不同情境下的特定假设，因而也能使我们对不同变量的作用做出评价。最后，只有比较分析才能得出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概括性结论。

采取比较分析方法意味着要实现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即实现从对社会运动结果的起因和决定性因素的研究——一种与因果关系问题相冲突的观点——到对其产生的条件和背景的研究的转换，也就是说，抗议活动需要在何种特殊的条件下发生，某种特定类型的影响才可能出现。如果社会运动被视为理性的和旨在引起社会变化所做的政治努力，那么那些使某些变化出现的政治条件就会成为对社会运动结果进行分析的核心。本书收录的多篇论文都提到了政治因素至关重要的但非排他性的作

用。通过对不同国家的不同运动的比较，本书试图从整体上挑选出那些能促使社会运动引起社会变化的政治条件。

## 变化的趋向和持久性

再花费一些时间探讨两个问题后，我将结束这个导论章节。虽然这两个问题在本书中只是略谈了一下，但是却值得社会运动的分析家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社会运动是如何引起社会变化的，那么就需要提供一些有关社会变化的趋向和持久性的问题的解答。例如，社会运动带来的变化有多持久？社会运动的影响对社会和运动本身来说通常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就运动的制度影响和运动对民主的作用而言，这两个问题经常被激烈的讨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许多作者都强调了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的间接的长期的影响，正好与它们的直接的短期的影响相对应。（e.g. Tarrow 1998）一般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政策结果与短期影响之间作比较，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在制度结果与长期影响之间作比较。毕竟，制度变革比政策变化要慢的多。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从长远的眼光来探究运动的结果，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们是如何改变政治制度以及如何改变社会组织的持久性方面的——即我们可以称为社会制度的方面。

在改变现状的目标方面，社会运动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如果它们要求短期的政策变化，那么就将会更有机会使这种变化发生，但是它们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结构和实践。相反，如果社会运动要求长期的制度变化，那么在实现这些变化上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是，一旦它们这样做时，就会带来更加持久的影响。汉斯彼特·克里西和多米尼克·威斯勒（Hanspeter Kriesi and Dominique Wisler）在他们提交给本书的论文中恰恰主张，社会运动很少能改变政治制度，或者仅在某些满足了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的限制性条件下才能改变政治制度。这种困境的极端版本是，当改良主义运动在较小范围内可能取得众多成果时，而

革命性运动只有很少是成功的，但是一旦它们获得了成功，那么由它们带来的变化就会是根本性的，而且往往是对现存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长期的持久性的推翻。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困境。然而，从学术的视角来看，对社会运动的结果进行研究，首先要分清那些引起改良主义社会运动的条件和那些能激起革命情形的条件之间的区别，然后要分析政策变化和革命结果出现的方式。

除了对国家或政治制度的影响外——无论怎样广义的界定——社会运动都可能引起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制度变迁。这意味着研究工作既应该遵循更多的社会学视角，也应该考虑社会和文化制度。运动不仅挑战国家结构，而且还旨在重新界定一整套社会关系，而这套社会关系已预先假定了那些能证明自身是合理存在的结构和符号性元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运动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都能产生制度上的影响。在本书中，克里西和威斯勒撰写的一章专门探讨了社会运动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而凯利·摩尔（Kelly Moore）撰写的一章则集中探讨了社会运动对社会层面上的制度的更为广泛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了解集体行动与社会变化是如何关联的，那么对那种能使运动带来长期变化的机制的研究就成为一项根本任务。我还要补充一点，不管变化是由有目的性的抗议活动带来的还是由无目的性的行动带来的，这种影响都可以产生。同样，道格·麦克亚当对激进主义（activism）的传记性影响的研究使我们对由抗议活动的参加者带来的长期的转化模式（transforming patterns）敏感起来。这使我们了解到社会运动对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潜在影响。

至于由社会运动带来的变化的趋向的问题，一些作者认为社会运动是民主的源泉，也就是说，社会运动是社会民主化的动力。尽管这通常是一个相当隐含的假设，但还是有几位作者明确地论述了这种关系并从实证角度对其进行了说明。（e.g., della Porta 1995; Koopmans 1995; Tarrow 1989）例如，唐娜泰拉·黛拉·波尔塔在她的论文中就恰好完成了这项任务。通过详细地分析抗议者和国家之间围绕着有关示威权利的公

共话语进行的互动，她指出，只要运动有助于扩大政治行动的空间，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就会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迈进。然而，没有理由能使我们确信社会运动总是使社会变得更加民主，这对于那些所谓的左派自由主义运动来说也是事实，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间它们一直占据着非传统的政治领域。从规范的角度假设社会运动的作用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积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显示，我们可能会把现实误认为我们的愿望，并且可能会认为那些需要从实证的角度来论证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即使假定社会运动始终朝着社会民主化的方向迈进，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民主，例如，我们是采用法律主义民主的定义还是采用参与式民主的定义（Held 1987），这两种定义分别遵循了美国的传统和法国的传统。<sup>[17]</sup>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民主视为一套准予个人利益聚合的正式规范和规则，那么，民主化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将包括正式的权利和自由的扩大。因而，采用和扩展由运动带来的准入渠道（channels of access）可以视为运动行动对民主的影响。譬如，美国听证会程序的不断扩展，极有可能是由社会运动部门尤其是和平运动与反核运动施加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遵循从雅克·卢梭（Jacques Rousseau）开始的传统，并据此认为民主不是正式规则，而是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实际参与，那么社会运动只有在公共空间里出现才能对民主化产生影响。不论我们是仅仅考虑到参与政治运动的集体行动者（即运动的行动者）的数量，还是用更为复杂的方式考虑到在民主进程中的集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性质，这种观点都是适用的。（Habermas 1984）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参与政治都将为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奠定基础。（Barber 1984）

然而，再清楚不过的是，如果评价社会运动对民主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对后者概念的界定，那么这种影响也可能随着社会运动运行的环境不同而变化。例如，尽管我无论如何都不想说所有西方社会都比非西方社会更加民主，但是，在这两种社会环境下民主的特征和民主化进程的确

有着极大的不同。另外，使社会运动能对民主产生影响的环境不仅随着空间的不同而变化，而且也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今天所说的民主的概念与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民主的概念就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社会某些方面的变化——社会运动带来的影响——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将难以解释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

### 紧接着是什么？

在导论中我已努力做了两件事。一方面，我提供了一种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现有文献的概述，这也是本卷书的重点。当然，我并没有提供一张能囊括所有的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理论资料与实证资料的清单，而是筛选了那些研究者在试图评价社会运动的影响时倾向于强调的方面。具体来说，我们发现先前的研究工作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思考的：破坏与温和之争，内部与外部之争。现有的研究都呈现出许多问题和局限。我在这里强调了三种这样的缺陷：考虑有关社会运动的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的趋势，对政策结果较为有限的关注以及因果关系问题。归根结底，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那种寻找有关集体行动的方便的但并不存在的不变模式的趋势。

另一方面，通过简要地探讨两个我认为是主要问题的领域——也是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应该给与关注的，我已为那些研究这一问题的论文（包括本书收录的论文）准备好了讨论的场所。首先，需要从理论和实证视角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的影响进行研究。基于以前研究工作的缺陷，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社会运动的结果，那么就应该超越那种有关运动成功的观念，而去研究包括运动行动的无意的结果在内的社会运动的所有结果，其次还要把对各种潜在结果的研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上，最后还要避免寻找不变的模式而去支持那种旨在重建因果关系路径的方法，这种因果关系路径能把被观察到的变化与社会运动在引起这些变化中的作用联系起来。本书第一部分的

所有论文都反映了这样一种研究不同类型的结果的需要。其次，我也强调了在研究社会运动的结果时需要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特别是，为了突出那些能使运动更有可能产生影响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研究者们应该重视那种进行跨国、跨运动、跨时间比较的观念。因此，本书第二部分的所有论文都专注于评价几种当代的社会运动，虽然这些论文集中探讨的是这些运动的政治结果，但也间接提到了其他类型的结果。

在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领域，虽然充满着丰富的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不同运动进行有价值的实证研究，但是仍然缺乏一种能引领将来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清晰的理论框架。虽然本书不能提供这样的理论框架，但是我们希望它至少能鼓励学者们不断研究社会运动的结果，从而使这一研究成为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需要持久关注的研究，这种努力有助于我们思考那些复杂的关系——即社会运动与其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带来的变化的趋向和持久性之间的关系。

## 注 释

[1] 我要感谢道格·麦克亚当、萨尔瓦多·桑多瓦尔和查尔斯·蒂利对本导论先前的草稿所做的评论。

[2] 对华盛顿大游行的描述参考了科什的资料 (Kasher 1996)。

[3] 有关民权运动的影响，可以参见巴顿的名著 (Button 1989)。

[4] 有关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的结果的文献综述可以参见 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 Burstein, Einwohner, and Hollander (1995), Gurr (1980), Jenkins (1981),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88), Mirowsky and Ross (1981), and Schumaker (1978), 最新的综述可以参见 Giugni (1998)。

[5] 尤其可以参见达尔 (Dahl 1967)，他是采用多元主义方法分析美国社会的代表人物。

[6] 其他对盖姆森的资料进行重新分析的著作或相关著作包括 Frey, Dietz, and Kalof (1992), Goldstone (1980), and Webb et al. (1983)。



[7] 最近的有关罢工的影响的研究可以参见 Cohn (1993) and Franzosi (1994)。

[8] 其中可以参见 Berkowitz (1974), Betz (1974), Button (1978), Colby (1982), Feagin and Hahn (1973), Hahn (1970), Hicks and Swank (1983, 1992), Isaac and Kelly (1981), Kelly and Snyder (1980), Jennings (1979, 1983), Mueller (1978), and Welch (1975)。有用的有关 20 世纪 60 年代种族暴动的文献综述能够在格尔 (Gurr 1980)、艾萨克和凯利 (Isaac and Kelly 1981) 的著作中找到。

[9] 可以参见皮文和克洛沃德 (Piven and Cloward 1993)、拉特纳 (Trattner 1983) 对与皮文和克洛沃德的论文有关联的著作的综述。也可以参见第 7 条注释中所列的作者论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城市暴动的论文的相关部分。其中, 对 20 世纪 30 年代救济扩大进行论述的部分可以参见 Jenkins and Brents (1989), Kerbo and Shaffer (1992), and Valocchi (1990)。

[10] 皮文和克洛沃德特别强调, 破坏性策略是成功的, 组织性策略是失败的, 这一看法在研究中引起了激烈争论 (Gamson and Schmeidler 1984; Roach and Roach 1978, 1980; 也可参见皮文和克洛沃德的反驳 Cloward and Piven 1984, as well as Piven and Cloward 1978, 1980; and see further Piven and Cloward 1992)。

[11] 关于社会行动的无意的结果, 可以参见 Tilly (1996)。

[12] 这种国家导向的最为著名的定义是由查尔斯·蒂利提供的 (Charles Tilly 1984: 304)。

[13] 前两种类型的影响类似于盖姆森研究中的两种分类 (Gamson 1990)。

[14] 通过区别抗议活动对运动参与者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和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塔罗 (Tarrow 1998) 提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类型学。然而, 这种类型的结果表明的是个体层面、政治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化。

[15] 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综述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可以在格尔 (Gurr 1980) 和鲁赫特 (Rucht 1992) 的著作中找到。

[16] 其中，格尔 (Gurr 1980)、斯奈德和凯利 (Snyder and Kelly 1979) 提出了一些研究社会运动结果的方法论建议。

[17] 古尔德 (Gould 1988) 把这两种民主的定义分别称为多元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





# 1. 社会运动和公共政策

保罗·伯斯坦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社会运动的结果持两种看法。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运动能带来重要的结果。威廉·A·盖姆森在他的开创性著作——《社会抗议的策略》（William A. Gamson 1975；second edition, 1990）中指出，只要社会运动组织（SMOs，他称其为“抗议组织”）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把社会运动组织视为常态的民主政治过程的一分子的观点，就是有道理的。盖姆森的结论是，社会运动组织确实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麦克亚当、麦卡锡和扎尔德（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88：727）在他们备受引用的评论（也见 Tarrow 1994：1）中写到：“许多学者研究社会运动的兴趣就是源于他们的信念：即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变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还认为社会运动很少能带来大的影响。他们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两种根本理由——特别有趣的是，这两种理由是相互矛盾的。有些人认为社会运动组织之所以鲜有大的影响是因为民主政治发挥的作用不足，而有些人则认为社会运动组织之所以影响较小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盖姆森采取前一种观点。他认为，对抗议组织而言，美国“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主。相反，它是那种以强力方式关闭社会运动大门的体系的成员。尽管面临着诸多障碍，一些抗议者还是有勇气和毅力进入社会运动的大门，只不过（对新的权势）难以形成明显的渗透”。（1990：177-78）<sup>[1]</sup> 社会运动组织表现得不好是因为政府反应迟钝而且不是真正民主

的。

相反，罗曼（Lohmann）则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时常表现不好是因为各国政府是民主的和反应积极的。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里，民选官员知道公众想要什么并且能对他们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如果民选官员只是对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大多数人做出积极回应，那么他们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失去再选的机会。事实上，罗曼写道：“令人费解的是，在多数主义者的诱使下，有理性的政治领袖总是对社会运动组织或其他组织发起的政治行动做出积极回应”。（1993：319）

因而，我们面临着两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即有些人认为社会运动组织能强烈地影响公共政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运动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甚小；在后一种主张中又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即有些学者认为社会运动组织影响不大是因为民主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运动组织影响甚小是因为民主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本章中，我认为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能够影响政策，但这种影响却强烈地受到民主政治的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一是选举竞争，二是公民与立法者同时关注许多问题的能力的限制。由于民选官员必须不断地争取公众的支持，所以他们首先要对大多数人的意愿做出积极反应，特别是当多数人极为关注某一问题时。因此，如果社会运动组织与多数人关心的问题不一致，那么它们就不能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然而，社会运动组织却可以在公众很少关注的问题上直接影响公共政策；另外，他们还可以通过改变公众的政策偏好及其关注特定问题的强度而间接影响公共政策。

## 社会运动与民主政治

我研究的重点是“全国性社会运动”（1984：304）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所谓“全国性社会运动”是蒂利使用的称谓，是一种能挑战全国各级政府的社会运动。蒂利指出，这种运动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是与那种推动选举政治和现代政治组织（他称之为“创造性团体”）发展的相同力量的产物。为了了解这种社会运动的影响，我们必须分析它们在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反过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要素进行描述。（这是那些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常常忽略的一项任务）

简而言之，民主政治已经运转起来。从350年前英国革命时期开始的为争取代议制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就宣称了下面这一理念：如果一国人民赢得了选举权和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权利，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其政府的所作所为。现代的学术成就显示（越来越确凿的是）这种斗争一直没有白费。民主政府经常且一贯性地对其公民做出积极回应，尤其是在那些对公民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民主制度事实上赋予公民的实际权力已超过了其赋予政府的权力。

公民怎样运用这种权力呢？依我看来，最好的解释可以由我称之为民主的代表性（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理论来提供。在这种理论中，民选官员有三个主要目标。首先是再选，大多数立法者认为这一目标优先于其他所有目标。立法者也想在他们的同僚中赢得影响力和促进他们认为好的公共政策的产生；很少有人去追求那些重要但次要的目标，因为这样做会冒在选举中失利的风险。（Fenno 1973；Mayhew 1974）

知道民选官员的目标后，我们就能发现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支持具体的政策——即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将使其在选举中赢得或失去多少选票。因而，官员们想要和需要知道公众到底需要什么的信息以及如何能对公众的行动做出积极回应；事实上，信息沟通机制已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Ferejohn and Kuklinski 1990）许多旨在影响民选官员的政治行动——抗议示威、游说、信访、捐助竞选活动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有效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给民选官员们提供了公民希望得到什么的信息。

在民主政治中，关键的信息沟通机制就是选举；选举结果不仅告诉民选官员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选民需求，而且不能忽略的一种信息

是——它赋予一些官员继续留在办公室工作的权利而让另一些人去别处寻求就业。然而，作为一种沟通方式，选举是非常粗糙的；虽然他们能传达选民对候选人的整体判断，但却无法提供有关这些判断的理由方面的信息。（Kelley 1983: chapter 9）选举能确保民选官员尽量满足选举人的诉求，但是它们自身却很少能提供选举人诉求方面的信息。

由于政客们需要比选举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信息，所以他们就创造了其他方式以弄清公众想要什么；而有些公众想要传达比他们仅仅通过选举所能传达的更多的信息，所以也开创了一些与候选人沟通的方式。双方的大量努力缔造了一些创造性组织：政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政党的发展就是为了改善民选官员与全体公民之间的沟通。政党标签本身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因为其作为一个“品牌”能告诉公众政党候选人所持的可能的政策立场。（Aldrich 1995; Arnold 1990）

在政党产生很长时间后，正式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才发展起来；实际上，许多早期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就是对一些群体（尤其是企业）的回应，因为这些群体看到了政党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利益集团要想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它们就得让政客们相信：它们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比政党所能提供的更多更好的有关公民偏好的信息，并且它们还有能力动员那些认同这些偏好的选民。（Hansen 1991; Walker 1991）

从这个角度来看，立法机构为了获取和处理信息，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一些政治科学家认为，人们组织立法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收集有关选民偏好和立法可能带来的结果的资料；而高效率的立法机构将尽可能廉价地做到这一点。立法者想要这些信息，以便减小他们在竞选中因为自己没有预见到的结果而受到谴责的风险。根据这种观点，最起码从长远来看，特殊利益者不可能控制立法机构，因为，如果立法者回应的是特殊利益者而不是大多数人，那么他们就面临着在选举中失败的危险。（Krehbiel 1991）

因此，许多同民主政府相联系的组织的出现和发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使这些政府能对公众做出积极回应。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声称，民主政府总是做那些公众需要的事情。<sup>[2]</sup> 其中理由可能就是大部分人所怀疑的：有些群体是非常强势的，甚至当公众反对时，它们也能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然而，民主的代表性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还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公众的要求得不到回应，其中对本文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个人认知能力的限制和组织尤其是立法机关承受能力的限制。<sup>[3]</sup>

无论是个人还是立法机关都没有能力同时处理许多问题。个人通过忽略大多数问题来应付某一特定问题，他们大多数时间是依靠朋友、组织、大众传媒和竞选官职的候选人来处理被他们忽略的问题，并让它们知道这些问题何时需要得到关注。立法机关通过授权给各委员会和执行机构来解决特定问题，它们依靠这些委员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包括政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组织）来处理多数问题，并让它们知道这些问题何时需要立法机关给予充分的关注。（Jones 1994；Krehbiel 1991；cf. Hilgartner and Bosk 1988）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能对那些有关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的公共政策产生强烈影响；但是，当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时（它几乎总是这么做），那些对这种公共政策仍保持高度关注的人——特别是利益集团和相关的立法委员会及执行机构——就有机会施加更多的影响。公共政策可能越来越远离公共舆论，直到某件事重新引起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注意。然后公众可能重新施加影响，使政策回到其偏好的水准线上。因此，可以说公众有权利使政策反应其偏好，但是却经常做不到。总体而言，民主的代表性理论的支持者们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公众想要什么，民选官员往往都能做到，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使民选官员做出积极回应成为可能的信息以及使这样做能够取得成功的动力。

## 社会运动组织、利益集团和政党

在这幅图景中，社会运动适宜在什么位置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追问社会运动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定义能参考所有人的观点，但是参考下面两篇论文提供的定义是很有用的。麦卡锡和扎尔德把社会运动定义为“一整套观念和信念，这些观念和信念反应了一定群体想要改变社会结构的某些要素和/或改变社会报酬分配的偏好”（1977：1217-18）。蒂利认为，“社会运动这一术语最适用于那些在当局和各个方面的代言人之间，为了解决针对这些当局的特定抗议活动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互动。”（1984：305；Tilly's emphasis）这两种定义的共同点在于对变化的期望，麦卡锡和扎尔德强调了对“观念、信念……偏好”变化的期望，而蒂利强调的是对由变化所带来的互动的期望。（cf. Tarrow 1994：1）到目前为止，社会学家考虑社会运动时所能想到好的定义就是这两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定义似乎也包含了常规的利益集团政治和立法机关中的政党冲突。举例来说，当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试图削弱有关职业保健和安全的法律时，它就得表达出对这种变化的期望。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就要经常与国会议员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如果少数党不能代表改变报酬分配的偏好，那么它们在同多数党进行的互动中还能做什么呢？

麦卡锡和扎尔德意识到他们的定义过于宽泛，因为他们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社会运动组织是利益集团吗？”（1977：1218）一方面，他们答案中强调的内容可以视为是社会运动及其组织与其他政治现象及组织的关键区别。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位于“政治体系的边缘”，与利益集团比起来，社会运动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较低，与政府的常规联系较少。虽然其他学者都各自集中探讨了社会运动组织不同属性，但是他们都强调一点：社会运动组织的边缘性使它们与其他政治组织区别开来。有学者认为社会运动组织可以代表那些先前没有被动员起来的选民的利益

(Gamson 1990: 16), 可以为那些没有正式代表的选民说话, (Tilly 1984: 306) 或者使用非常规的破坏性的策略。(McAdam 1982: 25)

令人遗憾的是, 所有这些想把社会运动组织和其他政治组织区别开来的尝试, 都有着共同的缺陷。每一种尝试都集中探讨一个连续统一体 (continuum) ——例如策略的制度化或者非常规性——实际上, 每一种尝试都宣称自己能在一个可识别的点上把连续统一体区分开来, 从而把社会运动组织分在一边而把其他政治组织分在另一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连续统一体能被精确界定; 怎样才能把一个特殊组织放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 从来都说不清楚; 此外, 为什么把分界点 (dividing point) 定位于此处而不是彼处的根本原因, 也不好解释。我认为, 这些尝试不是次要的定义问题; 相反, 想要把社会运动组织和其他政治组织区别开来的尝试, 恰恰反映了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谓的人类的“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 (也许是天生的)” (Stephen Jay Gould 1995: 39) ——一种分类思维的倾向, 而且这种倾向非常强烈, 误导我们在那些确实不可分的连续统一体上寻找分界点。(关于这一论点的详细论述, 可参见 Burstein 1998b)

为了理解社会运动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 我将回到“创造性组织”的话题上来, 这也是蒂利思想的核心。大家一致认为, 有三种类型或三类别的组织是民主政治的核心: 政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组织。最后, 我认为, 想要根据过去通常用来对这些组织进行定义的特征 (比如边缘化) 来把他们区别开来, 是不可能的。像蒂利那样认为社会运动是互动而不是组织, 从而试图灵活地处理这个问题, 也是毫无用处的, 因为区分不同种类的互动比区分不同种类的组织更难办。因此, 把社会运动组织视为不同于利益集团的看法也是没有用的。<sup>[4]</sup> 此外, 把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视为不同于政党的看法, 通常也是没用的。政党也是创造性组织, 其产生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它们在民主政治中的目标; 政党与其他这样的组织的真正区别在于合法性, 而不是组织性——政党是在投票中有一定位置并在组织化的立法机关中有正式地位的政治组织。极为有用的看法是, 存在两种类型的非政府政治组织——一是具有特殊法

律地位的政党；另外一个我们不妨称之为“利益组织”（Interest organizations，“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组织”的结合），其没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尽管两者之间有很多类似性。

因此，有关组织对公共政策影响的任何假说（这些假说惯常标签于社会运动组织上），都将适用于标签在利益集团上的那些假设，并且大部分也将适用于政党。承认这个事实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一种在民主政治背景下有关集体行动的理论，而不需要多种关于不同类型组织的理论。举例来说，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下面这两点：盖姆森所关注的社会运动组织赢得“认可”与汉森所关注的利益集团赢得“准入”是多么相似（Gamson 1990；Hansen 1991；cf.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88：720）；许多抗议活动包括上街示威与最高法院前的争论是多么契合。（Burstein 1991）

## 利益组织的影响：假说与论据

民主的代表性理论提出了有关利益组织对立法活动——立法的内容和立法颁布的时间——的影响的假说。我们在这里提供的假说总体上是有关利益组织的权力的；这些假说既没有考虑特殊组织、资源、策略的影响，也没有考虑立法者的感知能力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假说具有试探性是必要的，因为相比较而言，只有少量的对利益组织的研究是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进行的，尤其是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研究。

### 利益组织的直接影响

第一个且是最为重要的假说是我在研究社会运动的著作中还没有见到的，但它却是民主的代表性理论的直接引申。<sup>[5]</sup> 很多研究社会运动组织的学者都强调，社会运动组织想要影响政府是多么的困难。为什么这么困难呢？最常见的看法是，其他群体尤其是经济精英都比社会运动组



织更为强势，因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然而，民主的代表性理论提出了一个非传统性的解释：利益组织（包括社会运动组织）未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大多数公众想要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民选官员强烈地想要获得再选时，当公众每次仅仅关注几个少数问题时，当民选官员想要和需要有关公众偏好的精确信息时，我们提出了直接影响假说（direct impact hypothesis）：如果支持某一特殊政策的多数人越多、支持越持久，而且这一政策问题对多数人越重要，又能为立法者所察觉，那么利益组织对立法活动的直接影响就会越小。

多数人的规模对立法者至关重要，因为立法者想要确定他们的行为能否代表大多数人；多数人越多，官员们犯错的可能性就越小。持久性对立法者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想要尽力确定当前多数人的偏好还能否在下次选举中保持。重要性也至关重要，因为选举中的奖惩最有可能在对公众来说非常重要的极少数问题上实现。最后，察觉力（perceptions）也很重要，因为立法者仅仅是靠自己对公众偏好的察觉来行动的。立法者和大多数公众都需要准确的察觉力，因为只有这样，前者才能对后者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然而，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是，少数公众想要别的东西，而立法者却误将少数人的看法看得比实际上更得人心。（参见 Arnold 1990；Page and Shapiro 1983）

为了检验直接影响假说是否适用于任何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关立法活动、立法者对公众偏好的方向和强度的察觉以及利益组织的活动等方面的资料。为了了解政治过程而不仅仅是了解立法者对政治过程的察觉，我们还需要了解公众的实际偏好。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一假说和我将在本文提供的其他假说都直接来源于民主的代表性理论，但是它们在以前却没有用本文这样的方式完全呈现出来。因此，只有极少数的研究可以用来检验它们；实际上，有少数研究甚至吸纳了那些需要得到这种检验的变量。因而，可以利用的证据只能是参考性的。

我们知道，美国公共政策的变化与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变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当多数人的规模特别大时和这一政策

问题对公众至关重要时，这种关系就更为密切。（例如，可参见，Page and Shapiro 1983；Stimson, MacKuen, and Erikson 1995；and the review in Burstein 1998a）当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关系非常密切时，利益组织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空间就很小；这一结论并不是对资料的代替，而是应该铭记于心的。

那些分析公共舆论和利益组织如何影响立法活动的研究一般都显示，公共舆论比利益组织对立法活动有着更大的影响。举例来说，美国国会采取的涉及平等就业机会的行动、越南战争、性别问题和有争议的最高法院的判决都较为强烈地受到公共舆论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利益组织的影响。（Burstein 1985：85-87；Burstein and Freudenburg 1978：114-16；Costain 1992：150-55；Ignagni and Meernik 1994）甚至测验公共舆论的间接措施（诸如选区的人口特征和总体上的政治态度），都已证明比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Wright 1985）的作用更为重要。

由于那些研究利益组织的学者往往忽略民主的代表性理论，所以检验直接影响假说的机会常常被错过。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以斯考契波及其合作者（Skocpol et al.1993；Skocpol 1995）为一方与以斯帕克斯和瓦尔尼克（Sparks and Walniuk 1995）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关于美国许多州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就制定了母亲养老金（mothers' pensions）的法律。斯考契波等人认为，这是因为各州立法机关强烈地受到妇女团体联盟的影响——即是说，利益组织对立法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斯帕克斯和瓦尔尼克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即使许多州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但是立法者认为她们将不久就能得到它，而妇女们又都强烈地支持母亲退休金的法律——换句话说，选民（潜在选民）的意愿是至关重要的，而妇女团体对立法活动却没有直接影响。

这一争论似乎提供了一个检验直接影响假说的良机：斯帕克斯和瓦尔尼克的观点与这一假说一致，而斯考契波等人的观点则与这一假说不一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检验从来没有真正发生。斯考契波（1995）令人信服地争辩说，斯帕克斯和瓦尔尼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

们的分析数据是有缺陷的；但是她并没有对他们的理论争论做出回应。斯考契波等人提出，公共舆论可能是重要的——当论及“全国性的公共舆论呼声”（1993：691）和妇女联盟的成长对“公共舆论……的令人惊讶的影响”（1995：721）时——但是实际上从未检验到它对立法活动的影响。斯考契波反驳了斯帕克斯和瓦尔尼克的假设——立法者的行动主要是由选举人关注的问题推动的，她写道：“当各州立法者们投票支持母亲退休金时，我不想对他们心里一定是怎么想的这一问题进行纯粹的理论推导”。（1995：728）然而，至于立法者们为什么会做妇女联盟想做的事情这一问题，她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解释。为什么立法者们会制定母亲退休金的法律呢？最后，斯考契波得出结论（虽然有点不完满）：“母亲退休金已成为一种其制定时刻已经到来的观念”。（1995：728）如果斯考契波能提供一种对直接影响假说进行更好的检验的理论，那么将更有意义，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做。

其他一些学者用各种方法分析公共舆论和利益组织，但很难评价它们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吸纳所有相关变量的方法的重要性清楚明白的显示出来，而研究结果的含糊不清似乎违背了直接影响假说。欧康纳和伯克曼（O' Connor and Berkman 1995）考虑了各种变量包括宗教关系后发现，美国的堕胎政策与公共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当美国全国堕胎与生育权利行动联盟（National Abortion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Action League，NARAL）的国家会员增加到均衡时，公共舆论的作用就下降到无关重要的地步；而这时全国堕胎与生育权利行动联盟的全体会员却对公共政策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也许意味着利益组织的活动比公共舆论更为重要，但这并不是欧康纳和伯克曼的结论；他们解释说，全国堕胎与生育权利行动联盟的全体会员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公共舆论强度”的标志。（1995：450）是这个解释正确呢，还可能是全国堕胎与生育权利行动联盟不依赖公共舆论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呢？如果没有一种直接测量公共舆论强度的措施，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罗森菲尔德和沃德（Rosenfeld and Ward）采取了相反的看法：他们没有把组织活动看成

是公共舆论的指示器，而是把公共舆论视为一种衡量社会运动“程度”的方法（1991：53）——这种方法不能确定利益组织是否能不依赖公共舆论而直接影响立法活动。

## 公众真正想要什么？

我认为，当利益组织与大多数人强烈的清楚的表达意愿不一致时，它们就很少能直接影响立法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利益组织对立法活动没有任何影响。民主的代表性理论和第一个假说的逻辑表明，利益组织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影响立法活动：改变立法者对公众偏好及其强度的察觉、改变自身的偏好、改变某一问题对公众的重要性程度。

立法者的察觉力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这一点。立法者需要公众想要什么的信息，但是精确的信息往往是难于获得的——实际上，的确很难，所以有些政治科学家认为，人们组织立法机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获得准确信息的需要。（Krehbiel 1991）利益组织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式影响立法活动：即通过说服立法者，使他们相信他们已大大低估了那些支持某一政策提案的力量——即立法者认为是少数人支持的政策提案实际上却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看似不太显著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突出的，看似变化无常的偏好实际上已经变得很稳定。基于此，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信息假说（information hypotheses）：利益组织给立法者提供的有关公众偏好的新信息的数量越多，它们对立法活动的影响就越大；那些具有可信性声誉的组织提供的信息将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如果信息经过核实是准确无误的，利益组织就可以促使立法者根据公共舆论去行动；而如果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那么利益组织就可能无法对立法活动产生影响。

关键的一点是，信息必须是新的，能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这种观点主要归功于罗曼 Lohmann 1993）如果立法者想要对公众想要什么的问题保持消息灵通，那么他们就需要留心选民的信函、说客的来访、

公众的示威、报纸的社论以及民意测验等等。他们所留心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日常性的事务，所以只需要他们给与充分的注意就能及时发现公众偏好及其关注强度方面的任何变化。异常信息将会提醒他们注意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引起他们开始更加仔细地探索这些信息的来源。<sup>[6]</sup>有些组织经过证明在过去是可信的，并且有兴趣在将来继续同官员们保持联系；由于立法者需要准确而又新颖的信息，所以他们将会对这些组织提供的信息给予充分的重视。（Hansen 1991）

为了充分检验信息假说，我们需要有关以前为立法者所利用的信息和他们随后所采取的行动的資料。如果拥有了这些过去的資料，我们就能够把惯例性的“新闻”——这种新闻基本上适合任何一种已经确立的模式——与那些从这些模式中脱离出来的真正新闻区别开来。实际上，我们拥有的都是一些参考性的证据。

罗曼（1995）认为，在旧金山海湾地区发生的反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示威游行，之所以没有为政客和战争的支持者们所理会，是因为它们具有可预测性；海湾地区的居民反对美国所有的军事行动。然而，堪萨斯城（Kansas City）的反战游行却被视为更有可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游行；那里的战争支持者们不得不组织自己的游行，以抵制美国中部都是反对战争的印象。遵循类似的逻辑，罗曼（1994）认为，1989年末反对东德政权的示威游行之所以取得了效果，并不是因为参与游行的人数非常多，而是因为游行的规模增长如此之快——从9月25日估计的6500个参与者到两个星期后的60000个参与者，再到11月6日的3250000个参与者——无论政府还是平民，都为参与者们所表露的不满的广度和深度而感到惊讶。通过对游说而不是对游行的集中探讨，汉森（Hansen 1991）认为，从1919年到1932年农场的游说员之所以能在国会取得影响，是因为他们说服了国会议员使其相信他们能提供关于农场主需要什么的可信信息。他得出下面这种更加一般性的结论，“利益组织之所以有影响力，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把‘压力’施加给国会议员，而是因为他们能指引立法者注意某些压力而不是其他的压力”（为汉森所强调的；

1991: 227)。最后，迈耶和马鲁洛 (Meyer and Marullo) 认为，美国和平运动通过它鼓励使用的公民投票和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众比想象中的更加支持冻结核武器，从而对国会和总统产生了影响。(1992: 116-19)

## 改变公众的偏好

民主的代表性理论认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公众偏好及其关注的强度；根据直接影响假说，当公众偏好非常清楚和强烈时，利益组织对立法活动的影响就很小。如果利益组织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下，那么它们想要影响立法活动的关键——但是间接——的方式就是改变公众的偏好。利益组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一是改变公众对当前已确定的问题的偏好的分布状态；二是重新确定问题——即改变偏好是关于什么的。基于此，我们下面就探讨一下公众偏好假说 (public's preferences hypothesis)：利益组织对公众在当前已确定的问题上的偏好或重新确定的问题上的偏好的影响越大，它们对立法活动的（间接）影响就越大。如果我们能表明，由利益组织引起的公众偏好的变化没有导致我们期望的立法活动的变化，那么这一假说就可能被证明是假的。如果民主的代表性理论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发生。举例来说，不管公众的偏好是什么，企业组织都能从政府那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为了检验公众偏好假说，我们需要有关利益组织意在影响公众偏好的活动的资料、有关偏好本身的资料以及有关立法活动的资料。如果这些资料不支持这一假说，那么我们还需要有关影响立法活动的非传统型的原始资料。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难以得到一些必要的资料，因为那些研究利益组织对公共舆论的影响的学者很少考虑利益组织和公共舆论共同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而那些研究公共舆论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学者又很少分析公共舆论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至少在同一项研究中；把佩奇和夏皮罗 1983 年和 1992 年的研究进行比较）。我们知道，利益组织有时在特定的情况

下能影响到公共舆论；（Page and Shapiro 1992：350-54）而且它们通常对重新确定问题（使公众用新的方式去看待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就像它们在反歧视行动与反核行动中所做的那样明显；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7, 1989）<sup>[7]</sup>当然，我们也知道公共舆论通常能影响到政策。有少数学者试图分析利益组织和公共舆论共同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但他们大多都发现利益组织对公共舆论并没有影响。（e.g., Burstein 1985；Burstein and Freudenburg 1978）我在这些研究中发现，只有安妮·科斯坦（Anne Costain）在对妇女运动的研究中指出利益组织对公共舆论有影响——但却不是对立法活动的直接影响。（1992：150—55）

其他学者已经意识到，深入思考利益组织和公众是如何影响立法活动的问题是多么重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往往不能把问题的突出性与公共舆论的实质区别开来。举例来说，皮文和克洛沃德认为，选举人关注的问题在立法者对社会抗议的回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Piven and Cloward 1977：31—32），而抗议者带来的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公共舆论实现的。他们写道：“南方的民权抗议事件唤起了北方白人对公民权利的广泛支持”（239），然而，目前还含糊不清的是，这是表明抗议活动影响到北方白人对公民权利的看法，还是影响到白人对公民权利需求的强烈感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论据显示民权活动的确影响到问题的突出性（Salience），但却没影响到实质上的公共舆论。（Burstein 1985）

## 改变问题的突出性

通过改变某一问题在公众面前的突出性，利益组织也可能间接影响立法活动。从理论上来说，这会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如果公众较少关注某一问题，那么公共政策就可能会偏离公众的偏好——对大多数问题而言通常都是这样。因此，提高某一问题在公众面前的突出性，可能会引起公众注意到自身偏好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差距，

然后公众就会要求公共政策要与其偏好保持一致。

然而，提高一个问题的突出性是一种比改变公众偏好更难的策略。首先，只有公众偏好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差距存在时，这一策略才能起作用。此外，对利益组织而言，提高问题的突出性实际上是有风险的。如果公众在某一问题上反对利益组织，而利益组织又无意中提高了这个问题的突出性，那么消除公众偏好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差距将会使情况变得更坏。更加糟糕的是，如果利益组织在这些情况下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注意，那么它们就可能引来政府的压制或者其他组织的激烈回应。基于此，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问题的突出性假说 (issue salience hypotheses)：在公共政策与公众偏好之间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利益组织对问题在公众面前的突出性的影响越大，它们对立法活动的（间接）影响就越大。如果利益组织的目标与公众偏好一致，立法活动就将有利于利益组织；如果两者不一致，那么立法活动将会使公共政策偏离利益组织的目标。

为了检验问题的突出性假说，我们需要有关利益组织意在影响某一问题在公众面前的突出性的活动的资料、有关公众偏好、现有政策和立法活动的资料。当然，利益组织的许多活动都是为了影响问题的突出性、公众的偏好以及将要传达给立法者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这些活动的影响时所应该考虑的。

在我对争取平等就业机会的运作的研究中，能发现有关这一假说的最直接的检验。(Burstein 1985) 民权抗议活动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到国会的活动（就像我已经发现的那样），并且显然很少或者没有影响到有关公民权利的公共舆论。然而，它们确实大大增强了问题的突出性，特别是在南方挑起了敌对性的公众回应。反过来，问题突出性的提高看起来对国会的影响非常强烈，以致使国会在问题的突出性刚刚达到极点后就制定了 1964 年《民权法案》。然而，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美国国会是在大多数美国人都开始反对种族歧视时才最终对公众做出回应的。易于推想的是，如果类似的示威游行——也能引起问题的突出性增强到同样程度——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而不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么它们将会



激起政府的压制而不是带来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的制定。

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资料能够直接检验问题的突出性假说，但是一场有关 1935 年《美国劳动关系法 (NLRA)》制定的重要论战却提供了一些与这一假说相一致的论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激烈争论中，古德菲尔德 (Goldfield: 1989, 1990) 认为，工人暴动 (worker insurgency) 在国会制定这一法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考契波和费恩戈德 (Skocpol and Finegold: 1990) 则不同意这种看法，相反，他们强调的是选举政治和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在执政中为了应对压力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双方既没有强调公众的偏好，也没有强调利益组织对问题的突出性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论据。针对古德菲尔德所描述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劳工斗争的增加，斯考契波和费恩戈德认为，政府从来都没有必要对这种压力做出任何特别的让步；可供选择的回应总是有的，包括压制。(1990: 1304) 政府什么时候才能积极地对这种压力做出回应呢？(即使具体确切的回应形式还无法预测) 根据问题的突出性假说，只有公众偏好与公共政策之间存在差距，而且利益组织的目标又与公众偏好一致时，政府才可能积极地做出回应。据古德菲尔德所言，这种差距也许是存在的；在国会制定《美国劳动关系法》之前的一段时期，公共舆论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劳工政策却没有发生显著性的变化。(1989: 1275) 因此，就像工人想要的政策正在赢得大多数公众的支持一样，有组织的工人增加劳工问题的突出性也是完全可能的。

斯考契波和费恩戈德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国会制定《美国劳动关系法》的行动是由选举政治尤其是 1934 年民主党的胜利带动的，而不是由工人斗争引起的。(1900: 1300) 然而，在民主的代表性理论中，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民主党的胜利可以视为公共舆论转移的论据，在这种背景下，国会通过改良而不是压制的方式对公众对劳工的关注做出回应就能讲得通了。<sup>[8]</sup>

到此本章已经集中探讨了立法活动。然而，立法的制定并不是政策



过程的结束，法律的实施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 利益组织与法律实施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无论利益组织对立法活动有什么影响，它们对法律实施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官僚机构”和法院“不受控制”的普遍观念反映了社会科学家们下面这一主张：行政机构和法院过度地受到利益组织的影响，而公众却想要利益组织的活动受到控制。关于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民主的代表性理论提供了一些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公众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对很多问题都保持很高的兴趣，而且他们也缺乏密切监视法律是如何实施的能力；因此，众所周知的是，法律可能通过公众不同意的方式被实施。

立法机关也是仅有有限的能力去监督法律实施，所以它们把对特殊政策的监督委托给专门委员会。然而，这些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可能不均衡地代表着不同的选区，而这些选区的公民的偏好与作为整体的公众的偏好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国会的委员会是由立法者组成的，这些立法者为了给他们代表的选区选民赢得特殊利益和优惠待遇，都设法成为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最后，法官和行政官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其职责是解释和实施法律，因而他们缺乏立法者监测公共舆论的能力以及这样做的动力。如果一项法律措辞含糊或者授予行政机构和法院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这就会给利益组织影响这项法律的实施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当它刚刚颁布而很少有惯例约束法官时。

然而，民主的代表性理论也表明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总体上来说，立法机关需要防止法律在实施过程中过远地背离公众偏好，以避免其变成一个选举问题；因此，它将会行使自己对监督委员会的某些控制权，如果行政决议或司法裁决引起了公愤，它也可能会修改法律。显而易见的是，甚至是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公众偏好的影响。（Stimson, MacKuen, and Erikson 1995; Norpoth and Segal 1994; Mishler and Sheehan

1994) 基于此, 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实施假说 (implementation hypotheses): 一个问题在公众面前的突出性程度越低, 利益组织对涉及这个问题的法律实施的影响就越大。负责解释和实施法律的法院和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越大, 利益组织对法律实施的影响就越大。为了充分检验实施假说, 我们需要如下资料和数据: 一个问题在公众面前的突出性程度、公众的偏好、行政机关和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多少、利益组织想要影响法律实施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行政机关和法院所作的相关决定。

尽管很多研究都强调了行政决议和司法裁决在表面上是如何受到利益组织影响的, 但是却很少有人仔细测量这种决议和裁决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公众的偏好, 更少有人考虑问题的突出性程度。我们认为, 如果一连串的行政决议或司法裁决激起了公愤, 那么可能会引起立法活动来推翻这些决议或裁决; 20 世纪 70 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抗税风波和最近的反歧视行动政策在实施中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子。(Lo 1990; Burstein forthcoming) 但是, 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

很少有研究把自由裁量权作为一个变量。(但是在洛伊的研究中可以见到, Lowi 1979) 然而, 人们却普遍认为, 与一项法律实施一段时期之后比起来, 当这项法律刚刚颁布时, 行政机关和法院通常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为一项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 由行政机关和法院自己设立的先例或确立的惯例将对他们随后的决议或裁决产生重大的影响。反过来, 早期的具有设立先例性质的决议或裁决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益组织的影响。(see, e.g., Blumrosen 1993; Clark 1977; Zemans 1983)

## 结 论

我在本章中已指出,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利益组织是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 就必须研究它们在民主理论语境下的活动, 并分析个人和组织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环境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我们这样做时, 就

能得出一些与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著作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的结论。

首先，并不存在从理论上把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区别开来的理由。盖姆森认为，有关“极端主义政治和多元主义政治的固有的二元性”的看法是建立在错误前提的基础上的；相反，“只存在简单的政治”（1990：138）。同样的道理，有关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的固有的二元性的看法也不可能经得起推敲；事实上，只存在简单的组织——即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利益组织”。

其次，由于民选官员都非常关注再选和连任，所以对对他们来说，首要的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对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做出回应。当这些意愿是清楚的且能被强烈地感觉到时，利益组织就无法直接影响公共政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益组织对公共政策一点影响都没有。本文的第三个结论是，就像民主政治限制了利益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一样，它也给它们影响公共政策提供了途径。同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的限制相关联的是，在那些公众很少关注的问题上，民主政治给利益组织直接影响公共政策提供了机会；而且民主政治还给利益组织通过以下方式间接影响公共政策提供了机会：给民选官员传达相关信息，改变公众偏好及其关注的强度，影响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决议或裁决。

这些有关利益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的结论都是初步性的尝试，因为几乎没有研究社会运动的文献试图去测量社会运动在竞争性选举和立法活动的理论语境下的影响。但是，支持这些结论的论据已确定无疑的表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我也应该指明那种我还未设法得出的结论：即那些关于能够使一些利益组织取得成功而却使另一些利益组织失败的资源、策略和机会的结论。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一直非常关注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的成败，有时也非常关注特定的社会运动的成败。起初，学者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探寻哪种策略和组织特征有利于社会运动组织取得成功——举例来说，使用暴力是有助于社会运动组织取得成功还是不利于它们取得成功。最近，

学者们把注意力越来越投入到“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和影响社会运动组织成功的环境因素方面上来。

这是向正确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因为利益组织强烈地受到它们所处的环境的影响。然而，考虑到的环境越多，分析就会变得越复杂。例如，最清楚不过的是，一个利益组织所利用的特殊资源的效用，通常取决于能为其他这样的组织所用的资源以及它们利用这些资源的用途。（参见 Tarrow 1994: 170-71）我认为，遵循这种分析思路，我们就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个结论与那些研究复杂的、竞争性的系统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相同）——即，我们可以大概预测到将要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如何受到环境影响的，但是我们却无法预测到哪种变化最有可能发生或者变化的哪一方行动者（对我们而言，就是指利益组织）最有可能赢得斗争的胜利。民主政治给利益组织提供了为发挥各自的影响而相互竞争的机会，而这种竞争的复杂性和强度又使我们几乎不可能预测到谁将赢得胜利。

## 注 释

[1] 引用盖姆森的观点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盖姆森既说抗议组织是成功的，又说它们带来的影响很小，换句话说就是，民主政府既是反应迅速的又是反应迟钝的。然而，实际上，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在他的整本书中以及研究这一领域的其他人的著作中（可参见 Clemens 1993），这也许是由于他们都没有一套衡量影响或反应的明确的标准。本章稍后将论及这些问题。

[2] 严格地讲，组织的目的应该是使政府对那些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做出回应。此外，我们期望政府主要是对选民做出回应而不是对所有公民做出回应。在本文中我并没有考虑这些（概念）区别的实质，我使用的是“公众”这一术语，因为这一术语是所有被本文引用的著作中使用的术语。

[3] 其他两个重要的原因是：宪法和法律对多数人权力的限制（例



如，美国《人权法案》中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通过选举聚合偏好的问题(例如，多数票循环的问题)。

[4] 麦克亚当、麦卡锡和扎尔德 (McCarthy and Zald 1977: 1218;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88: 720) 认识到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区别通常是不清楚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提出应该摒弃这种区别的观点。

[5] Neustadtl (1990) 在一篇有关利益集团进行竞选募捐的论文中提出了颇为相似的观点。

[6] 也可以参见塔罗的论述——即塔罗对早在 18 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官员是如何依赖于利益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所做的论述，(1994: 51-55) 以及他对破坏性策略是如何成为常规策略而不再吸引政治家的注意的问题所做的论述。曼斯布里奇 (Mansbridge 1992) 也强调过由利益组织提供的信息对立法决议 (和公共决策) 是多么重要。

[7] 必须牢记的一点是，想要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之所以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那些试图在某一方面改变公共舆论的组织通常会遭到那些想要维持现状的群体或想在其他方面改变公共舆论的群体的反对。(可参见 Carmines and Stimson 1989; Kitschelt 1994; Page and Shapiro 1992; Riker 1982) 利益组织想要改变民意的尝试不仅通常无法取得成功，而且实际上它们有时候却适得其反，以致使公众反对它们所拥护的立场和主张。(Page and Shapiro 1992)

[8] 值得注意的是，斯考契波在她对《美国劳动关系法》的研究中 (Skocpol and Finegold 1990) 强调了选举政治的重要性、淡化了利益组织的影响，而她在对母亲养老金的研究中 (Skocpol et al. 1993; Skocpol 1995) 却把这一看法颠倒过来。这两个结论也许都是正确的，但是斯考契波却没有提出对此进行解释的理由。

## 2.施加影响：集体利益标准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论的涵义

埃德文·阿门塔和迈克尔·P.杨

只有少数学者研究抗议者（challengers）及他们采取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在民主政体中的影响。（Gamson 1975, 1990; Piven and Cloward 1977; McAdam 1982; Kitschelt 1986; 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 Tasperand Poulsen 1993; Amenta, Dunleavy, and Bernstein 1994; Tarrow 1994: chapter 10; Burstein, Einwohner, and Hollander 1995; Kriesi et al.1995: chapter 9; see review in Giugni 1994）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对抗议者的影响的分析和理论化不同于对抗议者动员的分析和理论化，对抗议者动员的分析和理论化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时所关注的焦点。因而，毫不奇怪的是，这些被人们研究最多的主题已经取得了最大的进步。

学者们对抗议者的影响的关注相对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主题所特有的概念上和方法上的问题。当我们辨别和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涉及的是社会运动的影响（impact）这一术语，而不是那些已被广泛使用的替代术语——社会运动的“成败”（success or failure）或者社会运动的“结果”（outcomes）。由于这些替代术语混淆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概念上的和方法上的问题（“成功”这一术语的普遍使用往往弄混了概念上的问题，而“结果”这一术语的普遍使用往往弄混了方法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围绕“影响”这一术语展开清晰地分析。

要想弄清楚抗议者的影响，就需要对抗议（challenge）活动的重要结果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进行界定。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抗议者的话进行界

定——即用“成”和“败”这些术语来解释。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给我们的分析设置了严格限制。虽然忽略抗议者的定期目标 (stated goals) 是不明智的，但是我们认为，仅仅关注这些定期目标将意味着会错过其他一些重要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又可能都是抗议活动的结果。此外，社会运动的许多目标往往并不能清楚地显露出来。然而，要想说清楚社会运动的结果，就要假想一下一位研究者需要确立什么。在抗议者发起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之后，有时会出现一些重要的新情况。但是，把这些新情况称为抗议活动的结果或成果还为时过早，因为在抗议活动期间或之后发生的事件除了是由抗议活动引起的外，还有可能是其他社会力量的产物。要想确定或说明抗议活动的影响，研究者需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发生抗议活动，将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对这个研究主题而言，基本的方法论上（通用于所有形式的因果分析）的任务是困难的，因为那些对抗议者的出现有影响的条件可能会既影响到抗议者们追求的目标，又影响到那些对抗议者们所代表的人们有利的事件。

在本章中，我们在研究社会运动的影响之后，将提出和解决一些概念上和方法上的问题。为了弄清楚社会运动的影响，我们讨论和辨别了“影响”的定义和方法论上的策略。虽然我们使用的方法并不是特别新颖，但是我们对有利的潜在影响的界定却是以集体利益 (collective benefits) 为中心的，而且我们使用的方法论上的策略也是符合社会科学标准的，这些策略主要是那些能使个案研究中因果关系假设看似合理的方法。在这里，我们试图把概念上和方法上的限制应用到那些探讨抗议者的影响的问题中。其实，方法论问题就是要说明特定抗议者的行动可以带来集体利益。我们还把我们的定义、策略及其涵义同那些在研究社会运动的文献中众所周知的定义、策略及其涵义作了比较。我们探讨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它们涉及到国家导向的抗议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也认识到类似的想法还需要抗议者面向其他目标。

我们非常依赖一个特殊的例子——汤森运动 (Townsend Movement)。我们之所以使用这个例子，就是为了给我们使用的范畴和策略提供一种



具有反复解释性的例证。我们还探讨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其他的抗议者，以及探讨了一些著名研究中出现的和最近发生的例子。我们在这里的努力并没有提供一种有关社会运动影响的理论。就像我们对抗议活动影响的界定一样，我们也没有设法确认我们探讨的任何一种抗议活动到底是发挥了影响还是没有发挥影响。因而，我们的探讨只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尝试。

在研究抽象问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汤森运动。1934 年初，弗兰西斯·E.汤森 (Dr.Francis E.Townsend) 把他的大部分老年追随者组织起来并宣称代表他们的利益。1936 年，汤森运动达到高潮时，大约有一百万个成员。这个运动集中体现在所谓的汤森计划中：每个月为 60 岁以上的美国老人提供两百美元的资助，而且这个资助必须由专用税款提供；只要受助者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工作并花光了积蓄，就得给予资助。(Holtzman 1963) 虽然汤森运动集中于国家层面，但是它也要求各州的养老援助法律做出改变，最终个别州通过了“婴儿”汤森计划——一项固定的、巨大的、普遍的养老金计划。没有任何一个州的运动比汤森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运动更活跃。尽管如此，汤森计划却没有在任何一个州通过。相反，1935 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建立了养老援助和养老保险——前者是各州的补助金计划，后者是国家保险计划——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社会保险。到 1939 年，各州都采用了资产审查的养老援助计划。在 1939 年和 1950 年间，各州对《社会保障法》进行了修订。尽管如此，到 1950 年汤森运动已经开始衰落。(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

## 社会运动影响的思考

一个关键的概念性问题就是如何考虑抗议者带来的潜在影响。我们认为，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集体利益 (Collective goods) 的概念——即协作群体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而且这些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很难把没

有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排除在外。(Tilly 1978; Hardin 1982) 集体利益可能是有形的, 如分门别类的社会消费计划, 也可能是无形的, 如向一个群体的成员求助的新方法。社会运动组织总是宣称自己能代表一个超出其领导者和追随者范围之外的更大的群体, 而且大多数组织都想要给这个更大的群体带来集体利益。根据我们的思考方式, 一个抗议活动取得的集体利益越多, 它的积极影响就越大。虽然集中探讨集体利益是一个很简单的起点, 但它却不是规范性的观点。鉴于此, 我们认为, 我们对集体利益的选择和取舍的优缺点是值得探讨的。

## “成功”与集体利益标准

主要的取舍集中于抗议者的计划和组织上。威廉·盖姆森在其著名的有影响力的对美国社会运动组织的研究中提出了“成功”的两种形式: 一是抗议组织的“新的利益”(new advantages)的实现; 二是抗议组织的“认同”, 即成为抗议组织宣称能够代表的那个群体的合法代言人。(William Gamson 1990: 29) 盖姆森通过这些方式把抗议者分成众所周知的两类, 即分成“充分回应”和“彻底失败”两种类型, “充分回应”包括取得部分成功的“合作”和“抢先占据”两种形式, “彻底失败”就是他所称的“崩溃”形式。

“新的利益”是盖姆森提出的“成功”的两种形式中影响较大的一个, 而为了弄清楚这种新的利益是由什么构成的, 他集中探讨了抗议者的计划。他认为, 成功地取得新的利益显示着抗议者实现定期计划的程度。相应地, 如果抗议者的计划或要求大部分都没有实现,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抗议活动就会被视为失败的。保罗·伯斯坦、雷切尔·爱因沃纳和乔斯林·何兰德(Paul Burstein, Rachel Einwohner, and Jocelyn Hollander 1995) 通过精确地分析抗议者的计划的实现程度, 也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确定新的利益和成功。通过抗议者的计划来研究和界定成功具有一些鲜明的优点, 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 并引起人们关注

集体行动的特殊目标及其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然而，标准定义（standard definition）也有缺陷。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考虑抗议活动的潜在影响方面存在的缺陷。最为重要的是，下面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抗议活动没有实现自己的定期计划，因而被认为是失败的，但是它却还能为自己所代表的成员赢得可观的集体利益。此外，下面的这种假设也是为时过早的，而且往往是错误的：社会运动组织的正式话语和计划反映了一场特定的社会运动所期望的变化范围。其他的目标可能是存在的，但却被这种计划导向的分析所忽视。

标准定义的一些缺陷在我们的例子中可以得到说明。一般而言，汤森计划的失败就意味着想要争取“新的利益”的汤森运动的失败。然而，如果汤森运动是代表《社会保障法》中的老年人的集体利益的，那么，就像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和理查德 A.克洛沃德（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Cloward 1971）明确指出的那样，汤森运动就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抗议活动之一。这是因为《社会保障法》确保老年人享有很多集体福利，而老年人正是这场运动声称要代表的群体。即使这场运动仅仅为老年人赢得了较不重要的集体福利，如越来越慷慨和越来越容易得到的养老救助金，但是它仍可能被视为有影响力的。总之，对计划的重视往往忽视了抗议活动的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对这些抗议活动的追随者们也许是有利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抗议者除了提出自己的要求外通常还能做出妥协，（Piven and Cloward 1977: chapter 1）那么计划导向的分析往往会低估他们的影响。

普遍应用“新的利益”标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抗议者计划的每一个方面未必都能给它的支持者们带来集体利益。抗议者们经常提出将援助更多的支持者的主张，以便这些主张的实现将能带来我们所界定的集体利益，但是抗议者计划的重要部分往往都只是给抗议活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规定了好处。更为特别的是，这种计划可能会使受益群体蒙受损失。举例来说，汤森计划要求老年人退休。尽管这个目标是抗议者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仅仅取得这个目标可能会被视为一种集体的“恶”

或损失，或许不应该再视为是一种益处。在其他例子中，目前尚不清楚抗议者的计划是否能给支持者们带来很多好处。盖姆森认为，与汤森运动同时代的查尔斯·考弗林（Charles Coughlin）为争取社会公正的全国联合运动也提出了许多方案，而这些方案似乎对那些失业者和穷人支持者们并没有多大帮助。（1990：34）

这种例子也能凸显集体利益标准的另一个优点——它的范围。根据普遍的思维方式和讨论方式，那种没有成功取得新的利益的抗议活动当然会被视为失败的。完全实现计划是最好的结果，彻底没有实现计划是最坏的结果。实际上，集体行动及其要求往往被忽视或压制。（Piven and Cloward 1977）然而，与仅仅未能达到目标比起来，抗议活动还可能带来更糟糕的情形。集体行动可能会事与愿违，给自己本应该援助的群体造成消极的结果。（Snyder and Kelly 1979）压制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给其参加者带来的损害；集体行动可能造成集体公害——已通过的法律限制了这些群体的实质权利和利益以及无形的集体资产。集体利益标准使我们更加容易探讨和分析那种可能已经给抗议者所代表的人们带来损害的集体行动。

汤森运动就是一个例子。1934年，这个运动反对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州长竞选活动，辛克莱的竞选纲领是“结束加利福尼亚州的贫困”，其措施之一就是给老年人提供每个月50美元的养老金。反对辛克莱的理由在于他不支持汤森计划，而他的更有权宜之计的对手——保守的共和党人弗兰克·梅里亚姆（Frank Merriam）则支持这项计划。梅里亚姆认识到他对汤森计划的支持并不会使他要为加州的老年人多做些什么。（Putnam 1970）通过支援梅里亚姆，汤森运动的集体行动可能降低了加州老年人的集体福利。至于这种集体行动是否降低了集体福利，主要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做深入探讨，但是集体利益标准却使我们更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关注的选民的集体利益与组织社会学使用的对成功标准定义也是不同的。后者常常侧重于如何实现可操作的目标和增强组织的生命

力（例如，可参见，Gross and Etzion: 1985: chapter 2）。然而，抗议组织与其他组织有着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受益方面，因为它们宣称自己代表着更加广泛的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在普遍的经济或政治过程中通常处于弱势。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抗议活动组织、抗议活动的参加者和抗议活动代表的支持者区别开来。

后面一点表明盖姆森的第二个维度的局限——即把准入（access）或认同作为抗议活动成功的一个标准，或作为我们将称之为抗议活动的利益影响的标准。就像盖姆森指出的那样，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制度上对社会运动组织的认同和运动组织的领导者宣称自己为支持者的合法代言人都未必能带来新的利益。例如，汤森运动想要加州的立法机关要求国会或者向国会“请愿”通过汤森计划。然而，令顽固的托温塞迪特斯（Townsendites）满意的是，这些“请愿书”几乎没有涉及加州老年人的福利。相反，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行动也许是以牺牲加州的养老福利为代价的。（Putnam 1970）皮文和克洛沃德更加一般性地指出，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组织通过选举进入精英阶层可能会弱化抗议活动的影响。

总之，不管抗议者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数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为支持者们赢得集体利益的可能性都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去进行独立的理论思考和做出经验主义评价。举例来说，查尔斯·里根（Charles Ragin）通过对盖姆森的资料进行重新分析后指出，“准入”被人们看做是影响“新的利益”的条件或者影响到它们缺乏的条件。对集体利益的集中探讨，可能会使我们更容易把抗议活动中出现的组织取得的成功与抗议活动的影响区分开来。仅限于积极行动者及其组织的福利或象征性胜利并不能自行构成集体利益，而且，如果它们不能带来集体利益，就不应该算作社会运动的影响。

### 集体利益标准的涵义：确定受益群体和可选择的利益

在社会运动组织的既定目标以外能考虑到的影响，都具有评价抗议

者及其集体行动的涵义。西方民主国家的激进运动往往达不到它们的既定目标。（Goodwin and Skocpol 1989；Tarrow 1994）一种遵循标准路线对成功进行的分析把所有这种类型的运动大体上都视为失败的——即使它们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对集体利益的关注也许会带来更为积极的评价。这种重视也有利于更加详细地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以外的革命运动（revolutionary movements）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取代那些标准的是非（all-or-nothing）分析——即解释为什么一些革命爆发了而另一些革命却没有发生。同样，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对那些争取目标很少而又易于实现的抗议活动的评价都是较为消极的。另外一方面的涵义就是：根据是否为支持者们带来长期的持续不变的集体利益，与对通常的实践方式的评价比起来，我们对那些有着巨大影响但后来被遣散的抗议活动都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我们并不是想要说明我们的定义仅仅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描述和解释是一致的。有着理性选择传统的学者通常试图根据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利益来解释集体行动。就像对社会运动进行的大多数的研究一样，理性选择的学者往往尝试着解释集体行动或动员的作用。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常常设法弄清楚个体为什么会给集体行动捐钱或做出贡献——比方说公共电视网络——并且他们还假设：一旦做出贡献，就将会带来许多确定的集体利益——比方说公共电视节目。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个体为集体行动付出足够的贡献的原因以及如何诱使个体为集体行动做出充足的贡献。一旦这种问题——常常被视为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或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规则——得到解决或转化为更易处理的问题或规则，人们就期望着集体利益几乎会自动产生。（例如可参见，Chong 1991）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集体行动往往更为复杂，并涉及到超出个人贡献（为实现集体利益而付出的努力）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举例来说，捐献给汤森计划的金钱或努力未必能带来一些普遍的集体利益——比如养老退休金的增加。我们认为，把集体行动与集体利益联系起来的关系机制是复杂的，需要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将其理论化。



尽管我们对潜在的有利影响的看法还存在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忽视它们。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查明特定的抗议活动或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是谁——这是我们的定义暗含的首要任务。表面上接受抗议者的要求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举例来说，汤森运动宣称帮助每一个人，汤森计划要求消灭失业和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因而，这里的决定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简单。对汤森运动而言，我们认为它代表的最为重要的群体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给这个运动提供的支持最多，并且他们还是汤森计划的主要的直接受益者。由于汤森运动是一种具有相对紧密结合的组织形式的抗议活动，所以它是一个易于分析的例子。在区分受益群体方面，组织越不完善的社会运动，遇到的困难可能就会越多。即使不能提供一种明确的答案，我们仍然认为这些问题是值得反复考虑的。

另一些难点涉及到辨别和评估集体利益。如何在有待研究的潜在的集体利益中做出选择？如何评估由抗议活动带来的集体利益的价值？最为重要的是，怎样才能确定什么是集体利益？最后，分配意味着确定一些东西确实是一个群体的利益，这总是一个困难的任務。在有关主观利益和客观利益的争论中，（Lukes 1974；Tilly 1978）我们支持那些把两者都考虑进来的学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个别的社会运动组织的计划和要求。相反，我们认为，首先要研究这些计划和要求，然后再分析它们所固有的集体利益。然而，根据集体利益标准对有利结果进行解释就成为研究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就是说，研究者们要考虑如何在抗议计划中或在其他潜在的妥协中做出选择，这些计划或妥协也许是有利的。我们认为学者们有必要认真考虑一下集体利益的范围，因为这对一个抗议活动所代表的群体是有利的。与那些不得不在危险中和在某个历史性时刻采取行动的激进主义分子不同，研究者们往往具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和运用比较分析的优势。我们认为只有这些优势不会立即消失。

再回到我们的例子中来，如果说有人支持老年人是汤森运动的主要受益群体的主张，那么对研究者而言，集体利益标准的涵义就相对简单明了。第一步是要研究为实现集体利益的计划，其中主要的是相对不受

限制的巨额的养老金。下一步是要研究其他的潜在集体利益，例如给老年人的其他的养老金形式。研究员要集中探讨给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并评估法律条款中规定的相关利益。事实上，养老金的数量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可以用美元来归类，而且这些数字也使研究任务得以简化。不过，我们仍然需要确定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利益可以归因于托温塞迪特斯(Townsendites)的行动(稍后可能会更多)。然而，抗议活动也可能会给老年人带来许多其他的集体利益。这些集体利益也许包括由老年群体的较好形象带来的一切利益，而这一切利益又是通过正式声明、政府刊物或者公共舆论规定的，是对老年人有价值的、持久的集体认同。然而，不采用金钱的方式来评估集体利益可能是困难的。下面我们就转向区分和评估不同类型的集体利益这一研究主题。

### 潜在的集体利益的类型和程度

大多数抗议者(包括我们举的例子)主要都是以国家为目标指向的。在盖姆森研究的53个群体中(这些群体代表了1945年以来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抗议者)，有33个群体是以国家为导向的。(1990: 21)其后重要的以国家为导向的社会运动的例子包括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由于如此之多的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都集中关注国家，所以通过国家导向的方式对公认的潜在集体利益进行分类和评估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不用说，有很多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主要是以国家之外的目标为导向的。一些突出的例子包括劳工运动和动物权利运动，前者的多数集体行动都与雇主有关，后者往往面对的是企业和大学。一些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希望创造新的集体认同，可以说它们没有与上述目标类似的目标。大多数抗议活动都是国家目标、私人目标和更广泛的目标的混合。下面我们要探讨的是从这些目标中得益的集体利益的类型。(我们先从民主国家开始探讨)



## 来自国家的集体利益

我们把国家界定为政治、军事、司法和行政组织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能对居住在特定的领土范围内的人们施加政治权威和进行强制性管理。国家从事的活动包括征税和制定社会消费政策，这些活动能把公民或被统治者束缚和凝聚起来，而且这些活动得到上述组织支持。(Skocpol and Amenta 1986) 在民主国家里，国家领导人、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关的构成都是由普通群众和公民的关键性参与和信息输入决定的；选举权相对具有包容性，公民有结社的权利，民选官员对国家负有重大的责任。(Dahl 1971)

通过探讨相对民主国家的社会运动的潜在影响，学者们通常认为社会运动具有不同类型和层级的影响。这些类型一般都会涉及到盖姆森提出的新的利益和认同标准。(1990) 例如，基特斯海尔特(Kitschelt 1986)认为，社会运动可以实现实质上的目标、程序上的目标和结构上的目标，其中前两个类型的目标就类似于盖姆森提出的两个标准，而第三个类型的目标就是一种“政治结构的转型”，这是基特斯海尔特在对一个新的政党的诞生进行研究时所论述的。詹金斯(Jenkins 1983)根据政治决定的短期变化、决策精英的变化和财产分配的长期变化提出了一种分成三个类型的方案。第一和第三个类型是新的利益的不同形式，而第二个类型则是准入或认同的更概括的表述。

我们还提出一种三个层级的分类方法，但是每一层级最后都涉及到集体利益而略去对任何一个抗议组织的认同或承认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抗议组织对利益变动没有产生长期影响，最小的影响就是为其代表的群体争取到具体的国家政策决定。最大的影响就是能使一个群体——但未必是代表这个群体的组织——对政治过程施加持续的影响。这些结构上的目标是根据它们能增强返回到常态的集体行动的事实来界定的。大多数集体行动都是以较为中等的层级的利益为目标的，如果不

发生某个反向的行动，这一层级的利益将会继续向支持者们倾斜。在每一种情况下，都需要新的立法来保护已取得的利益。因而，社会运动影响的区别取决于立法的内容。不用说，很多集体行动实际上可能会瞄向不同层级的目标，但是这些区别却为目标分析提供了依据。

在最低层级上，抗议者也许能为他们的支持者群体争取到一些具体的东西。例如，抗议者们通过正式的政府交涉也许能为他们代表的群体争得更多的尊重。例如，老年人在国家的通讯系统中被官方视为“老人”。在这一层级上，其他的利益就是眼前的金钱利益。在1936年而不是1945年，美国退伍军人组织努力争取早日发放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出征津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出征津贴只适用于当时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而对后来退伍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或参加未来战争的退伍军人却没有影响。（Daniels 1971）然而，这种一次性的利益通常被批判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Lipsky 1968）从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方式来看，这种利益反映了那些享有这些利益的公民的有限的权利观念。

在最高层级上，抗议活动可能带来结构性改革，从而增加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机会。例如，获得投票权或实现对低收入者或其他被剥夺公民权的群体的权利的保护，就能增加这些群体将来采取集体行动的机率。同时，取得这些权利也增加了将来获得金钱利益和其他集体利益的可能性。（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民权运动坚决要求给公民参与选举政治的权利（McAdam 1982）。妇女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也是如此。（Banaszak 1996）此外，通过国家导向的方式，集体行动可能为一个群体取得更高级别的权利，这种权利使这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冲突中处于优势地位。（Skocpol 1985）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类型的群体都可能会把国家习惯性地称为一个“支点”，（Tarrow 1994）而非主要以国家为导向。特别是，劳工运动常常以国家层面的目标为中心，以便确保能够组织和参加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就像美国劳工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功做法一样。（Plotke 1996）把这种类型

的利益和其他类型的利益区分开来的一般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增加了由某个群体采取的集体行动所发挥的影响的可能性——即一种元集体利益。(metacollective benefit)

中间层级是大多数研究者探讨的主题，而且还可能是多数抗议活动旨在发挥影响的地方。民主国家的大量活动都涉及到制度化的利益，这种利益能用常规的方式给那些符合特定要求的人带来集体福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官僚政治的方法制定和执行分门别类的社会开支计划，那么这些计划就能通过这种常规方式提供集体利益。受益人获得拥有这些利益的权利，并且这方面的法律和官僚政治对这些法律的强化能确保这些集体利益的正常分配。在这些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成为现实政治中的特殊问题，并且政治体系也变得偏向于受到优待的群体。实际上，此时这个问题也就从有利于这个受到优待的群体的政治议程中去除了。由于形势的变化，挑战这些制度化的利益就成为其他人或群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种利益是汤森运动试图取得的主要利益。汤森计划的一个立法承诺意味着老年人将能从联邦政府那儿得到大量的和均等的养老金。《社会保障法》中有关养老方面的立法可能是汤森运动动员的结果，同时也属于中间层级的类型。在这里，集体利益的程度、范围和保证可能会有很多变化。为了老年人的利益，我们必须要对资格规则、利益数量以及福利的提供方式进行判断。

## 来自国家之外的目标的利益

当然，除了通过国家政策外，社会运动也能带来集体利益。在盖姆森提供的 53 个抗议活动的例子中，(1990) 大概有 20 个群体主要是为了私人的目标。尽管我们认为概念上的任务仍然是相同的——即辨别受益群体和潜在的集体利益以及设法评价实际利益，但是，这些没有国家目标的抗议活动并非都是容易研究的。其中一些群体，如钢铁工人组织

委员会，就是设法直接从雇主那儿争得特别待遇的劳工运动。在许多这类例子中，抗议活动的支持者和集体利益的类型和程度都是容易辨别的。在由行业组织发动的劳工运动的例子中，本行业的所有工人都是受益群体。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工作安全、提高就业福利特别是给予较高的工资都是通常所说的集体福利，这些集体福利是劳工运动设法从雇主那儿争取的，同时也是容易评价的。（Cohn 1993）

那些适用于来自国家层面利益上的相同的层级可能也适用这类动员。从雇主那儿争取的一些特别待遇可能只是一次性的利益，并且其影响也是有限的。例如，为了讨回欠薪而在一段时期内进行的停工斗争可能会取得胜利，或者，由于工人们采取集体行动施加压力，被解雇的工人也许能重新得到工作。在更高的层级上，结构性改革或许能取得胜利，这增加了获得当前利益和未来的集体利益的可能性。例如，作为一个群体，工人也许能争取到决定劳动方法和过程的权利以及投资决定的权利。在中等层级上，工人们也许能用常规的方式争取签订合同或协议，这些合同或协议能确保给一个公司或一个行业的所有工人提供集体福利（诸如较高的工资率或改善福利）。同以国家为导向的目标一样，这一层级也是大多数抗议活动争取发挥影响的地方。在这些相对简单的例子中，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查明到底有多少从雇主那儿争得的特别待遇可以归功于抗议者们采取的集体行动。

然而，在争取其他非国家目标的集体运动中，下面几个问题还不明确：谁应该算作受益群体，什么应该算作集体福利，以及怎样评价这种福利。例如，辨别动物权利运动的支持者就是一个特殊的问题。首先，任何对社会运动影响的分析都能从对潜在支持者的考虑中获得启发。到底是动物还是动物爱好者是受益群体呢？如果有人认为是动物，那么人类对动物伤害的减少将是主要的集体利益。如果有人认为是动物爱好者，那么可察觉到的对动物伤害的减少就不是主要的集体利益。其次，抗议者的目标——想从某些人或群体那里争取到特殊的待遇——有很多而且是变化的。动物权利运动常常瞄向企业、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Jasper

and Nelkin 1992; Moore [this volume]) 像劳工组织一样, 这些运动取得的特别待遇可能是由私人目标直接带来的, 但是也可能是由国家干预带来的。

就像对待国家导向的抗议活动的例子一样, 对那些不具有国家目标导向的抗议活动而言, 我们将不考虑那些仅限于运动的组织和参与者的目标。通过联合领导阶层而从雇主那儿赢得的承诺并不能自动产生集体利益。然而, 某些制度化准入的形式——例如通过民主决策程序贯彻的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权利——或许能囊括到整个行业的所有工人, 因为在决定自己的工作条件时, 受益群体理所当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 大多数已有的职业性的抗议活动, 像动物权利运动、消费者保护主义分子、环保团体, 都或多或少地混合了国家目标和私人目标。为了获得特殊待遇, 这些抗议活动试图把国家拉入到它们争取私人目标的斗争中来。在这种情况下, 结构性改革就有利于受益群体将来达到私人目标, 而对这种结构性改革有影响的立法就会被视为更高层级的影响。

## 文化上的集体利益

近年来, 关于抗议活动的符号性表达 (symbolic-expressive) 的维度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 这就提出了社会运动的文化影响的问题。研究者们认为, 社会运动文化的发展是集体行动的前提。(McAdam 1988; Melucci 1988; Tarrow 1992; Taylor and Whittier 1992) 不过, 大多数关注社会运动和文化的研究者都把社会运动视为文化变迁的工具。例如, 道格·麦克亚当 (1994) 认为, 这种研究想要表明抗议活动可能具有广泛的文化影响, 包括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变化、新的集体利益的形成、创新性行为技能的发展、对物质文化的影响 (例如通俗语言和文化)、对主流的制度文化和实践的影响 (例如大学的课程)。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涉及到我们的集体利益标准。

为了说明有关文化影响的概念上的问题, 我们仅仅探讨上述文化影

响中的一个——集体认同，有时它被视为集体行动的重要结果。（Friedman and McAdam 1992；Inglehart 1990；Melucci 1989；Nagel 1995）然而，这种认同并没有限于那些参与抗议活动的人们，而且它通过抵触羞愧感和增强自豪感还可能给人们带来心理安慰。（Scheff 1994）当然，新的集体认同并不总是有益的，如果它成为人们普遍强烈反对的焦点或者成为集体分裂（这种分裂对后来的集体福利具有破坏性）的原因，那么它就可能给抗议群体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害。（Gitlin 1994）不用说，识别和评价文化利益是比较困难的，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尽管评价一种新的集体认同的潜在利益和潜在损失是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考虑那些与新的集体认同和其他的文化影响相伴随的潜在利益和潜在损失，对研究者来说至少是有用的。

我们还认为，研究者必须要证实抗议活动能扩展到抗议运动参与者的网络而对文化模式产生影响。如果集体认同的改变和创新只限于积极行动者的圈子之中，那么这些变化的影响就是有限的。例如，汤森运动通过地方俱乐部网络，在它的最热心的追随者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集体认同。然而，就像谢尔登·梅辛格（Sheldon Messinger 1955）研究衰落时期的汤森运动时揭示的那样，对汤森运动的识别仍然只限于俱乐部的成员和围绕着微弱的英雄崇拜，并没有延伸到受益群体。尽管汤森认同几乎没有超出汤森运动的影响，但是，对黑权主义运动或女权主义运动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少有的探讨和研究这些更为广泛的运动的例子就是，琼·纳格尔（Joane Nagel）发现在人口普查中美国印第安人种族的数量急剧增加。（1995）她认为，这种种族认同苏醒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印第安人的政治激进主义。

与国家给予的金钱奖励或私人目标给予的物质待遇不同的是，通过抗议者与支持者的关系而不需要涉及第三方就能对文化影响进行精确的界定。人们往往把集体认同从本质上视为一种自我反思。然而，我们想要告诫的是，不要忽略了集体认同还需要外界的认可或确认。（Melucci 1985）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们，特别是大众传媒（Gitlin 1980）和国家都

有助于集体认同的形成。

我们认为，对集体认同的分析可以纳入到对各种层级——这类似于前面讨论过的分类级别——的社会认可的分析框架内。在较低层级上，这种认可也许是短暂的——没有长期的影响。在较高层级上，这种认可就会变得更为稳定和习以为常。我们认为集体认同本身并不是集体利益。然而，只要抗议活动能创造一种新的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不仅能扩展到受益群体，而且还能带来诸如自豪感一样的心理安慰），那么，获得对这种认同的认可就可以视为一种潜在的重要的特殊待遇。最后，对这种特殊待遇的认同可能会对后来出现的以金钱奖励或法定权利为形式的集体利益产生影响。

## 确认抗议活动的影响：方法上的问题

对社会运动影响的研究需要超越对抗议者代表的群体能得到的利益具体化的方法。通常被研究者忽视但又是必要的方法就是：要弄清楚抗议活动的动员和行动是否对集体利益产生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在总体上确认一个抗议活动的影响是较为简单的。证明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抗议活动没有发生，集体利益就不会以它们在抗议活动发生时出现的方式产生。因而，研究者们必须要证明抗议活动已经取得了集体利益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集体利益。我们认为，使用抗议活动的“结果”这一术语使人们倾向于假设一个有待确证的前提——即抗议活动一定能产生影响。当然，并非所有使用这种术语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因果关系问题。（例如，可参见 Giugni 1994；Kriesi et al.1995）在下面有限的篇幅中，我们将重点分析以国家为导向的抗议活动的影响。

确认抗议活动的影响，虽然看似简单，但它却是一个像其重要性一样复杂的问题。抗议活动很少只为一个群体谋求集体利益，而且一个抗议活动的影响还需要同其他抗议活动的影响区别开来。其他情况也可能影响到对抗议活动的支持者们有益的结果。集体利益可能是由与抗议者

无关的原因带来的。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因为经济危机或新的政权都可以解释抗议活动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试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88) 例如，既有的研究可以表明，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以及抗议者以外的行动者都会对社会消费政策产生影响。(Huber, Ragin, and Stephens 1993) 在评价抗议活动对获得集体利益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可能的情况是，如果美国或个别州采取新的对老年人有益的计划，那么汤森运动就不会制定和实行这些计划。当然，这些计划也可能是其他情况的结果，诸如经济萧条或政治变迁。

在研究社会运动的文献中，研究者们使用的确认社会运动影响的方法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我们再一次考虑一下盖姆森的研究。(1990) 他认为，只要抗议活动的议程在抗议活动结束后的15年内大体上得到履行，那么这一抗议活动就可以视为获得了新的利益。然而，如果没有证明抗议组织已取得了成功，而把已实现的议程视为成功的，那么就高估了抗议活动的影响。这样对抗议活动成功的断言在方法上就相当于推定那些在相似的时期或地方出现的现象也是抗议活动的“结果”。得出这种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它忽略了那些对社会抗议和集体利益都有影响的其他的潜在条件。其他研究人员做的更为糟糕，因为他们只假定在集体行动后紧接着出现在某处的情况才是运动的结果(参见伯斯坦1993年的评论)。我们往往通过简单的叙述方法——类似于“抗议活动发生之后不久，国会就对此做出反应……”的叙述方法——来推断这种联系。做出这样的论述依靠的是因果分析中的二元关联性——但这通常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盖姆森的开拓性研究受到他所选取的大量的案例的制约，同时还受到需要制定能囊括这些案例一致标准的制约，而且他的方案还需要密切注意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看法，以及密切注意其他的参与特殊抗议活动的同时代的行动者的看法。多数当代的研究人员既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制约，也没有这么高的历史敏感度。没有证明集体行动和其结果之间的关系就



把结果归功于集体行动的倾向，主要是由于研究人员进行案例研究的缘故。（参见 Ragin and Becket 1992）反过来，案例研究通常受到所谓的识别问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的困扰，其中有很多可以解释捕捉到较少信息的潜在原因。（Lieberson 1991）为此，社会运动影响的研究者们需要使用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来扩展他们的案例研究，以便使他们的主张看似更为合理。多数这些方法都运用了历史分析或比较分析。（Giugni 1994）

就像任何涉及到因果论述的研究一样，研究抗议活动的影响也应该有计划地去评价具体的主张——无论是由某个研究者构想的主张，还是存在于现有文献中的主张。有人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把当前条件中的变量最大化。（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由于对抗议者的影响的理论争论落后于对抗议者的动员的理论争论，所以要想在方法上做出精确的规定是有困难的。在研究国家导向的抗议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主张就是简单假说——即动员和集体行动本身都是有效的；确定的动员形式或集体行动形式比其他的形式更为有效；（Gamson 1990）最重要的是，集体动员或行动的具体形式和特定的政治环境的结合是有效的。（Piven and Cloward 1977； Jenkins and Perrow 1977； McAdam 1982； Kitschelt 1986； 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 Amenta, Dunleavy, and Bernstein 1994； Kriesi et al. 1995）对这些主张而言，为了扩大案例研究的实证维度，那些最常用的方法似乎是可以适用的。

确定抗议活动的潜在影响的最为系统的方法就是从大量的生态单元（ecological units）中获取较多的信息。（Snyder and Kelly 1979）抗议者们通常试图同时在许多地方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社会运动在其活动范围内也越来越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这种方法需要我们能获得有关社会运动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变化的信息，以及获得其他影响集体利益的潜在因素方面的信息和有关集体利益本身的信息。如果有关上述各事项的信息都是可以利用的，那么我们在解释结果的变化时就能把所有重要的潜

在的因果关系条件都考虑进来。相对于评价其他相关情形的影响，我们可以在这些生态单元上使用推理统计的方法来评价抗议活动的影响。对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的因果关系主张（如前面已论述的那些主张）而言，我们应该使用相互影响的规范方法或相似的方法。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通常是在缺少大量的案例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轻易地模拟这种交互关系。（Ragin 1987, 1989; Amenta and Poulsen 1994）任何一种分析形式都可以把时间维度结合起来，例如，为了定性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使用横向分析和时间序列或者专门小组分析以及时间敏感度方法的分析。

那些掌握案例资料较少的研究人员或者对那些不可能为大规模研究所轻易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员，总是使用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实证资料的历史悠久的方法。（Amenta 1991）为了评价这些命题（propositions），我们可能需要采用许多小规模样本的比较分析。其中一些可能的比较分析类别包括：跨单元（即动员抗议者的单元）的比较分析、跨抗议活动（即特定单元里的不同的抗议活动）的比较分析以及跨结果（即集体利益的结果）的比较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抗议者要么被动员，要么没有被动员，要么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动员。而在这些种类的比较分析中做出选择将取决于被评价的命题。

在对抗议活动影响的历史考察中，研究者可以有限使用一些常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把抗议者动员的结果或集体行动的结果与利益结果做比较，例如，盖姆森就用这种方法研究了运动参与者的看法、分析了当代社会运动观察者的意见以及历史学家的观点。集体行动与结果之间相互作用的不足可能表明行动的影响不大。因此，过去对这种抗议活动的一致看法就是它缺乏影响力。然而，行动与结果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各自的论据也可能是相互对立的或者是有偏见的。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通常还需要比较分析方法。

我们将用一些有关确认以国家为导向的抗议活动的影响——我们的主要课题——的评论来结束本节。对立法发展中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的

方法完全可以用于对社会运动影响的研究上。(Kingdon 1984; Burstein 1993) 为了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 任何历史分析都需要证明抗议活动至少做到了下述事项中的一点: 改变了政治领袖的计划和议程, 对行政人员、立法议员或管理人员提出的议案的内容产生了影响, 对那些在立法议案的通过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又公正无私的代表产生了影响。要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了解在抗议活动发生前的政治领袖的议程和立法计划的内容, 而且我们还需要估定一下: 如果没有发生抗议活动, 立法议员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举。

把新的包含集体利益的法律分解为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的做法可以简化我们的分析方法, 从而使我们对抗议活动影响的辨别成为可能。如果一个抗议活动能成功地使其关注的问题提上政治议程, 我们就认为它已经增加了将一些集体利益(其价值尚不明确) 纳入到立法议案中的可能性。就立法计划的内容而言, 抗议者们会千方百计地提升那些能被有关问题的立法所囊括的集体利益的价值。这种类型的集体利益在议案内容中还将被具体化。而且, 一旦立法议案的内容得到细化, 抗议者们就能对个别立委产生影响并使他们投票支持这个议案, 因而也就提高了抗议者们获得特定的集体利益的可能性。换句话说, 抗议活动能对这些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过程产生影响, 都将增加集体福利对受益群体的预期价值。

我们认为, 抗议者们在影响这些过程的某一部分时也许是有效的, 但未必能取得新的集体利益。因为使一个问题提上政治议程仅仅是增加了行动的可能性, 而改变一项议案的内容也仅仅是影响到其潜在价值。除非下面的三个过程都能成功地通过——把问题提上议程、把集体利益写进议案中以及通过议案——否则, 抗议活动将不能带来集体利益。即使这三个过程都能顺利地通过, 也未必表明一个抗议活动就能产生影响; 同时, 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能够影响到所有这些过程也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情况。另外, 我们还认为, 如果一个抗议活动能使一个问题列入议程, 或者是增加了现有立法中的集体利益, 或者是提高了民选官员支持这种

立法的可能性，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有利的影响。当然，这种部分的成功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 结 论

在社会运动和对抗性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社会运动的结果越来越感兴趣。毕竟，人们参加集体行动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获得集体利益。然而，研究社会运动的影响不仅需要理论思维——这种思维能把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动员的影响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关注新的而又难以解决的概念上和方法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简要地对有关这些问题的常用方法（standard approaches）和我们自己的方法进行了比较。

首要的概念上的问题就是界定什么才能算做重大的影响。普遍的观点是以“成功”来衡量的，例如，通过抗议活动赢得的新的利益和制度上的准入（institutional access）来界定成功与否。这种观点认为，新的利益是根据抗议者提出的具体要求来界定的：如果抗议者的要求大体上得到满足，那么抗议活动就可以视为成功的；否则就是不成功的。这种定义侧重于具体的社会运动组织，相对容易理解和使用。

然而，我们认为研究人员应该重点研究与抗议者们预期的受益群体相关的潜在集体利益。这与普遍的看法是不同的，首先是因为我们考虑到的与此相关的仅有的现象就是新的利益。我们认为抗议活动的认同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并不能援助任何人，甚至还可能给受益群体带来损害。此外，我们还认为从集体利益中取得的团体利益（groupwise goods）是很难排除团体成员的——任何抗议活动或抗议者获得的这种利益的种类越多、价值越大，其影响也就越大。

我们的集体利益标准具有若干蕴涵。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发现了比普遍看法所隐含的潜在影响更为广泛的潜在影响。根据这些普遍看法，抗议活动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根据我们的观点，抗议活动可能取得较大或者较小的集体利益，但是，如果集体行动发生意外，它们也可能给自

己代表的群体带来集体公害。此外，根据我们的看法，在一般意义上取得完全成功的抗议活动却可能没有带来重大的影响。当抗议活动实现的计划仅仅含有较小的集体利益时，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相应地，当抗议活动的计划含有非常大的集体利益而仅仅得到部分实现时，这种没有取得成功的抗议活动却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的标准不仅适用于通过以国家为目标导向的方式取得的集体利益，而且也适用于通过其他目标的方式取得的集体利益以及适用于文化利益（例如集体认同）。

集体利益标准对研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建议，研究人员首先应该考虑抗议者们所代表的群体。然后，研究者应该分析抗议者的计划，把集体利益同作为取得这种结果的潜在手段的目标区别开来，以及把集体利益同尚不太清楚的目标区别开来。另外，研究者还需要认真考虑那些没有被抗议者的计划所涵盖的群体的潜在的集体利益。

为了确定抗议活动的影响，研究者必须要超越常用的方法论策略——这些策略通常是假设的，并没有得到证明。关键的方法论问题是：如果没有出现抗议活动，将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对研究抗议活动影响特别重要，因为对抗议活动有影响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抗议者所代表的群体的集体利益。许多常用的社会科学方法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在对来自国家的集体利益的所有的历史分析中，我们认为有用的做法就是：把政策制定（policy-making）过程分解成议程安排的各个环节、细化立法的内容和颁布法案。这种区分方法使人们对任何抗议活动的成功程度进行分析成为可能，同时还使人们分析抗议活动影响的发生过程成为可能。

然而，这些结论并不能代替对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影响的理论化。事实上，如果没有关于这种影响的理论预设，就难以对其进行研究。不过，通过密切关注这些概念上和方法上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对社会运动影响的研究将更为深入，同时有关社会运动影响的理论也将更为深化。

注：我们要感谢瓦内萨·巴克、德鲁 T.哈夫曼、凯利·摩尔和本卷书的编辑，感谢他们对我们先前的草稿所做的评论和所提的建议。本研究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SES-9210663）

### 3. 社会运动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对美国和瑞士采用直接立法的比较分析

汉斯彼特·克里西和多米尼克·威斯勒

人们认为政治制度是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中最稳定的要素，几乎超出了社会运动的范围。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制度的制定者特意把政治制度设计成一种具有持久性的机制，从而使抗议者难以改变它们。制度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为它们符合长期的规划。此外，制度还具有使自身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内在机制。（built-in mechanisms）制度之所以趋向于形成一些使自身能够维持下去的偏好模式和信念模式，是因为人们的需要和愿望受到他们对可以利用的机会的洞察力的制约。在“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s）机制的调解下，如果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愿望，那么他就得解职。（Elster 1983, 1988: 311）政治制度易于把人们的偏好引向特定的方向，使人们的视野变得狭隘，从而使人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出切实可行的选择。正如桑斯坦（Sunstein）评述的一样，由于集体行动面临的难题和适应性偏好现象的存在，所以我们很难在政治制度上实现重大的变革。

当然，这并没有排除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有很大的争论空间。本文将对人们为了争取民主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斗争的历史阶段进行分析。所谓民主的制度化，换句话说就是直接立法（direct legislation）的制度化——这既是19世纪60年代瑞士民主运动的主要问题，也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西部的民主运动的主要问题。直接民主的例子使我们能从更加普遍的角度去思考社会运动是如何实现制度变迁的问题。我们认为，制度变迁意味着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

的范式转换 (paradigmatic shift)。这种转换只发生在重大的社会危机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给根本的社会学习 (social learning) 和采用一套新的制度 (即新的政治范式) 提供了机会。然而，这种社会学习必然受到人们过去经验的制约，这也是新的范式为什么必须要与过去的政治传统 (political heritage) 产生良好“共鸣”的原因。最后，我们将要辨别三个能够促进制度创新并对我们在本文中研究的民主运动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必要条件：即联邦制、国家制度化的不足和政治精英的分化。

## 范式转换及其法国模式

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的范式转换。根据库恩 (Kuhn) 对科学史中范式转换的论证来类推，政治制度的范式转换是由旧的范式结构 (即已经建立的制度) 没能顾及到的“异常现象”引起的。范式转换使一套新的规则制度化，这套规则不仅给“常态政治” (normal politics) 界定了新的框架，而且还开创了常态政治的新时代。就直接民主而言，这种转换是从“代议制政府”的旧范式向“由人民直接立法”的新范式的转变。

这种新范式的起源不仅可以追溯到卢梭 (Rousseau) 和孔多尔赛 (Condorcet) 的思想中，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中使这些思想成为历史现实的两个连续性的宪法方案中 (Klz 1992) ——即 1793 年 2 月的吉伦特派宪法和 1793 年 7 月的山岳派宪法。山岳派宪法采用了一种新的选举立法机关的公民投票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个人而非地区第一次成为计算选票的依据。这种计算选票的模式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有关公民权的新观念，构成了现代直接立法范式的主要特征。(Klz 1992; Curti 1885: 83) 在激烈的革命活动期间，这些宪法从未得到实施，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使这种新范式突然终止。尽管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仍然延续着这种范式的思想火花，如科斯德沃特 (Considérant) 与和平民主派 (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的观点，但是直接立法在法国宪法传统中却越来越



边缘化。根据弗莱 (Frei 1995) 的看法, 这两部宪法都被视为革命的乌托邦, 并没有给法国政府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然而, 19 世纪在美国和瑞士发生的强大的社会运动延续了现代的直接民主范式。这两大运动最终都在各自国家成功确立了这种新范式。对瑞士民主运动而言, 19 世纪 60 年代是至关重要的 10 年, 因为在这一时期重要的苏黎士州, 通过连贯地介绍和推广当时为人们所知的一切直接立法方法, 通过了后来被视为瑞士最为民主的宪法。仿效瑞士各州和瑞士联邦政府树立的榜样, 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一些州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采用了这些直接立法方法中的一些。

史学界把瑞士“民主运动”描述为一场采用集体行动来获取直接立法权利——特别是 19 世纪 60 年代的立法创制权和任意的公民投票权——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其他主张包括直接选举行政官员和政府职员 (如法官和教师)、税制改革和创建国家银行。尽管瑞士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就提出了争取更多的直接民主的主张, 但是那些早期的社会运动却很少有取得成功的, 而且运动的范围也极其有限。然而, 圣加尔州和巴塞尔地区却早在 1831 年和 1832 年就首先采用了所谓的否决权 (veto)。<sup>[1]</sup> 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 有一些州纷纷效仿这种做法, 但是, 根据科蒂 (Curti 1885) 所说, 当自由主义者控制的各州意识到使用否决权可能会导致自由党人的政府垮台时——就像 1841 年卢塞恩的情况一样, 这一浪潮就迅速结束了。因而, 1842 年苏黎士否决了要求否决权的提议。然而在 18 世纪 60 年代, 一场由农民、工匠和工人广泛联合的民主运动获得了更多的动力。在 1867 年到 1869 年间, 这场运动首先在苏黎士州取得胜利。之后, 这种直接立法范式迅速蔓延到其他州, 到 1874 年, 联邦政府也采用了这种范式。

20 年后即 19 世纪 80 年代, 在联合了农民和工人的平民主义运动 (populist movement) 的推动下, 直接立法运动在美国兴起。就像在瑞士一样, 美国在宪法层面上已经使用了公民投票——1778 年马萨诸塞州宪法是第一部经公投通过的现代宪法。此外, 还有一些州使用全民投票



(plebiscite) 的方法，即是一种由当局酌情采用的公民投票方法，有时候在立法中也能用到。然而，在平民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南达科塔州在1898年率先采用了新范式所规定的公民创制权 (initiative) 和公民投票。随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部分州都纷纷效仿南达科塔州的做法。

美国两波直接民主的宪法修正案浪潮是有区别的。与平民主义运动推动的第一波浪潮（从19世纪90年代到1920年）相伴随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进步主义运动 (progressive movement)，进步主义运动是一场试图通过“好政府”改革来消除腐败行为和政党庇护的中产阶级的运动。在争取直接民主的斗争中，禁酒主义者和妇女参政主义者在第一波浪潮中通常都是盟友，而且这一运动几乎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各州都取得了成功。（例如，可参见 Price 1975）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浪潮与新社会运动 (new social movements) 的兴起有关。虽然在第二波浪潮中只有佛罗里达州、怀俄明州、伊利诺州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创制权，但是直接民主却成为许多其他州考虑的对象。（Cronin 1989: 51）

## 危 机

通过对盖姆森经典研究 (Gamson 1975) 的重新分析，戈德斯通 (Goldstone 1980) 发现，社会运动更可能在危机时期（例如，大的战争时期、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时期）取得成功。那些适用于一般的社会运动的条件也将适用于那些特殊的要求制度变迁的运动。根据西根舍勒 (Siegenthaler) 的说法，经济危机的核心就是人们对既有的一套规则失去了信心。（1993: 178）尽管人们对根本的社会制度失去信心并不能导致一场危机，但是它却是一场危机的显著特征。人们信心的丧失可能是由于社会中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反过来，这种不确定性又可能是由于稳定的经济发展中的分配效应 (distributional effects) 带来的。在西根舍勒的理论模型中，结构稳定时期会逐渐向过渡时期或中间时期过渡——即向我们术语中所说的危机时期过渡，在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认



知规则体系的结构变得更具有适应性；与此同时，根本的社会学习过程也开始了，并且社会组织也经历着变化、被重新创造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联系。在这一时期，政治体系的制度规则会受到剧烈冲突和一直变化着的风险的冲击。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适当利用这种高度复杂的理论模型，但是我们相信它能提供一些详尽有力的论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制度变迁更可能发生在经济危机时期。

历史研究中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19世纪60年代瑞士的民主运动和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平民主义运动都发生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这两个运动都是由一场使相当可观的增长时期结束的经济危机引发的。沙夫纳（Schaffner, 1982）描述了苏黎士的情况，布鲁姆（Blum, 1977）和艾普（Epple, 1979）描述了巴塞尔地区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是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背景。沙夫纳注意到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在苏黎士州经济增长时期发生的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棉花和丝绸行业的发展和扩张创造了新的财富，但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另外，增长时期还造成了地区之间的新的差距，特别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例如在铁路问题上。此外，资本市场的转变深深地改变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农场主在资本市场需求方面失去了传统上的优势地位，不得不去适应资本市场上已经发生变化而还没有在农村地区植根的规则。在许多方面，这种增长时期都破坏着过去的确定性，并造成了只有在危机时刻才会变得非常明显的紧张局势。

在苏黎士出现的这种危机冲击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对农民来说，他们经历了19世纪60年代一系列的坏收成，这被视为在1866-1867年间悲惨的比例。在已经很高的抵押水平上提高利率和降低粮食价格使农场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一地区的两大产业——棉花和丝绸——也陷入了从1864年开始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它们才开始恢复。同时，工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而消费品价格却上升了。最后，手工业工人也遭遇了普遍的需求不足。沙夫纳得出结论，“这种危机同时影响到工厂工人、散工、雇工、农场主和手工业工人”。（1982：

133) <sup>[2]</sup> 他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同时遭受危机使受到这些危机冲击的农场主、工人和手工业制造者的自觉意识得到增强,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持续着”。<sup>[3]</sup> 另外,1867年霍乱流行,同苏黎士经济危机一起,不仅加剧了城市工人阶级生活环境的恶化,而且还引起了更多的公众对这些生活环境的关注,并以极其引人注目的方式揭露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克罗宁(Cronin)指出,“繁荣和萧条”(boom-and-bust)的循环周期不仅影响到边缘地区的农民和矿工,而且在经济低迷时期还激起人们对精英阶层的不满和怨愤,从而引发人们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呼声。(1989: 43) 丹尼尔·谢伊斯起义(Daniel Shays's Rebellion)、一些反对联邦主义者以及后来的杰斐逊派(Jeffersonian)的联邦党人和杰克逊派(Jacksonian)的民主党人的出现都是这种情况。格兰其(Grange, 成立于1867年的美国全国性的保护田庄农民利益的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农民协进会”)、农场主联盟、亨利·乔治学派的单一纳税者联盟和人民党(平民党)都是具有平民主义倾向的团体,这些团体在1875至1895年间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降得非常低,从而导致一些农村地区的农业实际上都是亏损经营:

这些农民和其他饱受经济低迷之苦的人们都期望回到他们自认为没有受到剥削的稍早的年代——在这一年代,既很少有大富翁,也没有乞丐;既很少有垄断者,也没有经济不景气。总之,平民主义精神既源于人们的这种怀旧心理,也源于人们诚挚地希望社会能回复到工业主义、大规模公司资本主义和农业商业化之前的优越环境中的心理……。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丧失抵押赎回权的农场的数量猛增。例如,在堪萨斯州的一些农村地区,贷款银行逐渐获得90%的农场的所有权。得不到贷款、更为严重的债务、苛刻的税收和上涨的铁路运输费用使那些不满的人们开始怀疑这是一场阴谋——即金融资本家为了把他们束缚在

经济奴役状态中而策划的一场阴谋。(Cronin 1989: 44; 也可参见 Argersinger 1974)

通过从社会层面对南达科塔州边疆的某个农村地区中具有平民主义倾向的农民进行分析,迪伯恩(Dibbern 1980)发现,这些农民既不是本地人也不是穷人,他们通常是19世纪80年代在边疆地区农业得到极大发展和人口迅速膨胀时迁入这一地区的移民。在“经济繁荣”时期和这一时期良好的气候条件下,他们大量投资,成为了小业主。到了90年代,价格下降、人口减少和降雨量减少引发了“经济萧条”,由于这些农民负债累累,所以他们就成为“经济萧条”的受害者。迪伯恩写道,“如果没有好的收成,这些农民想要支付清利息和保留自己的农田几乎是不可能的,平民主义正是源于人们的这种脆弱性。”(1980: 214)

当然,危机的先决条件对那些塔罗(Tarrow 1994)称之为“早期反抗者”(early risers)的运动是至关重要的。而对后来的社会运动来说,就像麦克亚当(McAdam 1995)指出的那样,危机的重要性可能会越来越小,因为其他的有利于新的政治范式从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扩展和蔓延的机制逐渐生效并发挥了作用。

## 分析框架

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下,除了发生社会革命的特殊情况外(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是用武力强行建立的),大部分人的社会学习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先决条件。这就意味着观念在这种学习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Hall 1993)就像西根舍勒(Siegenthaler 1993)所说的那样,危机能增加特定类型的根本社会学习的可能性。但是,危机将可能引发人们丧失对既有规则的信心并使人们为根本的社会学习做好广泛的准备,即使这是可能的,那么它也绝不能说明危机的根源就可以归因于政治游戏的基本规则,而不是归因于具体立法的一些因素或者是治理经济和其他

一些社会子系统的规则。根据斯诺 (Snow) 和本福德 (Benford) 对“判断”框架 (diagnostic frames) 和“预测”框架 (prognostic frames) 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出, 只有当人们判断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既有政治制度造成的缺陷或异常引起的时, 并且他们还相信采用新的政治范式将会大大改善他们的处境时, 他们才会质疑旧的政治范式。埃尔斯特 (Elster) 认为, 有关宪法变迁的重要争论——“预测性”标准——可能都是推理性的, 因为我们很难事先就能预知到大多数制度变迁的实际结果。他争辩说, 这就是为什么新的政治范式通常要从有关正义的争论中获得合理性的原因所在。<sup>[4]</sup> 埃尔斯特指出, “如果人们认为一场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正义的, 那么, 在找到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之前, 他们将会积极地承受由广泛的改革试验带来的代价和承担过渡期的风险。” (1988: 319-20) 他还补充说, 像其他的规范一样, “正义和公平规范对解释和运用它们的语境有着强烈的依赖, 特别是, 它们很容易受到分析框架和重构的分析框架的影响。” (316)

对美国平民主义运动或进步主义运动和瑞士民主运动而言, 诊断危机的根源的方法是非常相似的。这两个运动都把危机归因于代议制民主体制的缺陷, 因而, 它们都试图通过采用直接民主的方法来克服这些缺陷, 尽管当时其他的运动都没有提出这些构想。为了详细说明瑞士民主运动的分析框架, 我们只研究苏黎士州的民主运动, 因为它比其他的例子更好研究。对于美国的例子而言, 我们通常使用有关平民主义或进步主义运动的二手文献和资料, 尤其是克罗宁的论述。(1989)

苏黎士民主运动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个运动动员人们反对十五年来一直统治该州的自由主义者。更具体地说, 它动员人们反对“埃舍尔体制” (system Escher), “埃舍尔体制”的名称来自于这一时期一位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人物的名字——阿尔弗雷德·埃舍尔 (Alfred Escher) ——他不仅是这一地区的一个主要银行的负责人和扩展铁路工业的关键角色, 而且还是苏黎士政府的主要成员和联邦议会的关键人物。一本 1867 年出版的论述苏黎士民主运动的小册子这样评述“埃舍尔体制”:



“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体制呢？它是这样一种体制——即能使这一地区的金融界、贷款银行、铁路公司以及幕后的集团和政府结成联盟的体制”。（qtd. in Curti 1885: 219）卡尔·伯克利（Karl Bürkli）——这一运动的领袖之一，在一次由这一运动组织的公众集会上用下面这些言语详细说明了埃舍尔体制：

我认为，这种体制对商业资本家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东北铁路公司（由埃舍尔控制）有着重要影响——它是商业资本家们的总部和信贷银行（也由埃舍尔控制）……。这种体制就像霍乱一样，虽然没有和你直接接触，但是你却能感觉到它对你的束缚。如果说我们在 1830 年推翻旧的、腐朽的但具有合法性的城市贵族统治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推翻新的、日益壮大的但不具有合法性的金钱贵族统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Qtd. in Gross 1983: 35）

在这里，伯克利不仅提到了当时荼毒苏黎士人的霍乱疫情，而且还提及了几乎是两代人之前的光荣时期——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革命推翻了贵族统治的政权，但是在战败拿破仑之后，这种贵族统治政权在瑞士又重新建立起来。瑞士民主党人使用的是“代议制贵族统治”用语，而不是“金钱贵族统治”的用语，这就表明新的大财阀（这些大财阀已经掌控了代议制民主的公共机构）的贵族统治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贵族统治。瑞士民主运动的主要鼓动者在一系列小册子（其中有一个小册子在不足 60 000 个公民的政治实体中售出 30 000 多册）中声称，我们的共和国已经遭受到一群肆无忌惮的贪婪的人（这些人把自己的物质利益看的高于道德和正义）的摧残和破坏。（Schaffner 1982: 166ff.）

对美国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的分析和对瑞士民主运动的分析是类似的。1870 年末，雷·比林顿（Ray Billington）这样描述美国的平民主义观念：“一方面是许多垄断企业、金钱权贵、大托拉斯和铁路公司的

联盟，它们试图制定对自己有利但将使人们变得穷困的法律；而另一方面是农民、劳工、商人以及所有其他的创造财富而又承担税收负担的人们”（qtd. in Cronin 1989: 44）。人们认为，正是大公司在腐蚀着公务员和立法者，就像威斯康星州的进步主义者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所说的那样，“看到诚实的人们在险恶的势力面前变得堕落起来，真是一件可怜和可悲的事情”（qtd. in Cronin 1989: 56）。大公司要么使公务员和立法者屈服于物质境遇的威胁，要么用华盛顿的职位任命来吸引他们，要么用金钱和女色来诱惑他们，甚至使用在重要的选举前把立法议员灌醉的花招。有人认为，直接民主能“减小腐败对立法机关的影响，削弱寡头控制（尤其是指首领对政党或政治机构的控制），促使立法者更多的关注民意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Cronin 1989: 53）。1899年，旧金山公民最终投票赞成新的城市宪章，这是在城市一级上采用公民创制权和公民投票，公民宪章委员会在旧金山公民发表的宣言中宣称：

我们呼吁所有的好公民都要支持去年12月当选的自由拥护者，并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把旧金山从寡头统治、水电公司、铁路公司以及垄断行业的统治中挽救出来，因为这些公司和行业往往与城市政府进行交易，除非它们受到限制，否则它们在将来将像在过去一样腐蚀我们的政客、掠夺人们的财产和破坏法律的实施和运作秩序。（Qtd. in Oberholzer 1912: 352）

直接立法是这两个运动的预测性标准的主要内容。卡尔·伯克利写道，“我们在哪儿才能找到补救代议制体制的良方呢？我们找到了由人们直接立法的方法，因为代议制体制太容易被腐败势力所渗透。”（qtd. in Gross 1983: 33）1867年12月，所罗门·布鲁勒（Salomon Bleuler）——另一个运动的主要的倡导者——在他给一个公民集会做的演讲中使用了一个病理性比喻来形容这种解决方法：“人民权利的扩大冲击了人们全部罪恶的核心和关键神经，它不仅削减了人们追求的片面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消除了个人及其虔诚的追随者的优越感”。(qtd. in Gross 1983: 28) 苏黎士民主运动要求由该州公民选举的修改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要赶快对该州的宪法进行全面修改。

直接民主范式并不是民主运动的发明和创造。正如奥斯特罗姆 (Ostrom) 所说的那样, 改革主义者想到的一套特殊规则“并不能包含一切可能存在的用于治理各种情况的规则。被提议的这些规则可能只是提议这些规则的人所熟悉规则的一部分”。(1990: 209) 从这个意义上讲, 现有的政治制度结构既给人们寻找替代性方案提供了动力, 也限制了人们寻找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卢塔德 (Luthardt 1994) 也提出类似的观点。直接立法的新范式受到了美国和瑞士更早的直接民主形式的启发, 它只是反映了这些统治形式的现代化, 而不完全是一种创新。同时, 这种新范式还具有很高的“叙述保真度” (narrative fidelity), 因为它不仅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故事、神话和民间传说产生了良好的共鸣, 而且还具有报告近期的事件和经验的功能。(Snow and Benford 1988: 210) 就像库尔兹 (Kluz 1992) 证实的那样, 19 世纪 30-40 年代瑞士自由主义改革者们已经尝试了直接民主方法并采用了一些直接立法的基本要素, 例如在瑞士联邦的一些州受到欢迎的“否决权”, 虽然这些改革者没有明确承认这些直接民主方法的来源, 但实际上这些直接立法模式却取自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法。然而, 法国大革命也没有创造这种直接民主范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1887 年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采用由公民投票通过的民主宪法的州。此外, 许多学者 (例如, 可见 Auer 1989) 认为, 美国一些州采用的直接民主方法来源于稍早的新英格兰的镇民大会形式和加尔文教“共同同意” (common consent) 的思想体系。因此, 平民主义运动的领袖们认为, 这种新范式并不是一种新的政体形式, 而是较早的美国自治形式的复兴。

在瑞士, 民主运动不仅使自由主义思想变得激进起来, 而且还把自己宣称的直接民主主张与阿尔卑斯山地区古老的有关直接民主的公众大会的流行神话传统联系起来, 以及把自己宣称的直接民主主张与日内瓦、卢塞



恩、弗里堡和圣加尔等城市参议会的传统联系起来。(Battelli 1932)<sup>[5]</sup> 瑞士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都不接受这种公众大会的传统。就像库尔兹指出的那样，他们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引起政治分裂 (political fragmentation)，因为在较大地区只有实行地方分权的议会才是可行的。(1992: 628) 此外，他们还怀疑人们能否接受他们的进步主义思想。最后，他们想要一种绝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化的民主，而不是合作的或公共的民主。恰恰相反，民主运动显然是以本土的共和主义传统为基础的。如果伯克利 (有人称其为新范式的“最清醒的领导者”，Curti 1885: 216) 都严重受到法国宪法模式和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者 (如 *Considérant*) 的思想的影响，那么他和同事们也就能回想起传统的集会民主 (assembly democracies)，因为这些在 17、18 世纪的贵族统治中幸存下来的集会民主给他们领导的民主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和思想支撑。(Kluz 1992: 629) 民主运动的理论家们试图论证新范式只不过是传统范式的现代化。卡尔·伯克利写道，“君主专制主义的愚昧无知和对神父的盲目信仰使人们摒弃了古代的民主，所以我们应该用理性和科学来恢复这种民主，并使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现代化。” (qtd. in Gross 1983: 39) 毫不奇怪的是，为了发起一场争取新宪法的运动，苏黎士民主运动在 1867 年 12 月 22 日举行了纪念乌斯特日 (the Uster day) 的庆祝活动；同时，苏黎士民主运动还组织了一系列被其倡导者和支持者们称为 *Landsgemeinden* 的公众集会，这些集会在 1867 年 12 月举行的四个大型的公众大会中达到高潮。

就像在美国一样，直接民主在瑞士也被认为是一种解决由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所带来的问题的方法。在这两个国家，主张直接民主的运动提出了相似的额外要求，例如，创立国家银行或州银行以便缓解农民贷款紧缩的压力。另外，这两个国家的运动也给他们的对手树立了相似的形象：这两个运动都动员人们反对“头头”统治的世界、“金钱”统治的世界和“腐败”盛行的世界。根据对这两个运动的形象化的描述，代议制政治体制之所以失灵，要么是因为它被寡头政治集团和金钱精英阶层



控制——就像苏黎士的“埃舍尔体制”体现出来的特征一样，要么是因为它易受强大的利益集团控制——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直接民主被视为是补救代议制政治体制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唯一方法。直接民主的目标就是杜绝“头头”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参见 Mckli 1994：176-77）

我们不仅对美国 and 瑞士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比较，而且还对那些政治传统中没有直接民主因素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比较。这些比较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观点——即在文化上与新的统治结构产生共鸣是至关重要的。美国 and 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对采取直接立法的社会改革的可能性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权是“通向新世界的桥梁”，而那些没有直接民主传统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既对直接民主的承诺没抱多少希望，也不倾向于把工人阶级的困境归因于代议制体制的失灵。因此，1869年9月当卡尔·伯克利在巴塞尔举行的第4次国际工人协会大会上提倡直接立法时，就显得相当孤立。（Gross 1983：40-41）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讨论直接民主，只是在大会快结束的星期五晚上的会议中讨论了直接民主。伯克利的提案受到比利时代表的强烈抨击，这些代表认为直接立法观念并不适用于比利时和法国的政治环境，他们还主张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参与政府的政治活动从而赋予它们合法性。尽管直接民主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计划的一部分，但伯克利认为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种“装饰”。（qtd. in Hernekamp 1979：234）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也反对直接立法：马克思把它称为“全世界都知道的古老的民主律法（democratic Litanie）”，恩格斯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时尚”，考茨基告诫人们要注意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反动的、保守的结果。（qtd. in Heussner 1994：58）相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就有助于带来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早在1885年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就在全国性的政治纲领中采用了直接民主（Heussner 1994：44），而后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02年也宣称采用直接民主。（Cronin 1989：164-65）



## 结构性条件

这些社会运动成功地确立了新的范式，这是如何可能的呢？我们认为，社会运动的主张与美国和瑞士的政治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共鸣，仅知道这一点是不够的。除此之外，它们也与相似的政治机会结构相吻合，这些机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能推动社会运动取得成功，但这些结构却不存在于那些还没有实行直接民主范式的国家。下面我们将讨论这种政治机会结构的两个方面——联邦制（Federalism）和国家制度化的程度。

### 联 邦 制

首先，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给这两个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联邦制国家结构减少了那些试图改变政治制度的社会运动在发起时的困难。联邦制下的地方分权造成了基于地域标准的部分间的差异问题。这种差异暗含着不同的子系统都要履行相似的功能。此外，这些子系统都是在相同的涉及所有的制度框架中运作的，也就是说，这些子系统都或多或少地以相似的方式发挥作用。就纯粹的可能性的原因来看，与单一制国家的单一系统比起来，联邦制国家的任何一个并行的子系统更有可能满足那些能促进旨在带来制度变化的社会运动取得成功的条件。那些能够促进制度变化的社会运动可以定期监督不同地方当局的行为和测验它们对新范式抵制的强度。一种政治制度平行的切入点的增多将会增加这种制度在某一点或其他地方产生的可能性。在特定的子系统中，如果经济和社会环境施加的压力特别强烈，那么这种可能性还会增加。例如，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60年代瑞士经济危机加上霍乱的流行既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又加重了当地工人阶级被遗弃的感觉。这种巧合出现的情况对苏黎士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苏黎士没有自己的能够对这种情形直接负责的政治制度，那么这种巧合可能就不会如此重要。

此外，联邦制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州的规模越小，越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最终取得成功。无疑，这在19世纪体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当时的运输和通信并不像今天这样便利。就像沙夫纳（Schaffner）报告的那样，在苏黎士州，民主运动的对抗性集会聚集了至少15 000人，大约是当时有选举权的公民的1/4（1982：43）。1867年年底，在集会的领导人提交给苏黎士政府的请愿书中，大约有27 000个公民署名。而这种大规模的动员在较大的政治实体内就不可能出现，因为它需要克服由更远的距离和更长的通信线路带来的问题。在没有大量的通信设施、电话和因特网时，人们为了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抗议、充分了解新的计划以及讨论由运动领袖提出的建议时，就不得不亲自见面或集会。<sup>[6]</sup>

如果说社会运动在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州比在单一制国家的行政区更可能取得初步的成功，那么联邦制结构也给传播这种初步的成功提供了机会。与奥斯特罗姆（Ostrom）一样，我们也将强调制度变迁的累积的、自我转换的性质：“在小规模的初始制度上的初步成功使很多个体都依赖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从而使得能够通过更大和更复杂的制度安排来解决更多的问题”。（1990：190）换言之，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的制度和在相似的环境中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比以前没有实行过的制度更容易被人们采用。联邦制国家结构允许这种小规模的小规模的试验，（参见Aubert 1983）一场运动在某一环境中取得成功就增加了它将在其他相似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也是在联邦制结构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一套新制度在某一环境中的成功实施能够增加这种新范式在其他类似的环境中实施的“经验上的可信度”。（empirical credibility）就像斯诺和本福德已经阐释的那样，“经验上的可信度”就是指“框架和现实事件之间的适合程度”。（1988：208）与斯诺和本福德一样，我们也认为，到底是什么才能成为任何特定主张的经验依据的问题本身就容易引起争论。然而，就像盖姆森所说的那样，（Gamson 1992：69-70）<sup>[7]</sup>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对于解释一种范式之所以优于其他范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邻近的、非常相似的政治系统内的公民都能参与到直接民主

过程中来，如果政治系统没有被这种新方法所动摇而是通过采用这种新方法变得更加稳定，那么对旧范式的拥护者而言，想提出相反的意见将会越来越难。一场“创始者”运动在某一环境中取得了成功对联邦制国家其他环境中类似的运动有两个主要影响：一是它使其他环境中类似的运动处于达到相同目标的压力之中，二是这些类似的运动需要借鉴成功的运动是如何实现这种目标的。就像高尔兹在扩散障碍模型中所说的那样，（Goertz 1994）我们可以预想，一旦抵制新制度的障碍在某一环境中崩溃了，那么这种崩溃在其他相似的环境中就变得更为可能，于是新制度也就可能迅速扩散到所有地方。

新的直接民主范式在瑞士的传播证实了这些预想。苏黎士不是第一个采用新的直接民主方法的州，但是它在推广新方法的范围上却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已经证实，苏黎士州民主运动的成功对新范式进一步传播到其他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苏黎士州在 1869 年采用新宪法后不久，图尔高州、索洛图恩州、伯尔尼州和卢赛恩州都纷纷效仿。次年，阿尔高州也采用了类似的直接民主宪法。（参见 Gmurr 1948）其他各州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也都纷纷效仿。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1874 年联邦一级也采用了随意的公民投票方法。

至于美国的例子，一些作者已经指出，城市最近获得的地方自治权对传播直接民主方法起到重要作用。（Mckli 1994： 175）奥尔（Auer）发现 19 世纪末期的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和各州采用的“地方自治”原则对直接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更为具体的说，在西部，当地方社区和大城市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组织自治权（这些组织自治权使它们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后，一切事务似乎都要从地方社区和城市开始”。（1989： 111-12）实际上，公民创制权的最初形式就是在美国地方一级发现的。奥博候泽尔（Oberholzer）提到很多例子。（1912： 387-88）1897 年，爱荷华州首先在县一级采用了直接民主方法。1898 年，内布拉斯加州的各个城市采用了公民创制权和公民投票，这比国家一级通过类似的立法早了 14 年。同样，1893 年，加利福尼亚州在县一级采用了直接立

法，而在 1898 年至 1910 年间，14 个地方自治城市也相继采用了直接立法，都比国家一级在 1911 年通过这种立法要早。（Key and Crouch 1939： 428）

最后，我们还注意到，瑞士的例子有助于美国西部直接民主的传播。拉帕德（Rappard 1912： 129-32）通过统计发现，在 1883 年到 1898 年间，在美国出版的研究瑞士的例子的著作有一百多部。其中对美国传播新范式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部就是——J. W.沙利文（Sullivan）在 1893 年出版的《通过公民创制权和公民投票的公民直接立法》。沙利文是一位社会主义的领袖和记者，他在瑞士两次长期逗留期间研究了瑞士的直接民主。他回国后，从 1889 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写了一系列关于公民创制权和公民投票的文章。根据克罗宁所言：“沙利文确信直接立法并不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计划——它在瑞士是行之有效的，因而他相信直接民主在美国也将会良好地运行。”（1989： 48）换言之，瑞士的经验不仅提高了直接民主方法的经验可信度，而且还证明了直接民主在瑞士之外的国家也是切实可行的。尽管沙利文明显高估了直接民主的积极效应，但是瑞士的例子却引起美国对新范式的关注。<sup>[8]</sup>

## 国家制度化的不足

根据巴迪和伯恩鲍姆（Badie and Birnbaum）对制度化术语的理解，在民主运动时期，在美国的州和瑞士的州之间的另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制度化的不足。首先，这表明美国各州和瑞士各州在那时（现在仍是）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影响。尽管这种情况在美国东部各州也有，（参见 McCaffery 1993： 153-59）但是它在西部各州却特别严重，因为这里的铁路垄断公司能对立法机关和地方行政长官施加巨大的影响。（Key and Crouch 1939； Shelter 1994）此外，美国的“政党分肥制”或“将公职委派给获胜政党忠实的支持者的制度”使行政机关依赖于政党（“政党的领导机关”），这种体制受到平民主义和进步主

义运动的抨击。加利福尼亚州的进步主义运动就是争取好政府的“反对政党领导机关”的运动。制度化不足的国家不仅容易受到腐败的侵蚀，而且还容易受到下面这一主张的影响——这种主张就是立法机关应当通过直接民主方法对人们更负责任。在瑞士，国家自治的不足不仅使“埃舍尔体制”成为现实，而且还使政府在应对民主运动时显得极其软弱。然而，较为制度化的国家，例如法国或者1871年以来的德国，都拥有更加独立的、连贯性的和职业化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能较好地摆脱垄断利益和政党赞助人的控制。因而，这些强势国家较少受到腐败的影响。（参见 Curtius 1919: 23）

然而，弱势国家不仅更加容易受到腐败的指控和受到人民直接立法主张的影响，而且它们还更没有能力或者更没有准备好使用压制手段来使自己不受抗议性运动的影响。20世纪以前，瑞士警察机构并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它虽然得到发展，但却是对俾斯麦所施加压力的一种不情愿的妥协，俾斯麦施加压力是要控制在瑞士领土内的外国革命者，（Liang 1992: 10）因而，瑞士警察机构的发展起初并不是针对当地社会运动的。这种情况在美国西部新建立的州也是非常相似的。相比之下，法国和普鲁士就发展了早期的职业化的警察机关，因而它们有能力较好地控制人们的观念和社会运动。（参见 Liang 1992）基本上，在19世纪60年代，瑞士各州当局所能支配的唯一力量就是地方民兵——而在大规模的民众起义面前，民兵却是一支很不可靠的力量。直到19世纪40年代，反对资本家的武装起义、暴力示威和血腥的斗争都一直是苏黎士州和瑞士许多其他地区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1839年，一次来自农村的武装起义推翻了当时强势的自由主义者的政府，而政府却对此毫无防备。直到19世纪60年代，虽然这种类型的政治暴力在日内瓦仍然存在，但它在大多数州已经消失了。然而，人们对这些事件仍然记忆犹新，所以州政府也不能确定民主运动是否已经为采取这些策略做好了准备。

由于缺乏强制手段和担心对选举失去控制，所以州政府对待政治对手的主要策略就是一体化（integrative）。它们尽力对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做

出有限的让步，并拉拢他们。约翰·雅各布·特雷克勒（Johann Jakob Treichler）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是苏黎士政府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主要的社会主义对手。“埃舍尔体制”的政府把特雷克勒拉拢进来，实际上特雷克勒成为当时这一政府的州长，而在那时正是他以前的好友——卡尔·伯克利领导着 19 世纪 60 年代末期的民主运动。另一个例子就是苏黎士政府对 1863 年民主运动中第一次运动的反应。面对着大量的民众起义，政府宣布它准备修订州宪法，一旦起义平息下来，政府就开始修宪。最后，政府采用了一些有限的变革措施，但是在直接民主上却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所以代议制体制在根本上仍然是完整无损的。1865 年秋天的普选通过了这次修宪。另外，执政的自由主义者对 1867 年年底新兴的更为重要的民主运动的反应也能说明政府的一体化统治策略。州议会中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立即接受了这次运动要求彻底修订州宪法的请愿，并确定在 1868 年 1 月 26 日对这一问题进行公民投票。尽管我们认为这好像是掌权精英们估错了他们在普选中获胜的可能性，（Craig 1988： 271）但这却是非同寻常的妥协和让步。就像结果显示的那样，绝大多数公民都接受了彻底修宪的原则和成立制宪大会的要求。执政精英们仍然指望在 1868 年春天举行的制宪大会的选举中获胜，但是他们仅仅得到了大约 1/3 的席位，而民主党人却赢得了获得制宪大会主席的足够的席位，并在草拟现行宪法文本的委员会中取得了多数席位。贯彻了民主运动所有要求的最终宪法文本在 1869 年春天举行的普选中通过。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美国只有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州在宪法中采用了直接民主方法，（Cronin 1989： 47）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用制度化不足来解释。这些州比东部各州建立得晚，所以它们的代议制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更容易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事实上，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就对政治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根据谢夫特尔所言，“在这一时期（19 世纪最后 10 年）的州内政治中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政党组织，而是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不是政党领袖，而是铁路政治机构的头头。”（1994： 179）也许是由



于这些州建立得晚、制度还不完善，所以它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克罗宁把这些州采用直接立法的原因归结为它们“年轻”——即这些州成立得较晚，但他还断言说，东部各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代议制体制是行之有效的。（1989：165）换言之，根据克罗宁所说，西部各州的代议制体制并不能指望着既有的国家政治传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州更容易受到新范式的影响。

总之，19世纪后半期的直接民主运动在制度化不足的国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这些国家比那些已经拥有较强的自治权——这种相对独立于商业利益的自治权是政治家职业化和强大的独立的官僚制确立的结果——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新的直接民主范式的影响。瑞士各州和美国西部各州制度化的不足使民主运动和平民主义/进步主义运动的判断框架更加可信。相反，由于法国的制度化程度较高并拥有强有力的政党，所以难怪法国曾实施的仅有的一次采用公民投票方式的直接立法也是由“上面”发起的，而且还是朝着使权力合法化的方向迈进而非绕道而行。（参见 Frei 1995；Luthardt 1994）

## 政党的弱势和精英分化

如果说制度化不足会使一个国家更容易发生制度变迁，那么，只有当一场社会运动能够在足够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动员并把这种动员的影响施加到既有的政治精英身上时，这种制度变迁才会成为可能。尽管这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下，制度变迁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准备支持它。换句话说，要求制度变迁的社会运动必须能够进行非常广泛地动员。而这只有在既有的政治精英无法控制大多数公民时才会成为可能。我们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里，如果满足了下面两个条件，这种失控情况最有可能出现：一是政党是软弱的，因而没有能力把民众整合到既有的利益调解渠道中来；二是政治精英内部出现严重的分化，并且这些分化的精英阶层中有一个企图从制度变迁

中得利。在这两个条件下，支持制度变迁的政治精英阶层——反精英阶层（counterelite）——可能会绕过代议制民主的活动舞台、直接呼吁和动员民众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

美国西部各州和瑞士各州都符合第一项条件。至于第二项条件，我们也许在瑞士的例子中能注意到，因为在瑞士呼吁直接民主的力量是两大反精英者阶层：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Gilg 1951： 28）一方面，鉴于人们普遍的保守性，毫无疑问，保守主义者期望的是：对直接民主方法的妥协将会使他们在选举中获得长期的优势。<sup>[9]</sup>另一方面，可以想象的是，一些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不仅想要增加人们的权力，而且还追求一些较为机会主义的目标：他们可能已经预料到，通过采用直接民主方法来打破金融贵族的统治，不仅能增强人民主权，而且还可能有助于进步主义者的领袖在选举中获胜。在美国的例子中，进步主义运动的出现与 1896 年两党制向单一党制的变化有关。（Shelter 1994： 75）除了权力外，反精英者们还指望社会运动能给他们重新控制政治过程提供机会。

## 政党的弱势

在苏黎士民主运动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危机冲击了社会各个阶层。这就意味着把动员扩展到几乎所有的民众是可能的。由于人们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而这一民主运动又拥有强大的控制结构，所以它能够进行极其广泛的动员。实际上，这一运动把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了。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冲突中来：在 19 世纪 50 年代，参加议会选举的人数已经下降到不超过选民总数的 1/3，然而 1868 年制宪大会的选举却动员了不少于 94% 的公民。这次动员是建立在跨越了当时所有文化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网络的基础上的。（Schaffner 1982： 43）例如，每月读书小组、星期天读书小组和星期一读书小组、常住居民组织、老年人组织和手工业工人组织、社区组织和区域组织、还有所谓的政治组织——即后来的政党组织的前身，民主运动促进了这些组织的形成。据沙夫纳统计，从

1867年11月到1868年12月3个月时间内，这些组织发起和组织了不少于75场集会。在这些微观的动员环境下，社会运动的拥护者们对新范式产生了新看法并开始审议这种新范式。这些集会可以说是哈贝马斯结构模型中所提到的“理性的公共领域”。

根据格鲁纳所说 (Gruner 1968)，更为重要的事实也许是：民主运动是第一个促进政治“机器”——即政党的领导机关，一种旨在广泛的基础上控制选举的组织——发展的运动。苏黎士和瑞士的政党通常都没有发展自己的基层组织，也很少举行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因此，自由主义者只是在1868年选举失败后才参与到建立反对者组织的过程中来并创立了工人协会。瑞士各州和联邦宪法中采用直接民主方法加速了政党诞生的进程；因而，用格鲁纳的话说，政党实际上是“直接立法的产物”。(1968: 581)

据谢夫特尔 (Shefter) 所言，在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出现之前，政党的弱势及其组织发展不完善也是解释美国直接立法改革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他认为，美国西部各州的进步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这种事实：与东部的情形相反，西部各州的政党还没有发展成根基牢固的强大的组织。谢夫特尔还指出，在1896年的关键的选举之前，西部的弃权者很多，得票数反复无常，但东部各州的弃权者却很少，得票数也很稳定，原因在于：在东部各州，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机器有能力控制选举。换言之，平民主义运动和进步主义运动在西部进入了政治机器薄弱的真空之中，而这些运动在东部却无法打破那些它们动员人们去反对的巨大的政治机器。此外，就像克莱门斯 (Clemens 1997) 声称的那样，东部以政党为核心的体制限制了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在西部，同样的利益集团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却可能有助于要求改革的社会运动。在这里，女权主义者、工人、农民以及特定的商业利益集团都蓬勃发展起来，并成为强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基础，而这种社会运动将能成功地动员人们反对弱势的政治机器。

## 精英分化

苏黎士民主运动是由一部分既有的政治精英领导的。在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中，我们发现，苏黎士州的前任长官——约翰·雅各布·苏尔泽成为制宪大会的主席，所罗门·布鲁勒成为苏黎士州第二大报纸（Landboten）报的主编。在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中还有几个来自乡下的牧师和保守主义者，但是也有非常活跃的左派，其中就有卡尔·伯克利。（Craig 1988： 268-69）根据制宪大会的成员成分来看，同沙夫纳一样，我们也注意到，大多数制宪大会的成员都曾在州、行政区、社区一级担任一定的政治职务。（1982： 71 ff.）此外，在那些未曾担任政治职务的人员中，大多数都是专门职业的从业者，例如，医生、兽医、牧师或者是公务员、老师、磨坊主。鉴于制宪大会是由民主主义者把持的，所以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代表的就是政治上反精英者的利益，而这些反精英者早已被整合进既有的政治系统之中，并不是从下层爬上来的“新人”。因而，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只不过是自由主义者控制的政府的政治反对者。在新宪法通过以后，这些反精英者赢得了 1869 年的州大选，并在接下来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掌控着州政府。实际上，就像克雷格（Craig 1988： 275）指出的那样，一旦直接民主的问题解决了，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继续存在的分歧就很小了——除非这两个政党由不同个性的领袖领导。（1988： 275）这两个政党都趋向于走中间路线，而且都没有极端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这个意义上说，苏黎士民主运动就是政治精英严重分化的例子。由于缺乏可以使掌权的政治精英对民众进行控制的政党组织，所以政治精英反对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得对大众进行动员，而他们也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动员。

在其他州，直接立法是由在野的保守主义政党支持的。德普劳格（Deploige）提到伯尔尼的例子，在伯尔尼激进的多数派投票赞成超出国

家正常收入的新铁路补贴。因而保守的少数派就要求在财政收支上进行公民投票，他们的明确目标就是阻止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1898：83）同样地，艾普（Epple1997）指出，巴塞尔地区的民主运动把采用直接民主方法的要求和减税的要求结合起来，其目标不仅是为了省钱，而且还是为了防止州政府的权力扩张。1842年，实际上是保守主义者第一次尝试在苏黎士采用直接民主方法，他们刚刚在3年前推翻了激进的政府。苏黎士保守主义者决定跟随卢塞恩的保守主义同僚所走的道路，卢塞恩的保守主义者已经成功地采用了对付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个反对派认为当时的制度是保守的）的否决权。

在美国，精英分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史学界一直是根据反精英者的出现来描述进步主义运动的。（参见 Clemens 1997）进步主义运动使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发生了分裂。许多著名的民主党人，像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都支持进步主义运动的直接立法要求。民主党人支持直接立法的重要原因在于直接立法引起了工会工人的兴趣。民主党人认为，他们通过实施“好政府”改革将能优于社会主义。（Auer1989）<sup>[10]</sup>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人为了拉拢平民主义运动者也支持“和平运动”（silver movement），那时的平民主义运动是由和平的平民党人控制的。（Argersinger 1974）“好政府”运动使共和党阵营内部发生分化。事实上，这一运动的先驱之一就是1884年总统大选中脱离共和党的女士（mugwumps），这些人成为共和党的一派。在加利福尼亚州，进步主义运动发展成为共和党的又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最终控制了共和党。

谢夫特尔（Shefter 1994）认为，直到1896年大选后一党制的出现，进步主义者才在两党之间挑拨离间，并试图从两党内部实行改革。然而，随着共和党作为优势政党的出现，进步主义的反精英者基本上都被赶出了政权，这就使反精英者们不得不在一党制之外寻找反对一党制的办法。谢夫特尔评述说：

1896年大选后一党制政权的出现使少数党成为无用的工具，

于是那些没有优势进入统治党的个人和团体就开始挑战统治党；而对少数党来说，现在想要奉行类似于 1884 年大选时脱离共和党的独立派曾使用的权力平衡策略已是不可能的。那些发现在现有政党体制内不可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活动家们通过进步党聚集在一起，对现有的政党体制进行抨击。（1994：76）

进步主义运动既吸引了被赶出政权之外的改革政治家，还吸引了无法从政党庇护体制中受益的党外人士。而后者的成员在不同的州之间是不同的。他们可能是“那些政党活动需要依赖于铁路的州的托运人……也可能是那些需要在国内市场售货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又位于那些政治机器需要依赖于商业公司（这些商业公司能够在当地市场售货）的城市……或者是本地的中产阶级，而政党在当地能获得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的支持”。（Shefter 1994：76）他们也可能包括工人（他们到处都同样地受到排斥）、妇女参政主义者（她们在任何州都没有选举权）和农民。（Clemens 1997：94）

更加一般地说，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两党的地域基础和阶级基础在领土扩张和工业发展之后相互交叉，所以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s）开始弱化。因此，“当 19 世纪的政党制度已扩展到能容纳新集团、新要求和新方法时，政党自身的张力开始积聚起来并打破了过去的政党忠诚和实践”。（Clemens 1997：23）

## 结 论

我们在试图解释社会运动引起制度变迁这样少有的情形时，遵循的是斯梅尔塞的“增值”逻辑（“value added” logic）（Smelser 1963）。根据这种推理逻辑，只有当一些限制性条件同时满足时，制度变迁才成为可能。我们在对社会运动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美国和瑞士，社会运动为了采用直接民主的立法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动员。社会运

动能改变政治制度的首要条件是社会危机（通常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也是引起大多数人进行根本的社会学习的原因。第二个条件由一组控制框架（master-frame）构成，控制框架给公民提供了选择一套现存制度的可靠办法。我们认为，如果这一框架能成功地把新的政治范式（即新制度的蓝图）与相关民众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如果这一框架能成功地把变化中的非递增的性质（nonincremental nature）呈现为一种适应条件变化的递增性质，那么这种控制框架就尤为可信。第三，我们已经明确指出，要求制度变迁的社会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现存制度的弱点。根据我们的论据，与单一制和强势国家比起来，联邦制和制度化不足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社会运动的冲击，因而也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最后，我们补充说一点，只有当既有的政治精英无法控制大众时，要求社会变迁的社会运动才有发展的动力。我们认为最后一个条件的关键在于政治精英的分化和弱势政党的存在。弱势政党不能把民众整合进既有的利益调解渠道中来，而政治精英的分化则削弱了掌权精英对那些被动员起来的民众的控制，从而使这些民众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主张。

## 注 释

[1] 否决权与公民投票不同，主要是因为投票反对一项已被通过的立法被认为是全体选民的百分比而不是参会者的百分比。

[2] 在这里和后面的引文中，我们翻译了原版的德文文本。

[3] 艾普在谈及巴塞尔地区时也有相同的论述：农业、丝绸和运输贸易——这一地区的三大经济部门——也遭遇了结构性危机，而并发性挫折又加剧了这一结构性危机。农民负债累累，饱受贷款缺乏和竞争压力之苦；依赖生产体系的丝绸织品制造商受到产品不足和收入缺乏的冲击；运输贸易随着铁路的延伸也即将失去存在的基础。据艾普所言，最受经济危机冲击的地区——位于巴塞尔地区内部的塞萨池（Sissach）和瓦登堡——也是该州最支持民主运动的地区。（1979：112 ff.）

[4] 就像桑斯坦所说的那样：“因果争论和有关正义的争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有时候因果争论就是有关正义的争论，反之亦然”。(Sunstein 1988: 350)

[5] 公众大会是一种公民对重要事务进行投票的集会，例如日内瓦选举城市的四位市长。利贝斯金德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日内瓦公众大会受到卢梭“公意”(general will)概念的启发，公意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非常显著。(Liebeskind [1938] 1973, 1952)

[6] 今天，联邦制国家的这一有利条件可能不太重要了。在一个较大的团体中，那些愿意且有能力和参与集体行动的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不仅在比例上而且在绝对数量上都比较小的团体中的人们少的多。这一点的关联性也许是更强的。马韦尔和奥利弗探讨的群体规模悖论时认为：“当各个群体是异质的，一个好的群体具有高度齐全的供给链条时，利益群体越大，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就越少”。(Marwell and Oliver 1993: 49)

[7] 就像盖姆森所主张的：“这不是克服框架系统的问题，而是与框架系统进行竞争的问题，这样在获得他们坚持的解释方面能做得更好”。(1992: 70)

[8] 克罗宁说：“沙利文夸大了瑞士在公民创制权和公民投票上取得的成功，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激起美国所谓改革者的想象力。沙利文认为，瑞士已经‘使官僚主义不可能出现了’，而且瑞士的例子还表明议会体制对立法并非必不可少的……瑞士预防了垄断，改进、减少了税收，避免了承担沉重的国债，而且在分配土地方面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合理”。(Cronin 1989: 48)

[9] 正像罗特斯坦因论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以短期的妥协换取长期的优势的例子。(Rothstein 1990, 1992)

[10] 奥尔引用的一篇进步主义的社论表明，“1910年左右，保守主义者盲目反对社会主义，而进步主义者则通过设法改善那些滋生社会主义的弊端和条件地反对社会主义”。(Auer 1989: 88)



## 4. 抗议、抗议者与抗议管理：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共话语

唐娜泰拉·黛拉·波尔塔

### 抗议的公共话语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社会运动的主要影响就是它能够将社会精英和公共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到抗议的权利问题上去。准确地说，社会运动的目标是促成或抵制周遭环境的变化。社会运动不局限于向公共决策挑战，而且还经常批判那些做出决策的方式，进而寻求决策中更多的公民参与。（参见 e.g., Rochon and Mazmanian 1993）社会运动组织越来越频繁地与公共行政部门相互配合，将自己作为“底层民主”（democracy from below）的代表。（参见 Roth 1994；also Dalton 1994）它们致力于开创新的场域，这些场域更易于对公共舆论加以控制。（Willelms, Wolf, and Eckert 1993）简而言之，它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民主理念，在这一民主理念中，公民不仅仅是作为选民来影响决策者。（Offe 1985；Kitschelt 1993）然而，大多数现有的研究通常都是根据单一的政策或程序来评价社会运动的结果，只有较为少数的研究关注动员对政治话语的影响。（参见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在本文中，我将研究一个特殊的领域——有关抗议与抗议管理的公共话语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运动使民主的理念扩展了。我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运动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抗议的合法途径和国家对抗议加以控制的合法方式。这些改变是在一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的，只要我们把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诠释、结构和策略联系起来，

就可以理解这个交互作用的过程。下面我们先简要说明一下上面这些论述中的主要术语。

在分析公共话语时，我不仅关注现实 (reality)，而且还关注对现实的感知 (perception) ——并假定后者是介于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一种相关的干扰性变量。在过去 20 年间，这方面的分析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一直非常少，人们只把偏好、价值观、意图和信仰当做“已知的”。至于意识形态，“有些人认可它在社会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论述也不过是列举其功能和内容而已，认为意识形态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或不可思议地来自于运动的潜在张力”。(Snow and Benford 1992: 135) 不过，最近对诠释的认知过程的发展进行的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对有意义的运动结果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以这类文献资料为基础，专门关注集体行动者对现实的诠释。

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人来说，抗议是他们采用的一种动员起有影响的公共舆论的政治手段。(Lipsky 1965) 为了吸引公共舆论的注意，抗议者经常采取非法的行动方式(比如，封锁和占领)。即使他们不这么做，抗议行动也会扰乱公共秩序。因此，大多数抗议行动都伴随着警方力量的动用，其任务是维持抗议的秩序。(della Porta and Reiter 1998) 不用说，关于抗议和抗议管理合法形式的公共话语对社会运动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它反映了通过抗议行动来表达分歧的权利的普遍观念。

本文集中探讨的是在左翼自由主义者运动家族 (the left-libertarian movement family) 演变期间有关抗议、抗议者及抗议管理的公共话语，左翼自由主义者运动家族包括一系列具有相似的基本价值观并且组织交错的同类运动，这些运动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旧左派中的左翼” (“the Left of the Old Left”) (della Porta and Rucht 1995) <sup>[1]</sup> 对一个社会运动家族演变期间的公共话语的研究看起来非常重要。左翼自由主义者运动家族演变过程中抗议策略的转变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抗议开始于符号性的革新性策略，然后转向大规模行动，有时会升级为暴力形式；当大

规模动员衰退时，运动又转回较为制度性的集体行动模式，尽管小团体还采取较为激进的行动模式。（della Porta 1995；Tarrow 1994；Koopmans 1995）至于政治话语的演变，有人已经做过评价，“对于同运动过程和特征有关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研究，还远远不能让人满意”。（Snow and Benford 1992：135）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将运用发展较为成熟的运动文化环境影响论的观念来分析公共话语——即框架理念。按照戈夫曼（Goffman 1994）的说法，框架是一种解读范式，是不同的行动者用来弄清楚周围环境的工具。在斯诺（Snow）和本福特（Benford）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他们将框架定义为“一种解读范式，即通过对某人现在或过去所处环境中的对象、境遇、事件、经历以及行为顺序进行有选择性地强调和编码，来简化和浓缩‘外界事物’”。（1992：137）主要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起作用，因为“框架的强调、归因和表达会歪曲、限制许多运动组织”。我将这种理念运用到社会运动研究之外，目的是重建公共秩序的主要框架，那些与抗议管理有关联的不同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包括警察和抗议者——都使用过这种框架。我特别关注的是，什么能被界定为元框架（metaframes），这种框架既不涉及抗议问题，也不涉及极端的抗议权。通过将对手非法化——即把对手视为违反民主博弈规则的人，抗议者及其反对者都利用抗议管理问题来扩大各自的联盟。事实上，在抗议周期内，公共秩序与抗议权成为社会运动及其反对者之间进行符号性斗争的最为重要的问题。

根据各自的功能，框架可以分为：界定一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提供行动动机、规定同一性、责任归因等等。我的研究集中于四类框架，分别指支持者定义域（protagonist field definition）、反对者定义域（antagonist field definition）、诊断（diagnosis）及预测（prognosis）。前两个框架规定的是同一性。正如亨特（Hunt）、本福特和斯诺观察到的：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认同建构都是所有社会运动框架化行

动所固有的。框架化过程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将个人和团体联系起来，而且还提供、支持并修饰了从合作到冲突的认同。通过使相关行动者处于或位于特定的时空内，并将那些能够表明具体关系和行动路线的特性归结于这些行动者，他们做到了这一点。（1994：185）

支持者定义域涉及到“那些被确认为支持者的个人和集体，因为他们拥护或同情社会运动的价值观、信念、目标及实践，或者他们本身就是社会运动行动的受益者”。相反，反对者定义域涉及到“那些与支持者的努力相对立的个人或集体，因而被确认为反对者”。（Hunt, Benford, and Snow 1994：186）虽然这些定义谈的都是社会运动，但我们也可以用它们来研究其他集体行动者。

其他两类框架涉及到问题与解决方法的定义。诊断框架将事件或环境视为有问题的和需要改进的，并指出应受谴责的行动者；诊断框架通常伴随着预测框架，预测框架不仅详细指明应该怎么做、由谁来做，同时还界定具体任务、战略和策略。（Snow and Benford 1988）

框架理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话语界定为一种交互作用的过程：运动、政党、媒体、政府及国家机器（包括警察）均参与“呈现意义的政治”，换句话说就是，均参与到“那些使某些含义和理解与其他含义和理解相竞优——或者至少提升某些现有解释的可信性层次——的斗争中去”。（Snow and Oliver 1995：587）因此，框架化过程就是一种事实建构（reality construc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正在进行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使行政机构意识到发展是共同行动的产物，是通过运动参与者同反对者的不断磨合来实现的；框架化过程可能会形成一些对现有方案构成挑战的可替代性的解读方案，就这点而言，它又是容易引起争论的”。尽管不同的行动者都发展了各自的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和框架解构（frame dealignment）策略，但他们在自身的框架发展中也都考虑了社会中呈现出来的大量的框架。框架整合被界定为一



种微观动员策略或一种有说服力的策略，它的目标是使人们达成共识。斯诺及其合作者在研究社会运动时指出，运动组织试图影响不同的群众，并根据目标群众对运动目的和手段的感知情况的不同来调整策略。虽然扩大共识是一项重要任务，但社会运动组织以及其他组织都必须保持可辨别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把与它们不同的组织“排除在外”。因此，还存在一种被我们界定为框架解构的过程，也就是包含限界框架（boundary framing）的过程或“试图使那些与其他团体有关的社会运动组织处于一定时空内”的过程。（Hunt, Benford, and Snow 1994: 193-94）从框架的这一“交互作用”的特性来看，对于那些与抗议和抗议管理这一主题相关的不同的行动者，我们需要同时对行动者的框架演变进行跟踪研究。除了那些直接参加“大街上”的冲突的人之外，还有其他社会行动者和政治行动者组成的公民权利联盟及法律与秩序同盟。根据格尔哈兹（Gerhards 1993）的研究，我认为，各种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可以在不同的论坛——即交流领域——中进行，每个论坛都由室内活动场所和走廊组成，前者是不同的行动者互动的场所，后者是公众活动的空间。

下文中我将提出，在左翼自由主义者运动家族的演化期间，每一波抗议浪潮都将政治话语集中在抗议权上。在围绕着意义和理解的斗争中，出现了公民权利联盟和法律与秩序同盟，它们在直接行动的范围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直接行动在民主政治中被视为合法的，也被视为对游行示威进行管理的有效政治方法。这种“呈现意义的政治”主要受两个变量的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和权力结构，前者提供了神话和解释图式；后者决定了左翼自由主义者运动的同盟者及其反对者的实力和特征。（Kriesi 1989）在那些支持议会制民主理念的群体与那些为了参与制民主而奋斗的群体之间，如果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那么在争论结束时就会在抗议权和抗议限制问题上出现较大的集中。从这一意义上说，公民权利联盟内部的社会运动促进了抗议和抗议管理的政治话语的变革，但同时它们在民主理念方面也会受到那些与其相互影响的政治力量的影响。

为了说明有关抗议和抗议管理的元框架 (metaframes) 的演变, 本文的经验研究跨越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次, 本文的研究还涉及跨国比较。作为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也是出于我长期以来的兴趣, 我选择意大利和德国来进行比较。因为对于左翼自由主义者运动家族的分析而言, 这两个国家具有最大的相似与差异, 总的来说, 这两个国家在面积、现代化程度和政治制度方面非常接近; 此外, 两国在最近时代都经历了长期的独裁政权统治和非常激进的强大的社会运动。然而, 与此同时, 两国在政党制度、政府联盟的更迭、劳资关系制度化以及在文化上对过去的独裁政权经历的重新阐述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两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上的相似性可以用来强调社会运动作为民主化进程的行动者的相似影响, 两国的民主化进程都具有相似的发展时机; 两国政党制度方面的差异又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的权力结构在“呈现意义的政治”中的影响, 这种“呈现意义的政治”是围绕抗议的元问题 (metaissue) 而发展的。<sup>[2]</sup> 第三,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也就是建立在对两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抗议 (和抗议管理) 事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同时本研究还集中分析一种特殊的抗议形式——游行。第四, 我将分析两个领域的争论: 大众传媒和议会。本文的经验研究建立在对每一事件的两类信息来源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这两类信息来源是: 发表的文章和议会对暴力示威游行问题的辩论。<sup>[3]</sup>

下面的分析分成三部分, 分别考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抗议浪潮期间围绕抗议和抗议管理问题上的公共话语。一共分析了六次左翼自由主义者运动的抗议活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学生运动的初次升级 (德国 1967 年春天, 意大利 1968 年春天); 青年“自治”运动或自治者的暴力活动 (意大利 1977 年春天, 德国 1982 年春天);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与残余自治团体有关的暴力事件 (德国 1987 年春天, 意大利 1989 年夏天)。在每一部分, 我将分别列出法律与秩序同盟和公民权利联盟的支持者框架、反对者框架、诊断框架及预测框架, 并以对每个单独阶段的特点所做的评论结束。



## 20 世纪 60 年代的抗议与民主化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学生抗议浪潮席卷西欧民主国家。与抗议相伴随的是，关于抗议权的争论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围绕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相关事件的争论，例如，1967 年 6 月 2 日，伊朗国王访问柏林，当时一名学生在警察袭击时丧生；1968 年 3 月 1 日罗马暴发“维莱·朱利亚”斗争（“Valle Giulia” battle），当时学生首次打退警察的袭击。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特别是 1966 年以后，以柏林为中心，长期的学生动员将游行示威自由问题提上了日程。1967 年 6 月 2 日，形势突转，当伊朗国王访问柏林时，学生组织同伊朗流亡者一起组织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当天，游行示威者同伊朗国王的支持者发生好几次冲突，警察袭击和逮捕了部分游行示威者。当天晚上，在歌剧院前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当时柏林的政要同客人们正在欣赏一场音乐会，有上千名警察负责保卫。表演开始后没几分钟，警察就用警棍对游行示威者发起袭击，一些警察分队使用警察总长称为“香肠”（sausage）战术的方法将游行示威者驱使到“香肠”前方，而其余警察在末端袭击他们。一名便衣警察为追捕一名叫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的学生而进入一个庭院里，然后开枪打死了他。

1967 年至 1968 年冬天，抗议浪潮在意大利各高校爆发。1968 年 2 月，学生们占领了罗马大学，其中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学生们的要求之一是改变考试制度。学校当局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2 月 28 日，校主任（大学教务长）打电话叫警察清理校园。不久，这场学生游行示威在游行示威者同警察的斗争中结束了。第二天，建筑系前的一场学生的游行示威在著名的“维莱·朱利亚斗争”中达到高潮。当学生试图进入警察正设法“防卫”的大楼时，双方开始相互攻击。根据官方资料，大约有 3 000 名游行示威者和 1 000 名警察参加了战斗，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警察的武器是警棍和水枪，游行示威者使用木棍和石头。最后，有

211人受伤，其中158名是警察。此外，有228人被捕，4人入狱。

在斗争首次升级过程中，两国关于抗议及抗议管理的讨论深受一种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对直接参与的形式持怀疑态度。至于权力结构，在意大利，由于共产党的支持，有关抗议权的话语包含了“大规模”劳工运动和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传统，然而在德国，由于社会民主党谴责学生运动，话语就集中在“激进的少数派”的权利（或风险）上。

## 抗议是民主的吗——20世纪60年代 法律与秩序同盟的话语

20世纪60年代，两国法律与秩序同盟的话语有两个共同特征：由于少数人违背民主的行为，抗议丧失了合法性；两国法律与秩序同盟都宣称国内反对派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在德国，法律与秩序同盟——由两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SPD）和基督教民主党（CDU）组成——等同于秩序的保障者。支持者的主要框架涉及到那些确保（西方）自由、文明免受共产主义国家专政侵害的人。正如柏林议会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塞斯（Theis）所说：“我们，特别是柏林工人，在向城市提供自由和民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的斗争中，损失最大”。（Theis AHB 1967: 140）反对者的主要框架打上了一种激进的少数派的烙印。学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操纵学生的少数人，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傀儡——是“由东方国家资助的激进主义团体（Radikalinskis）”（读者来信，in MOPO, June 8, 1967）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职业游行示威者、职业革命者（Berufsrevolutionärer）的傀儡。他们是用“纳粹方式”（读者来信，in FAZ, June 7, 1967）“试图破坏我们的自由”的人。（国会的基督教民主党成员施密茨 Schmitz, AHB 1967: 139）学生的激进主义使其只能“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

诊断主框架将骚乱归因于共产主义破坏民主的阴谋。根据这种描述，游行示威者想在柏林制造混乱，以便为东方集团（Eastern Bloc）的各个国家的军事干涉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这种军事干涉将带来“坟墓般的



寂静”。（读者来信，in MOPO, June 8, 1967）诊断主框架在这个时期的口号是“游行示威权的滥用”。（例如，社会民主党的柏林委员会，in MOPO, June 6, 1967）预测主框架强调，对于那些有“责任”完全清楚应该如何使用游行示威权的人，有必要限制其游行示威权。为了避免产生纳粹主义的情形，政治家们声明——正如柏林市长在学生阵亡的第二天声明的那样——“我们不会再允许少数派恐吓胁迫我们”。（参见 Archive of the Institut für Bürgerrechte und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e.V.）《法兰克福日报》发表的一篇透露内情的评论指出，“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学生参加任何类型的游行示威。直到游行示威者学会用辩论而不是用石头来武装自己时……直到年轻人意识到政治游行是最愚蠢最无效的政治参与方式时”。（th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June 5, 1967: emphasis added）当游行示威权同法律发生冲突时，获胜的将会是后者。

同样，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大利，法律与秩序同盟的支持者的主框架——包括中间派政党（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和右派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the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MSI）——是指那些反对左翼极端主义者的多数人权利的保护者。正如国务总理塔维奇（Taviani）所说（P March 1, 1968），“秩序的力量既不能保障政府的地位，也不能维护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路线。但它们能保障国家法律（*stato di diritto*）、民主国家”。“我们国家是民主的而不是专政的。因此，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罗马大学校长 D'Avack, in T, March 1, 1968）按照反对者的主框架，游行示威者是左翼极端主义者和政党激进主义分子，他们操纵了学生、宣传部门和政治犯。共产主义者是抗议的煽动者——学生们在 FGCI（青年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集会并不是偶然的：“罗马日报社论指出，他们选择集会的场所充分表明，共产党成功控制了学生抗议”。（ME, March 2, 1968）

根据诊断主框架，“极端主义者”为了破坏民主而制造骚乱：“莫斯科或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出于政治原因煽动了大学的骚乱”。（comment, in T, March 2, 1968）事实上，极端主义者并不是举行抗议或游行示威，



而是暴乱和煽动骚乱；他们不是进行民主文明的游行示威，而是杂乱无章的叛乱（comment, CdS, March 4, 1968）。预测主框架提到重构公共秩序与合法性的必要性。游行示威者占领大学侵犯了想学习的大多数学生的权利：“占领是非法行为，对那些相信民主的思想交流方法是有效的人来说，不会对此不分是非”（议会中的基督教民主党成员 Magri, in P March 1, 1968）；这是少数对抗多数的暴力。为了“在形势失控前使之正常化”（同上），必须镇压非法抗议。

因此，两国法律与秩序同盟都宣称保卫民主，反对阴谋破坏民主的傀儡所采取的非法抗议形式。然而，在德国，骚乱被视为外国敌对势力的罪恶行为，而在意大利，敌对势力则是国内的共产党。

这是为了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吗——公民权利联盟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抗议

两个国家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民主观念。在德国，公民权利联盟——从政党层面来说非常弱小——是指那些为了促进民主而进行反对示威权社会斗争的真正的反对派。在大联盟（Grand Coalition 联邦政府中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盟）面前，学生成为唯一的反对派。正如《法兰克福评论》的一封读者来信中说：游行示威者证实了“民主的基础仍需建构”。（the daily Frankfurter Rundschau June 6, 1967）反对者主框架提到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的独裁主义，这主要反映在武装警察的暴行上。各大学教授、助教、研究员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对基本民主权利的残暴践踏”。（Frankfurt and Giessen, in FAZ, Ju, ic 8, 1967）

根据诊断主框架，混乱无序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在于德国缺乏真正的民主文化。民主化进程看来尚未完成——特别是西柏林，自由民主观念常与反共产主义思想交叉在一起。在预测主框架中，公民权利联盟寻求民主化，包括保卫和扩大游行示威权，反对镇压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重要的公民权利，并在根本上威胁到柏林的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自由大学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大约 300 名教授、助教和研究员签名请愿；参见 Archive of the Institut für Bürgerrechte und/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e.V.)。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大利，公民权利联盟就是进步的左派，第二大党共产党 (PCI) 和一些社会党的党员 (PSI，在那时是 PSU) 在这一联盟中占重要地位，其中，社会党还是联合政府的组成成员。学生们寻求“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口号是：不去资本家的学校，不去阶级主义的学校”。(Comitato di agitazione degli studenti romani, in ME, March 2, 1968) 工人们表示“为了正义的斗争，要像兄弟般团结起来”(in PS, March 2, 1968)；民主的公共舆论和民主的教授都表示要与学生团结一致。(PS, March 3, 1968) 关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左翼日报一篇标题为《年轻学生的勇气羞辱了警察暴行》的文章中，将学生称为反抗非正义权威的勇敢者。(March 2, 1968) 反对者的主框架是指反民主的势力和保守势力，这些势力对改革要求做出了法西斯主义方式的回应。政府过于软弱，无法实行早就该进行的改革。<sup>[4]</sup> 公民权利联盟指责国务总理的行为与极权国家的总理差不多，谴责国务总理“在大学施用警力”；此外，“警察长（警察的头头）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和权利”。(PS, March 2, 1968)

根据诊断主框架，反动势力利用警方来阻止改革——事实上，只要形势一发生变化，警方就会干涉。预测主框架指出，不只大学需要进行深层改革，更一般地讲，整个社会都应该进行改革。正如共产党员、议会成员纳托利所说：“有些人认为利用警察机关可以破坏和阻碍迅速蔓延的运动——这一运动提出了不仅要重建大学而且还要重建整个社会的严肃问题，这些人应该对现在极度紧张的形势负责”。(Natoli in P 1968: emphasis added) 改革必须包括保卫和扩大民主。

总而言之，两个国家的公民权利联盟都强调：面对仍然属于独裁主义的制度，必须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德国的反对派认为自己只是力量较小的、进步的少数派，而意大利的反对派则等同于传统的左派。

## 公共话语与过去的传统

首先，必须将有关抗议管理的政治话语中跨国比较的异同和历史比较的异同，放到更普遍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前文提到的政治话语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历史经历，这些经历为我们解读政治冲突提供了一整套符号和模型。<sup>[5]</sup>

在德国，对两个联盟而言，魏玛共和国与纳粹政权的经历为理解当前形势提供了透视镜 (lenses)。运用这些“透视镜”可以解释两大联盟在框架组成方面存在的严重分化。法律与秩序同盟的主要模型背景是魏玛式的 (Weimarzeit)，它是公众和政治家们运用的一种象征性背景，一封读者来信说到：“生活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及以后年代的人们知道，它 (抗议) 以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TSP, June 7, 1967) 社会民主党党员、议员塞斯 (Theis) 说：“当某人试图通过投掷各种各样的东西将其政治信仰强加给他人时，这就不属于观念冲突的部分了。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有生活在 1933 年以前那段时期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 (AHB 1967: 140)

在公民权利联盟的模型背景中，过去的传统可以用来解释警察暴力——我们可以用自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被广泛引用的演讲作为这一观点的例证，他说：

在我们国家，几乎被人们一致称为民主的普遍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其成长和发展所必需的根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时间来转变对权威的忠诚观念，忠诚观念已有数百年历史，经历了几代人的培养……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将这种早已根深蒂固的倾向发展到最恐怖、最可怕的形式。所谓的 1945 年后的再教育已经初步见效，但我们国家的民主依然非常薄弱，因而需要对此加以关注。(In MOPO, June 9, 1967)<sup>[6]</sup>



我们常用的口号是抵抗权 (Widerstandsrecht)、反抗不公正当局的权利和警察恐怖行动 (Polizeiterror), 为了巩固民主, 警察机关必须清除纳粹倾向 (entfaschisiert)。

在同一时期, 意大利也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衰落的历史传统, 虽然两个联盟对此理解不同, 但都声称代表反抗的传统。就公民权利联盟来说, 不仅仅反对势力现在的行为“像法西斯主义者”, 甚至大学的问题也源于法西斯主义政体的影响。一些物理学者声称: “法西斯主义传统仍存在于那些至今仍约束着大学结构的法西斯主义法律中” (物理学教授公报, in PS, March 3, 1968) 由于未能进行改革, 政府被谴责在以“法西斯主义的手段”进行回应: “面对学生运动的要求, 政府派遣了公共安全人员 (Public Security agents) 和卡宾枪手; 预先准备了相当多的镇压器械 (从警棍到高压水枪), 就是说政府在声称保卫法制与民主价值观的同时, 又蓄意践踏它们” (PS, March 1, 1968)。另一方面, 法律与秩序同盟收回了下面这一说法: “秩序力量的薄弱和不稳定是造成民主衰落、法西斯主义抬头的的原因之一”。(国务总理塔维亚尼 Taviani, in P March 1, 1968)

此外, 两国的政治话语均受到以冷战的两极化为标志的权力结构的影响。毫不奇怪的是, 柏林冷战的两极化尤为突出, 在柏林, 法律与秩序同盟利用东西方对峙, 与所有信仰西方文明的人结为同盟。学生在他们的话语中使用象征性符号来表明他们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红旗就是象征性符号, 在这种符号下, 6月17日的群众叛乱被镇压, 柏林墙高筑起来”。(Bild, June 3, 1967) 游行示威者受到批评, 原因在于下面这种事实: 游行示威者既抗议那些保障他们游行示威权的人, 又用他们的自由去破坏那些赋予他们自由的人的名声。正如德国警察工会 (Gewerkschaft der Polizei 最大的警察协会) 所说, 当游行示威者游行反对民主时, 他们就是在滥用游行示威的自由。(in MOPO, June 4, 1967) 意大利的情况也与此相似, 人们认为东方集团操纵了学生运动。然而, 在德

国，整个政党体系都与“自由联盟”结盟，而意大利的政党体系则是分裂的——其国内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者被视为莫斯科在西方世界中的“第三纵队”（third column）。

在这两个国家，两大联盟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猜疑，这就使他们在博弈规则方面也无法彼此信任。这反映了两者在民主理念上的严重分歧：法律与秩序同盟仅限于议会制形式，而公民权利同盟则限于“街道民主”（democracy in the street）。

## 两极化还是去极化——第二次抗议浪潮期间的政治话语

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些使公民权利联盟与法律与秩序同盟分离的民主理念方面的严重分歧并没有迅速消失。非但如此，新的抗议浪潮还趋向于激起有关民主权利的争论。至少，接下来我要分析的围绕两个事件的公共话语就是例子：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第一次访问柏林时，正处于人们反对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的抗议周期内，当局禁止人们举行游行示威，这个禁令引起了骚乱；1977 年春天激烈的青年抗议浪潮，随着罗马两名警员和一名游行示威者的死亡达到了高潮。

1982 年 6 月 11 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欧洲旅行期间访问了柏林。在一些欧洲城市，里根访问引起和平运动组织抗议核武器，特别是抗议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在所谓的占屋运动（squatters' movement）时期，柏林的紧张局势就已经升级了。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禁止了将在里根逗留柏林期间举行的两次游行示威。游行示威者的大联盟决定将游行改在里根访问的头一天举行，非正统的名单（Alternative List AL; that is, the Berlin Greens）坚持去组织已被禁止的游行示威，并联合了激进的自治者组织（Autonomen）。里根访问前一天的游行示威是和平的，警察的任务只是交通管制。但是到了第二天，警察同游行示威者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结果造成 87 名警察受伤，40 人住院治疗，至



少 200 人由消防队医治，还有 200 人由“自治红十字会”（autonomous Red Cross）治疗，并有 242 名游行示威者被捕。

1977 年春，从 3 月开始的围绕大学问题而展开的抗议浪潮迅速升级。在罗马，激进的抗议者在同警方发生一系列激烈的巷战之后，4 月 22 日，好战的自治分子在大学附近的巷战中杀死了两名警察。政府迅速对此事作出回应——继续禁止在首都进行任何政治游行示威，并暂停了在劳动节举行的传统游行。几天之后，当局在 5 月 12 日禁止了由激进党和新左派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下午，警察包围了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音乐会本计划在此举行。包括议会议员在内的一小群人进行了静坐示威；警察和卡宾枪手袭击了抗议者。巷战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根据官方资料，8 人被打伤（其中一人系枪伤）；晚上，乔吉那·马西（Giorgiana Masi）——一名年轻的激进党成员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活跃分子，被一颗子弹夺去了生命。

在这两个国家中，政治文化的传统与一种将社会运动激进的两翼隔离开了的权力结构，维系了两极化思潮。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两个对立联盟的话语之间出现了某些趋同的迹象。

## 法律与秩序同盟：一种对游行示威权的选择性认同

在两个国家中，法律与秩序同盟的公共话语都强调尊重法律程序，认为法律程序应该同时约束警方和游行示威者。在德国，法律与秩序同盟——再次联合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这次还联合了自由民主党（FDP）——的支持者主框架是指法治国原则（Rechtsstaat）的拥护者、尊重法律和“秩序”权利的拥护者。警察被描述为既是高效率的，又是成功的。然而，社会民主党和开明的自由民主党主张，国家力量的垄断应该在法律和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的均衡中找到自身的界限。反对者主框架将暴力游行示威者描述为来自柏林之外专门找麻烦的恐怖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Chaoten）。最为普遍的比喻就是“犯罪分子”类型的比

喻：小流氓、犯罪的暴徒、凶残的街头杀人狂、乱闹者、聚众闹事者、闹事青年、捣乱者。

诊断主框架强调游行示威者违背了代议制民主的规则。年轻的自治游行示威者被指控危害了国内治安和国际去极化。（社会民主党成员、议员佩茨沃德 Paetzold, AHB, 1982）问题在于暴力青年团体的存在，这些团体被视为“法治国原则的敌人，企图将国家变为战场”。（德国警察工会 Gewerkschaft der Polizei, in TSP, June 12, 1982）

诊断主框架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镇压与一体化（integration）的综合体。那些使用紧急情况框架的人（主要是基督教民主党、部分自由民主党以及警察工会）尤其支持武力解决方式，这种武力解决方式认为，需要通过新的警察装备和/或新的立法进一步对游行示威权加以限制。<sup>[7]</sup>然而，还有另一个框架（目前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部分自由民主党）谴责武力解决方式，认为它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暴力的流氓通常会以暴制暴”。（社会民主党成员、议员 Rasch, AHB 1982）因此，除了“正常的”镇压之外，这一框架还提出需要对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和那些确信目标可以证明方法正确的人进行“政治教育”——对议会中的非正统名单（相当于柏林的绿党）来说，这种政治教育的需要尤为紧迫。

在意大利，法律与秩序同盟——这次也包括共产党——将支持者界定为拥护宪法的力量，即那些保卫民主和共和秩序的可靠力量。他们保护自由权利与和平共处的权利；他们站在公民一边。共产党员、议员史帕格诺里说：“工人、劳工运动必须要警惕一群煽动者和破坏分子从事反对民主国家的武装战争，同时还要认识到那些使我们陷入连年战争和死伤无数的征战的危险”。（Spagnoli P 1977: 7533）法律与秩序同盟认为警察是民主的，警察——他们也是年轻人、工人子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会被激怒，有时也会反应过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样地，反对者主框架认为主要的敌人是那些不遵守民主制度的反民主的恐怖主义势力。反对者是那些在街上游行示威的“臭名昭著的自治的”恐怖分子、煽动肇事者、破坏分子、沉溺于 P38 手枪的人。禁止游行示



威是出于“不得不承认一群罪恶的肇事者的存在”，这些肇事者的目标就是“打架滋事，希望引发一系列使社会陷入恐惧、狂暴状态的连锁反应”。（国务总理，in P 1977：7515，7517）这些肇事者是国会所控制不了的势力，因而也是危险的势力。因此，诊断框架反对“广场”制度（the “piazza” the institution）。

诊断主框架将问题确定为源自于抵抗行为的反对民主共和政体的阴谋。这种情况属于紧急事件；存在一个反对民主的“阴谋”：

武装分子的挑衅、恐怖主义组织的攻击都有清晰、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使国家陷入动乱和瘫痪，破坏民主政权和公民生命的坚实基础……我们相信，确实存在一个试图破坏、颠覆、贬抑民主国家的阴谋。（共产党员史帕格诺里在国会辩论中说，Spagnoli，in P 1977：7531-32）

利用便衣警察和武装起来的警察，运用饱受争议的警察策略向来被视为搜集犯罪信息的常用方式。共产党领袖皮考利放弃了关于无武装的警察力量的共产党的传统提案，认为为了自身的安全，警察必须持枪，甚至在游行中也应该配枪。（Pecchioli in R，May 18，1977）预测主框架指出，为了通过那些能挽救民主的紧急措施，需要实现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只有实现了“强有力的一元参与”、“大规模的民主团结”、“所有拥护宪法的政党团结一致”、多数人一致同意，或者引用罗马市长、共产党员阿尔干（Argan）的说法就是“为了孤立残暴的破坏分子，必须提高民主警惕性”，才有可能成功地保卫民主。（in PS，May 15，1977）

综上所述，两国的法律与秩序同盟均将自己当成民主国家的守卫者，反对暴力的少数派的挑衅。这些少数派在德国大都被描述为非政治性的小流氓，而在意大利，他们被称为政治恐怖分子。主要解决方案是武力解决，但也要考虑将“不太激进的”社会运动组织整合到民主进程中。

## 公民权利联盟：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

在两国有关公民权利联盟的公共话语中，随着对运用暴力手段的批判，我们发现了那种排除抗议的意思，但同时也发现了有关“正当的”抗议方式的争论。在德国，公民权利联盟与非正统名单在议会中只占少数席位，因而其支持者主框架只属于次社会（second society）：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游离于传统的政党体制之外；他们想要证实游行示威权是一项不能被限制的权利。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把他们的斗争与其他社会运动的斗争看成是一样的。左翼日报的评论员重述了约翰·F.肯尼迪的著名论断“我们都是柏林市民”（John F. Kennedy），他写到：“妇女和擅自占住者、自治者和非正统名单、和平运动以及左翼国会议员们：我们也都是柏林市民”（June 12, 1982）。社会运动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人把自己视为“全世界的自由战士”，（自治的反帝国主义团体，in TAZ, June 18, 1982）而其他人则提出在“对传统政治的非暴力反抗”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界定。（member of AL Wendt, AHB 1982: 1527）反对者是那些“既有政治”的参与者。最直接对手是警察：他们追捕孤立的游行示威者，沦为“警棍狂”，“变得疯狂”而且残暴。大多数警察都是由“罪犯”和“好战分子”构成——尽管一些评论员承认即使警察中也有“人类”。

诊断主框架认为当局的挑衅主要是为了镇压，因为它们不承认用游行示威方式来表达异议的民主权利。（the AL leader, in TSP, June 13, 1982）虽然暴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体系不愿意回应所谓的少数派的要求，但是次诊断框架还提到了那些所谓的被“专业巷战者”渗透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问题成为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Humanistische Union”，in TAZ, June 14, 1982）反映着经济衰退、合法性危机、技术风险以及“苦难与浪费的日益增加”。（member of AL Jaenicke, AHB 1982: 1529）政治暴力的解决方法就是承认无限制的游行示威权，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举行游行示威。然而，日益完善的预测框架指出，必须找到一种非暴力的但又不是空想的游行示威的方式。正如一名活动家所说“非暴力游行示威者需要更大的勇气；激进分子必须变得聪明点”。(Kunzelmann, in TAZ, June 14, 1982)

在意大利，公民权利联盟——在国会层面仅代表较小的激进党 (PR) 和无产阶级民主党 (DP)，与其他新左派团体结盟 (among them the Partito di Unità Proletaria and Lotta Continua) ——将支持者界定为左翼运动：工人、青年和学生的运动。工人、青年和学生是非主导左派的民主的进步力量，是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力量。为了保卫基本的自由权利，包括在街上游行示威的权利，他们宣称有不服从不平等秩序的义务 (纽伦堡就是一个标志)。如果 (对大多数新左派来说) 自我界定依赖的是“有可能选择革命”的信念，(LC, May 14, 1977) 那么激进党强调的则是取消使用非暴力手段。(参见, e.g., PR member of Parliament Pannella, in P 1977: 7524) 按照主框架的说法，反对者是大屠杀的代名词。激进的下议院议员品多 (Pinto) 质询：

本届议会悬而未决的事项有哪些？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芬塔娜广场大屠杀 (the massacre of Piazza Fontana)，意大利语裔大屠杀 (the massacre of the Italicus)，布雷西亚大屠杀 (the massacre of Brescia)，法西斯分子在街上杀害革命同志和青年，特务机关实施屠杀，因此我们必须保护意大利人的自由，而不是直接依赖于政府及各类基督教民主政府，也不是密谋日复一日反对工人的自由。(In P 1977: 7540)

在意大利共和国总能出现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是那些具有独裁主义阴谋倾向的人；是处于“独裁、暴力和教权法西斯政权”之中的基督教民主党及其同盟者；是在“颠覆政权”；是那些为了制造动荡而实施“暴力、独裁图谋”的人。

根据诊断主框架，禁止游行示威是为了制造混乱而制定的挑衅计划；它是一种使局势紧张的策略。事实上，警察执行一项旨在制造混乱和暴力的周密计划，以便加强压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阴谋的一部分：“由专门警察小组负责诱发死伤事件，然后以死伤的名义毫无异议地通过更加严厉的法案，（利用自治的托辞和对 P38 式手枪的迷信）来镇压整个社会运动，缩小工人阶级在自由和福利方面取得的成果”。（PR member of Parliament Pinto, in P 1977: 7540）当局的挑衅旨在“促成一个蓄谋已久的形势，主要目的是通过恐怖行动和内战的不断威胁来强化一种温和的公共舆论”。（LC, May 17, 1977）当局的用语是军事类的：口号是内战和恐怖行动、戒严状态和紧急状态、政府实施的团体作战、军事委员会、以及恐怖主义（政府声称警察杀人是职责所在）。警察过于残暴，就连资产阶级的报刊都承认这一点。然而，不只是警察要为斗争的升级负责，而且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也应该为此负责。事实上，有人企图在警察机关内部制造紧张局势，以阻止那些由于警察工会的要求而发生的变化。新的镇压方法包括对反动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进行的镇压，这些方法结合了先进的社会舆论工具，而这些社会舆论工具又是以利用共产党、进步的群众号召建立法律和秩序为基础的。暴力发生的原因在于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及其“反民主的不宽容性”。预测主框架认为，社会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联合政党（Partito di Unità Proletaria.）的公报声明：“当历史性危机暴发，保卫民主便成为首要任务”。（in M, May 15, 1977）意大利激进左派组织（Lotta Continua）的秘书证实：“政府及其支持势力的日常行为的目的就是废除民主，甚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LC, May 17, 1977）保卫民主需要群众的团结和警惕，特别是需要动员工人阶级。保卫民主也意味着警察机关的民主化。

两国的公民权利联盟都将自己看做是在独裁倾向面前的唯一的民主权利护卫者。然而，在德国，重点是“非正统”的次上流社会，而在意大利，重点依然是（事实上的）左派。

## 在激进主义与温和之间

斗争的再次升级导致有关抗议与抗议管理的“旧”框架回归，这种旧框架深深植根于传统政治文化之中。在德国，虽然与1967年比起来有所减弱，但两大联盟的话语仍然提及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政府。在意大利，政治话语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论调，再次强调紧急形势。抵抗者（the Resistance）的历史经验为两大联盟提供了标志：对法律与秩序同盟而言，标志是合乎宪法的力量的联合；对公民权利联盟而言，标志是反对不公平政权的权利。在两个国家中，悲观主义的时代思潮与一些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弹性框架一起，努力确保黑白混合形象（black-and-white images）存在下来。对权力结构而言，对以前的抗议浪潮和激进主义团体的传统的反应就是扩大法律与秩序同盟。

除了这些延续性外，还发生了一些变化，这表明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围绕意义的斗争”对政治话语具有重要作用。在公民权利联盟这边，对暴力行为模式与暴力自治团体的批判在这两个国家越来越多，暴力行为模式与暴力自治团体也日益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事实上，暴力已经受到批判。正如德国非正统名单组织的成员与非传统性的日报（Tageszeitung）的读者经常说的那样，从最实用的角度考虑，暴力导致隔离（人们很害怕，所以不去参加那些将会转化为暴力的游行示威），这不符合和平运动的目的。在意大利，激进的自治团体被视为青年运动中的“矛盾体”、“挫折时期”。

在法律与秩序同盟这边，随着人们对一些抗议形式的描述——自治团体由于频繁使用战争的比喻，所以经常被描述为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抗议形式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可供选择。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发现，在20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对那些进入议会舞台的运动党派的反应极其相似。1982年，对德国法律与秩序同盟而言，非正统名单组织是政治问题，因为它占有议会议席，却不完全承认

议会民主制的规则。（Social-Democratic member of Parliament Vogel, AHB 1982: 1523）问题显然在于它把自己界定为主要的议会外势力（*ausserparlamentarian*）：非正统名单组织成员信仰直接民主，所以他们认为暴力是正当的。（Christian-Democratic member of Parliament Rzepka, AHB 1982）

同样地，在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法律与秩序同盟指责了小的左派政党“有预谋的”行为。事实上，即使小的左派政党获得了议会议席，但它们的行为却像议会之外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接受少数服从多数（*a majority and a minority*）的民主原则和政府享有统治权的民主制度”（in P 1977: 7529）；并且“根据政府规定，议会成员不能并且绝对不能支持那些与秩序和合法性背道而驰的行动，哪怕仅仅代表他的个人立场也不行”。（*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in P 1977: 7516）在这两个国家，法律与秩序同盟都号召以前的“议会之外的”团体承认议会的博弈规则。

## 规范化还是罪行化——抗议话语的演变

随着非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在不同群体中的传播，人们在抗议权和抗议管理方式上达成了更为广泛的一致。虽然在激烈的抗议时期出现的关于抗议及抗议管理的传统的“两极化”话语的一些因素在两大联盟中再度出现，但过去的相互影响也促进了两大联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日益接近的认知过程。对两大联盟而言，暴力作为政治手段已被排除，但和平的游行示威仍被公认为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在1987年6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访问柏林期间，从游行示威者同警察发生的暴力冲突而引发的政治争论中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这一点；从1989年8月米兰因警察介入清理一个静坐青年中心而引发的游行示威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6月12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再次到访柏林，当时正值柏林建城750周年庆典之际。里根的到访再次成为和平运动者抗议美国重整军备政策



的一个机遇。就像在 1982 年那样，警察禁止在里根访问当天举行游行，大多数和平团体同意在前一天游行。6 月 11 日，大约有 8 万人参加了反对美国重整军备政策的大规模和平游行，这次和平游行是由约 140 个团体组织的。在游行期间，警察散发传单提醒抗议者不要使用暴力，希望他们和平游行。然而，一大群激进的自治者（Autonomen）参与了这次的大规模游行。在游行结束时，示威者同警察打了起来，随后打斗在城市的不同地区蔓延，特别是在克罗茨堡区（Kreuzberg），那里大量擅自占用的房屋就是非正统性环境的重要的基础设施。自治团体与非正统名单组织均为第二天的游行发表了各种抗议倡议，但行政法庭却确认了警方禁止游行示威的禁令。当数百名游行示威者在市中心集合时，警方设置了警戒线，包围了大概 300 人。当局暂停了大部分从克罗茨堡区驶出的公交车，警方控制了所有从克罗茨堡区驶出的小汽车。警察在克罗茨堡区大规模的巡逻过程中，两个晚上共发生好几次暴力冲突。

在意大利，“青年中心”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青年中心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青年抗议期间，后来逐渐发展为建立新文化的重要场所，特别是新的音乐时尚也在此举行。然而，青年中心的人坚持激进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当警方负责清理被占建筑时，他们经常同警方进行斗争并日益成为惯例。对米兰的莱翁卡瓦洛中心（Leoncavallo Center）来说，这种冲突特别频繁。在警察介入清理莱翁卡瓦洛总部之后，青年中心的好战分子在米兰集合，举行游行示威，最后以暴力冲突而告终。

## 对抗议进行限制：20 世纪 80 年代的 法律与秩序同盟及其抗议话语

在这两个国家，暴力更多地被指责为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在德国，法律与秩序同盟以基督教民主党为核心，是西方自由的拥护者。作为“真正的”民主人士，法律与秩序同盟成员捍卫一度被暴力使用者破坏的游行示威权利。正如联邦国务总理齐默曼（Zimmermann）宣布的那样，为了确保非暴力公民的游行示威权，有必要

防止无政府主义者“滥用”该权利。(in FAZ, June 13, 1987) 反对者主框架指的是青少年群体：反对者是 Krawalmacher、伪君子 Vermummten、暴乱分子、小流氓、罪犯。此外，与 1982 年一样，他们是游客、流浪者——或者引用国务参议员的说法，反对者是没有政治目标的“流氓、犯罪团伙”。(in TSP, June 16, 1987)

诊断主框架指的是聚众闹事者制造的紧急状况。这种解释包括争斗升级引起的难以预料的影响。根据国务参议员的说法，如果警方成功地达到了其主要目的，联盟内部就会展开对警方决议的批判。(e.g., in AHB 1987) 预测主框架指的是保卫民主、以防其落入未做好准备的人手中的需要；这是基于保护民主原则 (the principle of the wehrhafte Demokratie) 作出的判断，保护民主原则是指为了保卫民主，必须限制某些民主原则。(Christian Democratic mayor Diepgen, AHB 1987) 例如，在 1982 年，出现了改革游行示威权利的呼声。<sup>[8]</sup> 然而，甚至连法律与秩序同盟也强调“潜在暴力”的存在不应该仅由警方处理，同时它还告诫人们防范“纯粹的”法律与秩序解决方式。<sup>[9]</sup> 最好的警察策略是那些避免争斗升级的策略。为了重构根本上的共识，人们要求要正统名单组织和社会民主党谴责暴力，以便各方民主力量能够达成共识。(Christian Democratic member of Parliament Buwitt, AHB 1987)

在意大利，法律与秩序同盟聚集在社会党与新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社会运动党 (neofascist MSI) 的周围，强调其作为法律执行者的作用。后来陷入腐败丑闻的米兰市长、社会党党员保罗·皮雷特里说“首先要制定规则，然后必须要执行这些规则”。(Paolo Pillitteri in LN, August 22, 1989) 法律与秩序同盟成员是“无防御能力的公民的保护者”，他们打击吸毒成瘾者和极端主义者。反对者也就是那些“自治的”团体，被看做是街头小混混，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滥用暴力。一方面，在对“秩序的力量”与抗议者之间的斗争的描述中，重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话语：“游击战”、“最后的自治堡垒”、“无政府主义者”。年轻的游行示威者都是独立的，他们想通过暴力而不是思想来强加他们的意志。(G,



August 19, 1989) 另一方面, 由于他们的奇装异服、绿头发、大头针装饰、安全别针, 使他们看起来更像蓬克 (punks), 而不是恐怖分子。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不同的是, 他们没有取得“政治游行示威者”的资格——他们是“粗暴的、不合格的”游行示威者。

诊断主框架将斗争升级解释为抗议者边缘化的结果。用意大利《晚邮报》第二版的话说, 自治者组织代表“少到不能再少的边缘化群体, 他们决定坚持到他们不接受的社会环境消失为止, 并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斗争”。(CdS, August 17, 1989)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即便“莫洛托夫策略 (the molotov strategy) 保存下来”, 即便“自治者组织同蓬克、同那些吸大麻、吸毒及反社会行为的边缘化青年相联合……由于他们对反叛行为不屈不挠的追求, (他们) 也会永远处于社会边缘, 或者自我边缘化”。(CdS, August 19, 1989) “与反对警察比起来, 他们更多的是反抗现实”。(G, August 17, 1989) 鉴于这个原因, 预测主框架提议针对捣乱者进行“果断的”警方干预。“上级的命令”使警察忍受暴力、遭受痛苦, 因而受到谴责。(G, August 20, 1989) 就像米兰基督教民主党声称的那样, 帮助“暴力分子”意味着歧视“守法”公民。(LN, September 9, 1989) 然而, 镇压必须与对那些认可规则的人的社会援助相协调。

在这两个国家, 法律与秩序同盟均强调有必要对暴力团体进行“有选择性的”镇压, 这些暴力团体既非政治参与者又不是动员社会要求权 (social claims) 的组织。然而, 与意大利相比, 德国对“有选择性的”镇压强调的更多, 事实上, 意大利的法律与秩序同盟看起来非常沉默。

## 抗议的代价是什么——20 世纪 80 年代的 公民权利联盟及其抗议话语

在这两个国家, 公民权利联盟都谴责暴力, 但都认为暴力是一种社会问题, 不应该通过警方镇压来解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德国, 对由社会民主党和“非正统”团体组成的公民权利联盟而言, 主框架指

的是那些保卫游行示威权的支持者；不能因为一小部分暴力游行示威者的存在就限制游行示威权。相反地，反对者主框架指的是那些根据公共秩序的紧急情况来界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保守势力。然而，反对者框架也是有区别的。例如，警察特别突击队（Sondereinheiten，或者是特种部队）是否该被视为极端罪恶的，《左翼日报》是否该报道警方内部反对某些同事的暴行的评论文章（June 15, 1987）以及是否发表政府在处理抗议的方式上的内部分歧的文章。此外，次反对者框架指的是青年运动内部的暴力团体。

诊断主框架指出，面对社会问题时的政治失灵导致斗争升级。在这种解释中，社会不公、失业、酗酒、吸毒以及贫困是导致“缺乏希望”的主要原因，而缺乏希望又促使青年走向暴力。（参见，e.g., letter to the authorities from evangelist pastors, in FR, June 16, 1987）这种话语的补充部分强调，当社会问题由警察来解决时，就会有斗争升级的危险。然而，在联邦共和国和柏林，斗争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警察与激进分子的对抗力度。通过对专门话语的有效使用，克罗茨堡地区的非正统名单组织的领导人指责警察破坏了他们一直在做的使其辖区形势“正常化”的工作。（in TAZ, June 16, 1987）预测主框架是对解决那些引起暴力的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式的探索。非正统名单组织和社会民主党建议与暴力团体（特别是同自治者组织）建立对话机制，以便找出暴力及Staatverdrossenheit（对国家的不信任）的潜在原因。就像社会民主党领袖佩左尔德在议会辩论中所说：“仅仅由警察机关对暴力作出反应是不明智的”；相反，有必要建立与激进分子的对话机制：“那些只相信警察，不寻求政治解决方式的人应该对这个城市负责”。（Paetzold AHB 1987: 3250）

在意大利，公民权利联盟再次扩大，将共产党纳入其中，它把自己视为正确运用和平抗议的民主权利的“保护者”。公民权利联盟强调自己的“责任感”。反对者是不负责任的警官，问题在于政府作出了错误的或不准确的指示，使民主国家冒着紧张度上升，信任度降低的危险。如果

警察对自治中心的干预被指责为追随“战争的逻辑”，那么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就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集团，它们以利润和成功为导向的价值观体系“使边缘化群体越来越边缘化”。(M, August 18, 1989) 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团体的“弱肉强食”“将异质性存在的更小的生存空间也破坏掉了”。(M, August 20, 1989) 同时，“小的自治团体的挑衅”也受到指责。左派将“新的自治者组织”描述为“前政治的一代”(prepolitical generation)、“70年代的嬉皮士”、“存在主义者”、“叛逆者”。然而，即使在自治者组织的“少男少女”中，也存在富有责任的人，他们设法使投掷石头的伙伴冷静下来，号召他们“只扔鸡蛋和西红柿”。(R, August 21, 1989) 事实上，“青年社会中心”被描述为“一群设法反对海洛因和边缘化的人，它使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爱冲动的人和易怒的人能够团结在一起”。(M, August 23, 1989)

在诊断主框架中，“残暴的”警察干预主要被视为“陈旧的、不光彩的方法”的意外结果以及缺乏训练的意外结果。因此，人们指责政府放弃了战略上维持和平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可以避免斗争升级并保持游行示威的和平进行。共产主义日报《团结报》(L'Unità) 反问道：“由警察来解决边缘化问题合适吗……难道用政治提案来对待可怕的自治者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的吗？”(August 17, 1989) “罪行化”(criminalization) 实际上是在冒着加剧社会紧张局势的危险，而社会紧张局势必须通过社会改革才能缓解。预测主框架认为有必要进行社会改革，因为社会改革有助于将不再狂热的青年整合到社会中去。给自治中心提供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就是这些“政治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因为自治中心被视为一类对反毒品扩散非常有益的草根组织——自治中心是“大城市周边一种引人注意的并且可能是非常积极的集合体形式，因而它们不但不应该被封闭，反而应该大力发展”。(Luigi Cancrini, responsible for the struggle against drugs in the PCI shadow cabinet, in U, August 19, 1989)

综上，在这两个国家，公民权利联盟均将自己当做抗议权利的保卫者，它们抗议政府中保守力量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政治失败。在这两个国

家，政治暴力都被视为社会弊病的标志。在意大利，家长式的统治方式反映了旧左派在增选新成员和宣布任何社会主张时的一贯态度。

### 有选择性的扩大抗议权？

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话语变得更注重实效。在法律与秩序同盟中，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游行示威权，同时他们还对公民权利联盟提倡的较为激进的抗议形式进行了直接批判。在德国，阻碍历史发展的事件（魏玛共和国，纳粹政权）不再在符号性领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占支配地位，相反它们为解读当代事件提供了暗示；在意大利，提及“领袖时代”——“沉重的”、“灰暗的”20世纪70年代——和恐怖主义时，更多地是用来强调差异而不是指明共性。在这两个国家，在权力结构去极化过程中，随着旧左派再次进入公民权利联盟，两大联盟的话语有了更多的一致性：对两大联盟而言，暴力是社会问题的重要指示器；游行示威权和抗议权是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这两项权利有着凌驾于人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关注之上的倾向。警察将自己的任务界定为保护游行示威者，他们强调降低斗争的范围或强度。对游行示威权的主框架来说，一些抗议形式的“正常化”也认同对其他抗议形式的描述。

从长远来看，这种政治话语中的“去极化”是由相互影响的框架化过程引起的，在这一过程中，每个联盟都会认同另一个联盟的一部分话语，并且相应地调整自身的框架。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法律与秩序同盟于1982年提出了流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流动小流氓）的形象比喻，公民权利联盟于1987年借鉴了这一比喻。因而，政治话语通过框架整合与框架分解、传承与创新的过程进一步发展。这种将反对者“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做法的结果就是否定了政治权利。正如德国法律与秩序同盟强调的那样，当无政府主义者选择在所谓的仪式中戴着巴拉克拉法帽走来走去、或戴上面具的时候，他们会拒绝发表任何政治看法。沿着这一思路，为了解释为什么“流氓”被排除在游行示威权之外，国务

参议员提及了宪法法院关于游行示威权的决议：

按照宪法法院的专门用语，游行示威是人们在大街上表达个人意愿的权利。男人和妇女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阐明自己的看法，即使是离经叛道的看法。但是当某些人把脸藏在面具后面时，那就与发表看法无关了……或者与游行示威或游行示威权有关，但是大多却与暴力或恐怖主义有关。（Kewenig, AHB, 1987: 3230）

破坏游行示威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游行示威者：他们戴着面具的事实表明他们并不想沟通。（Christian-Democratic mayor Diepgen, AHB 1987）同样地，在意大利，使用暴力——即使当用鸡蛋和番茄取代石头时——仍然被视为将那些卷入其中的人排除在任何与当局的谈判之外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公共行政部门宣称，公开地区分“好的”和“差的”公民将有利于帮助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米兰市政府宣布“我们不与暴力分子谈判”，“我们不同他们讨论”。（in LN, August 30, 1989: 参见 also della Porta 1998）

另一方面，公民权利联盟要求对话。在意大利，共产党强调有必要用“论证和对话”来代替“武力和独裁主义”，一个加入反对海洛因斗争的牧师唐·马兹宣布：“我们不应该将所有不接受城市商店橱窗的人边缘化，他们拒绝接受城市商店的橱窗，只是因为不需要它，或者因为他们对标准化不感兴趣。难道我们必须得把他们交给法官或警察来处理吗？”（Don Mazzi U, August 18, 1989）在德国也一样，社会民主党领袖宣布反对使用警力来解决暴力问题。柏林市长、社会民主党党员莫波尔在议会中宣布“我们必须严于律己，并寻找国家缺乏信任和部分青少年存在暴力倾向的社会原因。我们必须寻找一种对话机制”。（Momper AHB 1987: 3236）在这两个例子中，“暴力”都被看做是社会问题的反常反应。

## 抗议与抗议话语：小结

在本文中，我试图评价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有关抗议权和抗议管理的框架的演变，就像它们在报刊上发表时和在议会辩论中出现时那样。正如我在引言中提到的那样，这些变化就是“呈现意义的政治”对游行示威权的影响。在抗议浪潮期间，政治话语集中在与民主相关的元问题上。社会运动通过极端行动使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发生分化。社会运动的反对者聚集在法律与秩序同盟中；而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参加了公民权利联盟。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着两大联盟的框架选择，两大联盟的成分反映了权力结构对社会运动的作用。这些延长的符号性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就是引起了所有参与社会运动的行动者的政治话语的变化。通过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运动激起了关于抗议权观念的政治讨论，从而促进了有关抗议权问题的政治文化的变化。

综上所述，在意大利和德国左翼自由主义者运动家族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关抗议者、抗议管理和抗议权的政治话语发生了以下变化。同一性框架（包括支持者框架和反对者框架）从政治框架（进步的 VS 保守的）转变为二元论框架（有益的还是有害的），随后又转变为实用主义框架。对法律与秩序同盟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的游行示威者是国际恐怖势力的傀儡（在德国游行示威者是“国外势力”的傀儡，在意大利他们是“国内势力”的傀儡）；在第二次斗争升级期间，游行示威者的政治形象减弱，法律与秩序同盟开始给他们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在第三次抗议浪潮中，暴力游行示威者越来越被看成社会中的边缘化群体。同样地，对公民权利联盟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和警察是反动计划的执行者；在第二次抗议浪潮中，政府和警察是长期持久的内战的敌人；在第三次抗议浪潮中，政府和警察只是尚未对解决社会问题作好准备而已。

在这两个国家，伴随着一些抗议形式的正常化和其他抗议形式的恶

名远扬，框架的区别日益显著。至于法律与秩序同盟，我们指出了存在多数游行示威者的“好的”形象和少数游行示威者“不好的”形象的两极分化，以及好的游行示威者与不好的游行示威者之间的两极分化。和平抗议越来越被认为是常态政治，暴力抗议则被视为犯罪。同样地，随着公民权利联盟赞同对抗议进行管理，处理抗议问题时“好的”策略和“差的”策略的区分开始出现。在诊断框架中，经历了从政治冲突的比喻变为斗争的比喻，又变为弊病的比喻。<sup>[10]</sup>对法律与秩序同盟来说，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暴力抗议普遍被认为是政治冲突的一种退化了的措辞。随后，暴力抗议又被视为斗争的一种。（在意大利更多的是国内势力引起的，而在德国多为国外因素所导致）最近，政治暴力被归到社会问题的框架中。同样，对公民权利联盟而言，警察暴行也越来越被视为是斗争升级和/或不充分训练的结果，而不是有计划的挑衅。

在预测框架中，从对有区别的解决方法（改革和镇压）进行界定，转变为与斗争的比喻有关的武力解决方法，<sup>[11]</sup>最后又变为弊病的比喻所指出的社会“治疗”。就警察的任务而言，重点是从法律实施到维护和平，从武力到智力和专业化的转变。越来越不承认身体暴力的现象也推动警察去“证明”其策略至少在“减小和降低斗争的范围和强度”方面来讲是正当的。

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传统政治文化为解读抗议和抗议管理提供了根据和模型。在意大利和德国，近代极权主义政权经历的传统就是不信任民主程序。然而，在围绕民主权利观念的符号性斗争中，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转变。在这两个国家，公民权利联盟和法律与秩序同盟是围绕抗议权问题而形成的。在德国，主要政党之间存在较多的“根本上的共识”，而与此不同，在意大利，左右翼之间互相指控对方违反民主的博弈规则，这种政治话语反映了围绕左右翼分裂而产生的政治体系的两极分化。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国家，民主作为多数人的权利的形式主义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游行示威者被称为少数派，而警察则被视

为是多数人权利的制度上的保卫者) 转变为更具有参与性的民主理念。同时, 暴力的抗议形式越来越毫无异议地被唾弃。因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社会运动家族的演变促使与游行示威权有关的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包括整合与解构过程, 两极化与去极化过程。最后, 与对抗议权的旧的解读相比, 新的解读更为“公正客观”, 但同时也越来越排斥暴力的抗议形式。和平的游行示威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 警察有义务保护该项权利; 暴力示威则被视为“非政治性”事件。这似乎证实了斯诺和本福特的假设, 即抗议周期带来了富有革新精神的主框架: “与抗议周期的出现相关联的是富有革新精神的主框架的发展或建构”。(1992: 143) 主要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主框架之一就涉及到民主自身。第一波抗议浪潮使公众舆论两极化, 而在随后的抗议浪潮中, 符号的相互影响促使人们在对抗议权重新界定以及如何处理抗议问题上达成了新的“根本上”的共识。

#### 注 释:

[1] 赫伯特·基奇特 (Herbert Kitschelt 1990: 180) 建议用“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个术语来指明政党的具体类型, 因为“左派”政党要求平等, “自由主义者”政党支持直接民主。

[2] 关于对德国和意大利的跨国比较, 更多地论述可见黛拉·波尔塔。(1995: chapter 1)

[3] 在新闻方面, 我对每个国家、每个事件各采用六份日报作为样本, 既包括地方新闻也包括国家新闻, 以及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我把每个事件发生后一周以内的日报中所有涉及到该事件的文章, 都进行了系统分析。至于议会辩论, 我分析了意大利下议院和柏林议院中涉及到已选事件的辩论。对于这两种资料, 我的分析单位是声明 (statements), 我认为声明是包括了主语、宾语和谓语的话语单位。我收集了所有提到支持者框架、反对者框架、诊断框架或预测框架的声明。在我的研究中, 声明是“重新建构的”。我不想衡量每份声明的“存在度”,



只是想找出各种不同参与者的框架。除了每份声明中的资料和数据外，我使用的编码表还包括对发表声明的行动者的界定、声明的对象、以及声明的内容。为了重构框架，我还公布了与框架相关的故事、比喻和模型背景。可参见本文结尾处的资料来源和缩写词列表。对所有日报和议会辩论记录文件的翻译都是我自己完成的。

[4] 议院议员、官方党社会主义党党员科迪哥诺拉 (Codignola) 和桑蒂 (Santi) 在一次议会质询中公开指责：“用改革而不是镇压的方式对形势做出反应，政治权力所做的还不够。” (in ME, March 2, 1968)

[5] 例如，参考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可以解释德国暴力的深层烙印；参考反抗者的神话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暴力在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禁忌。

[6] 遵循同样的思路，有人提及“现在德国人们的难题是：在残忍与无能为力之间的波动。德国警察从未拥有警察的自然权威。德国警察更像军国主义者而不是士兵，这并不是偶然的。” (reader's letter, TSP, June 7, 1967)

[7] 这个联盟的要求包括可以使用能够长距离使用的武器（例如橡胶弹和毒气弹），重新采取以前的 Landfriedenbruchparagraph（即使不能证明是个人责任，但参加已被禁止的、转变为暴力的游行示威就被视为犯罪），以及介绍危险的暴徒成员的罪行。

[8] 德国警察工会要求可以使用能够长距离使用的武器 (in TAZ, June 13, 1987)；联邦国务总理齐默曼 (in FAZ, June 13, 1987)、德国公职人员联盟 (Deutscher Beamtenbund) 中保守的德国警察工会、以及前柏林市国务参议员卢默尔提倡采用集会禁止 Vermummungsverbot（在公众游行示威期间，使用任何面具形式都是犯罪），并提倡禁止游行示威者携带“中性武器”（例如钢盔）。

[9] 正如国务参议员所说，即使集会禁止 (Vermummungsverbot) 已经存在，1987年6月12日游行示威期间，警察也不应该包围那三百

名隐藏的自治者组织成员，因为警察必须时刻权衡两大原则：尊重法律原则和公民安全原则。（Kewenig, in AHB 1987）

[10] 根据雷恩和舍恩所说，“很多当前的政策都倾向于按照一种健康的比喻来组织事件，在这种比喻中，忧虑被解释为社会病态的表现。”（Rein and Schoen 1977: 241）

[11] 引用雷恩和舍恩的话说，“能够生成的比喻可能是战争和胜利中的一个。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识别坏人、受害者和英雄是可能的，那么就可根据与坏人战斗的表现和胜利来解释既有的问题。”（1977: 242）

注：感谢马里奥·迪亚尼（Mario Diani）、皮尔保罗·多纳蒂（Pierpaolo Donati）、马克·朱格尼（Marco Giugni）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对本书之前的版本所作的评论。为了研究德国的例子，我使用了大量的柏林公民权利研究所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档案。在此特别对海涅尔·布什（Heiner Busch）和诺伯特·皮特（Norbett Pütter）的帮助表示感谢。

## 5.政治抗议与公共机构的变革：反越战运动和科学

凯利·摩尔

在对政治抗议的发生进行分析的热潮过后，有关分布广泛的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影响的问题正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大多数有关抗争性政治的结果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引起政策结果（policy outcomes）的原因上，特别是集中在国家对经济物资的供给、抗议团体及其成员的法定权利上。（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 Burstein and Freudenburg 1978; Burstein 1979; Clemens 1993; Gamson 1990; Gelb and Palley 1987; Isaac and Kelly 1981; McAdam 1982; Piven and Cloward 1979; Schramm and qhrbett 1983; Tilly 1978）典型的左派未加调查就开始向诸如医学、艺术、科学、法律及教育等非国家公共机构（nonstate institutions）挑战。尽管这些公共机构由于缺少能使普通人常规化进入的途径而同政府相区别，但由于它们只为较少的成员服务，几乎不具备创建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也不能通过暴力和镇压来抑制分歧，因此它们反而比政府更有可能对挑战者作出回应。

公共机构的变革是抗议运动中的挑战行动的结果，本文研究的就是这种变革的条件。本文的主要观点涉及两个条件：破坏性挑战（disruptive challenges）的存在和公共机构易受挑战的弱点，前者使公共机构活动的日常再现成为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后者主要是由于公共机构的快速发展、对政府的依靠、分散程度较高、对在机构内部的专业人员中的庇护关系（client relations）的依赖等原因造成的。我还要辨别和说明公共机构内部发生变革的机制。我们可以通过调解人（mediator）的行为看出公共机

构所发生的变革，这些调解人既是公共机构的成员，同时也是运动的参加者，他们能将挑战转化为公共机构规则的具体改变。对社会运动的挑战者而言，与非公共机构成员有关的标准规则的改变被视为公共机构变革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因为这些标准规则的改变使长期对公共机构的活动产生影响成为可能。

实际上，本文研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为什么科学容易受到反越战激进主义分子的挑战，并研究专业调解人——参加或支持反战运动的自由主义的激进科学家——如何将这种挑战转化为有关科学中固有的主题、行为、参与者等公认规则的改变。这些挑战与攻击导致科学家、科学知识、科学实践与美国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些最为巨大的变化中，首先是越来越多的公民能够获得有关科技利弊的可靠信息，这些公民可以通过大众传媒间接获得这些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科学家自身、通过公共利益科学组织直接获得这些信息。其次，知识分子、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再像 20 世纪 50 年代那么友好和毫无批判性。知识分子特别是专业学者担负起了审议科学的职责，他们发展了具有高度批判性而不是赞同性和恭顺性的科学分析。美国科学与技术研究计划的发展以及各大学的研究院系的发展是使这一批判性立场正式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这些研究计划中，虽然有些是支持科学研究的，但大多数都受到具有高度批判性的科学态度的知识分子的支配，有时甚至受到怀有敌意的科学态度的知识分子的支配。相应地，科学家也作出了反击，他们指责这些批评家是天真的有时甚至是不合格的，从而引起了一些观察员所称之为的“科学战争”。

科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关系的转变，以及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转变，不单纯是由反战运动造成的。但反战运动却是一系列向科学权威挑战的开端，这些挑战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是由妇女、消遣性吸毒者和激进的生态学家发起的。在本文中，我将研究那些使这种最初的挑战成为可能的科学特征。

## 抗议与公共机构的弱点

抗议和批判是所有民主国家发展中的特征，但它们不一定会导致公共机构的变革。抗议者及其行动的特性是那些向政府挑战的运动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那些具有全国性基础的、持续数年或更多年、并具有多重目标的挑战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同政府一样，公共机构也是庞大而且难以控制的，也包括稳定的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群体；如果没有持续的刺激、强制力和压力，公共机构是不可能发生变革的。另外，同政府一样，由于公共机构也要经常就成员和同盟者对金钱、地位与权力的要求展开谈判，所以从交易的观点来看，那些没有势力的人必然会失败。例如，为了响应亚裔美国人的抗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可能会增加一场亚裔美国艺术家的展览会，但是如果没有持续的、破坏性的压力，照常规来讲亚裔美国人是不可能取得抗议成功的。对于某一公共机构的非正式成员来说，势力来自于对公共机构各个方面的破坏，以期引起各方力量的回应。同样地，与只进行一次行动的抗议相比，如果某一抗议持续好几年并同时保持不断革新，那么公共机构就更有可能对其采取行动。因而，与对政府的挑战一样，对公共机构的挑战也必须超越在有限的领域内的短期性、象征性的变革，而要想做到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要发动起那些具有破坏性、广泛性和长期性的挑战。

但是，正如社会运动的研究者们所了解的那样，抗议者的行动只是社会运动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抗议对象的特征也同样重要。研究社会运动结果的学者们无疑会对政府与组织给予最多的关注；在这里我想把关注重点转向中等范围的实体——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社会机构是通过制订公认的规定来限制成员行为的社会团体，这些规定包括什么是恰当的行动目标（代表性规则），谁能合法地参与行动目标（构成规则），以及对于特定的行动主题来说哪种行为是适当的并且是在允许的

范围内。（标准化的规则；Scott 1994：68）社会机构的组成要素包括组织、网络、成员、组织目标、资金以及其他资源。能把这些社会机构区别开来的标志就是它们分别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而建立，（比如，艺术、教育、医学、宗教、或者科学）并且那些指导围绕某一主题的行动的规则具有长期稳定性。这些社会机构的边界通常比较模糊，因为某些成员、主题、以及活动可能被视为仅仅部分合法，或者可能被视为从合法向非法的转变（与美国医学有关的妇产科学和助产士就是一个例子）。

在一定意义上，公共机构这个术语有时用来指特殊组织——特别是像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或者哈佛大学这样的大型组织，或者是用来描述某个组织、法人、目标或行为，由于它们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某一特定领域内社会生活的永久性要素。因此，纽约洋基棒球队（the New York Yankees baseball team）可以称为纽约的公共机构。虽然这些用法与更为标准的社会学上的公共机构的概念存在某些重合，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永久性的、富有意义的公共机构的概念（公共机构一词的第二层意思）与社会学上的公共机构概念是有关联的。这两种意义上的公共机构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永久性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政治和/或文化效能，也在于它们的起源比较模糊或者已经被人遗忘了。

公共机构有时也与组织（organizations）相混淆。公共机构相对要大得多，它由许多组织、网络和成员构成，而不只是一个正式组织；而且公共机构是围绕那些在社会上、文化上得到公认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来的，例如，美学成果（艺术）、支配自然界的知识和成果（自然科学）、支配人类健康的知识和成果（医学），但是公共机构又不只限于此。在当代工业化的社会，专业人员通常在公共机构中占支配地位，他们研究的主题通常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个特定社会中与众不同的、各自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大多数西方工业化的民主国家都认为宗教与科学是有区别的。

社会运动对公共机构与政府形成潜在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其中最



重要的不同就是，不存在一套标准的直接机制可以供普通民众用来影响公共机构，但公民却可以通过选举和其他的民主途径影响政府。公共机构可能更像仁慈的、非民主的政府。其他的主要不同就是公共机构的局部性（包括它们的局部合法性）以及它们最终对作为管理者的政府的依靠。（Fligstein 1992: 314-17）

我们应该注意到公共机构的易受挑战性与抗议之间的关系是交互式的：易受挑战性并不意味着没有持久的、广泛的和破坏性的抗议；抗议也不意味着反对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对象。我们不应该将易受挑战性视为一种二元范畴，这种二元范畴认为公共机构要么容易受到挑战要么不容易受到挑战，或者认为存在某种有关易受挑战性的跨时空的永久不变的东西。由于公共机构源于宪法或其他正式法律，它们很少有哪些方面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正是这些变化使得公共机构如此与众不同而又有极大的吸引力：构成公共机构的重要规则和关系并不是正式化的，因而经常受制于来自公共机构内部与外部的谈判。除了那些最普通的方面之外（比如说，宗教是关于非理性的，医学是关于治病的），公共机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面，即使有也很少。我想郑重地声明：除了那些基本不变的方面以外，公共机构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的速度与内容应该成为分析的主题。<sup>[1]</sup>

正如对政府的挑战存在一个最佳时机一样，对挑战者来说也存在最合适的时机来贯彻他们反对公共机构的主张。简单来说，公共机构的易受挑战性使它们容易受到来自受庇护者的挑战。公共机构的四个特性决定了它们相对容易受到挑战。第一个特性是组织的快速发展、资金输入的迅速膨胀或者尤其是机构成员的迅速增多。这种“发展”、“膨胀”或“增多”天生就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对于参加者来说，它们使变革变得更加平常，因而也就更有可能发生。同时，这种“发展”、“膨胀”或“增多”也增加了成员和小组的绝对数量，而只有很少一部分成员和小组用于机构的日常运作。与新组织一样，新成员可能会为自己寻求有利的位置（不管他们是移向更高层级的职位，还是仅仅调换到其他职位），原因

有很多：声望、个人满足感、位居能够帮助更多人的职位的愿望、金钱、自私自利、以及其他动机。资金的迅速增多意味着资金分配模式不可能被固定化和惯例化，这就导致成员为了获取资金而提出新的政治主张。

第二，公共机构的相对扩散性（diffuseness）使其更容易受到挑战。一个扩散的公共机构缺乏对其成员或参与者（包括个体和组织）持续的集中控制，在这种机构，成员能从多种渠道获取资金和地位，而且这种机构存在很多准入途径。另一种说法是从定义上来讲的，公共机构难以对其内部具有较高自治权的组织、网络和个人进行控制。这就意味着个人或组织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以独特的方式对挑战和机遇作出响应。

例如，美国医学目前就比艺术受到的挑战要少，因为医学尽量对成员进行严格的控制，它的专业组织相对较少，而且工作场所也必须得到许可才能使用。另一方面，艺术对成员的控制较弱，它有数以百计的专业组织，而且在许多场所都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准入途径的多样化以及对成员控制的缺失意味着艺术更容易受到挑战。<sup>[2]</sup>

公共机构易受挑战性的第三个因素是机构内部委托人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所有公共机构都是由专业人员领导的。<sup>[3]</sup> 专业人员的合法要求（因而也包括对金钱、地位和政治权力的要求）通常建立在专门技能以及为一个委托人或为多个委托人服务的基础上。专业人员声称为特定的、有组织的委托人服务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利益（比如金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容易受到挑战。专业人员与委托人关系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机构的易受挑战性。一方面，所有的专业人员都必须依靠委托人的帮助才能使其活动正常化，委托人的帮助支持下面这一观点：即非专业人员不能像专业人员那样提供某些服务和履行某些任务。但是另一方面，当委托人处于提供金钱或其他物质支持的地位时，专业人员更容易受到挑战。此外，有组织的委托人比那些没有组织的委托人更具有威胁性。

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政府的依赖也会使公共机构容易受到



社会运动抗议的挑战。在这里，从公共机构与政府有关联的意义上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容易受到社会运动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同一个过程的挑战。对公共机构来说，只有在几乎没有分歧的历史时期同政府结盟才是有利的，而在对政府的激烈抗议时期，政府的亲密结盟者也容易受到挑战。当公共机构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时候，或者当抗议者攻击的部门已经为公共机构代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公共机构视为同政府结盟了（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政府机构）。因此，对一个团体来说，同政府结盟并从政府那里获得好处有时可以成为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源泉，但是当政府或者说政府的某些部门成为社会运动攻击对象的时候，结盟就变成不利的条件了。政府同公共机构结盟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法律。因此，那些与政府（例如政府法律部门）具有牢固的、合法的非正式结盟的公共机构比那些没有这种结盟的公共机构更容易受到挑战。

## 公共机构变革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治抗议可能会影响公共机构的三个特性。公共机构是能把与一系列行动主题有关的特定群体的行动组织起来的常规方式。因此，公共机构主要与规则和假设有关，而这些规则和假设是关于某个主题谁能做什么的规定。抗议可能会改变公共机构的三个方面（行动主题、成员、行动）中的任何一个：当抗议在根本上改变了这三个方面时，挑战就被视为最成功的；当没有任何改变发生时，挑战就被视为失败的。

因此，当我们检验变革是否发生时，应该首先寻找公共机构内部成员的社会特征或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变化。下面就是来自医学的例子：只有那些得到政府许可的人才能合法地行医。通过囊括新团体或排除其他团体的方式，抗议可以改变谁能成为医治者。一些既定规则通常是抗议群体攻击的目标：例如，在医学界，只有医师才能对医治艾滋病的药物的效果进行合法鉴定，但艾滋病激进主义分子已经对这一既定规则提出

了质疑。(Epstein 1996)

其次，我们应该寻找那些与某些主题有关的既定规则的变化，这些主题已经引起公共机构的成员的关注，特别是引起那些想掌握公共机构中大部分权力的专业人员的关注。这些公共机构成员和专业人员参与的主题或思考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认为合适的主题是什么，他们忽略了什么？

最后，那些围绕某一特定主题的行动方面的规则、以及那些有关特定类型的成员的规则也可能发生变化。下面这些规则是标准的规则：决定成员之间可能会有哪种相互关系的规则、成员可能会围绕某些特定主题采取哪种行动的规则。由于公共机构的专业人员通常声称为委托人服务，所以标准规则的变化包括专业人员与委托人之间产生的典型性行动类型或常规行动类型的变化。标准规则也会影响公共机构成员与其他有实力的团体（如政府）之间常规行动模式的类型。（例如，建议、中立或提供经纪人业务）举例来说，科学研究者对待实验室动物的变化就是动物权利抗议运动的结果，（但科学研究者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的做法）又比如，（假设）普遍取消博物馆的门票。

相比而言，参与者、主题和行动模式的重要性如何呢？就绝大多数而言，正如规范行动的法律通常会成为针对政府的挑战者所攻击的目标一样，标准规则才是最重要的。例如，某一运动可能会追求三种不同类型的目标：改变公共机构活动的参加者，改变公共机构活动的主题，改变非公共机构成员的准入规则和代表规则。这三个目标都涉及到那些能够支配成员与非成员之间、产品与委托人之间、主题与委托人和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规则。但是从长远来看，那种能影响公共机构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种变革位于公共机构权力的核心：公共机构内部的专业人员能制定规则，而公共机构外部的人员却不能。拥有常规性的、永久性的公共机构准入权为非成员介入规则制定提供了途径。

## 公共机构变革的机制

要想了解易受挑战性的公共机构是如何改变主题、成员与行动模式的，就需要弄清楚挑战是如何转化为变革的。一般来说，当公共的破坏性抗议发生在公共机构的公共活动领域时，而且又出现了广泛传播的口头与书面批判时，公共机构内部的人员和组织就会对此作出反应。以个人的力量永远达不到挑战公共机构的目的，必须通过破坏不断再现的正常的日常联系的方式对公共机构进行批判。这种假设的潜在意思就是假定公共机构成员——特别是专业人士把“一切运行正常”视为公共机构行动完全合法化的结果，因为“一切运行正常”能够引起资金和人员的持续流动。

当调解人——既是挑战运动的成员，同时也是公共机构的专业人员——着手改变公共机构内部组织的行动的时候，破坏性挑战与公共机构的易受挑战性就会一起转化为变革。社会运动理论通常将挑战者和政治组织成员视为截然不同的、各自独立的群体，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重合。调解人在公共机构成员、运动的成员、或者在这两种成员中可能只处于微不足道的、而不是核心的地位。而调解人在公共机构与挑战运动之间（或挑战运动之间，或挑战运动的网络之间）占据的中间地带，恰好是将抗议群体的要求转化为实践、标准与人员变革的最佳位置。例如，那些支持艾滋病激进主义者要求的同性恋医生在挑战医学界治疗艾滋病病人的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Epstein 1996）

我们很难不考虑公共机构成员的要求，毕竟他们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与公共机构外部的人员比起来，他们不太可能被作为疯子或骗子开除。调解人也能促进变革，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到规则制定机构并且有权使用资源和人员，而那些仅仅是挑战运动的成员的人却不能促进变革。最后，调解人是使用多方面语言的：他们能够将挑战运动所关注的问题

转化为公共机构成员可以接受并可以理解的语言。<sup>[4]</sup> 通过对科学易于受到反战激进主义的挑战性的检验，以及对那些参加反越战运动的激进主义科学家促成科学行动与科学主题发生变革的方式的检验，本文后半部分主要考虑上述一般性的论点。

## 二战后的美国科学：新机遇与新挑战

二战后的第一个 10 年，科学家主要因为发现了原子能和核武器而闻名于世，原子能和核武器的发现相当于向美国人民承诺了一种安全而幸福的生活。现在美国人垄断了“极其廉价”的能源的来源，成为不断更新的武器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受益者，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可能是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由于人们认为科学家能够客观地分析政治问题，所以许多政治家将他们视为政治争论中“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的关键。经济政策制定者也把科学研究与发展视为美国军事和工业经济的动力。

更具体地说，联邦政府对科学的信心和热心使其在 1945 年后对科学的投资空前高涨。1930 年联邦科学基金少到不足 1 亿美元，但是到 1945 年翻了十番，达到 10 亿美元。到 1954 年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美国全年对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投入超过 20 亿美元。（Price 1965：35）国家资助对国家的军事需求至关重要。1959 年，联邦研究与发展预算的 59% 都用于与防御有关的研究，（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77：34）那些与军事需求联系最密切的机构获得了最多的资金。相反，获得联邦资金最少份额的联邦机构是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和国家健康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最近，现有基金（available funds）也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展。为了跟上越来越专业化的领域的发展，科学家成立了新的协会。由于物理学对物质的基本构造块（building blocks）有着最精准的理解，同时也最有能力制造出有用物质，所以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物理学仍然是“科

学王后”，但是随着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1956年发现了DNA，生物学家开始争夺“科学王后”的位置。（Keller 1992）专业协会像野草一样迅速增多：1945年，153个新的专业科学组织成立；1955年，这个数字是185；而1960年，这个数字达到216个。（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 1992）<sup>[5]</sup> 联邦政府也建立了新机构以资助科学研究，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健康研究院和原子能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由于联邦资金只资助那些主要研究机构，而不是在所有学院和大学里平均分配，所以各大学都迅速提高其科研能力，使自己成为比其他大学更具竞争力的学校。这意味着科学家的学术注意力都集中在越来越狭小的自然界领域，以及集中于为数不多的科学家的看法和兴趣上，所以并没有出现像在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期间那样的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集中。

最后，随着研究基金的增多，科学家的数量也在增加。虽然科学博士授予的数量与其他学科的增长比率一致，但特殊的科学学科的博士授予数量的增长却更快一些。生物学博士授予数量比其他主要的科学学科的增长比率都要快，其次是物理学。因此，这些领域的平衡不仅很可能被打破，而且与其他领域比起来，年轻的科学家更愿意进入这些领域。（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50-1970）科学家越来越多样化。1945年后犹太裔科学家的数量有所增加，他们中有一些是从纳粹主义下逃脱的，没有受到美国科学家不关心政治的风气的影响，同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也加入到科学家队伍中。科学家的工作场所也变得更多：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的最大雇主是工业界，但是到60年代，联邦政府与私营部门雇佣的科学家几乎一样多。虽然从数字上看工业界和政府的科学研究雇员在减少，但学院和大学的科学家的数量却处于最高的增长率中。（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73）

1945年到1960年间，科学迅猛发展，新的观念层出不穷，资金大量涌入。对那些能抓住机遇的人来说，有更多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不仅如此，科学的发展还伴随着去集中化的过程。传统观念告诉我们，战后



美国的科学主要是政府资助的，所以它非常多样化而且相当集中。(Mukerji 1989; Lapp 1965; Lasby 1966) 但这显然不是实情。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显然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科学的排序中，生物学家不仅没有把自己看做是从属于物理学家的，而且他们还认为自己即将发现生命的真谛，这将使他们能够超越物理学家。(Keller 1992) 更为重要的是，不存在对科学家的鉴定活动或者对他们的公共行为或个体行为进行引导的核心组织；即使像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这样的跨学科组织也不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控制，甚至对科学家们的信息交换也不进行协调。国家研究委员会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或者国家科学院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也不像美国医学会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对医生的管理那样规定科学家的行为或研究主题。(参见 Start 1982; Wolfle 1989)

政府在科学能够生产出的物质产品方面的利益以及科学家在资金方面的互惠利益，共同促进了科学的高速发展与分化。科学家除了在知识与财力上依赖政府以外，在其他方面也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这些联系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为科学家带来了巨大利益，但在 60 年代却使科学家容易受到挑战。首先，科学家与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从二战以来，科学家开始作为战略精英的角色出现，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对政府有重大价值。(Lasby 1966: 267) 通过参加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咨询委员会与特别委员会，科学家开始参与政治决策。(Lapp 1965) 1958 年，国防部国防分析院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的詹森计划 (Jason program) 的形成，就是政府与科学界之间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正式的政治联盟之一，而詹森计划的作用就是使最优秀、最有能力的物理学家为国防的机密问题服务。(Cahn 1971)

政府与科学之间的知识、政治和财力联系的捷径就是大学的军事研究中心的发展。这些研究中心通常是由大学建立的，旨在获得政府的研究资金，它们通过专门计划 (例如西弥斯计划 Project Themis) 使自己成



为政府批准国防资金的受益者，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并促进研究中心与地方工业之间的协作。（Heineman 1993：chapter 1）在所有研究中心中，最大、最著名的就是斯坦福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与仪器实验室。（Leslie 1993）从军事协作中获利的大学不仅包括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科内尔大学以及詹森·霍普金斯大学等著名的私立大学，而且还包括纽约布法罗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公立大学。（Heineman 1993）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科学家、大学管理者、军队官员发现，这些专门计划及相关计划（如詹森计划）对所有当事人都有利。科学家获得了稳定的资金，通常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基础研究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大学管理者获得了大量经费；政府得到了武器和产品。正如莫克里奇（Mukerji 1989）所说，这种安排使科学家受到国家的政治管理，从而成为一种劳工后备军，同时他们还乐意用客观的语言和生产的武器为政府计划做辩护。

最后，科学家将他们对政府的经济和政治依赖看做是为他们的主要委托人即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服务。政府是代表公民利益的，因此，进一步讲，科学家与政府的联合似乎可以看做是为更普遍的利益服务的。（参见 Grodzins and Rabinowitch 1963年主编的一本论文集，这本论文集反映了源自《原子科学家期刊》的上述这一假设，这一期刊是战后关于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要的知识期刊）同时，那种拥有能把科学家同普通人的利益联系起来的委员会或计划的专业科学组织是很少的。即使是1969年以前存在的几个专业科学组织——例如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人类福利科学委员会（the AAAS Committee on Science for Human Welfare）及其前身科学委员会社会部（Social Aspects of Science Committee）——也主要致力于提高公众对科学产品和科学行为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的评价，而从不要求公民加入，也不关注公民感兴趣的问题。（Kuznick 1994；Wolfe 1989：234-36）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这种安排挑战，他们质询科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联合从道德上讲是否正义、是否民主或者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人们对这种安排的挑战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科学研究院的分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部分原因还在于国家对科学的关注。

## 反越战运动和科学

虽然美国早在1954年就被卷入那种打击代表法国利益的越南民族主义势力的斗争中，但直到1965年美国才采取大规模行动，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采取实际行动支持《东京湾决议》（the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大量增加对北越的轰炸。早期的“裁减核武器”运动主要是由专家、部分科学家以及少数和平主义者领导的，与此不同，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是由学生领导的。（DeBenedetti 1990）以大学为基础的抗议者的最初目标并不是科学，而是反对战争，但是到后来学生抗议不只是在大学校园里发生，而且日益把矛头指向大学本身，因为大学看起来是推动越南战争的真正合伙人。众所周知，人们总是倾向于反对离自己最近的对象，而大学校园里的军事科学联盟就是非常显著的对象。对许多学生而言，开始质疑大学与“军事产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之间的关系并不算是重大飞跃，因为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就开始质疑了。对大学及其院系的抨击还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原因和学术上的原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的成员是很多大学中反战抗议的领导者，他们都认真学习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著作，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压迫不只存在于警察和法庭的公开行动中，而且还存在于某一特定社会的公共机构、语言和文化中。（Ehrenreich and Ehrenreich 1969：34-35）

学生们逐渐把目标对准军队征兵计划和研究工作实验室，这些实验



室从最终为在越南的美国军队所利用的研究计划中获得资金。在 1965 年到 1970 年之间，至少有 11 所一流大学<sup>[6]</sup>、军队资助的研究院和实验室成为反战抗议的场所，而且它们还与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1970 年，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军队算术研究中心（Army Math Research Center）的爆炸事件致使一名研究员死亡，1970 年肯特州立大学杀人事件，以及 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室内静坐抗议。在这些事件的每一个事件中，抗议者都将其行动直接指向大学与军队之间联盟的物质表现，通常是国防部资助的实验室和研究计划。早在 1968 年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就已将抗议矛头指向液晶研究所，因为它研发出的运动探测器被用在越南（Heineman 1993：37）；在斯坦福大学，学生抗议的目标是斯坦福研究所，因为建立斯坦福研究所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得到国防部的合同，虽然斯坦福研究所在名义上独立于斯坦福大学，但斯坦福大学却在经济上依赖于斯坦福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1968 年的占领校园运动主要是由于哥伦比亚大学与国防部分析研究所进行合作引起的，这次合作使数百万国防部的资金投入学校的科学研究中。同样地，1970 年威斯康星州大学史德林礼堂（Sterling Hall）的爆炸也是由于该大学与军队的联盟引起的。（Bates 1992；DeBenedetti 199；Heineman 1993）

更一般地讲，抗议者认为战争是鲁莽、残酷和愚蠢的，只能使当局领导者和那些脱离群众的科学家不朽。学生运动对科学家的主要指责就是他们没有负起使科学知识和科学成果为社会服务的责任，相反却让它们带来了致命的破坏性后果。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抨击如此普遍，以致于在白宫的国家科学奖奖章授予仪式上，约翰逊总统都被迫为科学家辩护：“权利受到侵害的公众没有对‘好的’科学和‘不好的’技术划定清晰的界限……我们都知道，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sup>[7]</sup>是医生，而不是妖怪。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那些被妖怪激怒、从而游行抗议医生的村民”。（qtd. in Kevles 1978：400）对当局的大量质询直接将科学家推到风口浪尖上，因为他们早先对地位提出的要求是以政治当局和他们在保护美国人安全方面的作用为基础的。（DeBenedetti 1990；Kevles 1978；Lapp



1965; Leslie 1993) 与对科学、大学与越南战争之间的联盟的直接的公开抨击相呼应，反独裁主义者的挑战使科学家为人类服务的声称显得越来越难以置信。大学、专业科学协会、科学家及其他势力原本可以干脆不理睬这些抗议。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

## 调解人与公共机构变革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谈到的那样，科学家不只是单纯地对抗议作出响应，他们同时还是抗议的参与者和发起者。一些科学家，尤其是犹太裔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非常清楚他们与政府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 (Faustian bargain) ——用武器换钱，并对技术进步已经超越了人类政治能力的现状非常关注。甚至早在原子弹技术研发以前，就有美国科学家对此表达了道德上的焦虑，有些科学家还向罗斯福总统施压，不让美国空投原子弹。(Smith 196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科学家成立了几个团体，如原子科学家联盟 (the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 和美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 建立在一个英国团体基础上)，并出版了被广泛阅读的刊物《原子科学家期刊》。1948年，科学家聚集在新斯科舍的帕格沃什 (Pugwash, Nova Scotia)，召开首次帕格沃什年会，寻求鼓励国际合作的方式。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末期，科学家（仍由犹太裔科学家领导）成为和平团体的领导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莱纳斯·鲍林 (Linus Pauling) 和阿尔伯特·施韦策 (Albert Schweitzer) 对 SANE (明智的核政策委员会) 的创立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其他的，比如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里奥·西拉德 (Leo Szilard) 和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 (Barry Commoner) 在其他和平组织与“裁减核武器”组织中非常活跃，例如生存和放射性微尘科学家信息小组。(Scientists for Survival and fallout information groups) (Commoner 1958; O'Neill 1971) 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家，例如尤金·拉宾诺维奇 (Eugene Rabinowitch)，直言提倡对核

能的国际控制。(Grodzins and Rabinowitch 1963)

科学激进主义的传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一度衰落，而在反越战运动中，科学家复兴了这种传统。在大学校园里，自由主义（更为少见的是激进主义）科学家——通常是犹太裔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要么是正教授要么是研究生，(Moore 1996) 他们在寻求使政治义务和科学义务相协调的方式。这些科学家通常受到两种反战运动方式之一的影响。第一种方式也是较为普遍的方式是：科学家本身就是反战激进主义者，他们同反战行动一起，支持对科学沦为军队利益的附庸的批判。另外一种方式也是科学家参与反战行动的较为罕见的方式——即招收激进主义的科学研究生，让他们对学院行为施加压力。(Moore 1996)

起初，这些调解人或激进主义科学家通常利用现有的专业协会，设法将自己的政治利益与专业利益结合起来。通常，这些协会的成员要么加入到那些与科学家专业利益的促进相矛盾的大众政治中，要么参与一些微不足道的象征性活动，例如将“科学与社会”的部分加入到年会议程中去。科学家与专业协会不妥协的产物就是他们发起和成立了一些以科学为基础的组织，这些组织是反战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通过给自由主义的激进个人和公民政治团体提供科学信息和专业知识，这些组织试图同他们直接交流，并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忧思科学家联盟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1969)、为民所享的科学 (Science for the People 1969)、公共利益科学中心 (Center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972) 以及争取和平的电脑工作者 (Computer People for Peace 1969) 等组织。这些组织还包括由科学家和律师共同建立的公共利益团体，例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和环境保护基金 (the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这些组织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们改变了科学领域的规则。<sup>[8]</sup>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到 60 年代末，科学家们一直将公开提供科学信息并对工业界和政府进行合法的批判视为禁区。(参见 Fox 1985: 298,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科学家抨击雷切尔·卡森，因为她出版了《寂静的春天》

一书) 但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科学家都没有找到研究那些对公众甚至是一小部分公众——而不只是对政府或工业界——有重要意义的主题的方法。科学家在至少 5 本新书中分析了他们对公众应负的责任, 并提出了关于他们应该如何协助公众赢得与工业界和政府进行的政治斗争的建议。<sup>[9]</sup>

忧思科学家联盟 (UCS) 在使这种行为模式合法化方面所做的也许比其他团体都要多。自从忧思科学家联盟 1970 年在波士顿地区空气污染听证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公民挑战的报告后, 公众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就大大增加。(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1970) 1971 年 7 月, 忧思科学家联盟发表了首篇关于核动力的独立安全报道; 由于报道的对象是外行的公众, 因此受到了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国家广播公司 (NBC) (UCS 1984) 在内的多家媒体的高度关注。在接下来的整整 10 年, 通过提供核发电厂选址和安全规则的信息, 以及通过抨击原子能委员会的应急堆芯冷却系统, 忧思科学家联盟在公民与政府的沟通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Downey 1988) 它的行动使更多公众意识到与核能有关的威胁; 主流媒体也是第一次报道核能问题。

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 几乎每个主要的专业科学组织 (还有绝大多数较小的组织) 都采用论坛、委员会或者附属组织等形式, 去做那些公共利益科学组织正在做的工作: 将科学研究和科学行动与公民团体的利益相结合。<sup>[10]</sup> 物理学学会、生物学学会和数学学会成为领头羊。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以及少数数学家最有可能参加反战激进主义的活动并向自身的专业协会挑战, 以便从事对社会负责的活动。于是, 公共机构变革就以这种方式发生了: 激进主义科学家发现专业协会对他们对社会负责的行动的反应较为迟钝, 但当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公共利益组织时, 专业协会也会采取同样的对社会负责的行动。

如果这些关注新的主题 (对公民而不是对政府或工业界进行关注的问题) 的团体和新的行为方式 (直接同公众交流) 是反战运动对科学产生的影响, 那这种影响对激进主义分子来说就是重大的胜利。此外, 科

学家所做的改变也促成了非科学家对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学院派的看法的改变。如果说科学家在科学领域的改变源于科学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联系，那么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是社会学家）的改变也是如此。人文知识分子受到左派科学批判（包括马尔库塞）和反战与民权激进主义经历的影响，左派科学批判是科学哲学的新发展，它认为科学是社会与政治的创造物，而反战与民权激进主义经历则说明科学与统治方式相结合的微妙方式和并不微妙的方式。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仅在少数大学成立了新的学术网络和正规组织，这些网络和组织致力于强调科学知识与社会行为的社会决定性和政治决定性，而不是使之更模糊。其中最主要的组织是1975年成立于康奈尔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在“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下形成了新的学位授予计划。美国最早实行该计划的两个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和位于纽约州特洛伊的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虽然在一些大学，这些计划起到了科学助推器的作用，但是在绝大多数学院占支配地位的态度仍然是对科学的批判，而不是像早期的那一代学者那样对科学充满了敬畏之情。<sup>[1]</sup>同其他所有学科一样，与上述主题相关的期刊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其中最权威的仍然是创立于1971年的《社会科学研究》。

### 结语：批判、抗议与科学的变革

科学自身的易受挑战性使它很容易受到反战抗议的影响。抗议者之所以能够得到科学家的支持，主要是由于科学家本身也是激进主义者，他们支持抗议者对美国科学的政治本性的批判。调解人（激进主义科学家）能够通过成立新的对社会负责的组织，将抗议团体（基本不包括科学家）的挑战转化为对科学家行为规则的改变，而这些新组织的行动在20世纪70年代也被主要的专业协会以改进的方式采用。

这些调解人为什么能够促成变革呢？科学从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来

说很容易受到挑战。科学的迅速发展意味着没有单一的权力中心，因而就随之产生了许多都能受到挑战的场所和抗议的途径以及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因此，调解人作出变革的尝试就以下面这样的方式发生了：变革是通过向大学与军队的联盟和专业协会的挑战实现的，在有些情况中是通过个别科学家拒绝接受军队的资金实现的。科学的快速发展还意味着有许多新人加入这一领域，他们的利益与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就从事这一职业的那些科学家有所不同，正如可提出论据加以证明的那样，20世纪40到60年代是冷战的高峰期。

自由主义科学家主要是在大学工作的年轻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及各年龄段的犹太裔科学家，他们都在寻找使他们的政治信念与科学义务相协调的方式。为什么这些团体的利益既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也不同于比他们更强硬更保守的同辈呢？一方面，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数太多本身就更容易产生意见的分歧。另一方面，以前的政治经历使新的团体——流亡科学家，特别是犹太裔科学家和较为年轻的科学家——对强大的军队与科学联盟有所怀疑，这也是实际情况。由于受到那些领导者相对保守的专业协会的冷落，这些科学家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的行动首先被那些当初忽略他们要求的组织以一种改良的方式所采纳，随后，到1975年，他们的行动又被绝大多数主要的和次要的专业科学组织所采用。

同时，那些既是反战运动参加者、又从事科学社会学与哲学研究的学者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科学深受战争的决定和支配。与学院派激进主义科学家一样，这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科学的人种学分析、历史分析和哲学分析来说明科学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并一致呼吁对科学进行社会研究。

通过辨别非国家公共机构与政府在变革形式和原因上的异同，我得出如下结论。激进主义分子为了达到其目标，必须选择非常有利的时机，在这一点上，对非国家公共机构与政府来说是相似的。如果抗议的对象是政府，那么就意味着激进主义分子必须与那些通常是经过选举产生或

被任命的官员结盟，或者他们必须能够提供一些东西（通常是金钱或选票）回报那些支持他们目标的人。同样，如果没有变革的刺激，公共机构内的团体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第二个相似点是：那些没有掌握实权的人（无论是政府内的还是公共机构内的）通常需要使用特别的方式来获得别人倾听自己意见的机会，甚至在多数情况下要通过强制性变革的方式来获得这种机会。这些比较对于社会运动或者政治学来讲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学对大多数权力关系都作了更为一般性的评论。

以政府为目标的抗议和以公共机构为目标的抗议之间的许多重大差异已经遮蔽了它们之间的相同点。最为重要的是，对激进主义分子来说，挑战公共机构更困难一些，因为公共机构中的权力核心不明确。尽管有些公共机构的权力比其他公共机构的权力更集中（例如，医学比艺术更集中），但它们的变移性和多样性使得改革公共机构比创办（和维系）公共机构更困难。第二，虽然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显然是同官僚主义者一起行使权力的，但他们在政府中却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这意味着激进主义分子可以通过不给那些需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投票、利用标准化程序以及实施直接的破坏性活动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对公共机构来说并不是这样的。虽然公共机构内部的专业人员通常握有最大的权力，虽然他们能够拥有威望和非正式权力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声称为委托人服务而不仅仅是为自身利益服务，但事实上却很少有委托人能够通过常规方式影响到专业人员的行为。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那些对公共机构的行动、成员和主题进行挑战的团体不能使用那些为大多数社会运动在挑战政府时所使用的普通方式：即将直接的合法选举行动与革新的破坏性行动相结合的方式。挑战公共机构必须使用非同寻常的方式——即革新的破坏性行动以及同那些既能转移目标又能向公共机构的领导者施压的调解人结盟的方式——才可能促进挑战者共同利益的实现。

## 注 释

[1] 与同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在特定时期内相对易受挑战相比，研究者可能会把分析重点放在公共机构之间的差异上。但对几个公共机构的跨国比较（比方说，法国和日本的医学和艺术）则可能会使研究者集中关注某一特定国家的公共机构的相似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某一特定公共机构进行比较的内容会影响研究者对公共机构相对易受挑战性的判断。

[2] 然而，作为易受挑战性的因素，扩散性和自治权与那种引起公共机构急剧变革的挑战的能力无关。从公共机构具有扩散性来看，变革只可能在小的范围和领域发生，而不是在所有方面发生或“自上而下”地发生。

[3] 专业人员是指那些独自拥有一部分知识的使用和创造的职业群体，也指那些为了获得公众或委托人的信任而声称遵守某种道德规范的职业群体以及那些拥有许可体系和对等控制（只有专家才能判断彼此的工作）的职业群体；还指那些支持这些关系和活动的专业协会。

[4] 迈耶（Meyer）和惠蒂尔（Whittier）关于社会运动附带结果的论文中研究了“中间人”对思想、成员和策略的传播的重要性，以及“中间人”对建立跨运动的联盟的重要性。

[5] 这些数字比实际成立的组织数量要小，因为这些数字只包括那些1992年仍然存在的组织。

[6]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肯特州立大学、乔治城大学（Heinemán 1993： 196， 214-17， 228）、哥伦比亚大学（Avorn 1969）、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Leslie 1993： chapter 4）、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Lyttle 1988）、威斯康星州立大学（Bates 1992）、西北大学（Porter 1973）。

[7]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女作家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所著小说中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手创一怪物，但结果自己被怪物所毁。

[8] 除了某些特例（比如美国物理学协会）之外，作为反战运动的结果，那些从事特殊科学活动的科学家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简



单来说，这是因为反战运动的抗议者们并没有同样地去谴责科学家的相关社会特征。

[9] 这类书中阅读人数最多的是《建议与分歧：政治舞台上的科学家》一书，作者是约尔·普里马克和弗兰克·冯·希佩尔（Joel Primack and Frank von Hippel 1974）。其他的还有《为了社会的科学》（国会关于联邦的、州的和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的目标、政策和计划的会议公报）由约翰·E·毛克编辑（Science for Society John E. Mock 1970）；《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由马丁·布朗主编（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Scientist Martin Brown 1971）；《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纽约科学研究院的年报 vol.196, art. 4）由菲利普·施克威兹编辑。（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sts Philip Siekevitz 1972）

[10] 按照成立的顺序，这些组织分别是：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1969）、美国微生物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1969）、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70）。

[11] 萨尔·雷斯蒂沃（Sal Restivo），1995–1996年任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主席，在1995年10月15日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这一观察结果。

注：由衷感谢埃德文·阿门塔（Edwin Amenta）、林恩·乔瑟尔（Lynn C. Chancer）、马可·朱格尼（Marco Giugni）、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戴维·S·迈耶（David S. Meyer）、杜安·欧菲尔德（Duane Oldfield）、弗朗西斯卡·波拉塔（Francesca A. Polletta）、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W. Powell）、史蒂芬·瓦勒奇（Steven Valocchi）和吉尔达·沃尔曼（Gilda Zwerman）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对巴纳德大学的学生巴里·梅尔策（Bari Meltzer）、索尼娅·卡迪尔（Sonia Qadir）和玛丽·塞加雷斯（Marie Segares）协助完成的出色调查一并表示感谢。

## 6.激进主义的传记性影响

道格·麦克亚当

近几年来，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普遍为缺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impact）或结果（consequences）的系统研究而感到惋惜。（参见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88: 727）但是，正如马可·朱格尼（Marco Giugni）在本书导论中说明的那样，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关于社会运动结果这一一般性主题的文献。可是，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总会受到对各种社会运动结果的不均衡的新闻报道的影响。有些类型的社会运动的结果已得到人们大量的关注，而有些则为人们所忽视。大部分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都集中在社会运动活动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上，这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很少有人关注那些广泛的无意的社会结果或文化结果，而这些结果看起来是与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在后一种分类中，我将讨论经验上与社会运动活动有关的传记性结果或人生历程结果（biographical or life-course consequences）。

在本文中，我想对社会运动行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口统计的影响加以区分。第一种影响是根据持久的个体激进主义得出的传记性影响。第二种影响——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影响——主要是社会运动作为整体层面的因素对人生历程模式变化的影响。接下来，我将回顾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主义分子进行的各种跟踪研究，以便说明运动参与的传记性影响。然后，本文的余下部分将以我和我的几个同事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结束，这个报告支持下面这一论点：许多与“生育高峰期出生者”有关的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可能会从某些方面反映出 20 世纪 60 年代政治运



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

## 个体激进主义的传记性影响

在把注意力转向少数几项对以前的激进主义分子 (former activists) 进行系统的跟踪研究之前 (到目前为止, 这几项研究均已完成), 请允许我简单谈一下主流媒体对这个论题的关注——有些是社论类的。有关这个论题的学术文献相对较少, 这与主流媒体对美国所关注的问题的报道数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分子 (radicals) 现在在哪里呢? 通过无数的报刊文章和电视新闻节目, 很多普通民众以为他们确切地“知悉”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主义分子经历了什么。不仅如此, 他们还以为自己知悉有关社会运动参与结果的更为一般性的东西。他们“知悉”的东西可以从主流媒体对与以前的激进主义分子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的生活的描述中搜集到。

这些文章塑造的以前的“60 年代的激进分子”的形象与机会主义的雅皮士一样。与以前的激进主义分子“明星”——例如杰里·鲁宾 (Jerry Rubin) 和后来的艾尔德里奇·克利华 (Eldridge Cleaver) ——同时代的人的生活总是被当做支持这种普遍情形的证据。鲁宾作为里根时代的股票经纪人的化身, 克利华作为里根时代保守派的化身, 是对当时美国人生活态度的再现, 这种再现既给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范本, 又可以作为重新确定一种道德成熟和政治成熟的根据——这也是许多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分子”的典型要求。由于鲁宾和克利华的事迹经常出现在大众报刊里, 所以他们的生活可以当做对与以前的激进主义分子同时代人的传记的普遍说明。因此, 20 世纪 70 年代初新左派之所以突然瓦解, 按其申述原因在于当时处于大规模代际叛逆时期, 出现了众多信奉唯我 10 年 (Me Decade) 的政见和生活方式的以前的激进分子。

假如鲁宾和克利华事实上只是受到媒体普遍关注的以前的激进主义分子而已, 那么为什么这些代际叛逆的形象会持续下去呢? 答案可能在



于这类情形具有较强的非政治化功能。如果多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分子成长为雅皮士，那么他们早期的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抹煞为年轻不成熟和追求新潮的产物。由于鲁宾和克利华这样的人物长大后都拥护主流价值观并拥有传统的工作，所以他们使公众消除了疑虑并确信下面这一点：即没有必要把他们早期的激进政见太当真。从这个角度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主义的长期传记性影响——展开来讲，即更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参与的影响——似乎是很小的。

虽然主流媒体的评价非常有吸引力，但我们有很多质疑主流媒体的理由。首先，在鲁宾和克利华之后，我们已经很难辨认出许多与其经历相符的、以前的杰出的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主义分子。其次，主流媒体的评价依赖于对连续性（continuity）的不可靠的判断，而这些连续性连接着生育高峰代所特有的文化忠诚和政治拥护的转化模式。生育高峰代中恐怕只有 2% 到 4% 的人积极参加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晚期的任何一次社会运动。因此，现在的雅皮士很有可能并不是受到生育高峰代中激进主义分子的吸引，而是受到其他 96%—98% 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的影响。第三，大众传媒的评论不幸背离了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主义分子进行的少数几项系统的跟踪研究。

虽然与研究社会运动招募新成员的文献比起来要少很多，但也有一小部分针对以前的激进主义分子进行的跟踪研究，这些研究致力于评价社会运动参与的传记性影响。这些研究对一贯持反对意见的人来说意义重大，相对于我刚才描述过的媒体评价，它们针对的是以前的激进主义分子。在概括这一学术观点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构成本文学术参考文献书目的主要研究。

审视社会运动参与影响的第一个重要研究是由杰伊·德默拉斯（Jay Demerath）、杰拉尔德·马韦尔（Gerald Marwell）和迈克尔·艾肯（Michael Aiken）进行的。1965 年，这些研究者对 223 名志愿者进行了“前后对照”（before and after）的调查，这些志愿者参加了夏季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计划（summer's SCOPE project），该计划是由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发起的一次选民登记尝试。4年后, 研究者通过继续对40名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的志愿者进行访谈, 补充了最初收集到的数据。1971年, 德默拉斯、马韦尔和艾肯在《理想主义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Idealism) 一书中总结了各类选民登记尝试的结果。然后, 1984年, 这几位研究者又回到该领域对参与环境科学委员会计划的长期影响进行了评价, 这次他们调查了145名计划参加者。1987年, 他们以论文的形式将调查结果发表在《公共舆论季刊》上。(Marwell, Aiken, and Demerat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7)

下一位相关的研究者是詹姆士·凡德里斯 (James Fendrich), 他亲身参加了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民权运动, 这为他提供了接触研究对象的难得机会。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比凡德里斯发表的有关传记性影响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还多。凡德里斯发表的很多著作都依靠1971年从28个白人民权激进主义分子和72个黑人民权激进主义分子那里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在一些论文中, 凡德里斯只分析白人激进主义分子的数据。(James Fendrich 1974; Fendrich and Tarleau 1973) 在其他一些论文中, 他则把白人激进主义分子和黑人激进主义分子的数据对比使用 (Fendrich 1977)。与德默拉斯、马韦尔和艾肯一样, 为了对激进主义分子的经历的更为长期的影响进行评价, 凡德里斯也在很长时间以后重新访谈了研究对象。1986年, 凡德里斯重新对85个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这些新数据为凡德里斯1988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 (Fendrich and Lovoy) 和1993年出版的著作——《理想主义的公民》(Ideal Citizens)——奠定了经验性基石, 这些成果概括了凡德里斯对个体激进主义的传记性影响问题近20年的研究与思考。

接下来介入这一研究方向的主要是两位政治科学家——肯特·詹宁斯和理查德·尼米, 1973年他们使用对216名以前的激进主义者进行调查得来的数据来考虑传记性影响的问题。(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Niemi 1981) 除了使用大规模的样本外, 詹宁斯和尼米的研究在其他两个方面

也有独特之处。首先，他们的研究对象在运动参与的范围方面变化较大；其次，这些运动参与的时间跨度（1964-1972）确实比其他任何研究的时间跨度都要大。

下一项研究是1977年对30名激进主义分子进行的调查，这些激进主义分子参加了1967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人民公园的示威游行。这项研究是由艾伯特·纳西和斯蒂芬·阿布拉莫维兹进行的，他们通过调查的方式来评价早期示威游行对研究对象生活的持久影响。两人撰写的两篇论文总结了这项研究的结果，这两篇论文分别于1979年（Alberta Nassi and Stephen Abramowitz 1979）和1981年（Abramowitz and Nassi 1981）发表。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杰克·华伦和理查德·弗莱克斯（Jack Whalen and Richard Flacks）加入这一研究领域，他们主要对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芭芭拉被捕的11名激进主义学生进行跟踪研究，这些学生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附近的美国银行分行的火灾有关。华伦和弗莱克斯没有使用调查研究的方法，而是利用数个小时的面谈掌握了研究对象的多种概况，这些概况构成了他们《超越障碍》一书（1989）及更早的两篇论文的核心。（1980，1984）

最后，在这一研究回顾中，顺便提一下我对那些参加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夏日计划（Mississippi Freedom Summer project）的人进行的跟踪研究。这项研究在1982到1985年间进行，为了对212名志愿者的经历和自由夏日计划过后一年放弃运动参与的118名志愿者的经历进行比较，这项研究主要依赖于调查、深入访谈和对最初的计划申请书的分析。这项跟踪研究的主要成果记录在《自由夏日》一书和一年后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中。

这些不同的研究都存在某些方法上的不足。首要问题就是研究的时间选择问题。有几项研究（Demerath, Marwell, and Aiken 1971; Fendrich 1974, 1977; Fendrich and Tarleau 1973; Jennings and Niemi 1981）是在20世纪60年代“抗议周期”的高峰期组织的，所以它们很

难弄清楚在研究对象生活中体现的政治连续性有多少是研究对象早期活动的产物，有多少是受当时动荡时代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研究的研究对象数量太少。只有詹宁斯和尼米，马韦尔、艾肯和德默拉斯，还有麦克亚当的调查研究始终有 40 多个研究对象。第三，大多数研究选用的研究对象都来自一个狭小的地理区域，有时甚至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因此，这很难将研究成果普及。

这些研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使用非激进主义分子的对照组 (control groups)。而没有这样的对照组，我们就无法确定用来判断激进主义的影响的行为基线或态度基线。上述八项研究中，有四项没有使用对照组。最后，除了三项研究外 (Demerath, Marwell, and Aiken; Marwell, Aiken, and Demerath; and McAdam)，其余的研究都缺少关于激进主义分子“前后对照的”的数据。通常的研究程序都是先搜集与以前的激进主义者同一时代的人的信息，然后根据收集到的数据推断运动参与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研究对象以前的信息，我们就很难确定运动参与可能带来的变化的程度和意义。

如果不是因为我注意到各种出版物所发表的研究结果具有超强的一致性，那么这些方法上的不足会更加令人不安。总体来说，上述研究都认为运动参与对激进主义分子后来的生活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影响。与鲁宾和克利华不同，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的价值观和政见在其人生历程中都表现出高度的连贯性。具体来说，以前的激进主义者

\* 一直支持左派政见； (Demerath, Marwell, and Aiken 1971: 184; Fendrich and Tarleau 1973: 250; Marwell, Aiken, and Demerath 1987; McAdam 1989: 752; Whalen and Flacks 1980: 222)

\* 一直非常积极地参加当时的社会运动或其他政治活动形式； (Fendrich and Lovoy 1988; Jennings and Niemi 1981; McAdam 1989: 752)

\* 集中在教育或其他“帮助人”的职业中； (Fendrich 1974: 116; McAdam 1989: 756)

\* 与同龄人相比，相当多的激进主义者离过婚或一直没有结婚。  
(McAdam 1988, 1989)

难以想象的是，很多研究结果都与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主义分子的普遍形象相矛盾。与大众新闻塑造的形象不同，这些系统研究的对象在过去 10 年到 30 年的生活中表现出超强的连贯性。他们保持不变，不只是为了表达他们 20 世纪 60 年代支持的政治价值观，而且也是为了实践这些价值观。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持有积极的运动政见。此外，他们在很多方面似乎仍然保持着对新左派把个人当做政治的一部分的规则的忠诚。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和婚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他们早先的激进主义经历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强调了本述评的核心：应该将强烈而持续的激进主义补充到有关行为经历——比如，上大学、父子关系、服兵役——的明确的选择列表中去，这些行为经历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传记。

## 运动活动对更为广阔的人生历程的影响

虽然刚才回顾的跟踪研究得出的一致结论证明了个体激进主义的长期影响，但我们对这些结论的普遍意义进行质疑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考虑到这些研究的对象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人们可以合理地争辩说：虽然研究的结论非常引人注目，但这些结论却与一般人群和人生历程事件的整体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有也很少。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具体来说，我想谈一下我和几个同事最近从事的研究，这项研究也许能证明社会运动活动对主要人生历程的影响。

我们最近进行的这项研究的核心目标是证明人们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政治经历和倾向”与他们后来的人生历程选择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讨论 20 世纪 60-70 年代，不仅是因为这个时期存在普遍的政治动荡和文化混乱，而且还因为在这个时期人们逐渐偏离了许多标准的习俗，而正是这些标准的习俗构成了以前的人生历程。问题是这两种倾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关性？这个时期非传统的政治经历和倾向与后来的标准的



人生历程的偏离（比如，未婚同居、已婚夫妇无孩子、第一个孩子出生在空闲时间）之间是否有联系？

## 样 本

为了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对那些在 1943 年到 1964 年期间出生的美国居民进行了一次随机的全民调查。我们通过多级电话遴选过程来确定调查对象。首先，调查者从全国的电话号码中随机抽样，并确定该号码实际上是不是可使用的居民电话。如果是可使用的居民电话，调查者继续确定与他/她通话的那个人（或者居住在那个号码的房子里的其他人）是否在指定的年龄范围内。如果有一位以上的居民符合参与研究的条件，调查者会通过事先设计好的方法，选出一位对象来参加调查。在确定了调查对象并且他/她同意参加调查后，调查者会询问邮寄问卷的地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一共确定了 2 253 个研究对象。我们在与研究对象电话联系后的一周内向他们邮寄问卷。对于那些问卷邮出 3 周仍没有作出回应的对象，我们会重新邮寄卡片并做补充调查。我们将 1 187 个调查对象非常均匀地分配在 22 个同年龄组的人中，并根据从这些调查对象那儿得到的数据完成了调查。

按照一般的社会科学标准，在邮寄的问卷中，收到 53% 的响应率只能算是勉强可以接受的。然而，考虑到我们面临的特殊困难——确定符合年龄条件的调查对象、给回答者设置的读取时间（问卷需要 45-60 分钟才能完成）、以及很多调查问题具有敏感性，我们对总体上达到的响应率相当满意。尽管如此，53% 的响应率还是会让人质疑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作为标尺，我把几个样本特征值同其他已确定的样本或普查中的样本特征值的分布状况进行了比较。我首先考虑的特征是年龄，这是本次调查的关键问题。我将样本中回答者年龄的年度分布与美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进行比较，结果产生了 7.77% 的差异指数。这表明样本中有不到 8% 的数据要转化到其他分类里，以便使两种分布完全一致。虽然这个数据



不是特别小，但也没有大到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程度。样本与其他人口统计学特性也不尽相同。例如，样本中 59.8% 是女性，但人口普查表明美国人口中只有 51.3% 是女性。样本中 92.3% 是白人，而只有 80.3% 的美国人 是白人。在教育方面，样本中有 97.3% 的人是中学毕业，43.2% 的人是大学毕业，而人口普查中的相应数字分别是 80% 和 22%。

考虑到这些百分比差异，我们在归纳研究结果时需要格外小心，但总的来说，这些公布出来的数据并没有让我们过度担心。虽然样本同人口普查之间的差异不是大家所想要的，但是这些差异一般情况下不成问题，除非它们完全背离了研究者最关心的样本的特性。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对研究对象政治倾向和行为的转变特别感兴趣。有趣的是，在后两个维度上，我们提到的这些差异似乎不会破坏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我们来考虑一下政治倾向。在调查期间，样本中有 26.0% 的人声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32.8% 的人声称自己是“中间派”（moderate），41.2% 的人声称自己是“保守派”（conservative）。相比之下，1991 年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估算，27.8% 的人是自由主义者，40.0% 的人是中间派，32.1% 的人是保守派。与我们的问卷调查比起来，1991 年的综合社会调查提供了一套更加详细的对回答者进行划分的类别，尽管两者都是为了进行比较。通过分解种类的方法，被采用的两种样本看起来非常相似或稍微有些不同。然而，考虑到比较的难度，我们应该将比较的结果夸大。一种比较容易确证、而且可能更加可靠的相关指标就是投票行为。当问到人们在 1992 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谁的时候，40.4% 的人称投给了克林顿，38.4% 的人称投给了布什，21.2% 的人称投给其他候选人（包括佩罗，Perot）。根据国家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 Survey），相关数据分别是 43.0%、37.4% 和 19.6%。

总体来说，样本似乎在代表美国人口的人口统计方面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在种族/民族和教育方面。然而，这似乎并没有转变为样本同全体人口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政治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得样本的目的不

是评估人口分布的百分比，而是调查各种人口统计学特性与社会特性或政治特性的关系，即使在基本人口统计学的分布与人口分布不同的地方，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各种人口统计学特性与社会特性或政治特性的关系会受到影响，而这些关系正是本研究的焦点。1992年对投票行为的公共舆论测验的结果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简而言之，对于用我们的样本来检视人生历程因素与最近美国人的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有信心。

## 关键变量

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既包括详细的人生历程记录，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对调查对象在青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政治经历与倾向”的估量。在对这些政治经历与倾向进行估量时，我们只依赖回忆性行为的条款，而不使用表示态度的或自我描述性的条款，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前一种条款内在的偏见要比后者低。关于某个人在她或他的早期生活中属于哪类人的回忆性声称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这些回忆性声称不仅是含糊不清的，而且还受制于频繁的重新评估与变化。相比较而言，一个人否认或忘记他所从事的某类普通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小。鉴于此，我们询问回答者是否曾参加过任何与下述社会运动有关的“政治游行”：

- \* 公民权
- \* 反越战
- \* 女权运动

在两分的新左派变量中，我们把对这些行为条目中任何一项条目的肯定性回答都编码为“是”。

为了评价与调查对象的人生历程选择有关的变量的预测力，我们把确定的人生历程结果认定为对以前的“标准的”模式的“偏离”。这些偏离包括以下各项：

- \* 无子女——研究对象没有孩子（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子女或者领养



的子女)

\* 同居——研究对象在第一次结婚前与异性伴侣同居

\* 不结婚——研究对象一直没有结婚

这些变量都被处理成二分的，它们与我们对新左派行为的估量的关系是通过逻辑回归 (logistic regression) 的方法评定的。

此外，我们运用比例风险模型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s) 来研究新左派行动与其他两个连续变量的关系。这两个变量就是研究对象的结婚年龄和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在这里，我们有兴趣评估那些参加过任何一种新左派行动的研究对象偏离与这些行动相关的特定年龄的人生历程标准的程度。<sup>[1]</sup> 我将在本文下半部分介绍这些不同种类的分析。对于这些因变量，我们希望解决下面这两个问题：一是，在这些与较早参加“新左派政治”有关的人生历程的“偏离”中，变化的程度是什么；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什么因素调节了这些变化的传播？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与运动相关的问题。

## 结 果

为了评估主要自变量同前面提到的各种人生历程偏离的关系，我运用了三种分析方法：简单的二元变量比较分析 (simple bivariate comparison)、逻辑回归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 和风险比率分析 (hazard rate analysis)。我以一系列 t 检验 (t-tests) 开始，根据三个两分的因变量中的每一个来评估那些参加过新左派行动和没参与过新左派行动的研究对象的百分比差异的显著性。这些检验的结果显示在表 1 中。

表 1 参加过新左派行动与没参加过新左派行动的研究对象的百分比差异 (根据因变量)

	是 (Y=192)	否 (N=897)
婚前同居 (同居)	48%	32%
一直没有结婚 (不结婚)	17%	13%
没有孩子 (无子女)	35%	23%
平均结婚年龄	23.41	21.98**
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平均年龄	26.89	24.26***

\*p < .05    \*\*p < .01    \*\*\*p < .001

在所有例子中，参加新左派行动都与人生历程偏离频数的巨大差异有关。我用“t 检验”观察过新左派研究对象与非新左派研究对象在第一次结婚和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平均年龄上是否存在巨大差异。在这两个例子中，平均年龄的差异是以.001 的等级来表明的。那些已经结婚了的新左派研究对象第一次结婚时的平均年龄是 22.9 岁，而非新左派研究对象第一次结婚时的平均年龄是 21.2 岁。至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平均年龄，那些参加了新左派行动的研究对象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平均年龄是 26.6 岁，而没参加过新左派的研究对象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平均年龄是 24.3 岁。

正如这些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受到两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的限制。首先，我关注的仅仅是主要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二元变量的关系。其他相关的自变量对本文研究的新左派活动与各种人生历程选择的关系施加的影响尚待分晓。其次，中肯地说，我没能检验出两种类别变量的时间顺序。也就是说，我所说明的都是主要自变量和主要因

变量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但是，我们的论点对这种联系假定了具体的时间顺序。我们假定，早先的新左派活动促使我们的调查对象偏离了各种人生历程标准。为了弥补后者的不足，我在后文中将对新左派变量重新编码，从而使新左派变量只包括那些先于正被讨论的人生历程结果而发生的激进主义的例子。为了超越二元变量分析的局限，我首先借助逻辑回归方法。逻辑回归方法使我可以检验各种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同步影响。分析结果如表二所示。

表 2 经过选择的自变量对传统人生历程偏离的影响评估

自变量	例 1 (同居)	例 2 (一直没有结婚)	例 3 (无孩子)
早先参加过新左派行动	0.882*** (0.225)	1.336*** (0.290)	0.626** (0.220)
性别 (1=男性)	0.245 (0.154)	0.620** (0.290)	0.445** (0.162)
父母的阶级 (忽略“较低”阶级) 较高阶级 (1=较高阶级)	0.070 (0.228)	-0.132 (0.291)	0.216 (0.230)
中间阶级 (1=中间阶级)	0.092 (0.167)	-0.376 (0.236)	-0.048 (0.181)
出生年份	0.100*** (0.013)	0.118*** (0.020)	0.103*** (0.014)
种族 (1=白人)	-0.228 (0.357)	-0.625 (0.451)	-0.484 (0.366)
获得大学学位	-0.221 (0.163)	0.343 (0.218)	0.696** (0.618)
-2 对数似然函数	1021.94	597.540	944.725
自由度	7	7	7

\*p &lt; .05    \*\*p &lt; .01    \*\*\*p &lt; .001

就像我们从表 2 中看到的那样，其他变量的引入对各种人生历程偏离与关键自变量之间联系的强度的影响很小。在所有例子中，新左派活动对人生历程偏离的可能性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虽然我们引入“出生年份”这个变量来评价组群顺序对人生历程结果的影响，但我们的研究结果仍然有效。可以预料的是，假如我们知道所有因变量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增加的影响范围，那么出生年份就会是表 2 所显示的三个结果中最具有高度预测性的。虽然存在这些可预见的强有力的组群影响网络，但是新左派政治同因变量之间的实际联系并未减少。

在继续分析连续时间变量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表 2 中呈现的研究结果。就新左派活动的影响网络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过去的研究完全一致。假如人们结婚生子的年龄普遍比标准年龄大，那么我们就可以言之有理地说：性别与没有子女、一直不结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关系可能与下面这一事实更为相关：即男性调查对象仍然“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这些人生历程的状况，与妇女相比，男人最终不太可能结婚或者生子。大学学位与没有孩子之间的密切的正向联系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换句话说就是，上大学至少要 4 年，这无疑会推迟一部分研究对象——特别是较为年轻的研究对象——成为父母的时间。事实上，我们惊奇地发现：尽管大学学位与不结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并且达到了近乎值得注意的.10 水平，但大学学位对不结婚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运动参与可以作为调整个体人生历程选择的力量，表 2 显示的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但是为了充分利用回忆性时间序列数据，我又运用了事件历史模型（event history model）来考虑早先参与新左派行动是否不仅仅与偏离标准的人生历程有关，而且还与运动经过人生历程的时间有关。

表 3 表明，单一事件历史模型的结果可以运用到上述每一个人生历程结果中去。<sup>[2]</sup> 表 3 的结果不过是进一步阐述了由逻辑回归方法得出的重要结论。早先参与左派政治的经历不仅对各种人生历程状况的结构有重要影响，而且还对人生历程事件的时间选择有重大影响。实际上，以前的新左派活动对我们的两个“时间选择”变量的预测力与表 3 所示的、



公认的人口统计学的影响同等重要，就算把这些影响放在我们的模型中考虑，也是如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出生年份和性别对结婚和生子的时间选择的重大影响。

表 3 关于经过选择的自变量对两种人生历程结果的时间选择的影响的评估

自变量	模型 1 (结婚年龄)	模型 2 (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
早先参加过新左派行动	-0.662*** (0.113)	-0.666*** (0.113)
性别 (1=男性)	-0.426*** (0.074)	-0.309*** (0.074)
父母的阶级 (忽略“较低”阶级) 较高阶级 (1=较高阶级)	-0.163 (0.111)	-0.293* (0.111)
中间阶级 (1=中间阶级)	-0.032 (0.079)	-0.098 (0.079)
出生年份	-0.033*** (0.006)	-0.037*** (0.006)
种族 (1=白人)	0.312 (0.201)	0.234 (0.194)
获得大学学位	-0.382*** (0.078)	-.552*** (0.078)
-2 对数似然函数	9558.453	9846.614
自由程度	7	7

\*p < .05 \*\*p < .01 \*\*\*p < .001

由于大学教育对因变量一贯具有强有力的影响，所以这些结果给人留下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与许多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e.g., Rindfuss, Bumpass, and St. John 1980; Rindfuss and St. John 1983; Bloom and Trussell 1984; Marini 1984b) 接受高等教育的典型影响就是延迟了婚姻和





开始成为父母身份的时间。但是大学教育同婚姻、父母身份延迟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削弱早先的新左派激进主义的预测力。上大学、参加新左派政治对研究对象第一次结婚和生孩子时的年龄的增大有影响。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本来应该预见到新左派政治与上述两种人生历程结果之间的密切的正向联系是一种虚假的读大学的意外结果，但他们偏偏没有预见到。我们想知道：我们研究的新左派激进主义者在上述两项人生历程事件开始时的延迟是否主要是受到他们想要上大学并完成学业的倾向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对这种解释给予了强有力的驳斥。在调查期间，新左派激进主义似乎对后来人生历程事件的时间选择和内容都产生了强有力的连贯性的影响。

然而，在完全接受表 2 和表 3 显示的研究结果之前，我们来考虑一种其他的可能性：早先的新左派行动与我们对各种人生历程的估量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表 2 和表 3 都把某种潜在的倾向归因于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掩盖了人生历程事件发展中真正的原因动力。在提出这种可能时，我应该一开始时就说出下面这种情况：对个体层面的个性或倾向性因素与运动参与之间联系的精心的经验研究已经进行了 25 年，这种研究已经证实上述研究方法缺乏预见性。（McPhail 1971；Gurney and Tierney 1982；Wicker 1969）因此，近几年来，运动参与理论已不再考虑激进主义的“个体逻辑”因素，转而强调未来的新成员与社会运动的结构关系。（R. Gould 1991，1995；Klandermans and Oegema 1987；Marwell, Oliver, and Prahl 1988；McAdam and Paulsen 1993）然而，即使上述研究方法只获得了很少的经验支持，只在当代社会运动研究中引起了较小的理论共鸣，但它们还是能为人生历程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因此，我有义务用我拥有的数据来谈一下虚假性问题。

我重新对表 2 和表 3 公布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这次我增加了 5 个变量，用这 5 个变量可以粗略地估量我们的研究对象早先不遵从传统的倾向性。这五个变量如下：

\* 自由主义/左派的母亲——研究对象在读中学期间，认同他或她的



母亲的自由主义或左派政治倾向；

\* 自由主义/左派的父亲——同上，但却是对研究对象的父亲而言的；

\* 以前曾吸毒——研究对象在参加左派活动或进入任何人生历程事件前吸过毒；

\* 过早发生性行为——研究对象“过早的”性行为（男性在16岁以前开始性行为，女性在17岁以前）；

\* 人生差异——研究对象被问到，在他或她18岁的时候是否期待四个不同人生方面的每一个——工作、教育、婚姻以及家庭——都会与他的或她的同性双亲“有所不同”。总体来说，这4个“人生差异”条款构成了从0到4刻度值的刻度尺。

新模型整合了这5个“倾向性”变量，表4和表5显示了新模型的结果。表4显示了新的逻辑回归模型的结果，对三种“不正常的”人生历程状况进行了预测；表5则显示了风险模型的系数，对研究对象第一次结婚和成为父母身份的时间进行了预测。

上述几个新的分析结果基本上没有削弱我们对表2和表3所显示的关系的信任。在所有的5个模型中，以前的新左派行动对因变量仍然具有高度预测性。此外，在5个例子中，只有一个例子表明倾向性变量严重削弱了关键自变量同相关人生历程标准之间的关系。这个唯一的例外就是“没有子女”，在这里，对“虚假性”的检验使新左派与人生历程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等级从.001降低到.05。

当我们思考一些倾向性参数独自对人生历程变量的重要影响时，我们所假设的关系的稳定性就显得额外重要。在我看来，这些影响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影响主要是，前面已显示的自由主义/左派的母亲同5个人生历程变量中4个变量之间持续而密切的联系。显然，持自由主义/左派政治观点的母亲在养育研究对象期间对他们后来的人生历程轨迹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与自由主义/左派的母亲的影响相比，其他倾向性参数对人生历程变量都不是始终具有预测性的。有一个自由主义/左派的父亲仅仅对研究对

象的人生历程选择起微弱的、一般的顺从性影响。我们归纳的两个不遵从传统的行为参数——吸过毒和过早的发生性行为通常与人生历程变量无关。同居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该行为参数的双方是密切相关的。同样，这也适用于“人生差异”变量。仅从同居方面来看，与“异常的”人生历程状况相关联的是，一个人强烈地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同性双亲区别开来。

不管新模型证明倾向性参数和人生历程变量的关系多么引人注目，但归根结底，这些关系并没有严重削弱新左派行动对人生历程的结构和时间选择产生的一般性影响。我们的资料中没有证据表明后面的关系是以任何方式伪造的。

表 4 对两组自变量对偏离传统人生历程的影响的评估

自变量	例 1.1 (同居)	例 1.2 (同居)	例 2.1 (不结婚)	例 2.2 (不结婚)	例 3.1 (没孩子)	例 3.2 (没孩子)
曾参加新左派行动	0.880*** (0.204)	0.824*** (0.216)	1.334*** (0.290)	0.354*** (0.297)	0.626*** (0.220)	0.546* (0.227)
性虽(1=男性)	0.262 (0.139)	0.233 (0.148)	0.620*** (0.209)	0.611** (0.217)	0.445** (0.162)	0.478** (0.168)
父母的阶级 (忽略“较低阶级”)	0.230 (0.203)	0.449* (0.220)	-0.132 (0.291)	-0.012 (0.302)	0.219 (0.230)	0.343 (0.239)
较高阶级 (1=较高阶级)	0.164 (0.152)	0.372* (0.165)	-0.376 (0.236)	-0.366 (0.244)	-0.048 (0.181)	-0.004 (0.188)
中等阶级 (1=中等阶级)						
出生年份	0.086*** (0.013)	0.04*** (0.013)	0.118*** (0.020)	0.119*** (0.021)	0.103*** (0.014)	0.109*** (0.015)
种族(1=白人)	-0.163 (0.332)	-0.181 (0.353)	-0.625 (0.451)	-0.659 (0.459)	-0.484 (0.366)	-0.415 (0.375)

获得大学学位	-0.223 (0.147)	-0.129 (0.158)	0.343 (0.218)	0.354 (0.227)	0.696*** (0.168)	0.643*** (0.174)
母亲是自由主义者	-	0.228 (0.253)	-	0.828* (0.327)	-	0.867* (0.260)
父亲是自由主义者	-	0.352 (0.289)	-	-0.116 (0.428)	-	-0.688* (0.354)
吸毒	-	1.058*** (0.153)	-	0.020 (0.224)	-	-0.014 (0.174)
过早发生性行为	-	0.304* (0.198)	-	0.323 (0.278)	-	-3.10 (0.216)
18 岁的时候渴望 与父亲不一样的 生活	-	0.184*** (0.042)	-	-0.005 (0.062)	-	0.074 (0.049)
-2 对数似然函数	1249.492	1162.437	597.540	620.601	944.725	960.588
自由度	7	12	7	12	7	12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5 对两组自变量对两种人生历程结果的时间选择的影响的评估

自变量	例 1.1 (结婚年龄)	例 1.2 (结婚年龄)	例 2.1 (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	例 2.2 (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
曾参加新左派行动	-0.662*** (0.133)	-0.648*** (0.136)	-0.666*** (0.113)	-0.572*** (0.129)
性别(1=男性)	-0.426*** (0.074)	-0.454*** (0.076)	-0.309*** (0.074)	-0.374** (0.077)
父母的阶级(忽略“较低阶级”)	-0.163 (0.111)	-0.190 (0.115)	-0.293 (0.113)	-0.344** (0.117)

较高阶级 (1=较高阶级) 中等阶级 (1=中等阶级) 级	-0.032 (0.079)	0.036 (0.082)	-0.098 (0.078)	-0.101 (0.081)
出生年份	-0.033*** (0.006)	-0.037*** (0.006)	-0.037*** (0.006)	-0.042*** (0.006)
种族(1=白人)	0.312 (0.201)	0.293 (0.202)	0.234 (0.194)	0.252 (0.195)
获得大学学位	-0.382*** (0.078)	-0.346*** (0.080)	-0.552*** (0.078)	-0.493*** (0.080)
母亲是自由主义者	-	-0.396** (0.144)	-	-0.482** (0.143)
父亲是自由主义者	-	0.121 (0.160)	-	0.311* (0.153)
吸毒	-	0.062 (0.077)	-	-0.059 (0.077)
过早发生性行为	-	-0.204* (0.098)	-	0.286** (0.098)
18 岁的时候渴望与父母亲不一样的生活	-	-0.010 (0.021)	-	-0.047* (0.021)
-2 对数似然函数	9558.453	9547.506	9846.614	9820.727
自由度	7	12	7	12

\*p< .05    \*\*p< .01    \*\*\*p< .001

但是新左派激进主义对美国人人生历程结构的聚合式影响如何呢？我已经证明了个体激进主义与各种人生历程结果之间的一般性联系，下面我要转向研究计划的第二个目标：评价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运动在生育高峰代所特有的人口统计学模式开始出现时的作用。下面我将对这个论题进行全面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统计学家开始将一种特定的人生历程状况的顺序界定为向成人期的“标准化”过渡。尽管还没有普遍遵从的模式，但那种为大家普遍遵循的顺序无疑就是标准。这种顺序以完成正规教育开始，按照如下过程继续下去：进入领薪水的职业、结婚、开始成为父母。（Elder 1978；Hogan 1981；Marini 1984a, 1984b；Modell 1989）

然而，在过去 10 到 15 年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经历这一顺序的年轻人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Rindfuss, Swicegood, and Rosenfeld 1987）偏离这一“标准化的”顺序是生育高峰代所独有的特征。

我们如何解释生育高峰代明显偏离标准模式的原因呢？由于人生历程研究者对人生历程模式整体层面的变化的关注相对不足，所以很少有学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是个明显的例外。在他极具争论性的《出身和财富》一书中（Birth and Fortune 1980），伊斯特林认为，偏离标准模式的主要原因是生育高峰代的规模和顺序。得益于快速发展的燃料经济，再加上大萧条和二战军团的规模相对较小，所以早期生育高峰出生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相应地，这就使他们能够遵循向成人期过渡的标准顺序。但较为年轻的生育高峰出生者就没这么幸运了。面对日益萧条的经济和对任何一个空闲职位的激烈竞争，年轻的生育高峰出生者寻找令人满意的全职工作的道路被堵上了，从而延迟了他们进入其他成人角色。

伊斯特林的观点很有影响，无疑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为生育高峰出生者所特有的人口统计学概况。然而，我们确信：这不是全部、甚至可能不是他论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令我们费解的是伊斯特林的论述中固有的人口统计学的决定论，而且他还不承认更广泛的政治动力、文化动力和社会动力作为原因的重要性。毕竟，生育高峰代是由成长或成熟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一代人构成的，而在这期间美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在大多数动乱的中心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而正是这些社会运动构成了新左派。那些由生育高峰代所促生的社会运动和“反主流文化”包括对下面这些内容的直接批判：美国社会中的婚姻、核心

家庭（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传统职业观念、以及以前界定为“标准的”成人状况的生活方式。与伊斯特林相比，我们的观点是：一部分生育高峰出生者可能不是迫于人口统计学压力或市场压力才推迟进入惯常的成人角色的，甚至可以说，他们选择这样做是基于当时的反主流文化倾向以及他们对新左派政见的偏好。这一观点提出了关于社会运动过程与人生历程事件在内容、结构或时间选择等整体层面的变化之间关系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但是，关于社会运动的意义在于它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媒介的毋庸置疑的看法，却很少有社会运动学者进行系统研究。这当然也同样适用于人口统计学变化的领域。社会运动学者从未试图系统地研究社会运动过程与人生历程的整体层面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20世纪60-70年代的政治运动与生育高峰代的人生历程模式的转变有关联。那么这种关联的本质是什么呢？

伊斯特林认为偏离向成人期的“标准化”过渡有其人口统计学根源和市场根源，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完全错误。虽然由人口统计学带来的市场压力无疑与生育高峰代所表现出的独特的人生历程模式有关，但是生育高峰代仍然具有大量的个人态度上和经济上的异质性。（Cooney and Hogan 1991； Elder 1978）实际上，我们怀疑生育高峰代的规模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受到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经历的调解。我们的观点是：与以前一直持续着的向成人期的惯常过渡的社会化过程相比，新左派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发展使许多生育高峰期出生者（和一部分生育高峰期以前的出生者）较容易受到截然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的影响。相应地，这些新的社会化过程使他们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的形象。因此，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动乱有选择性地改变了社会化惯例，从而导致了人生历程的形象和结果更具异质性。莫德尔（Modell 1989）把这个进程解释为：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很多人开始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历程进程。或者可能是——正如我们倾向于怀疑的那样——这部分生育高峰代没有用人口统计学方式来决定其人生，而是遵循着非正统的人生历程模式。

这些非正统模式源自哪里呢？我们无法确切地得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研究和过去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解答这个问题（McAdam 1988, 1989; McAdam, Moore, and Shockey 1992）。我们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过程：首先是这些非正统模式的确立，然后是生育高峰代中的重要少数人运用这些模式，最后是整个生育高峰代都运用这些模式。第一阶段涉及到故意拒绝人生历程“标准”而支持更“无拘束”的非正统选择。这些非正统模式的创立者是当时政治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分子先驱。新左派、垮掉的一代、黑人民族主义者、东方哲学、人类潜能运动等激进主义分子利用对美国主流文化多元化视角的批判，并使他们所关心的事物更加人道、公平，或者对传统的生活进程模式进行更加个性化的选择，来谋求个性化的政治。许多自由夏日计划的志愿者明确表达了对这一进程的看法，他们承认诸如未婚同居、不生孩子（或社区育儿 communal child rearing）、以及短暂的工作经历等“偏离”人生历程的做法，其实是他们有意的选择，因为传统模式让他们感觉个性受到限制或使他们不信任政治（McAdam 1988, 1989, 1992）。

我们假设的过程的第二阶段就是非正统选择模式嵌入各种各样的地理区域和亚文化区域，而这些区域是美国“60年代经历”的主要场所。作为新左派激进主义和反主流文化的中心，大学校园——特别是北部和西部的精英公立学院和私立学院——成为新的人生历程选择的大本营。实际上，美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自觉地反主流文化的地区，例如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理区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通过已毕业的师兄师姐们的社会化力量，中上层的郊区也逐渐地成为接受新的非正统模式的区域——刚开始是在城郊边缘，随后到处都是这样的区域。

在我们假设的过程的第三阶段，通过广泛的传播和适应过程，非正统模式被美国青年中越来越多的异类所接受。然而，在传播和适应的过程中，非正统模式的原来的政治内容和反主流文化内容被大量摒弃，变成仅仅是那些受非正统模式影响的人所经历的一种新的人生历程标准。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者注意到的人生历程模式的日益异质性，更多的



原因在于受到这些模式影响的各种青年亚群体的选择的易变性，而不是在于那种能“控制”青年人的人生的百分比的可观的增加。那些很早就接触非正统模式而又受到这些模式强烈影响的人倾向于遵从这些模式，而那些成长于传统模式仍然完好无损的环境下的人，则可能追随传统模式。我们假设，通过这一过程，当时普遍的社会运动的动力可以重塑人生历程的标准化轮廓。然而，我们的研究仍然要遵守系统的经验式检验。

在此，我想从对非正统模式起源的分析，转向探讨那些促使非正统模式在普通人群中传播的因素。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辨别那些可能增强或减弱非正统模式对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影响的结构性因素。通过对3个主要小组（1943-1949，1950-1956，1957-1964）进行简单的二元变量比较，我们发现有三个结构性因素可能会在这一点上变得很重要。在这三个因素中有两个似乎使研究对象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去采用新的人生历程模式。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分别是1969年以后进入“激进主义分子”大学、15岁时居住在“自由主义的州”中。相反，第三个“因素”即18岁时每周都去教堂似乎不利于人们接受人生历程的非正统模式。

在检验这三个变量的促进作用时，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评价它们对3个小组中后两个小组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我们假设的传播过程中，后两个小组的人分别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我们期望新的人生历程模式能够超越研究对象早期在激进主义分子社区和反主流文化社区所受的影响而成长起来。我们期望特殊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我们前面辨别的那些因素——能够促进非正统人生历程模式的传播。相反，到第三阶段，我们发现非正统人生历程模式在社会中传播得非常广泛，以致于减弱了在第二阶段中对非正统模式的传播起促进作用的变量的影响。

为了检测这些概括性的观点，我们再次使用事件历史分析方法（the technique of event history analysis）。针对全部样本和三大组中的每个小组，单一比例风险模型对各种起促进作用的变量对研究对象的结婚年龄和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的影响进行了检测，检验结果见表6和表7。

表 6 对经过选择的自变量对全部调查样本和同期出生组结婚年龄的影响的评估 (正反检验)

自变量	全部样本	1943-49	同期出生组 1950-56	1957-64
曾参加新左派行动	-0.640*** (0.138)	-0.914*** (0.269)	-0.392* (0.196)	-1.628** (0.513)
性别(1=男性)	-0.452*** (0.078)	-0.269 (0.168)	-0.653*** (0.134)	-0.526*** (0.134)
父母的阶级(忽略“较低阶级”)	-0.201 (0.126)	-0.193 (0.252)	-0.296 (0.216)	-0.104 (0.198)
较高阶级(1=较高阶级) 中等阶级(1=中等阶级)	-0.036 (0.084)	-0.024 (0.164)	-0.207 (0.145)	0.096 (0.147)
出生年份	-0.040*** (0.007)	0.041 (0.042)	-0.082* (0.034)	-0.083 (0.030)
种族(1=白人)	-0.283 (0.208)	-0.033 (0.377)	-0.502 (0.440)	-0.264 (0.320)
获得大学学位	-0.375*** (0.096)	-0.389* (0.182)	-0.502 (0.173)	0.226 (0.167)
母亲是自由主义者	0.400** (0.147)	-0.558+ (0.291)	-0.386 (0.252)	-0.081 (0.258)
父亲是自由主义者	0.135 (0.162)	0.476 (0.330)	-0.266 (0.288)	0.251 (0.267)
吸毒	-0.069 (0.080)	0.143 (0.163)	-0.167 (0.134)	-0.104 (0.144)
过早发生性行为	0.171+ (0.102)	0.702* (0.266)	0.040 (0.175)	0.125 (0.155)
18 岁的时候渴望与父母不一样的生活	-0.019 (0.022)	-0.026 (0.041)	-0.058 (0.041)	0.003 (0.037)
18 岁时不定期去教堂	0.242* (0.097)	-0.0142 (0.254)	-0.319 (0.153)	0.261+ (0.151)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进入了激进主义者大学	0.006 (0.098)	0.241 (0.238)	-0.258* (0.155)	0.010 (0.159)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进入了非激进主义者大学	-0.06 (0.101)	0.163 (0.230)	0.122 (0.166)	-0.229+ (0.156)
15 岁时在自由主义的州居住	0.156 (0.106)	0.228 (0.206)	-0.276+ (0.158)	-0.053 (0.186)
15 岁时在温和的州居住	-0.004 (0.082)	0.088 (0.162)	0.206 (0.144)	-0.298* (0.144)
-2 对数似然函数	9024.019	2029.492	2654.498	2688.148
自由度	18	18	18	18

表 7 对经过选择的自变量对全部样本和同期出生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的影响的评估 (正反检验)

自变量	全部样本	1943-49	同期出生组 1950-56	1957-64
曾参加新左派行动	-0.521*** (0.132)	-0.544* (0.246)	-0.446* (0.221)	-0.662+ (0.354)
性别(1=男性)	-0.348*** (0.080)	-0.197 (0.154)	-0.342* (0.136)	-0.613*** (0.142)
父母的阶级(忽略“较低阶级”)	-0.328** (0.122)	-0.449+ (0.239)	-0.355+ (0.209)	-0.280 (0.214)
较高阶级(1=较高阶级) 中等阶级(1=中等阶级)	-0.122 (0.083)	-0.011 (0.149)	-0.374** (0.143)	-0.075 (0.152)
出生年份	-0.039*** (0.007)	0.004 (0.037)	-0.019 (0.033)	-0.072* (0.031)
种族(1=白人)	0.301 (0.201)	0.040 (0.374)	0.704+ (0.367)	0.102 (0.337)

获得大学学位	-.472*** (0.097)	-.580*** (0.172)	-.530** (0.176)	-.368* (0.180)
母亲是自由主义者	-.501*** (0.146)	-.565* (0.256)	-.535* (0.259)	0.302 (0.277)
父亲是自由主义者	0.292+ (0.157)	0.288 (0.280)	0.402 (0.286)	0.333 (0.279)
吸毒	-0.007 (0.080)	0.031 (0.151)	0.101 (0.134)	-0.145 (0.151)
过早发生性行为	0.284** (0.101)	0.602* (0.224)	0.166 (0.176)	0.166 (0.159)
18 岁的时候渴望与父母不一样的生活	-0.046* (0.022)	-0.077+ (0.040)	-0.072+ (0.039)	-0.003 (0.038)
18 岁时每周去一次教堂	0.218** (0.087)	0.157 (0.142)	0.352* (0.155)	0.169 (0.172)
18 岁定期去教堂	0.203 (0.098)	0.112 (0.222)	0.314+ (0.168)	0.337 (0.198)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进入了激进主义的大学	-0.078 (0.105)	0.128 (0.220)	-0.157 (0.171)	-0.342+ (0.191)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进入了非激进主义的大学	-0.049 (0.106)	0.080 (0.226)	0.072 (0.171)	-0.255 (0.186)
15 岁时在自由主义的州居住	0.098 (0.104)	-0.010 (0.185)	0.256 (0.183)	0.017 (0.192)
15 岁时在温和的州居住	-0.098 (0.084)	-0.058 (0.152)	0.131 (0.147)	-0.373* (0.150)
-2 对数似然函数	9238.777	2365.158	2729.627	2494.683
自由度	18	18	18	18

+p < .10 \*p < .05 \*\*p < .01 \*\*\*p < .001

这些“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对三个小组的影响难道会像我们假设的

那样变化吗？除了少数例外以外，答案是肯定的。诚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于年龄最大的那一组而言，新变量的介入基本没有改变那些已被我们证明的关系的一般模式和强度。对于那些从 1943 年到 1949 年之间出生的人来说，任何“起促进作用的”变量对结婚年龄和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都不具有预测意义。

对于那些从 1950 年到 1956 年之间出生的人来说，起促进作用的因素的影响的模式又大不相同。虽然新左派行动对我们使用的因变量仍然具有预测性，但现在它要同很多其他变量一起发挥解释作用，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对于从 1950 年到 1956 年之间出生的人而言，进入“激进主义的大学”大大延迟了结婚的时间，而去教堂对这一组人分娩的影响则相反。

但是，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对最后一组人的影响最引人注目，也最能证实我们的概括性观点。在这里，新左派行动与因变量只有很小的联系，而所有起促进作用的变量开始起作用。对于结婚年龄来说尤其如此，三个起促进作用的结构因素均与结婚年龄有很大的关联。每周去教堂使初次结婚的年龄降低，而居住在一个“温和的”州、进入“非激进主义分子”大学则会延迟结婚。后两个关系也适用于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新的人生历程模式的传播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那些起初与它们有关的社会运动。到第三组人进入墨守成规的年龄的时候，非正统的人生历程模式已经通过社会大众传播完毕，现在正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包括我们在这里正在检验的各种结构性因素。

## 讨论与结论

通过前文显示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把我们的研究结果合起来似乎可以得出两个重要推论。第一个推论是一系列具体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为我们对与生育高峰期群体有关的人生历程进行的引人注目的重组。从未婚同居的急剧增加到避免分娩，过去 30 年左右的时间见

证了各种人生历程模式在内容和时间选择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20 年的特征。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系统的研究尝试着去弄清人生历程结构转变的根源。只有伊斯特林的《出身与财富》一书算是例外。虽然我们的研究没有对伊斯特林的理论进行系统地“检验”，但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然与他的观点有关，但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倾向于支持伊斯特林理论的核心结论。

就最基本的层面而言，伊斯特林的观点依赖一种人口统计学决定论的形式，认为通过两种干预机制，生育高峰群体的规模和顺序构成了人生历程的主要轮廓。第一个干预机制是就业市场。得益于快速发展的战后经济，早期“高峰期”群体可以享受到有利的职业前景，这种有利的职业前景使他们能迅速向成年人角色转变。相反，后来的生育高峰出生者面临着更加萧条的经济、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从而延迟了他们进入全职工作、婚姻、以及父母身份的时间。伊斯特林强调的第二个干预机制是生育高峰期出生者对经济财富的社会期望，该机制能调解生育高峰期出生群体的顺序与人生历程选择之间的关系。战后的普遍富足提高了生育高峰期出生者的期望值，特别是后来的生育高峰期出生者，他们见证了其父辈及大一点的同辈人的成功。有利的就业市场使早期的高峰期出生者实现了他们的期望，而后来的高峰期出生者却面临着日益萧条的经济，这与他们的高度期望值“不匹配”。这种在期望与工作前景之间的失衡对后来的每一个出生者来说都变得更加严峻，从而促使他们中更多的人偏离了标准化的人生历程。

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结论同伊斯特林的观点不一致，更不用说用他的观点提出的理论问题了。例如，我们使用的几个系数与伊斯特林所强调的社会期望的调解作用之间的分歧就很难调和。按照伊斯特林的说法，这些期望“主要是他们（指高峰期出生者）所处的成长环境的无意识的产物。换句话说，经济期望是一个人在父母家中无意习得的或者说是‘内在化的’。这种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人的父母的经济状况、或者收入构成的”。（1980：40-41）考虑到前面总结的观点，上述引言



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预料到，在高峰期出生者中，那些出身较好的人面对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日益萧条的经济时，有着最高的、从而也是最“不匹配”的期望。因而，在研究中应该将社会地位与各种人生历程的偏离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只有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与出身地位有关，其次只在个别例子中和不重要的层面才与出身地位有关。

至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伊斯特林提出的观点没有像他声称的那样能够解释当时改变人生历程的动力。那么，在人生历程的变化中还涉及到哪些影响呢？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当时较为广泛的动乱一定在伊斯特林注意到的人生历程的整体层面上的变化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得出了我们研究结果的第二个重要推论。虽然社会运动学者一直把社会运动的效能假定为社会变革的媒介，但却很少有人试图系统地研究社会运动的长期影响。即使有学者研究社会运动的长期影响，通常也只局限于评估某一社会运动是否达到其既定目标而已。在这里，我们试图突破对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运动的直接目的的考查，而研究这些社会运动的更广泛的影响，既研究它们对那些参与斗争的人的生活的影响，也研究它们对同时代的美国人的人生历程结构的影响。这两种影响都清晰地打上了斗争的烙印。就个体层面而言，之前参加新左派活动的经历与我们在这里检验的五个人生历程结果有着很大的关联。但是，正如个别小组模型中表明的那样，两者关联的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降低，这就在整体层面上支持了人口统计学传播的一般模型，而这种一般模型正是本文所强调的。对我们研究中年龄最大的小组来说，参加新左派是新的人生历程模式最强有力的预测器。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关联的强度都在减弱。随着新模式在每一组人中的传播，社会运动行动的预测力被日益显著的结构因素和态度因素所取代。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运动的影响已超越了激进主义者生活的范围，这些激进主义分子似乎很不相称地成为各种人生历程非正统模式的“先驱”。不管“标准化”人生历程在战后初期的影响力如何，但根据我们的

数据，其影响似乎在每一个后来的小组中不断减弱。考虑到最年轻的小组中的相关青年，这一结论是我们根据结婚、成为父母身份等主要的人生历程事件得出的。但在这里，即使不受标准化人生历程的影响，研究数据至少也能说明结婚、成为父母身份等结果的时间选择上的重大变化

表 8 回答者坚决不结婚和/或者不生孩子的百分比，按出生小组划分出生小组

出生小组	合计 N	坚决不结婚		坚决不生孩子	
		%	(N)	%	(N)
1957-1964	412	23.1	(95)	37.4	(154)
1950-1956	361	10.2	(37)	19.5	(80)
1943-1949	316	6.3	(20)	12.7	(41)

用以前描述的相同的三组人，表 8 显示了每组中已经结婚或生孩子的对象的百分比的比较数据。毫无意外的是，在坚决不结婚和坚决不生孩子这两种情况中，3 个小组的百分比都稳定地上升了。然而，最年轻的那组人的数据最引人注目。这个小组中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结了婚，至少有 37% 的人已经有了孩子。要知道这组对象在调查时的年龄是 29 到 34 岁之间。为了了解这组成员所体现的变化的重要性，可以考虑一下：1960 年的平均结婚年龄，女性是 20.1 岁，男性是 23.1 岁，而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平均年龄，女性是 21.5 岁，男性是 24.8 岁。因此，即使最年轻的小组中的多数人继续结婚生子，他们也将能证明人生历程的时间结构在过去 30 年左右的时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考虑到他们相对较大的年龄，据我们推测，最年轻的小组中决不结婚或生孩子的回答者的百分比会大大超过其他两组的比较数字。这些数据要反映的是每一小组在更广泛的人生历程选择范围上的稳定性。

以前的人生历程参数非常有限，但现在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得以“放宽”或加宽，当然，其他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点（Modell



1989)。但是其他研究者没能提供任何有关那种能够促进一系列更为广泛的人生历程选择的形成过程的系统性的实证解读，特别是也没能提供任何有关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系统性的实证解读。通过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对这两大子域的交集进行经验研究。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将能增强有关人生历程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力量，这一学科一直都认可更为一般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在人口统计学上的重要性。（参见 Elder 1974；Buchman 1989；Elder and Caspi 1990）同时，我们鼓励社会运动学者不但要更加关注社会运动对人生历程的结构和时间选择的影响，而且还要更加关注人生历程动力在抗议周期开始时和个体激进主义消长中的作用。只有将两大领域的理论观点与经验方法结合起来，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才有希望能够完全理解那些引起他们注意的现象。

## 注 释

[1] 1960 年，女性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是 20.1 岁，男性是 23.1 岁。女性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平均年龄是 21.5 岁。因此，我们对（结婚或父母身份的）“晚”（lateness）的运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无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标准的人生历程版本具有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这种人生历程版本为我们研究中较大年龄的小组提供了社会化背景。我们的运作化在性别差异和历史趋势方面非常敏感。目前（美国 1990 年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女性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是 23.7 岁，男性是 25.5 岁。即使这些年龄都增加了，“晚”仍然是我们使用的年龄段的主要问题。然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解释这些趋势而不是它们的具体表现。

[2] 通过直接观察诸如第一次就职、第一次结婚、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等各种人生历程的里程碑经过的时间，我们运用模型方法能将我们假设中的时间问题合并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考虑了两个以时间为基础的人生历程结果：研究对象在他的/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研究对象第一次结婚时的年龄。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试图预测第二个里程碑



或事件（第一个孩子、第一次婚姻）将在一个既定时间及时发生的全部“风险”，（自从第一个里程碑发生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测量这些风险），我们还要预测新左派行动对这种风险的影响程度。

更正式的说，因变量被界定为“风险率”或者概率。也就是说，假如第二个事件还没有观察到，那么，自从第一个里程碑事件后，随着精确的时间  $t$  的流逝，第二个事件将会发生的“风险率”或者概率。

$$h(t) = \lim_{\Delta t \rightarrow 0} \frac{P(t + \Delta t \geq T \geq t | \geq t)}{\Delta t}$$

在这个公式中， $T$  是随机变量，表明自从第一个事件后时间过去的长度，也就是研究对象处于被界定为特殊因变量的第二个人生历程里程碑的“风险中”的时期。（Allison 1984; Tuma and Hannan 1984; Yamaguchi 1991）自变量与风险率之间的关系被界定为指数关系（或对数-线性关系）：

$h(t) = h_0(t) \exp(\sum_k b_k X_k)$  基本风险函数（The baseline hazard function） $h_0(t)$  完全可以解释可归于时间的风险变化的原因。比例风险模型的优点之一就是在不用具体说明基本风险函数的类型的情况下，就可能估计出自变量  $K$  的影响。（Yamaguchi 1991）然而，模型中内在的比例假设要求，条件  $X_k$  随着时间的过去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不发生变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检验并放宽这一假设。SAS 的程序 PHREG (SAS Institute 1996) 可以用来评估这里公布的风险模型。

## 7.敌对环境中的女权主义政治：障碍与机遇

乔伊斯·盖尔布和维维恩·哈特

20世纪80-9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女权运动（women's movement）都有在反女权主义政府时期提出女权主义议程的经历。回顾20世纪晚期的女权运动，我们认为，除了一些明显的障碍外，还有一些新的激励与机遇对实现女权运动的目标至关重要。两国女权运动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他们都声称自己改变了政治议程并实现了政策目标——即在某些方面激发了女性的政治热情，而不仅仅是维护了女性的政治热情。两国女权运动都与二十年前不同。他们（特别在是英国）发展了新的组织，同时它们还面临着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两国女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在美国，文化变迁非常明显，而政策上的成就可归因于大西洋两岸女权主义的影响。

女权运动内部的变化，不管是出现了新的动员形式、新的联盟还是与政府建立了新的关系，在本质上都与政治目标的实现不是同类“结果”。然而，如果不把女权运动与它内部的结构变化联系起来，不把女权运动与它同其他组织和政府的外部关系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运动近期实现的目标。本文描述了一种有关持续性的动态的相互影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女权运动的模式和议程既是对内部和外部变化的反应，又促进了内部和外部的变化。由于女权运动结构成为决定结果的因素，所以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然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政策结果的例子说明了动员、议程表述、政策制定的效力以及价值观和观念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



本部分探讨的是英美女权运动的变迁。接下来的部分简要概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盛行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组织的情况，并概述对女权运动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的政治环境。然后回顾英美女权运动的变迁，主要是为我们在三个重要领域中——堕胎、经济平等、家庭暴力——对政策结果的核心讨论作准备。然而，如果一场运动想带来持久稳定的变化，那么它就不能仅仅指望在立法议程的个别条款上取得成功。因此，为了评估女权运动目标可能在日常规范与实践中较为广泛渗透的程度，我们还要简要审视价值观与观念变化的证据。

通过对美国和英国证据的对比，使我们谨慎得出的乐观的结论得以巩固。扎尔德（Zald）把美国女权运动视为拥有最强持久力的社会运动团体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团体成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Zald 1988：10-41）伯克（Burk）和哈特曼（Hartmann）更加批判性地写道：像许多其他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一样，美国女权运动也发现自己难于适应变化着的（经济）时代。（Burk and Hartmann 1996：19）然而，巴希坚（Bashevkin）推测：与合乎逻辑的预料相反，英国女权运动不但不可能“在保守党长时期统治的紧张形势下消失”，相反，它可能设法“支撑下去，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我改造”。（Bashevkin 1996：526）两国女权运动都经历了对妇女有严重影响的社会、经济变化和敌对的政治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美国进入民主党连任执政时期，英国工党政府执政的时代也到来了，这些使我们对两国女权运动幸存下来的方式和自我改造的方式进行了及时的评估。当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两国女权运动均得到很大发展，与女权运动刚爆发时有所不同，这些运动都经历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虽然如此，可能还会有人提出质疑，例如，如何对美国意识形态上尖锐的反女权运动的影响与英国同样严厉的组织上反女权运动和官方反女权运动的影响进行比较？女权运动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何种方式保住其支持者并维持了其倡导变革的能力，以及如何维持了其发挥影响的范围并成功制定出女权主义公共政策的呢？

##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女权运动及其背景

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普遍状况就是建立了久负盛名的专业化的全国性组织网络，这一网络把主流的改良主义者运动与自由平等的目标协调起来。虽然不是十分明显，但美国女权运动还有一系列强有力的地方性、有组织的草根运动，这些草根运动在与官僚的政策制定者和民选的政策制定者谈判时已经把支持与公共服务提供（service delivery）结合起来。通过联合、成员组织以及其他在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均获得发展的合作关系，美国妇女与政府已经在政策支持和服务提供、诉讼以及代表竞选运动方面产生了相互影响。在这种设计最有效的时候，它能赋予人们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时机去追求那些多变的、各种各样的目标与优先权。（Gelb 1995: 130）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英国女权运动没有发展出具有同等意义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通过机会均等委员会（EOC）——即具有半自治地位的政府机构，妇女获得了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力，但她们起初只是作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组织——政党、联盟、专业协会——或者是特定性别领域的少数成员。女权运动的特点在于中央集权的议会制国家“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的边缘化或者说在意识形态上反对高层政治。这段历史成为英国人理解运动政治的基础，运动政治明显不同于甚至游离于妇女主流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活动。（Byrne 1996: 57-59）然而，在地方层面上，在“分权的、地方化和反精英主义的——有时描述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的团体中，英国女性与美国女性一样活跃。（Gelb 1987: 267）这些团体追求的是有关自由、广泛的社会变革或具体的政治变革的议程，它们只是偶尔在地方问题和国家问题上结成临时性的联盟。“地方政府”更愿意与公共机构进行合作，这些公共机构遵循女权运动的不分等级、共同的原则，而这种对地方政府的宽容使全国性的反国家主义得到缓和。（Cockburn 1977）美国政治环境——即不利于对美国运动政

治进行评价的背景——具有以下特征：没有强大的左派、以劳工为基础的政党（与英国的“以前的工党”不同）、政府除了纠正那些被视为不值得救济的贫民的行为外，不愿意干预“私人家庭”（一种与英国保守党统治日益类似的趋势）、一种改良的多元主义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与政党相比，利益集团是更强有力的政策制定者（与英国的政党统治不同）、以及由于权力分立和联邦制所导致的政策采纳和法律执行方面的多重障碍。与瑞典妇女团体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妇女团体也不尽相同，美国妇女团体倾向于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之外建立以性别为基础的团体。对英国女权运动而言，为了影响公共政策，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如何打破议会霸权的问题。

自从 1980 年以来，两国的女权运动均面临着右翼和反女权主义国家政权的压制。在从 1981 年开始的 12 年里，共和党人一直担任美国总统。在里根（Reagan）任职期间，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六年，随后在 1994 年后又控制了国会两院。共和党在诸如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和福利事业等领域的政策影响，使美国女权运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美国女权运动还必须应对政治上对其议程的强烈反响，这种反响不仅体现在从里根到金里奇（Gingrich）的共和党上，而且还体现在一些右翼团体上，比如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鹰论坛（the Eagle Forum）、基督教传教组织美国关注女性组织（Concerned Women of America）以及生命权运动（right-to-life movement）等。正如巴希坚指出的那样，在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恶意反女权主义运动的组织。（1994：670）难道这种恶意的猛烈程度正好是对美国协调较好的、政治上得到整合的女权运动取得相对成功的一种反应吗？

英国保守党——从 1979 年到 1997 年 5 月执政，通常避开激烈的讨论，而支持较为模糊的“家庭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体现了有关妇女角色的传统观点。但是保守党政府以自由市场观念的名义推行结构与策略上的双重变革，这种变革能直接影响到女权运动，这与美国在 1996 年福利改革中将联邦权力移放给各州的做法极其相似。由于英国没有权力分立，

所以决策反而变得更加集权。中央政府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与教育部的自由裁量权 (discretionary powers) 和财政独立, 限制协会权利, 并使机会均等委员会服从削减预算和冷漠无情的任命。公共部门职能私有化减少了公众的责任, 对妇女就业造成不利影响, 并对妇女的支持服务业和经费构成威胁。总之, 通过减弱其势力, 妇女的社会劣势也恶化了。由于一党执政, 保守党内部分歧不仅仅关系到党派斗争, 比起很多人提出的右翼少数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保守党有更大的影响力。

## 女权运动的变迁: 美国

“美国女权运动的历史是一个转化、扩张和多样化的历史”。(Wolfe and Tucker 1995: 436)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为止, 女权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就也许就是在所有政治层面上建立了各种新型的持久的女权主义组织。费里和马丁认为, 不能再将女权运动简单地归类于集体主义者或官僚政治形式, 或者, 就此而言, 归于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分子的类别。(Ferree and Martin 1995: 5) 女权运动的特点体现在那些表面上具有不同目标和策略的团体的共存上, 有些运动仍然保持着更加激进的、非同寻常的目标的承诺, 而另一些运动的行为则更像那些具有女权主义议程的改革主义者的利益集团的行为。

至于策略的连续统一体 (continuum), 有些运动团体利用政治游说、诉讼、竞选运动来改革体制; 这些团体可能以大量的成员为基础, 并通过全体支援和委员会来运作。其他团体包括许多地方性团体和一些国家性团体——如反对家庭暴力全国联盟 (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这些团体为下面三个因素之间的矛盾而斗争: 财政生存需求、官僚政治规则和过程的相互作用与张力、以及女权主义理想的承诺。这种斗争把一些女权运动引上“改良集体”和不断地重新评估优先权和结构的方向上。美国女权运动团体非常清楚必须面对冲突并不断地重新磋商组织结构与目标, 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它们的资历相对较老的原因 (Dis-



ney and Gelb forthcoming)。

美国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为了提出一项新的公共政策议程并为立法支持进行动员，女权主义者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了一次示威运动。以华盛顿为基础的女权主义团体从 1982 年的 75 个增加到 1995 年的 140 个左右，而新成立的一批联盟又增强了它们之间的合作，比如终止家庭暴力全国网络 (the National Network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妇女与岗位培训联盟 (the Coalition on Women and Job Training) 和全国同工同酬联盟 (the National Coalition on Pay Equity)。由于美国司法体系的重要性，女权主义者法律辩护团体的网络——效仿黑人公民权利团体的例子——在诉讼有先例可循的案件中至关重要。为女权主义者候选人筹集资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位富有的妇女创办的艾米丽名单 (EMILY's List)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1996 年它宣称有 36 000 名会员。通过合法团体、政治行动委员会 (PACs)、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全国会员团体，女权主义者在国家政治中发展成为重要的政策支持力量。

女权运动强调了横跨问题与思想路线的网络与联盟。组织的激增和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不利的政治环境的防御性适应的结果之一，就是促进了新的次运动 (submovements) 的发生，这些次运动关注家庭暴力、妇女健康、强奸、以及生育权等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动员起来的新团体主要由 20 到 30 岁的妇女组成，这些新团体提倡直接行动议程，比如第三次浪潮 (Third Wave)、妇女行动联盟 (the Women's Action Coalition)、女性健康行动动员 (Women's Health Action Mobilization) (Gelb and Palley 1996: xvi)。虽然代表 100 多个妇女组织的会长委员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分裂的趋势，但是各个组织为了从基金会或其他来源获得资金，以及增加成员和捐助者，总是相互区分的，因而分裂仍然不可避免。里格尔 (Riger 1994) 认为，虽然如此，公益性团体和拥护团体对有限的基金只存在相对较少的竞争，遵循“问题定位”方法，每个团体只集中在相对有限的活动和目标上。为了保障基金，女权运动同广大的



美国慈善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约有 6% 的资金是通过慈善部门的捐助获得的。在多数大城市，以社区为基础的妇女基金会成为支持地方女权主义者与妇女团体的额外资源。女权运动团体的日常决策和长期战略制订所需要的资金和职员，多数依靠“道义支持者”或捐助者。（Gelb 1989: 46）虽然沃克（Walker 1991）和其他人曾一度强调与其他社会运动相比，女权主义者团体成功地获得了公共和私人部门团体的资金赠予及合同，但近几年，迪斯尼和盖尔布（Disney and Gelb 即将谈到）却发现，这些团体开始逐渐减少对外部资源和多样化支持的依赖，开始寻求以会员制为基础的基金。总之，在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上，以及各种不同的团体中，女权运动似乎已经获得了普遍动员起来的反对的权利。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某一积极分子的看法，引用巴希坚的话：“我们比以往拥有更多的动力与公众支持”。在 1991 年参议院的听证会中，最高法院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被指控性骚扰前职员安尼塔·希尔（Anita Hill），事实证明这件事对于妇女团体来说是件好事，它既突出了性骚扰问题，又表明妇女在强大的权力位置上的缺席。会员团体例如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国家堕胎和生殖权利行动联盟（the National Abortion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Action League NARAL）、全国妇女政治核心组织（the 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 NWPC），都发现成员人数随着对危机的感知在逐渐增加。在韦伯斯特诉生殖健康服务机构（the 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案之后，1989 年的堕胎决议从宽解释了妇女的堕胎选择权。全国妇女组织的成员从 16 万增加到 27 万，预算增长到 1060 万美元。（Brenner 1996: 33）

女权运动非但没有终止，反而传播得更为广泛；尽管有时在教堂和犹太教会堂、自治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其他社会运动、大学以及工会联合会中“不太突出”，但的确到处都是女权运动的组织。（Katzenstein 1995; Wolfe and Tucker 1995）通过文化女权主义运动，女性文化通过书店、艺廊、出版公司和合作社等途径有所发展。1996 年，早期激进的女权

主义者杂志——《寄居者和摆脱束缚》（Sojourner and off our backs）——仍然存在，其发行量大约在 25 000 册（Brenner 1996：57）。受女权主义者授权的意识形态影响，与女权运动有关的团体可以通过国家妇女问题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Neighborhood Women）和联合工会女性联盟（the Coalition of Labor Union Women）在相关层面上建立，前者成立于 1975 年，后者达半数的领导者是黑人女性。（Brenner 1996：35）自由女权主义者也创造性地扩大了性别歧视的概念，包括性骚扰和对女性的暴力，继续致力于其原最初目标，同时，大大促进了他们认为对女权主义议程至关重要问题的解决。地方层面的女权主义团体已经对在女性生活中直接影响妇女压迫的具体问题作出反应，包括强奸、家庭暴力、卫生保健，以及摆脱主妇地位等。虽然经常同投资人关系紧张，但地方团体仍然继续存在。这些地方团体的投资人包括以基金为基础的投资人和以政府为基础的投资人，以及试图改变这些团体的宗旨与行为的官僚机构。尽管如此，正如女权主义者组织有所改进一样，女权主义者也改变了官僚政治准则与价值观念，这种说法是很公正的。（Reinelt 1995）即使各女权主义团体已经证明提供服务及持续宣传之间并不互相排斥，但它们都在为这个双重标准而奋斗。通过在移民妇女、性暴力受害者、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住房供给和无家可归者、经济公正与环境公正等相关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女权主义团体扩大了其行动范围。虽然涉及到大量代际交接问题，但还是有很多年轻妇女参加了 1996 年 2 月在华盛顿举办的 96 年赋予妇女权力世界博览会（Expo '96 for Women's Empowerment），一起探讨有关妇女权力的问题。

1992 年美国国会选举以及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当选后，资深女权主义运动者乔·弗里曼（Jo Freeman）总结到：女权运动获得了对议程的控制，但也注意到“两个主要政党对女权运动和对女权运动的反应已经完全两极化”。（Jo Freeman 1993：21）一些评论家谴责运动把主张人工流产为合法的选择权（pro-choice）问题视为当务之急（当然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损害了对其他亟需关注问题的注意，如儿童保育问题。还有

一些评论家谴责以 1996 年颁布的《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为标志的福利改革侵犯了贫困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美国女权运动必须要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与政党的政治孤立的确是确保其政治动力的一个限制性因素。预见到 1996 年选举时的政府分裂，柏克和哈特曼对运动中竞争的“自由市场女权运动” (free market feminism) 的发展感到痛心。他们质问“妇女组织怎么在短短 20 几年的时间内就丧失了政治权力，并被看做是与普通妇女毫无关系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组织？”虽然这种苛刻的评判并不普遍，但纳尔逊 (Nelson) 和卡弗 (Carver) 也同样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妇女组织——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组织——有很多见解，但却没有将要求转变为持续行动的媒介”。(Nelson and Carver 1994: 739) 当代女权运动的问题，事实上也是所有谋求变革的社会运动团体的问题，不是表达问题而是执行问题。柏克和哈特曼的观点可能更多的是对政治体制的控诉，而不是针对女权主义政治。

## 女权运动变革：英国

罗博瑟姆 (Rowbotham) 主张：“如果说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已经遍布英国，它作为一种运动却变得更加难以捉摸”。(Rowbotham 1996: 13) 这一运动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女权运动在某些方面似乎变得更突出，而不是更消沉。在英国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国家政治中，古老的反中央集权制正在逐渐衰落。国家发起的持续了 17 年的反女权运动，表明国家权力排斥局外人。妇女已经进入了工党的领导层，工党在 1997 年 5 月大选获胜后组建了政府。所有政党都开始寻求用新的方式来吸引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选民。自从第二波女权运动开始后，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就被卷入到工党政治中。培瑞克 (Perrigo 1996) 讲述了妇女如何实行工党改革，如何在 1997 年选举前改革了工党，实行了哪些积极的计划以增强其代表性并表达其问题的。自由民主党表示实行机会均等政策，也在



为寻求增强妇女地位以及围绕妇女问题而展开活动。(Squires 1996: 73) 保守党继续保持了其传统的女性选民与更新、更具有表达能力的保守派职业女性选民之间的分裂；对于后者，他们都支持立法跟踪和以建立两性平等为目标的公共管理机构。

工党妇女与全国的自愿团体组织 (voluntary-sector organizations) 有着密切联系。有些还在公民自由和社会政策拥护团体中担任职务，比如自由党、国家单亲家庭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ingle Parent Families)、儿童贫穷行动团体 (the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等，这些团体使女权主义者促成了更广泛的议程。反过来，这些妇女和团体正在成为新的全国女权主义者协调组织的重要纽带。新生团体如福西特协会 (the Fawcett Society 成立于 1866 年) 和全国妇女组织联盟 (NAWO, 成立于 1989 年)，与美国国家妇女组织相比虽然只在小范围内活动，但它们也为国家及国际女权主义问题的协调行动提供某些机制。福西特协会是一个会员组织，其成员从 1990 年的 400 人左右 (UK Cabinet Office 1990) 增加到 1996 年的近 2 000 人。全国妇女组织联盟是代表 500 万妇女的 200 个团体及协会的伞状组织 (umbrella organization)。这两个团体都是靠为数不多的员工、志愿者和简朴的预算运作 (两个团体的预算都远远低于 50 万美元)，但它们却能不断地进行广泛的游说、教育和媒体竞选活动。(Fawcett Society 1996b; 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s Organisations 1996) 福西特协会发动全国范围的支持者进行游说并保持妇女问题的广泛性，主要针对那些处于争论中的和那些媒体关注的突出问题，这些支持者大体上以 1997 年选举运动时的选民为基础。全国妇女组织联盟 1996 年的“妇女宣言” (womanifesto) 是一个综合政治议程，涉及经济、对妇女的暴力、艺术媒体以及一些特殊问题，这些特殊问题包括妇女任命、家庭法、老龄化、农村妇女问题、种族主义及移民等诸多方面。国家协调组织如妇女权利组织 (Rights of Women) 或全国堕胎联盟 (the National Abortion Coalition) 有着更专业的议事日程，也开始尊重其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Griffin 1995) 全国妇女组织联盟加入了欧洲妇女游说团体，并

联合福西特协会及其他团体对联合国北京决议 (UN Beijing resolutions) 的执行进行施压, 这表明许多妇女问题已经国际化。

地方运动团体, 与国家运动团体一样, 已经摆脱了大量意识形态上的党派主义, 这些党派主义有时会转移女性的需求。地方女权运动的主要改变就在于承认了多样性并对其作出回应。少数民族妇女团体, 特别在亚裔英国人社区, 已经对有特殊需要的教育、医疗保健、婚姻、暴力等方面采取行动。为了满足那些处于种族上混合居住、经济上贫穷的伦敦自治市镇妇女的需要, 1979年成立了索萨尔黑人姐妹组织 (Southall Black Sisters SBS), 这为拓宽此类团体的议程提供了例证。原来提供服务的索萨尔中心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地方资源。但是在国家倡导的角色上, 索萨尔黑人姐妹组织现在同“妇女协会 (Women's Institute)、乡镇妇女协会 (Towns women's Guild) 和妇女正义组织 (Justice for Women) 等团体一起, 致力于改革关于挑衅行为的法律”, 这个法律常常保护被指控犯有家庭暴力的男性, 而不是女性。索萨尔黑人姐妹组织与移民团体、反对个别穆斯林学校的教育团体以及反种族主义者运动等团体合作。同时索萨尔黑人姐妹组织也是反正统派基督教妇女组织 (Women against Fundamentalism,) 的创始机构之一, 是为南亚社会改革而战的团体之一, 并且派代表去纽约和北京从事人权问题。(Griffin 1995: 79) 种族和其他动机彼此相互渗透, 就像地方和国家问题相互影响一样。同样地, 全国家务劳动团体 (National Group on Homeworking) 代表的是劳动力中最低收入的妇女, 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少数民族; 该组织以利兹市为组织基础, 用旁遮普语 (Panjabi)、乌尔都语 (Urdu)、古吉拉特语 (Gujarati)、孟加拉语、中国汉语等多种语言公布工资及待遇信息。索萨尔黑人姐妹组织和苏塞克斯郡妇女援助部门 (Sussex Women's Aid branch) 起初从地方上提供的案例, 最终导致妇女正义组织发动全国性活动去改变对亲密杀人者的法律。国家政策议程和社会变革目标同地方组织的服务性规定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地方政府是保守党政府结构性改革的特定目标。自由裁量权 (discre-

tionary powers) 和资金被大幅度缩减, 最极端的例子是 1985 年撤销了大伦敦议会 (GLC)。大伦敦议会已成为女权主义者组织的旗帜; 在其巅峰时, 其下属的妇女委员会 (Women's Committee) 有 95 个员工, 控制着平均 600 万英镑的年度预算。随着它的解体, 权力被分散到较小的地方行政区。20 世纪 80 年代这些区域中的 2/3 地区有妇女委员会或立法提案权, 但是到了 1994 年, 只有两个区域还保留该权利。随着保守党委员会竞选失败 (1996 年国家大选中, 457 个权威人士中只有 12 个仍然处于其控制之中), 妇女们寄希望于其他方式。但是教区的地方工党通常不愿意支持平等问题和妇女问题。(Lovenduski, Margetts, and Abrar 1996: 11-12; Lovenduski and Randall 1993: chapter 5) 在地方政府中参加选举并被任命的妇女在总数上有所增长, 对妇女团体的实际支持和经济支持仍在继续, 这些进步更多地归功于妇女的组织网络, 例如, 由管理层妇女组成的地方政府网中的妇女组织。(Women in Local Government Network Lovenduski, Margetts, and Abrar 1996: table 4 and 19-23) 地方团体必须找到更广泛的活动场所及资金来源, 比如从全国彩票 (National Lottery) 及其他志愿部门获得资金来源。(Russell, Scott, and Wilding 1996) 一方面, 保守党对公共服务的大量缩减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一方面, 福利事业的私有化将政府资金从志愿部门转化为服务佣金。(Griffin 1995: 7) 索萨尔黑人姐妹组织运营咨询建议中心、支持团体、语言培训、儿童的暑期计划、地方游说及全国家庭暴力和移民问题等, 从伦敦的伊令区获得超过一半的年预算, 约为 15 万英镑, 其他的预算多数是从基金会和慈善机构获得。(Southall Black Sisters 1996)

必须承认的是, 女权运动中相当多的变化如反中央集权制倾向的衰落、意识形态软化、差异认同以及专业化并不是非常普遍。自称为革命女权主义者的林恩·哈尼 (Lynne Harne) 说道: “自治妇女解放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似乎空前低落”, 原因是“地方女权运动的起起落落”, 女权运动“受到重创的部分原因是它必须承担阶级、种族及残疾等大量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女权运动差点自我毁灭掉”。(Lynne Harne 1988:

65, 69) “茅屋匠的孩子们” (Thatcher's children 80年代以来教育程度较低的一代) 中的女权主义者——那些生长在保守党政府时代的人——出乎意料的乐观。特别是在年轻女性中，多样性被视为积极肯定的，而不是分裂的：“妇女解放”已经不能再作为有组织的全国（国际）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女权运动的影响渗透在方方面面。女权运动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在将各种女性——工人阶级妇女、黑人妇女、女同性恋者和女性残疾者——的经历提上‘女权运动议程’方面”。（Pegg 1990: 159）

从结构上讲，在保守党时代低潮的压力下，在妇女推动的社会进步及职业进步的鼓舞下，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女权运动开始进行变革，在旧的机制破产之时抓住了新的机遇。与前些年相比，英国女权运动可以分为更多的精英部门与地方部门，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比那个时候密切得多，而且更具有多样性，一句话，变得更专业。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国家精英部门层面上，遵循了美国女权运动发展出的进入政府游说的模式，这一趋势在1997年大选前非常明显。这些发展可以看做是女权运动动员的成功，因而对女权运动来说动员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些变化对于政策目标的有效实施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能够促进对新环境的自我反思、对新议程条款的新结合，以及为了促进或应对开放的新渠道的新策略。迄今所描述的运动构成及变化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解读政策变化（policy changes）的一部分。

## 女权主义者对政策变化的影响：美国和英国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衡量女权运动的成功：通过运动动员、政策影响以及文化变迁；或者通过集体意识的变迁和散乱无章的文化政治的变迁，这些变迁也许能创造出进一步动员及变革的资源。塔罗（Tarow 1994）曾经争论地说到除了政策变化之外，运动的成功还要依赖于“战略战术”的范围及灵活性。在政策方面，美国女权运动的主要贡献在

于它通过立法决议和司法判决改变了联邦和州的政策。女权运动获得了合法参与决策的资格。

美国女权主义者目标实现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过去 20 年中妇女在政府机关谋职及参加选举的人数急剧增长。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权运动开创的政治化过程，以及为了获得更多平等权利而增加妇女代表性的具体努力。援助女权主义政治议程的特殊意义在于，许多参加美国政府机关选举的妇女都是妇女团体和妇女权利组织的成员，一项调查表明 40% 的参选妇女都属于某个妇女权利组织 (Darcy, Welch, and Clark 1995: 37)。此外，女性立法者认为其当选的部分原因是女权运动团体的行动。这些团体提供经费和志愿者，女性立法者与男性立法者大不相同，她们把这些团体的支持看做是选举成功的至关重要的一环。艾米丽名单等团体都与其他团体联合，包括多数女权主义基金会 (Feminist Majority)、共和党愿望名单 (the Republican WISH List)、妇女竞选基金会 (Women's Campaign Fund)、出于自己选择的选民 (Voters for Choice)，以及全国妇女政治干部会议 (NWPC，一个较早的女权运动组织)。根据一项评估显示，大约有 42 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代表女权主义候选人的女性权益 (Brenner 1996: 69 n. 79)。全国妇女政治干部会议主要负责培养候选人对竞选政府机关的渴望。女性立法者比男性立法者更有可能签署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政策，这也反映了其支持者的基本利益。(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1995: 2; Carroll 1985: 171) 她们的席位更多的是在州和地方层面，在州和地方层面拥有超过 20% 的席位。

除了谋求立法政治改革之外，女权主义者团体还致力于增加妇女在行政部门和官僚政治部门的任职。1994 年，部分是出于对妇女支持其候选人地位的酬谢，克林顿任命了 7 名妇女担任内阁职务，并创下了 91 项联邦司法部门任命中有 30 名是女性的记录。1996 年再选的特点是：与 1992 年相比有更多的女性选民支持克林顿，这次再选后，在代表 100 多个妇女团体的总统理事会的压力下，克林顿任命其他妇女任高级职务，包括任命马德琳·奥尔布莱特 (Madeleine Albright) 为国务卿。美国女权





主义者采取了“内/外” (inside/outside) 策略, 既利用体制内有影响的掌权者的支持, 又利用体制外的女权运动动员。(Staggenborg 1991: 155; Spalter-Roth and Schreiber 1995)

英国女权运动积极分子预测到 1997 年工党选举胜利后, 他们会具有与政府内部人士一样的代表性与知名度。虽然工党故意在可赢得的席位上提名女性候选人, 但工党女性议员却由预选时的 37 个迅速增加到 101 个, 大大出乎工党的预料, 因为工党总共有 419 个议席。总体来说, 在新议会中的女性议员由原来的 62 名增加到 120 名, 占总议席的 18%。许多新成员都很年轻, 并且都参加了最近的女权政治运动及地方女权活动。在这段时期, 妇女获得的委员会公共任命和重要官方机构的任命一直在增加, 她们在过去 17 年中促成了很多政策的实施。尽管 1996 年女性仍然只占约 1/3 的职位, 但 1991 年时这个数字还不到 1/4。(Equal ON-opportunities Review 1996 [No. 67]: 6) 300 人团 (The 300 Group) 监督任命的部分原因是其希望看到议会中有 300 名女性议员, 它坚持应该有数百名甚至更多的妇女被提名, 认为她们同男人一样有资格胜任公共工作。

女权主义者的施压促进了这一进程。工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人数已经缩减的女性候选人名单 (women-only candidate short lists), 直到 1996 年一个工业法庭发现该惯例违反性别歧视法时才停止实行。自由民主党所有的竞选名单中都有女性候选人, 日益活跃的国家女权运动团体如福西特协会也力劝两大政党提名女性候选人。1992 年选举后, 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现象, 英国艾米丽名单组织负责招募、培训女权主义候选人并给她们提供资金。早期高等教育与职业平等运动的成功, 为招募有经验的女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女性占高级文职人员的 15%, 近一半具有律师资格, 并且妇女在其他职业中也占重要比率。(Equal Opportunities Review 1996 [No. 67]: 6; Moss 1995: 172) 机遇 2000 (Opportunity 2000) 是一个由商业团体赞助的组织, 最初的目的是实现管理平等, 1991 年有 61 个企业组织成员, 到 1996 年增加到 305 个, 虽然 1996 年女性仍然只占管理人员的 12.3%, 而与此相比美国约为 40%, 但女性作为管

理人员已经有了很大增加。(Equal Opportunities Review 1996 [No. 68]: 4)

在最初的工党内阁中只有 5 名女性，还有 14 名下一级的部长，随着全国组织的专业化进程和协调，1997 年英国女权运动具有斯达根伯格 (Staggenborg) 称之为内/外政治的特性，并且在美国该特性被证明是有效的。这种内/外政治一方面“运用许多技能和资源，促进动员活动的制度化过程，并且采用劝说性集体行动策略而不是对抗性集体行动策略”。(Staggenborg 1991: 30) 另一方面它是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的联系纽带。在伯纳 (Byrne) 的女权运动术语中，内部人员“像冰山——看得见的那 10% 非常重要，但是没有下面的 90%，上面的 10% 也会融化”。(Byrne 1996: 71) 通过将妇女公民自由问题与社会支持组织（这些组织为政府中有影响力工党妇女提供建议和支持、并支持其女权主义主张）相连接，政府中有影响力的工党妇女同政府外 90% 的政党和团体都保持着联系。

即使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政策影响也要根据许多条件而变化，并且最好根据一系列相关事例来评定。我们将检查三个方面、并通过对比女权运动对每个方面影响的迹象来评定政策影响，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堕胎、经济平等和家庭暴力。

## 堕 胎

在美国，自从最高法院对 1973 年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 作出判决后，堕胎和生育选择 (reproductive choice) 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成为备受瞩目的问题。在判决后联合起来的积极而强大的选择权 (pro-choice 主张人工流产为合法) 运动遭到反对堕胎、反对把堕胎合法化 (pro-life) 团体的激烈反对，这些团体挑战法院和国会确定的堕胎权，对提供堕胎服务的人进行暴力袭击，大大限制了堕胎服务的运用。这些力量通过认同共和党而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冲突的范围在扩大，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被高度动员起来，双方都操纵了符号性标志以控制争端。全国

堕胎权利行动联盟 (NARAL)、全国妇女组织、计划生育组织 (Planned Parenthood) 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的生育自由计划组织 (Reproductive Freedom Project) 都开始致力于维护堕胎权。运动策略包括法律策略, 在华盛顿举行大规模集会, 立法游说, 努力改变反对堕胎选择权的议员在投票箱前的选择。1989年, 主张堕胎合法化的力量遭受了一次挫折, 在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的案件中, (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法院支持妇女拥有堕胎权, 但用胎儿发育原则取代了罗伊诉韦德案中的3个月原则, 胎儿发育原则实际上是划分合法堕胎与非法堕胎之间的界限。(Gelb and Palley 1996; 221) 第二次挫折是1992年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件中, 法院支持各种不同的选择权, 将在各州把堕胎限制为不给孕妇添加“过重的负担”。最初在1976年通过的《海德修正案》(The Hyde Amendment) 规定, 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 严厉禁止公共医疗补助基金用于堕胎, 虽然没能通过宪法修正案, 但用一切可能的方式限制堕胎的“生命权”策略还在继续。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并且牵制了大量继续施压所需要的精力和财力, 但相对而言, 主张堕胎合法化运动仍然作为相对强大的运动而存在, 并能够在各个领域作出反应。1989年4月, 作为对韦伯斯特案判决的反应, 大概有30万到60万人参加了华盛顿的游行示威, 进行抗议。女权运动估计1992年游行示威的参加者大概是50万, 包括很多年轻妇女和黑人女性。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的成员从1989年的20万增加到1990年的40万, 计划生育组织和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在堕胎合法化斗争中结成联盟, 它们在成员和捐赠方面均有显著的增长。然而, 在克林顿总统大选后, 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的成员从近35万减少到不过10万。(qtd. in Brenner 1996: 33) 伯克和哈特曼认为克林顿总统大选“破坏了选择权运动的核心基础”, 使得堕胎权激进主义分子坚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取得胜利, (1996: 20) 这些人给予选举充分的信任。克林顿一开始就提前将选择权提上议程,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女性选民的支持。他撤消了美国禁止对某一问题进行公开议论或辩论的规定 (the gag

rule)，这项规定是用来防止医生在联邦政府投资的诊所提供堕胎咨询服务的，同时，克林顿解除了对流产胎儿发育组织研究的禁令，撤消了美国拒绝向提供堕胎服务的国家提供基金的政策。克林顿还签署了《自由进入诊所法案》，并批准 RU486 “宿醉”口服避孕药的研究，这些可能会改变堕胎政策。从 1996 年到 1998 年，他屡次否决了颇有争议的禁止晚期堕胎的国会议案。

虽然也产生了常设的全国协调组织，但在英国政治中，堕胎问题从来就没有像在美国那样成为主要的两极分化问题。为了限制 1967 年获得的在可靠的医学与社会条件下，只要有两个医生同意就可以进行堕胎的权利，1975 年成立的全国堕胎行动组织 (NAC) 领导了一场抵抗运动。20 世纪 70 年代，全国堕胎行动组织策划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但是到 1990 年，它的策略转变为更专业化的游说和较小规模的示威游行。(Byrne 1996: 62, 65) 1990 年，反对把堕胎合法化的人试图将合法堕胎的时间限制由怀孕的 28 周改为 18 周。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议员第一次说服政府于议会期间（虽然没有认可）在《人类生殖及胚胎法》(the 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Bill) 中追加一个条款。在反对把堕胎合法化的议程成功确立后，全国堕胎行动组织联盟把 24 周时间限制的最终投票看做一次相对胜利。

主要反堕胎组织如未出生婴儿保护协会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born Child SPUC) 和生命组织 (LIFE)，模仿美国的策略，设法为堕胎确立具有高度情感性的政治轮廓。未出生婴儿保护协会已经请来了美国顾问，包括从实施援救组织 (Operation Rescue) 请来的团队。同时生命组织为围绕多胎妊娠的感人事例的媒体活动支付薪水，但它并没能找到阻止妊娠中止的禁令。虽然有这些尝试，但反堕胎问题在英国并不十分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政治环境，堕胎没有成为政党问题或选举问题。议会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斥着政党事务，政党组织秘书允许对堕胎问题进行自由投票。在英国政治中，已经很少有宗教团体的直接干预。然而，反对堕胎者还是试图改变堕胎问题的超党派状况与教堂

置身事外的状况。在 1997 年选举的宣传中，天主教高级教士要求颁布堕胎禁令，并抨击工党领导人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是虚假的基督教徒，因为他没能保持本派别的反堕胎立场。新成立的反堕胎联盟倾向于支持处于边缘选区的反对堕胎权的 50 名候选人。这些将堕胎问题推到选举议程上的尝试遭到了政党领袖的拒绝，甚至许多反对堕胎的国会议员和选民也不赞同，但是它们无疑给了反堕胎组织以新的声望和活力。(Observer, January 5, 1997)

## 经济平等

伯克和哈特曼相信运动“未能使女性优先权成为女权运动的核心”，由此他们提出了恢复女权运动的方法。民意测验显示，女性优先权是“经济问题（工资平等和养老金）、卫生保健（经济问题）和暴力”（1996：20）。经济平等是美国全国组织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首先考虑的问题，早在 1964 年《公民权利法案》中的女性问题中就包含了经济平等问题，并伴随着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EEOC) 的建立，通过反歧视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和类似的方案得以进一步发展。英国立法机关从事这项活动相对较晚，而且在范围上也比较小，但是它在 1970 年颁布了《同工同酬法案》 (Equal Pay Act)，1975 年颁布了《性别歧视法案》 (Sex Discrimination Act)，通过颁布这两部法案建立了英国机会均等委员会 (the British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英国机会均等委员会受到了美国立法机关模式的巨大影响”。(Lester 1996：25)

同等薪酬的原始基本指标表明了它在过去 25 年内的缓慢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女性平均每挣 59 美分，男性能挣 1 美元，而 1970 年英国女性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是男性的 62.9%，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个数字都上升到 70%。（“Through a Glass Darkly” 1996：51；Equal Opportunities Review 1996 [No. 70]：34）在美国女性合法组织持久稳定的支

持下——在英国是机会均等委员会，妇女已经在其他相关工作条件上（特别是在养老金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Goldstein 1988：513-36；Collins and Meehan 1994：385-87）通过参加高等教育及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美国的法律政策明显使女性获益良多。（Kessler-Harris 1994：73）种族意识反歧视行动计划（Race-conscious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也增加了参加某些非传统工作的机会，比如建筑和工程。1987年，最高法院批准了性别意识反歧视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支持雇用黛安·乔伊斯（Diane Joyce）为圣塔克拉瑞镇运输代理局（the Santa Clara County Transportation Agency）的公路车辆调度员。在这个案件中，全国妇女组织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NOW LDEF）同其他13个女权主义团体和公民自由团体的联盟共同提交了（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这与里根政府的司法部反对所有的反歧视行动形成对比。（Goldstein 1988：562-82）

然而，除了这些成就之外，运动还必须致力于改变那些持续不断的不平等现象。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参加抗议只是走向平等的第一步，1991年《公民权利法案》建立的格拉斯·盖林委员会（the Glass Geiling Commission）开始探索下一步——晋升。（Gelb and Palley 1996：235-36）低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和性别结构已经证明是难以改变的。与全职比起来，兼职的工作条件更差，工资更少，美国的兼职工作者中62.3%是女性，而英国是85.4%。正如凯斯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曾提到的，美国反歧视行动计划的影响对“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技能的妇女”包括许多黑人妇女来说很不明确。（Kessler-Harris 1994：73-74）立法活动以及为女性提供更多机会（Wider Opportunities for Women）等组织提供的计划，是为了提高技能培训，增加非传统无需技能的工作途径，提供就业服务，加强为低收入群体服务的美国工会妇女联盟等协会团体之间的沟通，这些活动仍不十分引人注目，并且就提供服务方面来说，也仅仅是杯水车薪。（Spalter-Roth and Schreiber 1995：124）过去，妇女受益于种族意识计划和性别意识计划的权利支持，现在她们很容易受到

削减种族意识计划决议的影响。妇女合法团体没有干预 1995 年的几个最高法院案件，这些案件分别转移了个人的歧视证明的负担；（*Adarand v. Peña*）降低了反歧视计划的执行标准（*Missouri v. Jenkins*），反对按种族重新划分选区（*Miller v. Johnson*）；妇女合法团体也没有干预霍普沃德诉德克萨斯州案件，（*Hopwood v. State of Texas*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ifth Circuit, 1996）该案中种族成为大学录取的标准。1996 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反对反歧视计划的 209 号提案，女权主义合法团体，包括全国妇女组织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在内，都参加了反对 209 号提案的斗争。

然而，平等权仍将是美国女权运动争论的主要领域。美国政治文化、社会公平及经济平等问题的解决等作为《第十四号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的核心，以及女权运动的长期传统和宪政方面的知识，这些都使得关于平等权的争论不会被挫折击倒。1996 年克林顿总统将福利改革写进法律，这是对经济平等领域更加激进的挑战，这项法律对保险金设置了 5 年上限（five-year cap），并对合法工作的外国人的保险金和工作的必要条件进行了限制。“贫困的女性化”问题的分析家早已指出，福利也是一个经济平等问题。（Pearce 1990）1996 年的立法揭示了这一问题，同时表明对于许多没有技术的黑人妇女、以及经济上已经成为贫困工人的白人妇女、或者即将成为新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接受者的白人妇女来说，制定对女性有利的政策迫在眉睫。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将美国的平等立法模型和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引进其政体中，英国的议会主权把对立法部门或行政部门进行司法审查的要求排除在外。那时，英国也缺乏权利政治的文化；经济问题仍属于阶级冲突领域或社团主义者的谈判领域。英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经济大萧条、兼职增加、工资低、私有化、日益增加的女性劳动力、对工会的限制、为理想的自由放任市场体制服务的政权，正是这种政权在当时使问题加剧。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妇女通过诉讼获得了经济平等权，发展了新的联盟，为低收入女性而斗争。动员、策略和议程方面的

变化与社会生产相互影响，导致社会形势非常紧张。

欧洲诉讼策略促进了这些发展。20世纪70年代一位专家回忆道，“我们都没有想到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法律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Lester 1996：25）英国于1973年1月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罗马条约》，该条约第119条规定妇女享有平等薪酬的权利。1976年，德弗莱尼诉萨本那（Defreene v. Sabena）案件中，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判定：个体可以在自己国家的法庭上坚持欧洲人的平等原则，以此来驳回国家立法，甚至在没有该法律的国家中要求立法。从那时起，这一惯例就被用到工资、养老金与退休年龄、雇佣与失业保障、兼职工人的权利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差别待遇的斗争中，大大促进了妇女经济地位的改善。（Collins and Meehan 1994）在这一进程中，英国女权运动结成了新的联盟，为动员与实现政策改革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最清晰的例子。例如，在性别利益组织（薪酬平等计划 the Pay Equity Project）、不属于工会的低收入工人（低收入者协会 the Low Pay Unit）、种族工人（全国家务劳动团体 the National Group on Home-working）的支持下，机会均等委员会和英国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一起在1994年正式向欧洲提出控诉，因为废除最低工资立法违反了欧盟条约的协定。（Hart 1994）福西特协会组织领导了反对低收入人的运动。福西特协会与全国妇女组织联盟都参加了欧洲妇女游说组织和欧洲社会政策论坛，旨在促进欧洲经济平等组织网络的发展。这种网络同时也拓宽了欧洲人狭隘的经济法律观念，囊括了性虐待、生殖权和家庭法等方面的政策。（Elman 1996；Meehan and Collins 1996）进行诉讼和向欧洲的议员游说都是专家治国论的形式，但是随着新兴的专家网络和支持团体（为了大多数贫困妇女）的出现，正在形成与美国同样的内/外联合，就像施帕尔特·罗斯和斯瑞博（Spalter-Roth and Schreiber 1995）发现内/外联合对美国的经济平等政策来说很重要一样。



## 家庭暴力

在英国和美国，家庭暴力问题将地方性的女权主义问题提到国家议程上来。现在家庭暴力问题被认同为公共政策立法问题，这反映了较为激进的女权运动分支的胜利，该分支将家庭暴力这个“私人”问题定义为政治问题，并能够获得国家对家庭关系的立法干预和司法干预。两国女权运动都表明提供服务和支持不一定成为对立物或相互排斥的目标。

英国对家庭暴力问题作出的最早的反应是实践性的：1972年伦敦成立了两家庇护所。1975年，运营庇护所的35个团体成立了全国妇女救助联盟（the National Women's Aid Federation NAAF）；现在，仅英国联邦就有约200家庇护所。全国妇女救助联盟成为积极的立法游说者，议会委员会于1975年证实，家庭暴力的权威定义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1976年和1978年成功颁布的法律为限制或阻止施暴伴侣回家提供了禁令，而且1977年的《（无家可归者）住房供给法案》保证为逃避暴力的妇女提供公共住房（Lovenduski and Randall 1993：305-8）。在美国，沿用英国模式，1974年在明尼苏达州成立了第一家受暴妇女庇护所（现在仍然存在）。最初关于立法改革和资金筹措的尝试都是地方层面上展开的，其中资金通过基金会的支持不断增多。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女权运动团体开始围绕家庭暴力问题进行动员。1976年全国妇女组织受暴妇女/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NOW Task Force on Battered Women/Domestic Violence）成立，1977年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the 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NCADV）成立。

在美国和英国，如何在不放弃女权主义组织原则和目标（包括受暴妇女的授权）的情况下维持经济保障，是庇护提供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们面临的所有斗争就是要找到一种策略，这种策略能使女权主义议程与非女权主义组织产生共鸣成为可能，让非女权主义组织接受我们的政治议程，而不是我们接受它们的政治议程”（Foley 1996：174；see also



Reinelt 1995)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依然存在的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是美国一个服务提供者的联盟；虽然它要依赖政府与基金会的资金，但在为彰显自治妇女的声音而奋斗的时候，以及为那些有争议的职位做辩护的时候，它仍然会坚持自己的主张。由于这一团体的指导方针明确规定——如果基金代理人拒绝支持其议程，它就必须返还代理人的基金，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两次返还了大额捐赠，一次还给美国司法部，一次是还给美国强生集团。由于科罗拉多州反同性恋组织的认可和女同性恋者的建议，1992 年预计在该州举行的会议被取消了，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虽然丧失很多资金，但女权运动仍能生存，这证明了上面提到的观点即资金来源具有多样性。以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为例，只有 30% 的基金是来自同一途径的 (Disney and Gelb forthcoming)。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的团体结构也有所调整，继续实行多样性决定；保持阶级、种族和性别差异；重建一些较小的管理团体。

英国的运动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它的资金、住房供给、还有其他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来源是地方政府。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威尔士庇护所的研究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所有的资金都增加了，庇护所的数量也有所增长，地方政府仍然是主要资金提供来源；威尔士妇女救助组织是一个庇护团体，其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中央政府威尔士办事处。(Charles 1995: 626-28) 庇护所现在拥有法定委托职能，这有利于保障资金供应。虽然如此，正如英国和美国为妇女提供的其他资金服务一样，这里也涉及到女权主义分析家尚未解决的资金独立问题。(Radford and Stanko 1996: 70; Foley 1996: 174) 威尔士的积极分子认为他们维护了自治权，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任务具有特殊性，并且这些任务是经法律授权的。对于政府的社会服务来说，根据议会选举委员会的说法，“棘手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某种不幸妇女的困境，而是家庭的未来，包括男人、女人，最重要的——他们的孩子”。(qtd. in Dobash and Dobash 1992: 128) 妇女团体对她们自己作用给予了不同的界定，一个不出名的庇护所工作者对尼克·查尔斯 (Nickie Charles) 解释：“一方面我们是问心无愧的

……一位妇女遭受到了暴力，这就是全部。我们可能是唯一那么做的人。你知道，社会工作者、卫生访视员、医生可能都富有同情心，但是他们全都试图把受暴妇女作为一个家庭来帮助”。（Nickie Charles 1995：628）

虽然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家庭暴力问题受到全国的关注，但在美国想通过国家立法却很难，主要原因在于 1980 年选举后右翼团体在共和党中占支配地位。为了阻止政府向任何家庭暴力计划提供基金，1981 年右翼势力甚至在国会中提出“家庭保护法案”，不过该法案最终未能通过。（Gelb 1983）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大多数国家都通过了与受暴妇女有关的立法，并通过犯罪审判和司法制度为庇护所提供资金，改进干预手段。有些政府通过对结婚证追加额外费用的办法为这些新提案提供经费。通过共同起诉民事案件、强迫地方官员作出迅速反应、以及在司法机构里要有的职业女性的代表出席，妇女团体推动了地方层面与政府层面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女权主义团体在地方层面上学到的经验可以在今后联邦层面的工作中运用，包括建立有广泛基础的联盟、两党的联合支持，以及通过使用挽救家庭、保护受苦妇女等没有胁迫感的概念使右翼势力中立。（Dobash and Dobash 1992：206-7）

走向成熟的女权主义话语与分析对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立法过程有一定的影响。在女权运动 6 年来不断地施压和激进主义影响下，1984 年，《暴力预防与服务法案》（Violence Prevention and Services Act）被签署为法律。它为庇护所提供、并将继续提供有限的资金。根据爱默生·窦巴什和拉塞尔·窦巴什（cR. Emerson Dobash and Russell P. Dobash）的看法，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女权运动“精神、艰苦的努力、日益增强的政治复杂性、建立联盟、使用策略的一座里程碑”，这在里根政府反女权主义及倒退的社会政策议程占支配地位时期显得尤为突出。（1992：144）1994 年，在国会又一次延期讨论后，《针对妇女的暴力法案》（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作为综合犯罪法案的一部分得已通过。这几乎是 20 世纪 90 年代女权主义议程中颁布的最重要的法律，这一法律是女权主义团体及其同盟成功运用内/外策略的证明。在 1996 年



4月26日的一个电话访谈中，帕特·莱乌斯（Pat Reuss）——全国妇女组织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的立法理事，解释道：

内部人士包括参议员比登（Biden）、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还有国会中许多两党联合支持的拥护者。女权主义团体联盟代表的外部人士由全国妇女组织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组织的针对妇女的暴力机构领导，并有全国妇女组织、全国妇女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妇女法律辩护基金会（Women's Legal Defense Fund），以及最近成立的全国结束家庭暴力组织（National Network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等团体的积极参与。他们与更广泛的联盟一起工作，包括初级联盟（Junior League）、天主教慈善会（Catholic Charities）、女性俱乐部大联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还有为了生命的女权主义者组织（Feminists for Life）。

地方积极分子和联盟成员发起了草根阶层的动员，联盟参与者扩大到支持他们的执法官员和律师。立法的核心主要在于通过司法警察保护来预防危机。法律授权各州执行保护法规，包括全国家庭暴力热线、联邦和州的法官培训、为与性有关的犯罪提供民事权利赔偿，以及为一些受暴移民女性提供援助。通过一些专门的支援，地方法律实施与警察和检举人培训均有所加强。此外，法律为庇护所提供了一些附加的联邦资金。（Gelb and Palley 1996: 230）2000年总共有16亿美元财政支出用来支持这些活动。

现在英国的反对对妇女暴力问题等同于国家问题。1996年11月有一个主题为“暴力、虐待与女性公民的权力”的会议，共有两千名参加者，其中一半以上来自英国，包括许多年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这表明反对对妇女暴力问题的力量已成为女权运动集结的信号。这次会议是由一个大学女性问题研究小组、全国妇女组织联盟、英格兰和威尔士女性救

助联盟 (the Women's Aid Federations of England and Wales)、索萨尔黑人姐妹组织, 以及其他种族团体、妇女团体、儿童团体、发展团体联合主办的。零忍耐运动 (Zero Tolerance Campaign) 是公众主动有意识地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组织, 1992 年由爱丁堡妇女委员会 (Edinburgh Women's Committee) 建立, 从它建立到它在遍布英国的地方性行动, 零忍耐运动的传播成为以对妇女暴力为主题得女权运动活力的又一个指标。(Mackay 1996) 零忍耐运动在执法官员与司法官员的培训、程序变革、现存法律的改进, 以及出台关于追踪的新举措等近期活动中的作用也同样显著。

爱默生·塞巴什和拉塞尔·塞巴什将美国对家庭暴力的政策争论与英国的相关状况进行了对比。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的女权主义话语大多伴随着公民权利与法律保护的要求。英国国会议员忽视了对女权主义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分析, 倾向于将家庭暴力归因为“个人的无能与家庭贫困的背景”,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同激进主义者关于庇护所、住房供给、社会服务等注重实效的建议。实际上, “虽然问题的本质被否定或被转移, 但解决方法被采纳了”。(1992: 100) 后来的英国女权运动遵循三条路线: 继续提供最初提到的物质资料, 特别是住房供给, 以确保妇女的安全与独立; 与在美国进行的一样, 新的运动要求执法机构要进行法律改革以及采用更好的处理办法; 扩大争论的范围, 从家庭暴力扩大到所有针对妇女的暴力形式。例如, 最近争论的在家庭住所居住的权利, 以及将有暴力行为的伴侣驱逐出家庭住所的问题等。一项立法创制权确认了长期存在的居住权同样适用于已婚伴侣和未婚伴侣, 并动员起一些数量相对较少但联系广泛的保守的支持传统家庭结构的人去游说议员。虽然保守派 (英国上议院) 大法官 (领导司法部, 同时拥有立法和行政职务) 在 1995 年提出的《家庭住所与家庭暴力议案》 (the Family Homes and Domestic Violence Bill: 1995) 把这些权利编入了法典, 但这一议案对一小部分右翼保守派议员包括一些妇女而言过于刺眼, 他们认为这是对整个婚姻制度的威胁。一项最后的议会与媒体的运动成功地否决了这项议案。尽管这项议案中的某些条款被整合到 1996 年的《家庭法法案》



中，但这些反对者又提出了一个赋予法官酌情决定权的折衷办法，这一办法要求法官对结婚的伴侣和未结婚的伴侣有区别地判定是否允许其进入家庭住所，“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未婚同居者’没有给彼此走入婚姻的承诺”。（Current Law Statues 1996, c. 27）

为了游说议员恢复被否决的《家庭暴力法案》，英格兰妇女救助联盟（the Women's Aid Federation of England WAFE）组织了一场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妇女从事专门职业的地位提高了，并得以在新的层面上参与政策制定。两家主要庇护所的工作人员与当地的志愿者一起协调全国的其他组织网络，并向媒体作简要介绍。他们直接参与立法活动，其方式不属于标准的英国惯例，他们起草了30个法案修正案，向议员和上议院大法官报告，密切关注上、下院委员会审查议案之间的关键阶段（committee stages）。作为对议会与右翼媒体的“家庭价值观”运动的反击，他们的行动非常有效。最后的妥协意味着，与美国一样，立法支持传统的家庭与婚姻。但是英格兰妇女救助联盟的工作人员认为，1995年法案的夭折表明“反动势力在政府内部起作用”，因而妇女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在这些工作人员看来，断然地拒绝妥协可能会引起强大的反对势力，或者可能会导致更糟糕的立法。事实上，英格兰妇女救助联盟成功地使针对暴力的一系列补救方案和所提供的保护措施编入法典。允许区别对待未婚伴侣的折衷办法至少只是自由决定的，关键是要看法院如何运用它们的自由裁定权。因此，英格兰妇女救助联盟的下一步计划是提出申请，召开委员会起草具体规则。（Harwin and Debbonnaire 1996）

监督执行引起了警察实践与司法制度的关注。《1976年家庭暴力法案》赋予治安员对暴力男性的禁令中附加逮捕的权力，但警察仍然不愿意介入到家庭争端中去。对警察的不满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益增加，女权主义者批评警察对家庭暴力、强奸案件、种族偏见和对黑人妇女的暴力等问题上的管制方式，而且他们也没有考虑到种族妇女的需要。这些批评引起人们对法律执行（有关暴力男性的禁令和把暴力男性从住所中赶出去的法律执行）进行长期的施压，但是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期，警察实践才开始转而重视执行问题。（Hester and Radford 1996）1985年和1990年内政部的指导方针是对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的响应，这些批评来自于英格兰妇女救助联盟、妇女反对女性暴力组织（Wome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全国妇女委员会。（1986年发表的一篇报告，反对对妇女暴力）（Radford and Stanko 1996: 74）根据1990年内政部指导方针的建议，到1993年为止，伦敦69个城市警察机关分区中，有62个分区建立了家庭暴力小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其他42个警察机关中，有20个警察机关也建立了家庭暴力小组。“虽然只取得了有限的而且是不均衡的进步，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妇女获得由警察保护其不受男性伴侣暴力侵犯的权利”。（Hester and Radford 1996: 85）

与美国一样，英国也有关于提供服务和警察干预的新的全方位一体化服务模式的例子，比如在伦敦伊斯林顿区，女议员与妇女委员会合作建立性虐待中心；在曼彻斯特，女权主义团体与警方以及卫生局合作建立了性虐待中心。（Foley 1996: 168）家庭暴力组织如英格兰妇女救助联盟，同女权主义组织以及强奸防治团体一起坚持从事防范家庭暴力的活动，女权主义组织有妇女权利机构（Rights of Women）、妇女防止强奸行为组织（Women against Rape）等。妇女权利机构、妇女正义组织（Justice for Women）以及许多种族团体，特别是索萨尔黑人姐妹组织，已经走在向法官施压的最前沿，它们要求法官重新审核司法程序，而且在发生了几起鲜明的妇女受虐谋杀案后，要求法官重新审视法律本身。（Bindel, Cook, and Kelly 1995）最近，对驱逐那些逃避暴力婚姻生活的移民妇女的行为的攻击已经促成女权主义者、种族团体、公民自由及庇护组织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这个联盟主要反对“一年规则”，这项规则使受虐妇女失去保护。（Southall Black Sisters 1996）正如妇女正义组织的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的评论，“反对对妇女暴力可以说成是女权主义者的‘胜利’，现在这个问题是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且我们很多具体的批评已经被认同是有效的”。（Julie Bindel, Cook, and

Kelly 1995: 65) 成功地将反对对妇女暴力问题提上议程会导致政策变化，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向女权运动提出了新的挑战，即通过建立组织和获取资源以形成执行与监督程序的长期化、日常惯例化，从而维持这种成功。

## 意识与价值观的改变

对女权运动的成功进行分析的最后一个领域是它对公共意识与价值观的变化的影响。在美国，妇女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Women Policy Studies) 1993 年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调查发现多数妇女认为女权运动扩大了她们的就业机会，使妇女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可能，并且增强了她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Wolfe and Tucker 1995: 457) 人们对待女权运动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肯定。1970 年，有 40% 的女性支持提高与改变妇女地位的尝试；1980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 64%；1990 年，77% 的女性支持这样的尝试。1989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9% 的女性认为女权运动使她们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82% 的女性还认为女权运动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美国，大约有 1/3 的女性认为她们自己是女权主义者，65% 的女性认为全国妇女组织“与每一个美国妇女有关”。此外，大约有 450 万美国人，包括许多年轻女性和黑人妇女，声称曾经为女权运动做过贡献。(Ferree and Hess 1994: 192, 199)

很少有迹象表明英国妇女的观念发生了变化。1992 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女性和男性对女权运动持肯定态度 (分别是 57% 和 56%)”。(Lovenduski and Randall 1993: 357)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女性和男性都支持机会平等——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是 92%。最近女性交流中心组织的 1 万名妇女参加的调查表明，参与者“反映了许多女权运动最初关注的问题”，绝大多数人认为妇女仍然二等公民，并寻求“所有人的机会平等”以及结束性别定型观念。(Guardian, July 1, 1996) 然而，罗文杜斯基 (Lovenduski) 警告，在主要的政策制定领域，



只有轻微的迹象表明性别态度在改变：

一方面，存在显示变化的证据，在女性参与政治方面有缓慢的进步，制定了一些性别平等政策……另一方面，“更广泛的”政策与组织的性别偏见似乎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人们只是偶尔才对公共政策的性别暗示非常敏感；组织中的文化变迁非常罕见。（Lovenduski 1996：16）

英国的文化女权主义还遭受了一些挫折，例如，女权主义者出版社潘多拉印刷厂的倒闭，与它相似的维拉戈出版社也在困境中挣扎，还有杂志《多余的肋骨》也从书报摊中消失，等等。虽然妇女研究计划已经扩展到大多数高校，但女性在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士中仍然只占极少数。（Griffin 1995，chapter 14）

在选举政治方面，美国的“性别差距”（gender gap）——男性选民与女性选民在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上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女权运动所引起的有关投票的性别意识。（Mueller 1988）。就像1980年最早被观察到的那样，当时男性中8%的人更有可能支持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性别差距在4%-7%之间。争取一个更加民主、更加进步的选举并非总是甚至通常并不是女权主义的议题，相反她们关注的是那些反映公共部门开支，对雇佣的干预以及其他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政策。（Erie and Rein 1988）然而，有时，支持堕胎和反歧视行动的候选人和党派会诱使女性选民在州与国会选举中投出关键一票（swing vote）。1996年1月俄勒冈州美国参议院补选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例子，当时与会者和性别差距有利于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女性选民投出了决定胜负的1%的优势票。（EMILY's List 1996：1）

与1992年相比，1996年的国家大选中，性别差距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男性选民与女性选民出现了空前的11%的差异，男性与未婚女性（49%-62%）和职业女性（35%-56%）出现了更大的差距。（Connelly

1996) 为数众多的黑人女性和年轻女性支持克林顿。1996年, 女权运动注意到了民主党派和共和党派为了吸引女性选民成为其重要的中间选民所做的努力。美国民主党成为性别差距最大的受益者; 正如前面提到的, 不管温和派和支持女权运动的共和党人如何努力调整其立场, 共和党仍然继续坚持反对选择权和反对反歧视运动的政策。

在英国, 性别差距的发展相当多变。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是妇女支持保守党, 有17%的差距。1987年这种差异缩小为不到1%, 1992年上升到6%, 1997年又再次下降为不到1%。然而, 诺里斯在20世纪90年代(Norris 1996) 创立了她称之为“性别代(gender-generation)”差异的理论。30岁以下的选民中, 支持工党的年轻女性有14%的差异; 支持保守党的30-64岁的女性有8%的差异; 非常不成比例的是, 支持保守党的65岁及65岁以上的女性有8%的差异。这一性别代差异在1997年急剧增长, 在支持工党的30岁以下的女性中差异为35%, 只有超过65岁的女性支持保守党。女性最强烈的政治反应反映了政党政治对她们缺乏吸引力, 并与她们的生活无关。福西特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 超过一半的女性(52%, 男性仅为35%) 不知道她们会最信任哪个政党; 许多人呼吁建立“一个不涉及一党倾压另一党的国会”, 尤其是年轻女性认为政治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和无用的活动(Fawcett Society 1996a)。作为对这些感受的回应, 1997年选举后, 资深工党妇女最初的承诺就是, 要改变那种被国际发展部长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 称之为下议院中“呀-呸”(yah-boo) 的男性文化。我们的资料表明, 尽管只有不到7%的女性声称自己对政治“感兴趣”, 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政治冷漠。妇女们忙于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 而不是参与议会的“男性俱乐部”。

### 在敌对政治环境中运动力量 与继续成功之间的关系

在20世纪80-90年代, 美国与英国的女权运动都面临着敌对的反女权主义的政权与对抗行动。但有迹象表明它们仍然幸存下来并有所发展。

女权运动并不是仅仅在逆境中坚持下来，而是取得了积极的发展：运动的扩展、目标的重新定义和增加、成员和服务对象的多样化、努力招募新一代政治活动家和公众代表。这些发展为女权主义政策的有效表述与采纳打下了基础。这种分析是以下面这一观念为前提的：集体运动动员与行动能够引起政策变化与态度的转变。因此，运动政治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对于确保运动的持续成功来说是必要的。

然而，随着女权主义成功把现有问题提上公共议程，妇女问题也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在逐渐增多，有些可归因于政府行为，而有些则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两个国家同样低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差异与社会差异，但仍能够突出重要的趋势。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关注贫困女工需求的跨阶级议程的紧迫性，而且还建立了新的网络，特别是在英国。然而在英国和美国，选民仍选举反女权主义者的候选人和政党——即使选民不一定把反女权主义问题作为其选举依据。尽管在两个国家中女权运动成员出现下降与上升的循环，但是仍有迹象表明敌对政权的存在能够促进女权运动招募新成员。在两个国家中，对家庭制度的挑战，特别是对堕胎与家庭暴力问题的挑战，引起了最多的反对，这可能是对在提上议程与改变政策上取得的成功的一种讽刺。在美国，反女权运动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更具有组织性、更尖锐，并通过与政府内外的右翼运动相联合得以巩固。相比之下，在英国，近期的在家庭价值观与堕胎问题上的激进主义已经是次要的，但是尽管如此，它也适合马歇尔（Marshall）对反向行动的分类，这种反向行动试图获得能见度，并在立法政治中获得立足点。

正如塔罗（Tarrow）所说，在保守的里根政权时期（及其以后），通过个人网络与次级协会，激进主义妇女利用保持联系的方式保存了女权运动的火种：

美国妇女最初是在公民权利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的影响下动员起来的，并结合了多种有利条件促进了——在其他



事物当中——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变革，这些有利条件包括丰富的各式各样的运动技能、有目的的散乱无章的政治、根植于社会与制度中的网络组织以及使女权运动成为美国社会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的选举优势。

美国女权运动的力量在于其广泛的、各种各样的、不断扩大的网络组织，囊括了从非正式的妇女团体到大学中的妇女研究计划，再到诸如全国妇女组织与全国妇女政治会议之类的专业组织。甚至女权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重大挫折以及接下来的挑战之后，它们的网络组织也没有被打破，更一般性的说，它们的在反歧视立法上的动员能力也没有下降。女权运动的草根阶层、自发参加者和庞大的志愿者分支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现在更可能以服务为取向，并且比一开始更依赖政府和慈善团体的基金。

美国女权运动是不断动员和参与的过程，而英国女权运动则是不断改革的过程。这里有两个明显的趋势：反中央集权的下降，导致专业化增强，更多的人进入政治体制中；地方上幸存下来的活跃的团体仍然具有多样性，仍然坚决保持女权主义者的自治权，但是现在也要对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作出回应。在英国，尽管不是在美国，国家服务供给的减少对某些女权主义团体增加它们提供的物质援助、建议和抚慰的资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但是随着国家福利的减少，这些资金也伴随着对这类服务需求的增加而日益增加。英美妇女共同为增加资金而奋斗，她们没有将其原则折衷，除了保留义不容辞的服务功能以外，还维持了关键的拥护作用。正如本文所论述的那样，在这两个国家，女权主义政治在地方与国家层面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女权运动在压力重重下生存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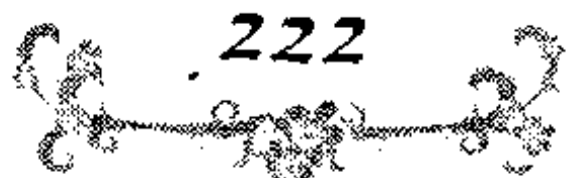
根据塔罗的说法，美国女权运动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奏效，但它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主要因素。通过性别差距进入到民主党的纲领，并迫使共和党也纷纷效仿，美国女权运动同政党体系建立了多变的、不稳定



的同盟。如果女权主义运动仅同一个政党保持亲密联系，就会限制它影响整个多党分立的政府体系的能力。英国女权主义者同两个主要政党中一个——工党组成了坚固的联盟，这个联盟使得她们游离于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外，因为从1979年到1997年都是保守党在执政。这使得将女权主义主张提上议程变得更为艰难，但如果实现了第一步，在单一的、紧密控制的立法过程中实现立法也就更有可能了。因此，运动效能的关键因素可能不在于同一个党结盟还是同多个党结盟。美国的政治结构允许多党在多个方面发挥影响，并能对此作出反应。在议会制政府就需要向国家议会中的多数派政党施加压力，保守党政府统治以外的时间，女权运动生存与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其从较友好的政权中获得政策要求的能力。在美国分立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表达要求要比有效实施这些要求容易一些。一方面，对于政策制定而言，与英国的一元体制比起来，联邦体制与权力分立体制使得监督和报告政策的执行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与英国相比，由复杂结构的所产生的困难也会被至少三个其他因素所抵消：体制内已经有更多的女性成员；行政与立法职位中有更多的政治任命，并允许体制内成员与体制外成员更多的轮换；以及开放的政府与信息共享的传统。

## 政策成功

对于在内容上可以暂时归为女权主义运动及属于女权主义运动种类的国会立法和议会立法，列出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单是可能的。（Bashvkin 1994: 682, 684; 1996: 535-36）两个国家的女权主义议程都已经扩大，并在公共计划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对妇女暴力问题是这一现象的主要例子。采用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的“家庭暴力”的说法来取代妻子被打的说法，有利于女权主义者以一种更广泛、更不具威胁的方式提出对妇女暴力问题（虽然在堕胎问题上，更具价值中立性的“选择权”的说法并没有起到同样作用）。这种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它借鉴了虐待



儿童问题的做法，即通过呈现一种普遍存在的超越阶级界限的社会问题来获得影响的做法。（Gelb and Palley 1996：228）把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努力同更大的犯罪控制问题联系起来，在美国被证实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从“家庭暴力”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转化拓宽了政策范围，甚至进一步讲，把诸如强奸和追踪等问题与预防措施（如住房提供、迁移计划、警察改革与司法程序改革）整合起来，实现了对普遍存在的暴力问题进行综合的政策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1990年家庭暴力问题作为主要立法内容首次被参议院的《针对妇女的暴力法案》（VAWA）所采纳，而家庭暴力问题“最初被视为是激进的包袱、政治上的困境”。（qtd. in Carroll 1995：14）4年后，许多妇女和儿童受益于包括这一立法在内的犯罪法案的成功实行。《针对妇女的暴力法案》似乎很快销声匿迹了，没有公众的关注，没有大量的争论：“《针对妇女的暴力法案》实际上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没有人关注它，也没有人反对它”。（Carroll 1995：14）毋庸置疑的是，与反对妇女授权一样，在妇女保护问题的获胜与关注受暴妇女的女权运动的最初目标并不相符。尽管如此，在保守党统治时期，将纯私人问题提到公共议程上来的女权运动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在美国和英国（反对追踪的措施得到了所有政党的支持，同样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执法官员、法律和秩序拥护者、从事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以及其他人士组成一个联盟，这一联盟承担起支持庇护所和努力改革司法和警察实践的重担。甚至那些最初持反对意见的右翼妇女团体，包括反对女权主义者的鹰论坛（Eagle Forum），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接受了妻子被虐待问题。

在堕胎与生育选择的例子中，敌对环境的影响仍然是限制选择权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美国，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也一样。在美国，联邦体制与最高法院的裁决能使国家立法机关以及国会未来很多年内继续保留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因为在美国堕胎政策与较为广泛的保守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运动相联系，与英国相比，政治

不满与恐惧对女权运动的威胁更大。(Brenner 1996: 44) 有些人认为, 美国的选择权运动过于片面地强调单一问题为基础的个人权利, 这不足以解决与意外怀孕有关的更大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一些认识到身体自主权的集中性与重要性的女权运动评论家, 寻求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断支持堕胎合法化的行动主义的基础上, 建立新的、更广阔的联盟。

公平与平等待遇问题仍然是美国和英国女权主义者参与国家活动的重要领域。正如在两个国家中新的经济平等问题已经获得支配地位一样, 美国自由主义女权运动最初的核心基础——平等权利——仍然是第一位的。在经济平等政策领域, 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联合与英国传统的阶级意识一起, 共同促进了以性别为基础的团体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团体的成员的持续外流与合作, 这两类团体都在寻求新的欧洲政策。然而, 在美国, 社会福利立法既与平衡工作和家庭需求相关, 又与抨击妇女贫困的原因相关, 但这种社会福利立法却逐渐衰落甚至越落越远, 这种现象值得讨论。虽然 1993 年通过的《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规定了多达 12 周的无薪休假, 但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带薪休假要求。与这一法案价值相当的、特别是国家层面上的立法被延迟了, 贫困妇女日益成为新一轮抨击福利制度的牺牲品。在英国也一样, 虽然在保障基本工作条件方面有所进步, 但自从第二波女权运动复苏以来就成为女权运动核心议程的问题——不平等、依赖、贫困、种族歧视、暴力以及女性对自身生命与身体缺乏掌控力——并没有消失。

最后, 还有一些文化与价值观变化证据上的疑问。虽然存在反对意见, 但还有许多分析家都认同女权主义价值观在美国传播的重要性。(Wolfe and Tucker 1995) 民意调查和性别差距现象为支持女权主义目标和价值观提供了证据。包括教堂在内的各类专业协会和其他主流机构中, 女权主义支持者“不引人注目的动员”是美国女权运动普遍深入发展的又一表现。在英国类似的发展包括女性专业组织的发展。在建立英国国教 (Church of England) 的中心, 妇女任命运动 (the Movement for the Ordination of Women) 已经达到其目标, 而且传统的母亲协会 (Mothers' U-

nion) 也已经开始参与女性问题。这些发展表明, 时机选择而不是结构因素可以解释英国与美国之间显著的差异。(Griffin 1995) 罗博萨姆(Rowbotham) 认为, 女权运动在英国已经普遍盛行, 这可以用 90% 的英国人表示期望机会均等来证明。但是期望与罗文杜斯基(Lovenduski) 的警告并存, 罗文杜斯基警告说政策制定过程已经显示出一种自发的性别意识。(Lovenduski 1996: 16) 随着更多的英国妇女进入领导职位, 下面这一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清楚: 文化基础与有组织的运动团体是否足够强大到能够承受完成女权主义目标的压力。

透过运动成功的方面, 我们已经确定了女权运动幸存下来的依据。肯定方面的依据包括持续不变的动员, 以及招募新一代女性进入各类地方和国家组织中。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妇女网络无论从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没有改变, 而且跨越了不同种族、民族、性别与阶级。英国权利与诉讼策略的发展对新的欧洲机遇作出了响应。在美国, 由于发现了只依赖一种路线的局限性, 妇女开始超越权利政治(rights politics), 转向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在两个国家, 议程的扩大和针对对妇女暴力的问题的凸显成为妇女继续参与并影响政策制定的缩影。虽然英国与美国在许多发展问题上都很相似, 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右翼势力与反女权主义政治力量上台后的第二个 10 年中, 两国女权运动不仅都幸存下来, 而且都继续维持了它们的原则, 发展了对话, 实现了组织与策略革新, 至少赢得了一些重要斗争, 并使自身面临着新的机遇。



## 8. 冷战到底是怎么获胜的：20 世纪 80 年代反核运动的影响

戴维·S. 迈耶

1989 年，主导国际关系 40 多年的冷战——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两级对峙——突然结束了。东欧“缓冲”国家的人们纷纷推翻了本国的共产主义政府，而苏联也没有进行武力干预。1989 年 11 月，东德和西德的人们推倒了柏林墙——最为明显的冷战产物的标志。仅仅 2 年后，苏联也分崩离析、瓦解成 15 个共和国。

实际上，核军备竞赛——超级大国竞赛的核心——在早些年就有所缓和。1987 年，美国和苏联签署一份武器控制协议，这份协议规定双方都要减少他们在欧洲部署的中程核导弹的数量——这在武器控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份协议要求双方都要实际减少各自部署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而不是对双方将来拥有的武器种类和数量的最高限制的规定。在前苏联拥有核武器的 4 个共和国中，除了俄罗斯以外都明确放弃了核武器的拥有权，同时美国也开始缩减它的核威慑力量。虽然在遵守这样一个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的多边协议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在将来的艰难谈判中解决，但是这种始终进展缓慢的多边协议的进程总算加快了。不过，在核军备竞赛的过程中或者更为概括地说是冷战的过程中就已体现出一些预示性的转折，但在 20 年前却没有任何一个决策者能预测到这些预示性的转折。

然而，大约在 10 年前，有相当多的这些决策的批评家们基于冷战中的两大集团开始瓦解的事实，提出了冷战将要结束的先见之明。（e.g., Forsberg 1984; Havel 1985; Kaldor 1983; Kaldor and Smith 1982; Mich-



nik 1982; Myrdal 1982; Thompson 1982; Thompson and Smith 1981) 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满怀激情、铿锵有力地争辩说，积极行动者通过动员人们反对新式核武器和反对更广意义上的冷战，迫使各国政府裁减军备并打破了冷战集团的体系。当时的政治领导者不但没有考虑这种先见之明，相反却鼓吹核威慑力量所带来的稳定，因而他们指责汤普森，指责 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方蔓延的和平运动和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运动过于天真（好一点说）或是对苏联极权的屈从（坏一点说）。

毫不奇怪的是，1989 年的戏剧性事件使一系列有关冷战的报告和著作需要重新分析和重写，因为大多数国际关系分析家不仅没有预测到冷战的结束，而且也没有发现导致冷战结束的机制 (Hopf 1993)。由于和平运动的积极行动者对自己打算做的事情只是略有所知，所以他们并没有轻易地宣称冷战结束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但可参见 Cortright 1991, 1993; Meyer 1990-91; Thompson 1990）与之相反，他们的政治对手却急于表明自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e.g., Fukuyama 1989; Gaddis 1989; Krauthammer 1989; Weinberger 1990) 他们把冷战结束的原因归结为很多因素，如像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这样伟大的人物的努力、长时段的经济盛衰周期、需求体制中控制存货的内在缺陷以及西方势力的强大等。

强大的和平运动和核裁军运动是在核裁军的实际进程之前，但这也不能证明冷战的结束就是这些运动的政治影响，因为因果关系和相互关系之间的联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众所周知的难题。虽然反对使用核武器的积极行动者比他们的对手更早更好地描述了冷战将会结束，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们的努力实际上就起到了效果，因为预见和政治现实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至少乍看起来，和平运动影响的论据似乎不太充分：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反核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衰落了，他们在西方国家的大选中支持的政党几乎总是失去选举（但在新西兰不是这样）。甚至冷战结束后的 10 年里，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们也很少宣称这种运动的影响。

然而，少数学者通过使用历史过程追溯法发现，和平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对东、西方国家重大的安全问题的争论和决议有一定影响，(see Evangelista 1995; Knopf 1993; Meyer and Marullo 1992; Risse-Kappen 1991 a, 1991 b) 但是更多关于社会运动对外交政策事务的影响的难题仍然存在。

在本章中，为了解决更为普遍的关于社会运动对政策影响的理论问题，我将采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和平运动及其对国家安全政策影响的例子。首先，我简要评述了有关政治结果的文献，目的是为了说明社会运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理论问题。然后，我概述了社会运动可能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决策产生影响的一般机制。紧接着，我做了三个简短的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平运动影响的案例研究：即三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核裁军运动——西德、美国、新西兰。这些案例既反映了这三个西方国家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安全问题，又反映了政治影响在这三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路线。新西兰和平运动联盟帮助它们支持的政党赢得了重要的国内选举；而西德和平运动联盟却使它们支持的政党失去了重要的国内选举；在美国，这种联盟只是对选举形成了威胁。最后，我回到社会运动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一般性问题上来，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一方面，我打算对社会运动和冷战的结果进行经验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些研究成果还需要详细阐述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理论解读。本文的经验性论据是：社会运动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冷战结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中一个例子中，和平运动通过直接改变政府政策取得了短期胜利。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和平运动通过改变政治联盟和政治文化或者通过使进攻性安全政策的主张在政治上站不住脚的方式来牵制国家政策。同时，这些运动还推动人们进行政策选择，而这些政策通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可以转化为公共政策。本文的理论论证强调的是：政治运动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国际约束条件，以及运动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 社会运动的影响和外交政策

尽管积极行动者的行为总是表现出他们的努力可能会起到作用，但是有关社会运动结果的学术文献——特别是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文献却较少肯定这一点。当然，政策过程分析家认为社会运动在安排公共议程和提出选择性政策方面能发挥一定的作用。（e.g., Baumgartner and Jones 1993; Kingdon 1984; Stone 1988）然而，引起社会运动发生的因素——麦克亚当把这些因素描述为“扩张性机会”（expanding opportunities）——同时也是政策改革的主要压力，而这些政策改革也许与积极行动者在社会运动中所做的努力无关。换句话说，引起政策变化的条件或许同时也能引起要求这些变化的社会运动的发生。就算在最为理想的情况下，想把社会运动的起因和影响区分开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要求分析家们必须能找出反事实的例子——就像没有社会运动发生时的情况一样。

进一步说，正像一项政策会受到不止一场社会运动的影响一样，一场社会运动也许能影响到不止一项政策。甚至政策改革发生的过程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因此，在重新考虑评价外交政策影响的特殊难题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三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依赖的影响的层面——公共政策、文化、社会运动参与者——还是有用的。

## 政 策

每一项有关社会运动对政策影响的研究在某个方面都源于威廉·盖姆森开拓的重要研究，（William Gamson 1975, 1990）盖姆森辨别了能使社会运动组织取得成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一是对合法的政治角色的认同（recognition），二是某个群体或其受益的支持者的新的优势。一般而言，这些方法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实质（新的利益）和过程（认同）。虽然



后来的学者各自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但都接受了盖姆森研究社会运动影响时所做的一般性区别。皮文和克洛沃德（Piven and Cloward 1971, 1979）追踪研究了穷人的抗议活动对国家社会保障开支的影响。巴顿（Button 1978）追踪研究了美国城市专门为社会动荡的拨款，这种拨款体现了国内动荡对联邦政府开支的影响。由于所有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抗议者影响政策的一般机制，所以，即使政府在抗议活动的高潮过后也会合理地采纳社会运动的主张，但这些研究仍然会把政府采用社会运动的主张作为社会运动影响的证据。需要补充说明的重要一点是：社会运动不仅能影响到政府的政策选择，而且还能影响其他公共机构的政策选择——诸如政党、利益集团、企业、教会、学校以及公众可以参与的其他集会场所。

## 文 化

社会运动为了争取一个宽容的文化环境而继续努力，正式的政治政策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只是一个参数。（Gusfield 1980）因此，民权运动不仅努力争取改变既定的规则和程序，以便使政治包容看起来对美国黑人更为可能，而且还努力争取改变人们对种族融合（racial integration）——种族融合在主流社会是广为流行的——的态度。民权运动通过努力在主导文化中争取到一些可以利用的文化符号，例如国旗和宪法以及来自美国黑人社区的其他特定的文化符号（例如，把教会精神带进民众的政治话语中来）。在大众文化中，民权运动是改变文化氛围的主要原因，例如，这使电视网络的主管人员认为在黄金时段重复播放黑人演员表演的戏是合适的。

文化制约着政策。对美国政府来说，在20年前对妇女和黑人的政治参与施加各种正式限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今天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一些学者认为，（Breines 1989；Gusfield 1980；Rochon 1997）虽然社会运动的文化影响常常被分析家们所忽略，但是与短期政策的成败比起

来，它往往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

## 参 与 者

社会运动对参与者也有影响。通过参与挑战性运动的社会生活，个体对世界的感知，会随着自己对世界运行方式，尤其是对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了解而改变。通过积极的参与，个体把自己创造为历史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客体。与流行的看法相反，作为主体的个体不可能被动地接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观点。麦克亚当（McAdam 1988, 1989）在对公民权利计划——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计划的参加者的研究中发现，这个计划的参加者比那些没有参与该计划的群体更愿意积极参加那些要求社会变革的运动。同样地，惠蒂尔（Whittier 1995）在对激进的女权运动的参加者的研究中指出，在持久的变化中，这些参加者不仅看清了自己的行为，而且还把自己呈现给外部世界，因此，即使没有发生公开的社会抗议活动，这些变化也能影响到参加者的行为。另外，个体还能在社会运动的斗争中塑造自己的世界观，从而使自己将来能在不同的环境中做出不同的决定。

因而，一般而言，社会运动不仅能影响政治格局，而且还能影响到可以供社会运动自身和其他抗议者利用的物质和文化资源。（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在挑战性政策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运动能改变新的抗议者所面临的政治机会机构和外部环境。按照这种思路，我们概括了社会运动的各种各样的潜在影响，并指出了社会运动在较长时期内的影响机制。这些机制要求使用更加灵活的方法来评价社会运动的结果，特别是涉及到政策变化的期限时。尽管那些没有成功带来政策变革的社会运动往往得不到认可，但这些社会运动却可能改变政策议程，从而影响到后来获得成功的社会运动。

在考虑外交政策，特别是战略核武器政策时，不仅抗议者面临一个很难施加影响的领域，而且学者们在整理这些政治运动的影响时也有很

大困难。(Meyer 1991) 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他们政府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对支撑政策决定的策略和执行这些政策的部门知之甚少。此外, 国内政治和抗议活动以外的因素, 尤其是其他国家的行动,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环境。然而, 在评价运动的影响时, 学者们仍然遵循着研究国内其他社会抗议运动的常用方法。斯莫尔 (Small 1988) 在采访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的决策制定者时, 明确问到反越战的社会抗议活动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决策。寇特莱特 (Cortright 1993) 在研究核冻结运动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时也进行了类似的案例分析。<sup>[1]</sup> 为了弄清楚社会运动在设定政治议程上的作用和查明社会运动在使一些决策比其他决策更引人注目或者更没有效用, 还有一些学者 (参见 Knopf 1993; Joseph 1993; Marullo 1994) 用其他的历史过程溯源法的研究成果补充了这种类似的采访和案例研究。虽然历史学家和回忆录的撰写者对社会运动有着不同的解释, 但他们通常都探讨了下面两个相同的问题: 国内动荡影响到外交决策的内容了吗? 抗议活动把新的行动者引入到决策制定过程中了吗?

为了弄明白公民运动是否影响到政策, 我们需要把和平运动的原因和影响区分开来。而我们只有了解了这种运动发生时的情况才能做到这一点。公民之所以很少关注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 一个显著的原因就是: 在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 国家安全问题很少能扰乱到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虽然和平活动家们总是设法把他们关注的军事政策、军费开支、核武器问题提上公共议程, 但他们只是偶尔才能做到。只有当政府政策和国际环境使国家安全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异常突出时, 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社会抗议运动才可能发生。

二战以来, 反核运动随着人们察觉到的战争威胁的紧急事件, 时而高涨时而衰落。有时是通过合作, 有时是对相同的国际因素的回应, 遍及西方联盟的反核运动通常是一起盛衰。二战结束后不久, 由科学家领导的禁止核武器运动挑战了依赖这种强大武器的道德, 但是, 由于冷战开始后人们对苏联的恐惧取代了对核武器的恐惧, 所以这场运动很快就衰落下去。随后不久, 西方反核抗议者重新动员起来要求结束核试验。



当美国、英国和苏联谈判并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时，这场运动就开始消退。虽然最近一次动员（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是它却是一次国际基础最为广泛和各国之间配合最好的运动。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和平动员在多数西方国家都衰落下来，而紧随其后的就是两极冷战的国际体系的解体。（Meyer 1993）

为了检验这些运动的影响，首先识别出影响国际政治的次国家的（subnational）运动的可能方式，是明智的。<sup>[2]</sup> 和平运动可能会通过三条不同的路线影响国际政策：在国内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政策，直接影响外国政府，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和平运动进行联盟来间接影响外国政府。

首先，抗议运动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影响国家政策：把精英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政治问题上来，把新人推向政府的权力职位上去，提出和支持某些政策选择；增加政策实施的难度和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改变自身的行为；和/或者改变联盟的条件从而改变政府的政策选择。社会运动也可能通过以下方式间接影响本国政府的政策：改变本国的政治话语和改变人们对政治上可行的解决办法的看法，有目的地改变特选主题在主导文化的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给公民提供能改变他们观念的新经验。（可参见 Gusfield 1980）

其次，和平运动可能会通过改变外国政府行为的方式来影响本国政府的政策，和平运动改变外国政府行为的方式与上一段概述的方式差不多。和平运动还可以起到传送各国政府想法的渠道作用，因为政府可以把和平活动家作为探试他国政治谈判的想法的非官方渠道。

最后，社会运动能通过改变领导人考虑的提案的内容来影响国际政治。提案可能来自基层而在跨国性会议和非正式接触中通过。<sup>[3]</sup> 伊凡吉利斯诺（Evangelista 1990）举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苏联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之间召开的国际会议，特别是帕格沃什会议（“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的别称），影响了苏联科学家对反弹道导弹（ABM）系统的看法，而后这些科学家又影响了苏联在随后的武器控制谈判中的姿态。和平活动家可能会把公众的注意引向其他国家的和平和反核运动，从而增强自



身的实力和减弱政府的能力。在接下来的例子中，我们将在不同的情况下研究所有这些层面的社会运动的影响。

##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的和平运动

在过去，反核运动的产生都是对核军备竞赛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的新威胁的回应。当运动参加者感觉到这种威胁下降时——这往往是由于武器控制协议或政策变化带来的，反核运动就开始衰落。和以前的和平运动一样，20 世纪 80 年代的和平运动也是在军备竞赛升级和威胁变得更加危险的情况下出现的。然而，最近的和平运动超越以前的和平运动的地方就是：最近的和平运动发展成相互配合的跨国运动，它们不仅跨越西欧和大西洋进行联盟，而且还与东欧同情性的运动相呼应。

致使 20 世纪 80 年代和平运动发生的因素是 1979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双轨”（“dual-track” decision）决议，这一决议表面上是对苏联部署的新式核导弹（车载多弹头 SS-20s 导弹）的回应。北约一方面在西欧部署美国的珀欣 II 型导弹和地面发射的装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另一方面还与苏联进行旨在减少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的武器控制谈判。1979 年 12 月，吉米·卡特总统宣布这一政策时，引起了那些打算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的立即回应。双轨决议不仅为西欧和平运动提供了动力，而且还成为这一运动的焦点。（Cooper 1996；Johnstone 1984；Kaldor and Smith 1982；Risse-Kappen 1988，1991 a；Rochon 1988）另外，双轨决议也给西方和平活动家们带来了重大的政治挑战：即反对北约组织的新式导弹，同时这些活动家还需要找出某种明确的方式去回应这些导弹是用来反击苏联的观点，或者去冒政治边缘化的风险。在处理这种与各自国情相应的均衡性问题时，本文所考察的社会运动展现了不同的方式。

1980 年 11 月，美国总统选举突出了上述相关的问题。罗纳德·里根——远离卡特的右翼主张——在大选中以压倒性胜利击败了他的前任，

使共和党在近 30 年来第一次控制了参议院，这就为里根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主动性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的支持。<sup>[4]</sup> 里根设法忽视那些已经由和平活动家向卡特总统表达过的不满，事实上，他也鄙弃了这种在武器控制上最为温和的做法，他任命那些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者在联邦政府部门和国防部的重要官僚机构里任职，而这些保守主义者曾经强有力地反对早先的武器控制协议。重要的是，里根政府中最大和最显著的派别完全怀疑武器控制的前景。因而，双轨决议迅速变成在欧洲部署新式核导弹的单一计划。另外，里根政府提出要在战略核导弹上掌握新的主动权，这些新式核武器包括从地面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装载在潜艇上的核导弹以及装载在新式战略轰炸机上的核弹和导弹。战略武器的增加与常规武器的增加共同使美国的军费预算达到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最后，由于里根政府发表一些有关核战争发生的可能和结果的草率言论，<sup>[5]</sup> 所以民众对它控制西方联盟的安全局势的能力和诚心失去了信心。跨越欧洲和美国的公民运动又鼓舞了公众的努力，在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同情性联盟。下面我将对这些运动中的三个运动及其结果进行简要地回顾。

## 西 德

二战后不久，德国沿着东西方的分界线分裂了，这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和核武器问题将始终是突出的公共问题。对德国人关注的欧洲势力不均衡问题，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激烈地表达过这种看法，而实际上北约组织的双轨决议起初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sup>[6]</sup> 在德国的导弹排斥了苏联，使美国参与进来。为了消除德国人的被排斥的感觉和分担新式导弹的政治负担，北约组织还计划在意大利、比利时、英国和荷兰部署新式导弹。这些国家接受这些武器的政府决议，反映了各自特有的政治现实，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的现实。

然而，由于施密特的前任——威利·勃兰特经常明确表达其和平运动

的立场，所以施密特在他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内外，都给他的左派留有相当大的反对空间。北约组织双轨决议的宣布激起了库珀所描述的“西德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活动家的院外联盟（extraparliamentary coalition）发起的持久的抗议活动，这种抗议活动通过被动支持和基层参与的方式深入扩展到主流民众之中”。（1996：135）

西德新发生的运动既是大规模的，也是多样化的。那些早期反对新式导弹的人最初都是当地的积极活动家，这些活动家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都是左派学生。20世纪70年代，这些活动家发起了一系列的公民创制权运动，这些运动大多集中在环境问题和核动力问题上，但是也有明确表达对女权主义关注的，还有对民主进程及其结果做出明确承诺的。除了针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抗议活动外，和平运动的参加者还参与当地的竞选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政党——绿党，这一政党最初只是当地政党的联盟。政党活动家、新式导弹的反对者和多数院外反对者都立足于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或基层民主的更为广阔视野之中。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者，和平活动家们还强烈谴责苏联部署的新式导弹——他们既明确抵制北约组织的武器现代化，同时又强有力地批评苏联的做法。通常情况下，示威者都要求消除在欧洲部署的所有核导弹。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努力描述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可选择性的主张，而不是退出北约组织。因此，基于“和平研究”这一主题，和平活动家还要努力发现和设计出能实现国家安全的可选择性模式和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常在社会民主党的资助下，小规模和平研究机构开始出现，它们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的运动出现时，和平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可选择性防御安排的方法，这些方法中的大多数通常都是建立在“非进攻性”防御或有时是非暴力防御的基础上的。他们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的运动来检验他们的看法。因而，20世纪80年代的和平运动就成为创造新制度的主要动力。除了成功地创造这些可选择性的制度以外，和平行动主义还在既有的制度内迅速发展，包括在天主教堂、路德教堂和社会民主党内迅速



发展。主流教堂都建立了新的能够协调基层和国家抗议活动的组织。

社会民主党内的活动家要求施密特总理至少要能确保双轨战略的两个方面都能得到强有力地贯彻执行，这意味着需要强调最近被忽略的武器控制方面。在此背景下，施密特提出了“零选择方案”（zero option）：如果苏联能拆除它部署的 SS-20 导弹，那么西方国家将放弃它的导弹部署——这一提案直接来自和平运动的标语。<sup>[7]</sup>然而，施密特执掌的联合政府是依靠作为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才形成多数派的联合政府。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也要求施密特改变他的政策，但却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改变。面临着联盟中越来越难以应付的紧张局势，施密特呼吁在 1983 年 3 月提前举行大选，而自由民主党放弃了与社会民主党合作 13 年的伙伴关系，与两大保守政党建立了成功的选举联盟。（Markovits 1983）虽然和平运动失去了大选，但却争取了社会民主党。由于摆脱了统治责任和联盟义务的束缚，和平活动家很快就对社会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社会民主党没有明确表达和平运动的立场，但它却强有力地批评了北约组织强行实施双轨决议的行动（社会民主党领袖施密特曾精心策划过北约组织的双轨决议），同时它还强烈谴责了北约组织计划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实现核武器进一步现代化的行动。双轨决议的副效应引起了欧洲的政治动乱，这就使已计划好的对第二代短程核导弹进行现代化部署在政治上站不住脚了，（Huygen 1986）同时这也迫使德国和美国政府至少在表面上要认真对待国际关系缓和与军备控制问题。在西德，赫尔穆特·科尔总理领导的以保守主义为中心的联盟也要求军备控制和反对后来的核武器现代化。

德国情况的特殊性也给西德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由于位于冷战的第一线，所以只有少数西德和平活动家把东德国家共产主义视为一种良性现象，并设法引起人们关注东德的人权活动家。和平活动家与人权活动家都经常与跨国组织——欧洲核裁军组织交往，宣扬和支持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所做的努力，并给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诸如鲁道夫·巴罗和沃尔夫·比尔曼恩）提供公共论坛。他们有意不理睬

官方的国家联盟和平委员会去帮助那些独立的、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家，这些活动家看到了和平和人权之间的必然联系。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西德绿党同东德独立的和平运动经常举行定期会议，甚至在大量文献中采用了东德“化剑为犁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的标志。(Tismaneanu 1989: 104) 这些会议增强了东德活动家的决心，给他们的活动赋予了合法性，树立了他们的信心。当德国统一时，绿党就同独立的公民论坛 (Civic Forum) 经过磋商建立了一个选举联盟，这一联盟包括许多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涌现的积极活动家，尽管这一联盟的两翼在民意测验中却显得很糟糕。(Ash 1991; Pond 1990) 另外，绿党和东德的民主活动家还受到保守主义总理科尔的轻视，科尔曾承诺较快实现德国统一和经济发展。

由于失去了 1983 年大选和冷战结束后的大选，尤其是国际环境给西德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条件，所以和平运动对德国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就不太引人注意了。然而，和平运动却在改变讨论国家安全的话语和改变长期的政治联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和平运动在政策上遭受了直接失败，但是它却在政治文化和话语上取得了胜利，这些政治文化和话语影响到后来的政治话语和公共政策。仅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两大党都极大地改变了它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姿态。1983 年离开政府后，社会民主党实现了从支持控制核武器的现代化向反对所有新式核武器和支持替代性防御的转变。

保守主义联盟——从 1983 年一直控制国家立法机关——也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变：从用右派观点批评老社会民主党、要求尽快实现核武器的现代化以及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向支持军备控制和缓和国际关系转变，成为了制约北约组织实施核武器现代化的力量。由于绿党在和平运动动员和大众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以它进入了国会和许多州政府（有时候它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这不仅使绿党能对传统的和平运动给予明显的关注，而且还为环保主义、女权主义、移民权利保护发出了制度上的声音。



## 美 国

尽管欧洲和平活动家主要针对本国和美国政府（毕竟，北约组织计划在欧洲部署美国的核导弹，而美国也愿意同苏联进行谈判），但是美国的活动家们最初却很少能成功地把和平运动的信息传达给公众。<sup>[8]</sup> 1977 年，一场由反核组织联盟策划的旨在迫使联合国召开第一次特别裁军会议的大游行仅仅吸引了 1.5 万人聚集到纽约。1980 年，里根当选总统又改变了和平运动行动发生的可能性。

在 1980 年相同的选举中，一个没有捆绑在大选中的公投问题在马萨诸塞州的三个参议院选区赢得了大多数选票，这个公投问题要求美国议定一项有关核武器的研制、生产和部署的双边冻结方案。核冻结观念已经在和平运动组织传播好几年了，但是直到 1980 年这种观念也只不过是和平活动家们关注的众多观念中的一个。在支持里根的选区进行的民意测验中，这项核冻结提案成功的通过了，因而这就表明：作为政治动员的一个目标，这项提案具有很大的活力。因此，这项核冻结提案很快就获得了许多和平活动者组织的认可，并成为里根第一任期内和平行动的焦点。和平行动者主张的双边性是吸引核冻结提案的关键因素。虽然双边主义允许活动家们可以不去评价人们对冷战和军备竞赛的谴责和允许活动家们不讨论特殊武器的问题，但是它仍然要求政府要改变其政策。然而，后来证明：双边主义只是政府用来拉拢和平运动实现自身目的的一个工具。

核冻结方案迅速而又轻松地在民意测验、镇民大会、国家和地方的公民投票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由于缺乏其他的显著的替代性方案，而政府又没有主动提出可行的方案，所以军备控制组织和国会中的支持者在 1982 年就聚集起来举行示威游行——不一定是赞同核冻结方案的目标而是对里根政府提出批评。在这一运动的高潮时期，它包含了极其广泛的政治活动，例如，公民抗议和直接行动（如罢工）、院外游说活动、竞



选捐款活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广泛的教育计划。1982年2月，100万人聚集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示威，要求实行核冻结方案，从而迫使联合国召开第二次特别裁军会议。在这一时期，公民对核武器的关注程度达到了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后人们对核武器的关注程度。核武器成为座谈会、学院和大学公民教育计划、期刊和杂志的特刊、音乐会、电影、电视专辑和情景喜剧节目的主题。1982年秋天，和平组织宣称它们相信民主党能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

1983年，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没有捆绑在大选中的核冻结决议，这项决议已经被充分讨论了一年多。翌年，民主党提名一位表面上支持核冻结提案的总统候选人（在7位有发展前途的民主党人中有6位认可核冻结决议）。更为重要的是，里根政府被迫对人们广泛关注的核武器冻结问题做出回应。里根没有让和平运动丑化了他和他推行的政策。同时，他和他领导的政府逐渐抛弃了那些有关核警告射击、可撤销的导弹、临时准备的防辐射微尘的庇护所和有限的核战争的不计后果的言论，这些言论曾是里根当局前几年的独特话语，同时也是推动反核运动的一大动力。相反，他们学会谨慎地使用那些灵活性的语言和可选择性的语言。

为了使核冻结方案失去政治空间，政府当局大搞宣传战。一方面，为了表明双边主义是不可能的，政府通过谴责苏联的化学战和违反条约的行为继续激起人们对苏联的恐惧。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国内压力和回应欧洲联盟的担心，政府重新开始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并提出了一些新条约，例如针对欧洲中程核力量的“双零方案”（从争议地区全部撤走双方核力量的方案）和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其中有一项提案要求苏联大大减少其军备，而作为交换，美国在其军备部署计划中适当减少其军备——政府当局认为苏联不可能接受这项提案。这项提案来自施密特对德国和平运动的回应，但它却在里根政府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因而，政府需要说服那些通常不信任军备控制的官员和那些企图通过部署新式武器来确保同欧洲的政治联系的官员。最后，当政府官员确信苏

联不可能接受这项提案时，政府决定提出“零选择”方案——这意味着政府要放弃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Risse-Kappen 1988；Talbot 1984）里根最后一项政治战略就是积极的战略防御，即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3月23日，里根摒弃了在核战争中取得主动权的演讲，相反他问美国人“挽救生命是不是比核报复”更好。（qtd. in Meyer 1990：221）总之，为了防止1984年的大选成为对里根核政策的全民公投，政府的办法就是既激起公民对苏联由来已久的恐惧，同时又淡化其言语和提出军备控制议案。里根声明他连任再选的主要任务就是军备控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对的。

里根在1984年参加竞选时和他在1981年就职时有着很大不同。1984年1月，里根宣布他打算恢复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同时他还为没有同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会谈做辩护，并承诺将在下一个任期里做得更好。他不再说能够赢得核战争的话语了。实际上，他经常重复说这句话：“核战争不可能赢，也决不会打起来”。（Bundy 1989：6）通过核冻结运动和星球大战计划，里根已经确信：这种能够相互摧毁对方的体系在道义上是不可容忍的。重要的是，当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时，这种相互毁灭的局势开始好转。

总统的良心并不是制约政策的唯一因素。国会中军备控制党团比以前更加强大和更为积极。众议院奋力争取抑制军费开支、停止反卫星武器的部署、抑制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以及停止部署第一次核打击武器。（如MX导弹）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也一致要求里根政府必须要更加积极地推行军备控制方案。（Fascell 1987；Magraw 1989）众议院议员不得不更加关注核武器和军备控制问题。核冻结组织在地方仍然很活跃，它们通过举行代表会议来说明它们选区选民的意愿。政治领导者也不可能再依靠选民对核问题的无知或漠不关心了。因此，他们必须得更加了解自己和更加积极地回应选民的要求。由于国会和大众都提高了对核问题的认识和积极性，所以里根在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上先发制人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里根连任后，核冻结思想就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但是核冻结思



想所批评的国际战略局势还没有消退。198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顶峰（这也是1984年预算的结果），随后就开始下降。当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受针对欧洲核武器的“双零方案”时（里根政府本来认为苏联不可能接受这一方案），里根只好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和磋商使后来的改革和裁军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反核运动显然失去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即结束核军备竞赛。然而，反核运动却引起了话语和文化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了的话语和文化后来又都转化为不同的政策。

## 新 西 兰

与西德和美国的情况不同——西德位于冷战的第一线，美国是西方核现代化的推动者，新西兰虽然也在西方联盟内部发挥作用，但却处于大多数安全争论的边缘。<sup>[9]</sup> 由于新西兰离核武器和大多数想象中的核对峙地点有数千英里远，所以这就给新西兰和平活动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与其他国家的和平活动者比起来，新西兰和平活动者能够更直接地影响他们政府的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访问新西兰的美国海军舰艇经常会受到新西兰和平活动者的冲浪板、皮船、小游艇和快艇的阻扰——他们试图阻止美国海军舰艇进入新西兰港口。（Clements 1988；Graham 1989）虽然这种策略并不是新西兰所独有的，但不同寻常的是，新西兰政府最终认可了抗议者的主张。

1984年，当其他地方的反核运动都衰落时，新西兰新当选的工党政府却宣布今后新西兰的水域将是无核区。和其他表面上的无核国家不同，新西兰不允许核动力舰船或用核武器武装的船只访问其海港。新西兰还禁止那些可能装载核武器的船只访问其港口——除非能确定这些船只并没有装载核武器，新西兰才会允许它们访问。这项新政策对长期存在的美国海军政策提出了直接挑战，美国的海军政策是既不确认也不否认它的舰船上是否装载核武器。新西兰这一政策也反映了和平运动在该国政治上取得了彻底胜利。



虽然新西兰和日本的国土大小差不多，但是它的人口却很稀少，地理位置比较孤立，所以它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并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新西兰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军备竞赛的消极后果，特别是核试验的辐射微尘，而且新西兰也很少能从核威慑中得到好处。从历史上来看，新西兰反核行动主要针对两个问题：一是由美国、苏联和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所带来的放射性尘降物，二是那些可能装载核武器的美国海军军舰到其港口访问。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反核运动一直在这些问题上对人们进行动员，有时候还得到政府的支持（当工党执政时）。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反核运动继续努力，它组织的大部分活动都侧重于反对港口访问上，因为港口访问是军备竞赛在新西兰体现得最为显著的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里根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加强海军建设的政策（包括装备新式的从军舰上发射的核武器），激起了更多的和平行动。新西兰和平运动还努力在海外寻找盟友，并资助国际和平活动家的巡回访问（包括活动家海伦·凯迪克特和理查德·福尔克）。除了公民教育和请愿运动外，和平活动者还举行了反对港口访问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这就在实际上拖延了美国海军军舰德克萨斯号 1983 年 8 月的访问。重要的是，新西兰位于冷战边缘的战略位置使和平活动家和政府在提出议案上有更大的自主权。与西德和美国的和平运动不同，新西兰和平运动没有受到双边主义的制约，因而新西兰和平活动者令人信服的争辩说，他们国家就算从参与核军备竞赛中撤出来，也不会对核军备竞赛的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为了反映这种现实情况，和平活动者开始关注无核区并从基层建设这种无核区，例如在家里、在教堂和小社区。到 1984 年年初，多于 65% 的新西兰人生活在自己宣称的无核区里。（Clements 1988：116）工党积极赞同无核区的概念，同时，随着反核运动的壮大，工党也越来越强调无核区问题。

反核运动只是困扰罗伯特·马尔登领导的国家党政府的诸多问题之一，但它却是能导致政府垮台的大问题。1984 年 6 月，一位工党部长向



国会提交了一项无核议案，得到两名国家党议员的支持，从而威胁到马尔登得以继续执政所需的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当政府否决这项议案后，马尔登立即号召举行大选。关于装备核武器的舰艇访问港口的问题成为这次竞选活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除了国家党以外，所有参选政党都支持某种形式的港口访问禁令。（Macmillan 1987；Pugh 1989）

与新西兰公众的看法不同，美国政府认为工党的无核承诺是竞选活动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把任何形式的对联盟的“背叛”都视为一种威胁。1984年6月25日，助理国务卿保罗·沃尔夫威茨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中强调，访问新西兰港口的问题对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国国会议员提议：国际贸易制裁可能是对新西兰港口访问禁令的最合适不过的回应。（Landais-Stamp and Rogers 1989：61-63）把刚开始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港口访问问题突显出来，美国这种试图影响新西兰大选的愚笨做法损害的仅仅是国家党。明显的是，反核政党赢得了62%选票。

工党顺利地赢得了大选，它执政后就开始关注经济问题，并采取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总理戴维·兰格（David Lange）起初试图调整工党在核舰艇上的政策，但是工党领导层却迫使他继续履行其在竞选中的承诺。即将来临的是，国内政治压力比美国的压力要大得多。

1985年10月，兰格同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磋商在1986年3月举行一场联合海军演习——兰格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求一种可以使美国舰船访问其港口而又不会激起反核运动的方法。在兰格的敦促下，美国请求新西兰允许一艘护卫舰（美国海军军舰布坎南号）进行港口访问，这艘护卫舰曾在1979年访问过新西兰，当时仅仅激起了较小的抗议活动。然而，在港口访问对外宣布的前几天，一个和平组织——反核军舰联盟预料到美国的访问请求，并公布了一份有关所有美国核动力舰船和具有核能力船舶的名单。兰格要求美国宣称布坎南号护卫舰将不会装载核武器或者选择另一艘舰艇，但被美国拒绝了。（Clements 1988：132；Jackson and Lamare 1988：174）

虽然兰格提出布坎南号护卫舰将可能不会装载核武器，但他仍然未能让他的内阁准许这次港口访问。自从工党当选后，新西兰和平运动在整体上变得更好组织和更加密切关注港口访问问题和无核区理念。此外，如果工党不支持港口访问禁令，和平运动还有能力惩罚它。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谴责反而增强了新西兰公众对港口禁令的支持和对工党的支持。（Landais Stamp and Rogers 1989：73-75）最后，美国取消了联合军事演习；虽然新西兰明确表示将继续支持太平洋防卫联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的联盟），但是美国则宣称，一个没有军事演习和港口访问的联盟实际上就不是联盟。虽然美国通过减小同新西兰合作的范围和情报沟通的数量对新西兰进行制裁，但它却从未实行贸易制裁——很明显美国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贸易制裁。港口访问禁令不仅使新西兰在经济上没有付出多大代价，而且它还体现了新西兰国家的独立自主，从而提高了公众对禁令和兰格的政治支持。新西兰公众对港口访问禁令的支持率从 1982 的 50% 左右上升到 1985 年 3 月的 76%。（Macmillan 1987：34）

起初，兰格对港口访问禁令并没有太大热情。后来，他就越来越热衷于新西兰无核化的主张，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态度给自己在新西兰和国际上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参见 Lange 1985）1985 年 3 月，在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同保守的美国宗教领袖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的辩论中，兰格提出了核武器“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主张。在每一次演讲之前和之后，兰格都赢得了听众长时间的起立欢呼，因为他强调了国家具有不受核武器保护的权力。他说到，“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新西兰人并不能自行决定如何捍卫新西兰，而是不得不采取那些其他国家用来捍卫自己的方法……迫使盟友违背其意愿接受核武器的行为在道义上就是不允许自决权存在的极权主义。”（qtd. in Landais-Stamp and Rogers 1989：85-86）无核政策使新西兰树立了鲜明的国际形象，并使其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上——但却不是边缘化的位置。这一政策在牛津大学和其他地方得到积极的响应说明：与非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建立



更加强大的政治和文化联系是可能的。新西兰提高了自己在西方联盟内（至少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知名度和威望。

美国不仅对新西兰无核政策作出苛刻的言语回应，而且还在防御事务以外对其进行小规模制裁，这就使新西兰人将核问题视为民族自决的问题——即是一个维护国家荣誉感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战略风险问题。与西德和美国的例子不同，在新西兰，政策变化成为文化变化的根源。1985年7月，两名法国政府的工作人员炸毁了停泊在新西兰港口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船只，致使船上的一名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死亡。这一事件不仅增强了新西兰人需要维护国家独立的感觉，而且在政治上巩固了支持港口禁令的联盟。1985年9月，工党通过了加强港口禁令的立法，这就使太平洋防卫联盟实际上解散了。1987年，工党扩大了它的选举，并继续掌握着多数选票，所以核问题在竞选活动中只是一个小的问题。1992年，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宣布：通常情况下，它将不会在水面舰艇上装备核武器。在新西兰，政治家们开始讨论在无核条款下重建太平洋防卫组织的前景问题——他们几乎在10年前就已提出这一问题。

## 结 论

本文描述的三个案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评价抗议活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有一定困难，二是社会运动影响政策的方式是多样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至少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国家并不是只受国内或国际因素影响的社会生态单元。相反，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是相互影响的。（see Knopf 1993）一个国家的社会运动可能是对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和政府行动的反应，同时一个国家的社会运动往往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和政府行动。例如，美国总统大选就成为遍布整个西方联盟的和平运动发生的诱因。西德和平运动既谴责本国政府，也谴责美国政府，其运动动员使美国提出了军备控制的倡议。新西兰工党知道，开拓一项独立



的安全政策不仅能带来国内的选举安全，而且还能提高其在海外的声望和知名度。社会运动和各国政府之间的跨国联系既被视为社会抗议运动的机会，又被视为社会抗议运动的结果。和平活动家甚至在面临着政策失败时还提出改变政治文化和话语的跨国性策略和主张。此外，由一个社会运动取得的胜利也可能成为在不同国家活动的和平活动者所宣称取得的胜利。

这三个案例还说明了社会运动具有不同的政治影响路线。在这些路线中，社会运动的主张和最终结果不仅取决于和平活动家的策略、主张和国内政治结构，而且还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与新西兰相比，美国和西德的活动家和政府更易受到苏联活动家和冷战前线的直接挑战。因而，这就使政策改革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在新西兰，政策改革和文化变迁是同步的，甚至先于文化变迁。在美国和西德，在政治文化和话语上取得胜利比政策改革容易得多。

新西兰和平运动的例子起初是最简单的。对新西兰政府来说，国家安全问题通常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新西兰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全球冲突的中心地区。然而，在野的工党为了寻求选民的支持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并利用它作为抨击执政的国家党的手段。新西兰和平运动获得了工党的支持，当工党赢得大选后，就开始实施它在竞选中承诺的政策——曾是国家党明确忽视的政策。这一运动很快就在政策上取得了胜利，而政策上的胜利又带来了文化和话语上的胜利。同时，这一运动在宣传无核区观念上的影响还超出了新西兰的国界，因为其他西方国家的和平活动者也采用了这种观念，并把它作为一种发起反核运动的策略。

在西德的例子中，和平运动的确加速了一个对和平活动者不太友好的政府的垮台，但起初却是使一个更不友好、更缺少回应的政府上台。然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之间13年的联盟关系的破裂，使社会民主党在探索和宣传非传统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拥有了相当大的灵活性。社会民主党的言语和对和平研究的财力支持，使新的安全观念在西德、

东德和西欧其他国家得到广泛传播。施密特政府在回应和平运动时提出的“零选择方案”最终影响到美国。虽然西德和平运动在最初的政策斗争上失败了，但是却在政治文化变迁上取得了大胜利。特别重要的是，西德和平活动者和东德人权活动家之间的跨国交往大大提高了东德持不同政见者的知名度，从而给东德改革者提供了重大支持。

同时，作为对和平运动的回应，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总理科尔和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联盟从1983年大选后就一直执政（首先是在西德，然后是在统一后的德国），但是政府部长们却从一开始就努力防止核武器问题再度成为选举问题。科尔政府比它取代的施密特政府更有能力使美国和北约组织在军备控制上做出更大的努力。虽然和平运动在选举斗争中失败了，但它却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尽管北约在很短的时间内部署了中程导弹，但是根据1987年的《中程核力量条约》，所有这些武器装备不久都被拆除了。随后，核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也站不住脚了。因此，虽然和平运动在政策问题上失败了，但是它却影响到后来的政策辩论。

德国的例子还为社会运动的“附带效应”（spillover effects）提供了证据。（Meyer and Whittier 1994）毫无疑问，和平问题为绿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重要的政治角色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1983年，绿党获得了超过5%的选票——突破了选举门槛的限制，第一次进入国会，此后它利用政府资源解决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尤其是环境保护和移民权利保护问题。在州一级，绿党经常赢得选举，甚至有时候还同社会民主党共同执政。

在美国，虽然“附带效应”的证据不太明显，但是政策变化和话语变化却很明显。尽管核冻结运动没能实现主要的目标，在任的里根总统在民意测验中仍然拥有超过70%的支持率，但是全国范围内的核冻结运动却从整体上改变了有关核武器的政策和话语。总统及其顾问们改变了谈论核武器的方式，而话语的变化又对安全观念产生了影响。为了寻求公众支持，里根政府提出一些军备控制的倡议，它原本希望苏联将会拒

绝这些倡议。但当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这些提议中的一条——即双零方案时，里根政府就从根本上陷入了自己用花言巧语布下的圈套中；尽管里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它却找不到能够驳回自己提案的方式。

美国和西欧的国内动荡也影响到西方的政策。1984年后，美国和北约组织内的动荡进一步限制了其军备的增加，使其领导人对苏联采取了更加缓和的态度，同时也促使它们重新建立军备控制制度。当然，珀欣II和巡航导弹在欧洲的部署反映出欧洲和平运动并不是非常成功；美国核冻结运动及其要求的对美国政策的重构也没有真正实现。然而，虽然和平运动没能实现这些主要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这说明社会运动对政策施加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到短期的边际影响和长期的政治文化变迁。

## 注 释

[1] 在这两个例子中，通常可以理解的是，政策制定者都不情愿地把对他们在重大政策事项上的决定有影响的因素归结为制度之外的抗议活动（Meyer 1991）。

[2] 有关社会运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的学术文献还很少，但一个系统性的概述可以参见里瑟·凯鹏。（Risse-Kappen 1991a）

[3] 例如，约翰·肯尼迪叫反核活动家和编辑诺曼·卡森（Norman Cousins）解释美国在禁止核试验协定上的立场。后来证明，卡森早在1963年的穿梭外交活动对稍后几年的美国和苏联领导人聚在一起谈判一项条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 我已在其他书中对这些政治变化和政策变化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例如，Meyer 1990： chapters 2-4；1993，1995）

[5] 舍尔（Scheer 1982）提供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有关核武器的虚假说法的汇编。

[6] 有很多研究双轨决议和德国政治的著作。这一部分借鉴了约翰斯通（Johnstone 1984）、库珀（Cooper 1996）、里瑟-凯鹏（Risse-Kap-



pen1988)、庞德 (Pond1990) 和罗尚 (Rochon1988) 的研究成果。

[7] 重要的是，零选择方案并不是一种国家安全战略，而是一种缓和由和平运动带来的国内压力的手段。施密特还试图迫使美国提出一些看起来是切实可行的武器控制提案，具体可参见塔尔伯特。(Talbott1984: 56ff.)

[8] 这一部分借鉴了许多研究美国和平抗议活动的成果，尤其是研究反核运动的成果，包括 Kleidman (1993), Lofland (1993), McCrea and Markle (1989), Meyer (1990), Rochon and Meyer (1997), Solo (1988), and Waller (1987)。

[9] 在迈耶 (1994) 主编的书中，我已经更为广泛地探讨了新西兰的例子。

## 9. 西方社会环境运动的影响 [1]

迪特尔·鲁赫特

就像 19 世纪后半期及以后的工人运动提出了“社会问题”一样，在 20 世纪最后 30 多年里（可能到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型运动把“环境问题”提上日程。回顾过去，工人运动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s）的影响却不太明显。虽然有很多论述环境运动的文章，但却很少有对其影响进行全面研究的。<sup>[2]</sup> 那么，我们需要考虑哪些相关的因素呢？环境运动的影响在西方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吗？如果有的话，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呢？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提供一些尝试性解答（tentative answers）的关键问题。

“尝试性解答”并不是笔者谦虚的说法，而是显示了这项研究的难度和局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困难源于下面这一问题的性质——即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进行界定和评价的问题。<sup>[3]</sup> 此外，这种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也可能取决于很多间接因素。另一个困难可能是由于本文探讨的这一特殊问题不仅范围很广而且过于复杂。环境运动是由很多团体和组织动员的，因而它涉及到很多种问题。难怪当前几篇少有的对环境运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文章都限于案例研究，因为案例研究更容易概括那些发挥作用的因素。

因此，本文只是做了一些初步性的探索。与笔者相比，那些在政策结果研究上更有经验的学者或那些对特殊问题或特殊国家更为了解的学者也许能对这种初步性的探讨加以改进和详尽阐述。

## 环境运动的悖论

与其他一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运动相比，环境运动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环境运动”是一种非政府团体和组织的网络，这一网络通过政治和社会干涉（包括集体抗议）的方式来阻止滥用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在战略性干预的尝试中，环境运动不同于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非政治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ism）行动，后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都很盛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团体主要关注的是地方性问题和部门性问题，它们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考虑；而环境保护主义者则倾向于使“拯救地球”的问题更引人注目和更具有连贯性。根据“行动在地方，胸怀全世界”的口号，即使在地方一级进行动员，环境保护行动者也会把他们的动员视为世界性运动的组成部分。（Rucht 1993）

迄今为止，环境运动都有什么影响呢？撇开地域性和主题性变量，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环境运动简史可以解读为一段了不起的成功史。当我们考虑到下列因素时，这种成功就变得更为明显：环境运动的发展和壮大，环境运动对议程安排的作用，环境运动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环境运动对建立新的政治实体和新的工业部门的贡献。然而，另一方面，环境运动一直都没有成功地阻止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关于成功和失败的悖论需要更为详细的说明。

### 成功的情况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环境运动的行动者、追随者和同情者的人数猛增，而且其财力资源和组织基础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不仅原有的环保组织得以重生，而且还有相当多的新的环境运动组织纷纷成立。除了单纯的增长以外，其他一些趋势也能用来说明

环境运动的成功形象。首先，环境运动已经复杂化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大体上覆盖了可以察觉到的环境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核电的生产、有毒的废物、热带雨林的破坏以及人为的气候变化等。专业化是与精密知识的获得同步的，而这些精密知识是与工业和国家行政对专家的要求相适应的。其次，与第一个趋势相关的是，环境运动朝着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趋势发展。例如，环境运动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组织、创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和院所以及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同时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为共同的环保事业服务的专业人士。再者，环境运动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网络，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紧密的跨国合作，国际性联盟和网络的形成，协调一致的跨国组织的建立。（Princen and Finger 1994；Wapner 1996）在后者之中，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无论这是真是假，它们的确都算得上最近一段历史时期内成长最快的组织。

比环境运动的成长、制度化、国际化更引人注目的，也许就是它在议程安排上的成功。总的来说，环境问题尽管在具体问题上波折起伏，（Downs 1972）但却是最近10年里争论的最激烈和最持久的政治问题。此外，环保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相关的社会团体或重要的政党敢于无视环境保护的目标。一些工业部门和企业即使在具体问题上已成为环保团体反对的对象，但是它们却还要在言语上拥护环境保护主义，并努力树立“绿色和清洁”的形象。

环境保护主义在公共讨论中的显著地位在个人态度层面也得到了回应。同主流的公共舆论相比，即使这一层面对环保事业的支持也许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一层面总的来说对环保事业和环境运动是高度尊重和同情的。因而，有的观察者把这种个人态度层面上对环保的惊人的支持称为“公共舆论的奇迹”。（Dunlap and Scarce 1991：651）

公共行政和国家政策也体现了对环境保护的支持。人们的行为受到很多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法规的约束。最近，一些国家甚至试图宣布在宪法中设立环境保护的内容。此外，为了完成环境保护的任务，国家还创

设了下列机构和项目：政府环保部门、环保机构、咨询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和环境教育项目等等。

最后，在环境保护上，除了以社会和国家为中心的保护外，日益壮大的环保产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环保产业同加强人们对环境的关注有着经济利益上的联系，所以它是作为环境运动的支持者出现的。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趋势都是由环境运动带来的，但是环境运动的确有助于打破人们在环保上的无知和被动，从而成为推动环境保护的催化剂。

## 失败的情况

环境运动的成功史与这一运动带来的实际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毕竟，环境运动的成长、公众的支持和制度上的影响都只是达到环境运动的核心目标的手段，这一核心目标就是遏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最终改善环境状况。尽管我们承认统计报告在测量上存在问题、差距和瑕疵，但是我们仍不妨说环境运动并没有实现其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环境运动的动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根据各种资料显示：在过去几十年里，环境状况一直在恶化。（Porter and Brown 1991；Worldwatch Institute 1992；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 der Bundesregierung 1996）<sup>[4]</sup> 下面我们仅仅考虑几个明显的指标：

\* 自然资源继续被滥采，可能比以前历史上任何时候滥采的规模都大。

\* 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的数量继续减少。

\* 由于人口的增长、密集型农业的发展、城市化、采伐、道路建设以及其他因素，那些人类还没有插足的土地或没有遭到破坏的土地继续缩减。

\* 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不断增加，因而，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能引起疾病、疼痛、甚至死亡的有害物质的威胁。

## 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

根据手段来说，环境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而根据目标来说，环境运动又明显是失败的。虽然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还是需要用各种方法把它们区别开来。最明显的是，随着问题和地区的不同，成功与失败也是不同的。如果把环境状况作为衡量环境运动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地指出由环境运动带来的各方面的改善和取得的部分成果或效益，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太清楚环境运动对这些改善和效益的实际贡献有多大，尤其是在衡量经济上最发达的一些国家时，有人可能会强调下面这些方面：在许多湖泊和河流中水污染的减少，空气中一些有害物质（例如碳）的减少，自然保护区的扩大，以前耕种的土地的“复活”和能源消耗的减少。因而，有人认为这些改善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功于环保组织的动员。（Jnicke and Weidner 1995）有人还找到一些有关环保团体成功地阻止某些特殊项目和方案的实施的个案，这些项目和方案被认为能给环境造成有害的影响，例如，兴建核电站、新机场、公路和水坝。这些成功的案例中有一些已经被记录下来。（例如，Caldwell, Hayes, and MacWhirter 1976; Jnicke and Weidner 1995）核能问题也许是跨国比较研究中最受重视的问题。（Rüdig 1990; Midttun and Rucht 1994; Rucht 1995）一些环境斗争甚至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在法国环保主义者往往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Rucht 1994）此外，一些跨国的甚至全球层面的环保目标已经得到公认。例如，油轮基本上已经不准用海水冲洗船舱后再把这些海水排入海中。此外，瓜分南极洲并在经济上开采利用其资源的计划已经被搁置起来。

但总体而言，这些成功的例子还是过少和过于分散以致无法弥补那些消极的趋势。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环境运动在环境斗争中通常只能取得部分成功（除了个别几个取得完全成功或可能是完全失败的例子外），但还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成功往往可能是不重要的，甚至有时候完

全是象征性的。很多环保行动者也持有这种怀疑性的评价，他们往往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一位德国研究者通过深入的采访当地的环保行者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能坚持环保行动，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有效的，而是因为消极被动会令他们感到愧疚。（Christmann 1996）他们通常表达这样的想法：在将来，当我们的孩子问到环境状况为何如此糟糕的问题时，我们至少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防止环境的破坏。

最后的这一方面使评价环境运动影响的问题更加复杂化：环境运动的成功是否只能通过当前的环境状况来衡量？即使这种状况是糟糕的，难道这就表明仅是环境运动的失败吗？或者，它难道就能反映包括政府——政府对环境的命运承担正式责任——在内的其他力量也失败了吗？

在这里，我不想对谁将为环保负责的问题进行规范性的讨论，相反，我想对环境运动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更为完善的论述。首先，和许多其他的冲突不一样，环境问题往往是一个长期的发展问题。我们当前看到的环境恶化状况通常是由过去做出的一系列决议和非正式决议造成的。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他的《沉寂的春天》一书中就已表达过这种观点，《沉寂的春天》可能是推动环境运动产生的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同时，环境结果出现的长期性也意味着：当前我们已经采用的环保措施的成效只有在将来才能看得到。其次，稳定甚至恶化的环境状况可能都“隐藏”着环境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因为：如果没有环境运动的行动者，这些环境状况可能会一直恶化下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要考虑到那些恰当的环保措施也可能被人口增加或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掩盖和遮蔽。只要环境状况在恶化，我们就难以说环境运动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是说环境运动没有任何影响或者只有消极影响。

这种较少的隐含着环境运动可能具有积极影响的评论，并不应该掩盖那些基本上对环境运动的成功持怀疑态度的评价，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需要对环境运动的影响进行更加精确的评价。要获得一种对这

种影响的评价和解释（仍然很困难）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挑战。

## 评价西方国家的环境状况

如果我们把环境状况作为衡量环境运动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那么从实证角度对因变量进行测量就变得至关重要。对此，我们需要考虑各种制约因素。

首先，就全球环境的整体状况而言，想要对所有在环保中发挥作用的行动者的影响进行探索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宣称他对全球各地的所有环境运动的行动和影响都了如指掌，更不用说对参与环境政策的其他行动者的了解了。对国家边界内的环境运动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也许是比较切实可行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分析还需要限于那些完全是由或主要是由各自国家的行动者分别引起和造成的环境问题上。单独一个国家无法控制的环境问题——例如南极洲的臭氧层问题和海洋污染问题——不能归因于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因而也要排除在我们的分析之外。

其次，我们不能依赖于静态测量。环境质量是过去不断的发展、无数的决议和非决议（nondecisions）积累而成的结果，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密度、经济结构和工业化程度等因素。如果我们仅仅测量特定时期的环境状况，那么这一测量结果将不能充分反映最近几年或最近几十年来环境保护的努力和效果。因而，我们必须辨别出不同时期环境质量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显示着环境保护的成败与否。对衡量环境保护的成败有用的指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有毒物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受到保护的陆地（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公园）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减少能源消耗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的变化。

搜集有关这种测量方法的比较数据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拥有一些国家的详细数据。然而，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1985-95）已经开始收集环境状况的标准化资料。部分是基于这些统计数据，一个由马丁·詹尼克（Martin Jnicke）领导的德国研究小组已对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的环境性能的数据进行了整理。（Jnicke 1992, 1996; Jnicke and Weidner 1995）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中的国家在 1970 年到 1985 年间设法（或未能）改善国内环境质量的程度，并结合各种指标，这个小组最后选择 22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总体上的测量数据，这些国家按照从好到差的顺序排列如下：日本、荷兰、卢森堡、瑞典、瑞士、奥地利、丹麦、挪威、美国、西德、芬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南斯拉夫、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Jnicke 1992）

我们应该谨慎地解释这份名单，决不能根据绝对的环境质量标准把它解读为一份环境状况好坏的排名，否则就会得出日本环境状况最好而土耳其环境状况最坏的结论。在给这份名单上列举的国家的运动的影响下明确结论时，我们也应该小心，因为私人 and 政府所采取措施的数量和影响不一定是环境运动的压力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像在其他的政策领域一样，环保行动也可能“从上面”发起。这些都是我们对环保动员和实际结果之间的直接联系所持的保留看法，许多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因素进行解释的研究成果也支持了我们的这种保留看法。鉴于此，我们需要探讨如何创造一个解释性模型的问题。

### 对环境运动的影响的一种解释

在这一节，我打算创造和应用一种解释环境运动影响的模型。对将要提供的可靠的解释模型来说，现有资料都过于分散和空泛。因此，作为一种谨慎的尝试，这种解释方法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探索有根据的假说（informed hypotheses）的手段，我将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介绍和讨论这种假说。

## 一种解释性模型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假定，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运动的动员很少能直接转化为政策结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运动通常无法接近决策过程，因而必须利用一些间接的影响渠道。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可能会被掌权者或其他社会力量采取的对策所瓦解。至于环境政治，我已经论述了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期望环境运动动员和环境状况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分析相关的因素上。对这些因素的分析 and 界定可以清楚地显现环境政治的过程，否则就难于理解环境政治。这些相关因素可能会或者不能使环境运动的动员转化成国家活动，而国家活动对环境状况的根本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我们集中探讨一下影响环境政策的因素。我认为有三个关键的因素可以制约环境运动动员的影响：公开声明中所表达的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绿党或相似的政党（即具有环保倾向的政党）。很显然，环境运动试图影响这些因素，因为它们自己既没有掌权，往往又无法直接接近掌权者。因而，环境运动通常只能通过这些间接联系才能影响到国家政策。

### 公众舆论

政府决策者不能忽视公众舆论并不是环境政治领域的特有现象。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政策领域的大量例子表明：在自由民主国家，决策者不仅倾向于对公众舆论做出回应，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直接依赖于公众舆论。公众舆论通常由许多往往是相互对立的代言人所代表，但在某种程度上，公众舆论却可以转化为协调一致的决定性的声音。（Neidhardt 1994）很明显，这可以从政治丑闻的事件中看出来——在这种事件中，公众极大的愤怒和愤慨就体现了公众舆论。这种反应可能会导致程序变

化的结果和 / 或人事变动的结果，例如：快速的立法改革、强有力的政府措施、官员的替换，甚至政府的垮台。由于相对一致的公众舆论具有潜在的强大影响，所以决策者往往会密切关注公众舆论（例如，通过阅读每日社论），而反过来，他们也设法通过自己的公关手段影响公众舆论。

## 个人态度和行为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说，个体态度和行为因素应该从公众舆论中分离出来，因为这两个因素并不是一回事。<sup>[5]</sup> 在民主国家，个体态度对决策者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国家的很多活动都取决于公民的认可甚至公民的合作。当政府想要说服人们在政策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时，例如当政府想要说服人们参与自愿的健康检查、减少能源消耗以及把废物分类以便回收利用时，这就更为明显。总之，政府和政党都必须考虑公众舆论，因为能否在大选中获胜取决于选民的同意。难怪政客们需要通过调查、咨询、拜访选民等方式不断地了解个人的意见。特别是当棘手的问题出现并需要做出决议时，政客们都渴望了解当时公众的情绪和可能的反应。下面这两个现象进一步反映了政客们需要关注人们态度的事实：首先，为了了解人们对一个问题、一个政治人物或一个设想的措施到底是怎么想的而开展的特别调查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其次，当具体政策将要实施时，政客们都要通过信息宣传活动来设法获得公众的认可。例如，为了获得人们对核能计划的认可，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公共行政部门就发起了巨大的宣传运动——尽管它最终没能取得成功。（Nowotny 1979；Flam 1994）

## 绿 党

无论我们是把绿党视为环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把它视为从

环境运动中分离出来的派生物，都是有争议的。在某种程度上，绿党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现有政党的结构，并把主要努力放在选举和议会政治上，因而，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如果这种看法看起来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就得承认绿党（作为我们模型中的三个相关因素之一）存在的现实意义。当我们考虑那些有洞察力的政党和政治决策者是如何对待选举中的直接竞争的问题时，那些有助于实现环境运动要求的绿党的影响就变得非常明显。只要一个政治问题被证明是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而且足以成为一个特殊的政党关注的焦点并影响到这个政党在选举中成败时，那么其他的大多数政党就会觉得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或至少得对这个问题说一些好听的空话。一旦这个特殊的具有挑战性的政党设法在议会中赢得一定席位或在政府中取得一定职位时，那么与这个政党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和关注的问题很可能就会直接传送到决策过程中来——甚至不需要任何的修改和调整就能传送到决策过程中来。我们可以从德国绿党中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模型，德国绿党不仅在从地方议会到国家议会的所有层面上都拥有一定的议席，而且还在少数几个州政府中掌权，并从1998年秋以来，在联邦政府中也执掌一定的权力。

在一个有关环境运动的影响的模型中（见图1），我们可以一起得出这些假设。然而，这个模型还需要补充和完善。首先，基于两个原因，环境问题必须要包含在这个模型中。一方面，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环境运动动员就是“客观的”环境问题的直接反应，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环境运动是对环境负担或威胁的反应。环境问题是在社会中产生的。<sup>[6]</sup> 它们的成因、潜在危险和可能的解决办法并不会很快显现出来，而是需要通过计划、解释和辩论的过程来吸引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过，这些问题并不是被创造的，它们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植根于现实之中。就环境问题而言，在环境状况成为问题的过程中强烈地受到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依赖于更广大民众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必须要纳入到这一模型中，因为它们是从根本上

影响环境质量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国家政策才是至关重要的。市场的力量（例如，能源价格的上涨和囊括从个人行为到大公司策略的私人行为）也可能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但是，这些非国家活动将被从我们的模型中排除出去，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受到国家的鼓励、推动、甚至强制。否则，就需要详细复杂的国家政策了，因为国家使用根本手段即强制力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总之，在这里讨论的这些要素代表了那些能称为主要的政策循环的要素（在图1中用实线箭头标出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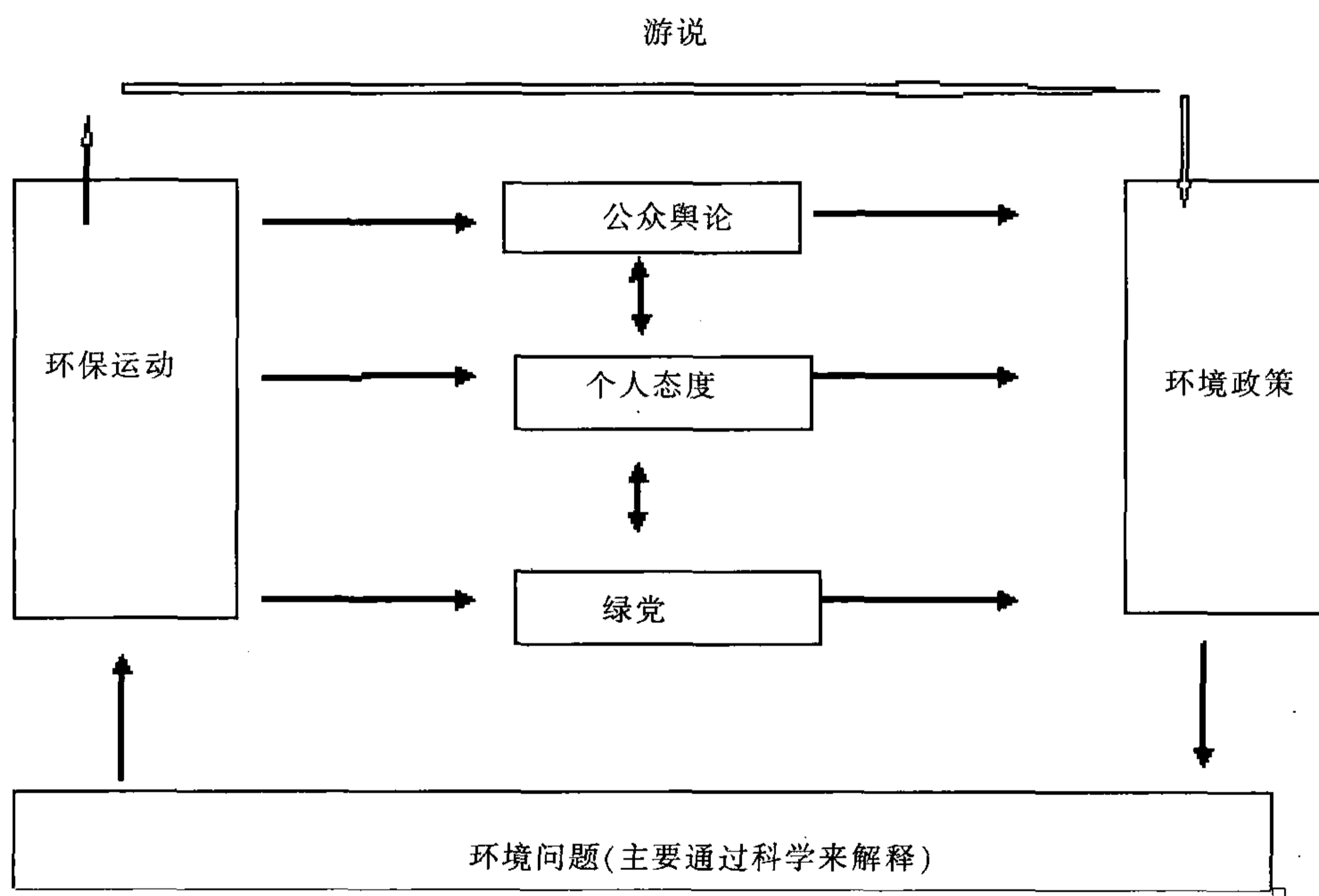


图1 环境运动的影响

此外，这一模型还需要通过一些次要的影响的循环来补充。我们可以假设公众舆论、个人态度和绿党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环境团体可能通过游说而直接影响决策者。最后，国家政策除了通过压制或推动手段直接影响环境运动以外，还可能通过它们对环境问

题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到环境运动的动员。不过，这些影响都是难于预测的。在环境条件恶化的情况下，环境运动可能会因为受挫而变得气馁，或者正好相反，它也可能会觉得需要加倍努力。类似地，虽然改善环境状况可能会在环境运动发起时占据上风头，但是它也能促进运动深入地发展下去。

尽管这个模型中的循环很复杂，但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主要的因果关系循环。环境运动关注的是那些能察觉到的环境问题，它的动员受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一动员又影响着国家的环境政策，而国家的环境政策又是影响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sup>[7]</sup> 由于我们很少有理由可以假定环境问题的客观数量与环境运动动员的数量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只能用后一种因素开始我们的因果关系解释。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设想精简成下面这一假说：环境运动施加的压力越大，公众舆论、个人态度和绿党（或类似的政党）产生的影响越大，国家就会采取更多的强有力的措施保护环境，从而最终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

这是一个有点生硬和机械论的假说，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我们可以研究以下几个例子：公众舆论不一定会对强大的环境运动的动员做出积极的反应。即使当环境质量被视为有较高的价值时，强大的有影响力的动员都可能被人们视为一种对另外的可能是优先考虑的因素（例如充分就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情绪可能就与环境运动的要求相冲突。根据欧罗巴罗米特（Eurobarometer）的调查，这就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德国强大的环境运动和反核运动为什么会在民众中遭遇到相对较为消极的态度了。（Fuchs and Rucht 1994）我们也可以假定一个强大的绿党并不是有意削弱环境运动的动员的，因为环境运动的追随者可能会觉得：像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党的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责任不再是必要的了。最后，举一个和我们的重要假说不相符合的例子。我们可能会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环境运动的影响的因果循环会沿着相反的方向运行。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联合国发起环境保护运动时，（参见Caldwell 1984）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的环保意识可能比那些积极活动的公

民的环保意识更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政治精英教育公民需要进行环境保护。鉴于这些背离常规的例子，我们的重要假说就显得比它乍看起来重要多了。因而，需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 操作化的尝试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何应用解释性模型中的这些因素以及如何寻找那些能使我们对环境运动的影响进行评价的数据。在根据环境质量的变化进行排序的 22 个国家中，有 4 个国家（挪威、日本、土耳其和南斯拉夫）需要从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中排除出去，因为我们无法得到这四个国家在其他变量上的数据。因而，我们只集中探讨剩下的 18 个国家。

## 来自环境运动的压力

这一因素可以视为两个变量：在有关抗议性事件的分析中记录的环境运动的动员的规模（动员的人数）和强度（激进的程度）。其他测量标准——例如环保团体的人数<sup>[8]</sup>——很少有显示作用，因为成员人数本身并不代表政治压力。因此，成员人数的数据也应该排除出去，或者只有当抗议性数据无法取得时，我们才能考虑这些数据。从比较视角考虑环保抗议活动，我们可以从仅有的一项重大研究项目中得到一些资料，这项重大项目涵盖了 4 个西欧国家。（Kriesi et al. 1992, 1995）根据这个项目中有关环境运动动员的资料，并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我们发现了这 4 个国家从 1975 年到 1989 年间的环境运动的数据：瑞士——16；西德——11；荷兰——5；法国——2。（Kriesi et al. 1995: 22）<sup>[9]</sup>这一研究后来得到有关英国和西班牙环境运动的数据（尽管这种数据只是基于较短的时期内的较少的样本）的补充。（Koopmans 1996d）从 1980 到 1989 年的这段时期内，环境运动的动员体现为以下指标：德国——29 人；瑞士——27 人；荷兰——13 人；西班牙——8 人；法

国——5人；英国——5人。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环境运动的强度，我认为这种排列顺序将会稍微发生变化——德国将会更接近甚至超过瑞士，法国和西班牙将会更接近荷兰，而英国则远远落在后面。

我们可以从欧罗巴罗米特的调查中得出一些补充性的资料，这些资料能使我们确定5个国家中环境运动追随者的人数。在从1982年到1989年的4次调查中，这5个国家中自认为是环保行动者或潜在的行动者的被调查者在各国被调查者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如下：荷兰——34.4%；西德——30.8%；英国——22.1%；意大利——21.7%；法国——13.3%。（Fuchs and Rucht 1994）此外，我们掌握的有关评价大多数国家环保团体的数据都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最后，基于我对一些欧盟成员国的环境运动的长期观察和对那些来自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的环保团体的代表的采访，（Rucht 1994, 1997）我粗略地估计了这些欧盟成员国的环境运动动员所造成的压力。这些数据和估算都过于粗略以致无法确定出一个截然分明的排序。不过，考虑到所有这些资料，并根据这些国家的环境运动所带来的压力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的环境运动分成三大类别（如表1所显示的）。

表1 18个国家中环境政治的各个方面

变量	强	中等	弱
环境运动的压力	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士、瑞典、美国	比利时、加拿大、西班牙、法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	希腊、葡萄牙
个人态度	丹麦、荷兰、卢森堡	奥地利、加拿大、西班牙、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瑞典、美国	比利时、英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
绿党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瑞士	英国、瑞典	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美国



政策成效	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士、瑞典	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美国	西班牙、希腊、葡萄牙
环境质量的变化	奥地利、丹麦、卢森堡、荷兰、瑞士、瑞典	比利时、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英国、美国	西班牙、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

## 公众舆论

和调查研究中把公众舆论等同于个人态度的总和的测量方法不同，我把公众舆论界定为个人或团体对公众发表的声明。由于大众传媒是反应和体现公众舆论的最重要的渠道（尽管不是唯一的），所以利用大众传媒的目录分析来测量公众舆论的方法似乎是合适的。例如，我们可以计算出那些表述环境问题和环境运动的声明和评价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次数和频率。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需要在已发布的关于所有政治问题的全部声明中衡量那些已发表的关于环保问题的声明。由于这项任务需要相当多的资料，所以我们无法取得这方面的数据也是毫不奇怪的。因此，这一因素尽管和我们的分析有理论相关性，但也必须被排除出去。

## 个人态度

这一因素（应该从公众舆论的类别中区分出来）用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还是相当容易测量的。我们可以利用那些测量个人对环境问题和环境运动的态度跨国调查的数据。这些跨国调查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如下：

\* 欧罗巴罗米特对欧洲共同体和欧盟成员国进行的不同的调查。

\* 市场和公众舆论调查国际做的涵盖 12 个欧盟成员国的深入调查。

(MORI, 1994)

\* 世界价值观调查做的分别集中在 43 个国家和 24 个国家的两次调

查。

\* 涵盖 24 个国家的地球健康调查。

由于这些调查设计的问题和进行的时间不同，所以被调查的国家在支持环保事业方面的排序位置也是不同的。20 世纪 80 年代不同的欧罗巴罗米特的调查显示：环境保护在丹麦、卢森堡和西德受到高度重视，在意大利、希腊、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受到中等程度的重视，而在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爱尔兰却受到相对较低程度的重视。[10] 根据市场和公众舆论调查国际的调查显示：卢森堡、德国、荷兰和丹麦是高度支持环保事业的国家，比利时、爱尔兰和法国是中等程度支持环保事业的国家，而葡萄牙、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希腊则是较低支持环保事业的国家。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第二次调查显示：为改善环境质量而增加税收在挪威、丹麦、荷兰、英国和美国得到强烈支持，在东德、芬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得到中等程度的支持，而在西德、爱尔兰和日本则得到较低程度的支持。根据地球健康调查显示：同意环境问题“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重要和非常严重的问题”的表述的受访者的比例在西德和加拿大是较高的，在葡萄牙、美国、日本和挪威处于中等水平，而在英国、爱尔兰、荷兰、丹麦和芬兰则较低。（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 der Bundesregierung 1996；也可参见 Inglehart 1995）一些国家在市场和公众舆论调查国际的调查中对环保事业是高度支持的，而在最后一种调查中却排在后面，实际上这两种排法并不矛盾。因为与那些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相比，在那些已采取很多措施改善环境质量的国家的受访者可能没有理由认为环境问题在他们国家是非常严重的，

总之，这些不同的调查确实没有提供一个确定性的排序。不过，根据个人重视环境事业的程度，我们研究的 18 个国家至少能分成三大类。（如表 1 显示）

## 绿 党

最能说明绿党实力的指标就是它们获得选票的份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采用平均值。马勒·隆美尔（Müller-Rommel）提供了 15 个国家的绿党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平均选举结果的数据。对于那些起到绿党功能的政党即有生态保护倾向的政党来说，想要评价它们的实力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对一些国家来说，我们不得不依赖于粗略的估计。

## 国家环境政策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因素，由下列要素构成：权力机构（例如国家的环境部长、环境保护机构、咨询委员会，参见 Jorgens 1996），环境保护法和其他规章（例如对饮用水中特殊物质的量的限制），执行能力，监控系统及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制裁，程序规则（例如环保团体接触法院的渠道，有关环保数据的信息自由），国家为改善环境质量的财政投资，国家为教育更广大民众而做出的努力。<sup>[11]</sup>此外，我们必须要考虑从地方层面到国家层面的环境状况和环保活动。想要测量我们考虑的 18 个国家的所有这些因素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研究限定在较少的几个用来评价国家环境政策的内容和决议的简单的指标上。例如，我们可以找出下列几个指标：国家用于环境问题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份额，空气净化标准的严格性程度，（Knoepfel and Weidner 1986）国家是否愿意加入和履行合乎国内法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Dietz and Kalof 1992）基于这样的测量，比较环境政策方面的专家已经鉴别出：一些国家已成为环保事业的领头羊，而一些国家则拖后腿。尽管我们还没有一个能从系统数据（涵盖了所有上述要素的系统数据）中得出的鲜明的排序，但我们仍然可以参考这些专家的看法。至于欧盟成

员国，我们已积累了一些它们在推动环境保护方面的数据。在同来自欧盟总部的专家和来自布鲁塞尔的非政府环保团体的专家会谈时，我们得出相对一致的估计。而这通常可以用下面的环境护卫船的比喻来解释：这个环境护卫船的头部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德国、奥地利和卢森堡构成，中间由法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比利时组成，尾部则有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构成。考虑到这些不同的资料，我再次把这 18 个国家分成三大类。同时，表 1 通过浓缩和概括现有的资料，又根据环境质量的变化对这 18 个国家进行了分类。

## 讨 论

假如可以根据前面讨论的不同的因素对这些国家进行适当的分组，那么，无论这些结果是否与我们的一般假说相符合，我们都能对环境运动的影响做出评价。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这种分类中得出其他假说。

当我们观察那些体现了强烈的环保价值观的纵列中的国家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变量上都是这几个相同的国家。而当我们观察那些体现了较弱的环保价值观的纵列中的国家时，这种集群效应 (cluster effect) 甚至更为明显。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支持了下面这种一般性的假说：环境运动施加的压力越大，国家往往就会采取更多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对其他相关因素的反应）来改善环境质量，反之亦然。

然而，通过进一步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规则还有例外。在一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在一种类别中程度较低，但在另一种类别中的程度却可能很高。例如，意大利在环境质量变化的类别和绿党实力的类别上就是如此，而芬兰在环境运动压力的类别和绿党实力的类别上也是如此。此外，虽然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存在着强大的政党，但这些国家的环境运动的压力却只是在中等程度上。这些例子表明：绿党实力和环境运动压力之间没有相关性或仅仅是一种薄弱的正向关系。表 2 更加清楚地显示了这 5 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于强弱关系的解释在其

他相关因素中也能发现——在一些国家，这种相关因素被认为会对绿党实力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妨碍潜在的支持者投票选举绿党的因素：选举体制（多数主义或代议制体制）的根本性质，一些国家的小党想要进入国会时面临的“百分比门槛”（percent hurdle），绿党内部的分裂乃至几个绿党的同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的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强大的环境运动的压力不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绿党。

表 2 环境政治中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环境运动的压力	个人态度	绿党	政策努力	环境质量的变化
环境运动的压力	1.0000	.6144 **	.2820	.9031 **	.6789 **
个人态度	.6144 **	1.0000	.2670	.5702 *	.6843 **
绿党	.2820	.2670	1.0000	.4421	.6054 **
政策努力	.9031 **	.5702 *	.4421	1.0000	.7919 **
环境质量的变化	.6789 **	.6843 **	.6054 **	.7919 **	1.0000

注：根据表 1 中较弱、中等和较强的分类并根据相关联程度进行的推算。

\* $p < .05$     \*\* $p < .01$

当我们把环境运动的压力和它的最终目标——环境质量的改善联系起来时，我们可能会看到有几分不太一致的模式。举例来说，德国、芬兰和美国面临着强大的运动压力，而这一压力看起来也影响到其他一个或两个相关变量，但是最终却只带来了环境质量中等程度的改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相关变量的影响也很重要。尽管德国、芬兰和美国面临着强大的运动压力，但这些国家的个人态度却只排在中等程度上。此外，美国的绿党极其弱小。因而，在这些国家中，运动动员在通向政治体制的进程中，其影响似乎在弱化。一个对这种现象更为具体的解释

就是那些反对环境运动的力量的相对实力的大小，例如化学工业、矿业公司和木材公司。这些经济力量在美国似乎都特别强大，因而可能与相对强大的运动动员相抗衡。

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国家结构上的共同点（对同在具有较强烈环保价值观的纵列中的国家或同在具有较弱的环保价值观的纵列中的国家来说，这个共同点更为普遍）时，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变得很明显。第一类别中的国家——即具有较强烈环保价值观的纵列中的国家往往都是经济上最繁荣的国家，而那些具有较弱的环保价值观的纵列中的国家基本上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这表明经济上的表现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变量，下面两个原因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当我们设法解释强大的运动压力时，我们可以假定——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相符合——在经济繁荣国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 value）或新的政治问题（如环保问题）将会在民众中产生较大的共鸣，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必须要满足的基本需要。<sup>[12]</sup>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些国家的教育系统比较发达，因而它们往往能给民众提供更多的有关环境保护的信息以及对环境保护的更好的理解。其次，当我们考虑国家活动时，我们可能会看到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在环境保护上进行投资。此外，在经济繁荣的国家，工业部门也能够轻松地应付由严格的环境标准带来的额外的财务负担，同时又不会失去国际竞争力。换句话说，不像相对贫穷的国家，富国能够承担得起环境保护的费用。就像我们回顾过去所能看到的那样，正是由于富国采用了严格的环境标准（从长远来看使它们更有竞争力），所以它们才可能发展的更为强大。

尽管经济表现对环境政策的影响至今仍未被详细地研究，但是当我们解释环境质量的变化时，我们应该考虑这一因素。就像在反核运动的例子中一样，（Midttun and Rucht 1994）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外，经济变量也应该包含在我们在这里提供的解释模型中。

总而言之，我认为本文只是浅尝即止地探讨了环境政治中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网络。本文主要想达到以下几个目的：展现出研究这一课题的

难度；开拓一种能够通过相关因素把运动运动员和环境质量的最终变化联系起来解释的方法；用实证数据使这一方法具体化。由于这些数据比较分散，所以这一方法并不是一种“硬性”的测量标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现有的资料和我们在本文提出的假说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的数据汇编已经在进行之中，因而我们在这一领域有待做出更加系统和更加完善的实证分析。

### 注 释

[1] 本文是对 1996 年最初发表在德国的《新社会运动研究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环境运动的影响：Von den Schwierigkeiten einer Bilanz”的修订和详细阐述。在这里，作者要感谢马可·朱格尼对本文初稿的评论。此外，作者还要感谢 Gabi Rosenstreich 的编辑工作。

[2] 关于环保运动的跨国比较，可参见 Wrndl and Fréchet (1991), Heijden, Koopmans, and Giugni (1992), Dalton (1994), Rucht (1994), and Kriesi and Giugni (1996)。

[3] 有关如何界定社会运动的结果的著作并不多见。（但可参见 Rucht 1992; Giugni 1994; Burstein, Einwohner, and Hollander 1995）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在类似这样的标题——《社会运动与政治结果：为什么这两个目标都未能实现》（Zimmermann 1990）——的文章中找到有关评价社会运动结果的难度的论述，但却很少有实证上的探讨。除了下面这些例外：Gamson (1975), Piven and Cloward (1977), Gurr (1980), Kitschelt (1986), Huberts (1989), Rüdig (1990), Midttun and Rucht (1994), and Giugni (1995)。

[4] 根据新闻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1997 年 1 月最新公布的一份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报告和预测似乎支持了下面这种说法：总体来说，环境状况正在急剧恶化。

[5] 例如，在战后的德国，反犹太主义受到精英们的强烈谴责；因而在公众舆论中几乎得不到体现。然而，尽管政府在教导人们要放弃种

族歧视方面已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一些调查却发现相当多的德国人仍持有反犹太主义的态度。(Stss 1989)

[6] 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上，杜文达克和库普曼斯 (Duyvendak and Koopmans: 1995) 已经论证了这种看法。至于一般性的观点，可参见道格拉斯和威尔达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

[7] 除了国家外，社会因素也能影响到环境质量的变化。(Jinicke 1992: 87)

[8] 道尔顿 (Dalton1994) 和克里 (Kriesi1996) 西分别提供了一些没经过调查的比较性数据。

[9] 这些指数显示的是，每百万居民中的一千公民对由环保运动引发的不合常规的抗议活动的参与程度。

[10] 这种粗略的分类是基于 1983 年、1987 年和 1989 年进行的三次调查的数据。豪夫里克特和里弗 (Hofrichter and Reif1990: 130) 记录了详细的数据。由于在类似的调查中所问的问题不同，所以这些国家的排序也许会略有变化。

[11] 伯斯坦、爱因沃纳和何兰德 (Burstein, Einwohner, and Hollander: 1995) 已经区别了社会运动影响国家的几个方面。

[12] 与我们的想法恰恰相反，邓拉普和默梯格 (Dunlap and Mertig 1996) 通过对 1992 年地球健康调查的分析发现，穷国的环保意识出奇地高。大多数衡量环保意识的变量都与全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他们认为这与日益突出的环境恶化问题有关，因为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到穷国的生活条件。



# 10. 种族和公民概念意义上的国家以及德国和意大利极右势力不同程度上的成功

路德·库普曼斯和保罗·斯坦森

## 共同的历史，不同的现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欧出现了仇外的和极右的动员的复苏，这些动员以对外来移民进行猛烈攻击、新纳粹的示威和极右政党的抬头为其形式。尽管对这些现象已经有了大量的比较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把单个国家的个案研究编辑在一起的汇编。（e.g., Baumgartl and Favell 1995; Merkl and Weinberg 1993; Hainsworth 1992）真正的比较研究是很少的，远远不够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对意大利和德国的系统的比较研究。

这种忽略是令人惊奇的，正是这两个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上升为极权主义国家权力的情况，而且这种法西斯主义在现在仍作为角色模型（role models）和意识形态参照性观点（ideological reference points）而或明或暗地对当前的极右势力运动发挥着影响。不管历史上的相似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代极右势力的力量和选举上的成功，德国和意大利近来的历史更加相似。在意大利，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AN）——一个战前的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在 1994 年的国家选举中获得 13.5% 的选票。北方联盟（Lega Nord）——尽管没有法西斯主义倾向，但却有着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也获得了 8.4% 的选票。选举之后，两个政党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一同进入了一个联合政府。



尽管这种联合统治只持续了8个月，但它却有着历史性的意义，它代表着战后欧洲极右势力第一次获得了政府权力。在1996年的选举中，民族联盟（15.7%）和北方联盟（10.1%）的卓越表现在第二共和国的政治版图上是非常突出的，而一个从民族联盟中分裂出来的新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运动三色火焰（MS-Fiamma）又获得了0.9%的选票。

相比之下，德国的极右势力，尽管在联邦国家选举和欧洲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并没有进入国家议会。德国共和党（German Republikaner）——德国三个极右政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在1990和1994年的选举中分别获得了2.1%和1.9%的选票，是欧洲极右政党中比较弱的一个。这是和意大利的相应党派以及法国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15%的选票）、弗拉芒集团（Flemish Vlaams Blok）（在1995年比利时的选举中获得了7.8%的选票，而且在佛兰德斯（Flanders）几乎两次获得了那样百分比的选票）相比较而言的。而且，在意大利，极右势力已经被接受为一个合作伙伴，已经从“挑战者”转变成了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成员”，（Tilly 1978; Gamson 1990）但它在德国仍然完全处于社会的边缘。在德国，没有一个已成立的政党愿意和极右势力结成联盟或其他合作形式，即使是在地方或局部地区的层面上。极右势力的三个政党：共和党、德国人民联盟（Deutsche Volksunion）和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被官方烙上了“宪法敌人”的印记，常常被国内安全机构所监控，它们的领导人和成员也要遭受各种各样的压力。

因而，就“接受”（acceptance）（盖姆森1990年所区分的社会运动结果的两种基本类型之一）来说，意大利和德国处于相反的两极。然而，如我们的讨论所显示的，就实质性的政策结果（盖姆森的术语是“新的利益”（new advantages））而言，这并不必定是真实的。实际上，和意大利的情形相比，德国的外交和移民政策至少在最近已经变得更加严格，和极右势力的要求更加接近。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形成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人种结构

的差异、公民权和国家的政治基础的不同，以及两个国家中公民和种族成分近来发展的平衡程度的不同。很多的学者将极右势力的复活归结为两个主要的源头：基于种族——民族主义公民权（citizenship）概念之上的仇外要求的复活；现行的政治代议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德国的术语 *Politikverdrossenheit* 是最好的表述）。这两种发展往往被分别对待。然而，如果一个人从公民权和国家的种族概念和公民概念之间的竞争性张力的角度来考察它们，则它们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从民族国家形成起，公民权和国家问题就与之相伴随，意大利和德国尤其如此。从这种观点来看，极右势力的复活是（甚至更是）政治共同体（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危机的一个结果，也是由于移民和文化异质性的不断增加而产生的种族边界政治化的结果。

### 机会和话语：一个理论模型

公民权和国家认同的种族概念和公民概念之间具有竞争性，要分析这种竞争性如何影响极右势力的动员和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建议结合近来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两种理论困境。第一种困境围绕着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POS）概念，政治机会结构强调由制度结构和权力配置所产生的推动性或约束性作用。（McAdam 1982；Tarrow 1994；Kriesi et al.1995）政治机会模型不像以前那样关注于社会运动内部的资源和战略，而是强调角色是由更广泛的政治背景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在此背景中展开。模型理论已经成功地应用于纵向的单个国家研究（Tarrow 1989；Duyvendak 1995；Koopmans 1995）和跨国比较研究之中。（Kitschelt 1986；Rucht 1994；Kriesi et al.1995）然而，它在资源动员模型方面也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即它不能完全处理社会运动动员方面杂乱的内容。因此，政治机会结构的很多方面被认为是“无内容的”，因为它们应用于社会运动时不顾其目标、意识形态和话语。政治联盟的不稳定、选举的多变性和政治体系的制度结构等因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

运动的机会通常会在某些时候多于其他时候，为什么在某些政治组织中社会运动相比而言会使用更为激进的战略。然而，政治机会结构（POS）模型却难以处理普通的问题：机会结构没有在同样的程度上和使用同样的方式推动和约束所有的社会运动。当然，政治机会模型更为精确的版本，如流行的精英战略和分裂结构，（Rucht 1994；Kriesi et al. 1995）已经试图通过在运动类型和政策平台之间加以区别和合并政治文化要素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然而，将政治机会模型发展至这么重要的程度，它就超越了它自己的概念限制，进入框架系统的视域，即第二重理论困境，这一理论视域专注于动员的论证方面。从这种观点来看，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成功的机率是由这些运动发展为解释性“框架”的能力所决定的，这些框架能有效地将一场运动及其原因与潜在支持者的兴趣、感知和思想意识（Snow et al. 1986）联系起来。然而，框架模型却难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框架失败，而其他的却成功地说服公众，以及为什么一些相似的框架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中却有着不同的影响。此外，这里也提供一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是：在这种情况下，将特定框架的一致（“共鸣”、“公度性”或“逼真度”）程度与外部因素联系起来。这样的—个框架模式在客观的问题和事件中能被找到，这种努力将框架视角与传统的申诉视角（grievance perspective）联系起来。（对传统申诉视角的一种批评，参见 Koopmans and Duyvendak 1995）<sup>[1]</sup> 在我们看来，更富有成效的是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关注社会运动框架与一个特定社会更广泛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契合。（Snow and Benford 1992；Diani 1996）

这个步骤包含着将机会结构引入框架模型。这样，在政治机会和框架路径中所发生的不断拓展的视角就不再有什么错误。然而，我想，两种视角的融合需要在概念上加以认识。当然，这些视角还没有趋于同一。政治机会模型仍旧有它自己的领地，在那里，它关注于制度结构、权力关系或潜在同盟者的战略性姿态，而这些都是框架性视角很少论及的。相反，机会模型不能说明社会运动是以何种方式动员象征性资源来推进

其目标——而这是框架视角的特殊力量。在这两个领域之间，一个共同的领地已经获得了发展，在这里，两种视角都论及政治文化的或象征性的外部约束和社会运动动员的推动者。我们建议用“推理的机会结构”（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这个术语来说明这种变化，这个术语被视为决定着哪些理念是“明智的”，哪些现实结构是“现实的”，哪些主张在一个特定时刻和一个特定政治组织中是“合法的”。

在下面的段落中，我们分析机会的结构水平对极右政党的动员和成功几率的影响。<sup>[2]</sup> 关于话语机会，我们关注的是公民权和国家认同的种族的和公民的概念的效力。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极右势力的定义为：动员一种国家认同的种族——文化架构反对作为一种政治的或公民共同体的国家理念。抛开此定义，我们会得出下面的假设：如果（1）关于国家认同和公民权的主导性话语与国家认同的种族——文化的理念类型（ideal-type）的一致性越高，愈使之具有合法性，而且（2）国家的主导性概念由公民——政治因素提供的基础和合法性愈少，极右架构所引起的共鸣，和由此而来的它的动员和成功的可能性将会愈大。<sup>[3]</sup>

一旦我们引入制度机会之后，这个相对简单的模式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个要被考虑的因素是政治组织成为极右政党的可能性，或者用另一种概念术语来表述是，压制与促成之间的平衡。这把我们引向的假设是（3）极右势力愈容易进入政治体制，它所受的强制性约束愈少，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此外，我们应该承认，挑战者不仅与政治体制的成员们相对立，而且与之竞争。除了施加强制外，政治体制的成员也可以通过抢先满足挑战者的某些要求，阻止挑战者进入政治体制。因而，（4）国家认同的种族——文化概念被整合进政治体制成员的计划和政策之中愈多，极右势力的动员机会受到的限制也愈多。荒谬的是，这最像是我所假设的情况，即种族-文化要素是国家和公民权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社会运动的文献中，政治精英的一致性和稳定的程度经常作为影响挑战者进行动员和获得成功的一种关键因素而被强调。这将我们引向我们最后的假设：（5）当政治精英分化，政治联盟不稳定，尤其



是当分裂和不稳定同国家认同问题关联在一起，最明显的是当它们被一种政治体制的公民-政治基础的合法性危机所引发时，极右势力的动员和成功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在应用这些假设之前，我们首先讨论国家和公民权的种族概念和公民概念在解释极右势力的动员和成功方面的不同。

### 作为一种争议性话语的国家认同： 关于国家的公民和种族变量的竞争

国家的制度性机构是一种政治精英为“国家建筑物”所使用的一种工具，这已经被国家主义研究很好地证实。在文化领域里，国家对传统的制度施加权威。这包含了一种国家教育体制的建立和一种被设计出来强化国家统一原则的主导性的宗教和语言。（Hobsbawm 1990；Gellner 1983；Anderson 1983）

国家的集体性认同在此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此集体性认同合并了两种广泛意义上的理念类型的各个要素：种族国家主义（即声称“人民”的统一是建立在属于一种假定的或真实的原始认同的文化基础上的，或者是建立在种族群体的基础上）和公民国家主义（即声称“人民”的统一是在一个公民平等的政治共同体的普遍理念之上的）。国家的认同在一个共同体内为成员资格规定了一个“契约”。在这种意义上，政治文化是一种“公民宗教”，此“公民宗教”规定了成员资格的义务以及吸纳和排除在外的依据。作为集体性的认同构建，种族国家主义和公民国家主义意味着两种基本的截然不同的关联的理念类型，这两种关联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联系在一起。种族国家主义根据分有一个原初种族的原始属性，吸纳和排除它的“人民”。公民国家主义根据分有一种普遍的政治和法律权利的政治共同体属性，吸纳和排除它的“人民”。

在战后时期，将国家主义等同于公民变量（civic variant）是经常的事情，但是，如国家主义运动近来的复兴所表明的，这种联想模糊了国家认同的复杂基础，而国家认同必定保留了种族变量的要素。国家主义特



定的历史变量可以被视为集体性认同，此集体性认同是由一种种族的和公民的国家主义的联合物创造出来的。(Smith 1995)

采用一种在欧洲内部跨国比较的视角，我们看到，种族国家主义已经在德国文化中有着最突出的表达，而公民国家主义在法国共和主义的革命传统中有着最杰出的表达。然而，将种族国家主义的后果简单地等同于一种不民主的、文化上排外的和扩张主义的国家，将公民国家主义后果等同于一种民主的、文化上包容的和非扩张主义的国家，是错误的。近来，相对于前南斯拉夫 (Yugoslavia) 的塞尔维亚人 (Serbs) 而言，捷克人 (Czech) 相对和平的种族国家主义运动是一个反面例子。相反，在波拿巴 (Bonaparte) 治下的法国国家主义是另一个历史案例，它展示了公民国家主义的普遍主义冲动怎样转变为一种扩张主义战略。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跨越时代的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都可以被视为公民的和种族的遗传密码的化合物或“混合物”。公民的和种族的遗传密码是行动者用以构建作为集体性认同的国家主义特定变量的因素。因此，国家主义的一种主导性变量，不管是种族的还是公民的，都是统治阶级或精英的一种意识形态，此意识形态被镶嵌于国家的组织机构之中。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国家主义的不同类型依托于不同的阶级联盟、冲突和妥协，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中已经显现出来，这些阶级联盟、冲突和妥协“造就”了国家，重新界定着公民权的基础。作为一种集体性认同，国家主义的主导性变量包含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对来自反对话语的文化抗议保持开放，而此反对话语则由社会运动的动员所引发。因而，国家认同是政治话语的一个争议性领域，(Gamson 1988, 1992) 而此领域中的支配性话语——它综合了种族的和公民的因素——与由社会运动所引发的其他“挑战者”变量相竞争。社会运动汲取认同资源和反对密码 (countercodes) 来抗议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概念和其所必需的公民权的义务架构。例如，有时，政治体制崩溃，在战争中失败或发生国内危机，社会运动的挑战者的话语就有机会在关于国家主义的支配性的话语内刺激“框架整合 (frame alignment)”的进程。<sup>[4]</sup> 然而，进入框架整合，运

动的机会并不必定保持这种戏剧性情形的发生，挑战者的结构也并不一定转化出他们想要的结果。框架整合的另一个例子（在公民国家主义的一种支配性变量中进行的）是由社会福利国家的建立所提供的，此例可以看做是由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运动进行抗议的结果。社会改良主义的抗议通过将工人阶级的“属性”并入政治共同体理念的新的定义之中，从而将框架整合的过程引入到了关于国家公民权的支配性话语之中。一种公民国家主义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和法律权利之外的社会权利，在这样一种国家主义中，工人阶级能被设想为与国家公民权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的文化纽带相比而言）更相一致。（Marshall 1950）社会民主的抗议，通过在政治共同体内重新界定公民权的契约基础和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拓展了公民国家主义的基础。

甚至在社会革命和推翻一种政治体制的极端例子中，一种关于国家主义的支配性话语（不管相对更种族性，还是更公民性地加以界定）完全被一种挑战者的变体所取代，并不是常有的事情。关于政治文化的国家传统已经证明它对于社会变化是有抵抗力的。大战之后，德国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建立，没有根除作为国家认同基础的种族国家主义。相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变体能够使得魏玛共和国的种族国家主义激进化，并走向其逻辑顶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建立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集权国家，通过一种官方政策消除了其他的种族。相比之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汲取了并非强烈固有的种族国家主义传统，产生了一种更富国家合作主义、较少仇外色彩的法西斯主义变体。

国家的公民概念被西方盟国（Western Allied）强加给种族国家主义的战败国，建立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和意大利第一共和国（Italian First Republic）。在战后的西欧，公民国家主义的统治地位在自由民主国家的政策和向之提供合法性的政治话语中已经制度化了。种族国家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抗议性话语，被极右运动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反体制的批评所使用。





国家主义不同变体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认同的文化资源，一种国家公民权的模式是深深植根在一个社会内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这给予了它一种抵制转变为其他变量的持久的潜力。一个国家和它的挑战者存在分歧，但却分享着相同的集体行动的文化政治背景。挑战者的集体行动是从同一组文化传统和与其对立的“各式工具 (tools)”中构建出来的，(Swidler 1986) 因此，即使在少有的场合，当一种政治体制被颠覆或崩溃，它的继任者建立的政治体制的国家统一也要参考和他们前任相同的文化框架。文化传统作为正在建设的神话和集体认同，“使社会成为国家”，文化传统有一种持久的品质，影响着社会运动反对一个国家的潜力。我们认为，要通过极右动员来解释成功结果的可能性，除了分析政治体制所提供的制度机会外，还有必要分析关于国家主义的话语所提供的文化机会。

学者们对移民政策和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采用一种国际比较的路径，已经辨别出关于公民权的不同国家传统或模式。(Brubaker 1992;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Kleger and D'Amato 1995; Rex 1996a; Bovenkerk, Miles, and Verbunt 1990) 这些不同表明，尽管公民国家主义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但在界定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由此而来的复杂的机会结构）时，种族国家主义传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西德，公民权的国家解释已经保留了一种强烈的种族成分。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和完全的公民权利都以种族划分为基础。德国的国家认同并不基于领土或出生权的原则，而是基于一个原初的种族共同体的神话。这种认同转换成了一种国家政策，这种国家政策不承认非日尔曼的文化认同纽带的合法性，在公民权利的分配中具有高度的排他性。相比之下，法国国家认同的传统已经与共和主义的创立神话牢牢联系在一起，在此神话中，公民权是在领土内生来就有的权利，此权利保证着在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身份的平等，而不管其种族血缘。然而，法国公民文化也是“排他的”，它拒绝接受除忠诚于共和之外的其他忠诚的合法性。在传统上，法国国家主义也拒绝给予文化差异以政治空间。这一点在一校长拒绝允许一个穆斯林女

孩在国立学校中戴头巾这一著名事件中得到证实。(Husbands 1994)

与德国和法国相比，荷兰和英国国家主义的文化多元论允许公民权利与种族共同体的相对融合。在柱状化 (pillarization) 的荷兰模式中，通过将政治共同体划分成不同的文化群体，基于宗教、种族或血缘纽带的文化差异的合法性获得了制度性的承认。相比之下，英国传统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分离和将文化领域分成不同的行为区域之上的。宗教和血缘被归入个人良心的私人问题。然而，当国家拒绝基于褻渎性法律反对沙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时，英国的穆斯林发现，甚至在这种多元变量中，国家的权威启用了——一个更好的公民文化的版本。(Rex 1996a)

相对于这些国家认同的情况而言，意大利表现了一种南欧的特点。它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造就”了一个兼容各种对立的文化和冲突性认同的国家。这个国家集体认同的最好概括是天主教和地中海类型的。(Ginsborg 1995) 原始的和家族的认同在这里仍然是强烈的、冲突的，这一点表现在北方和南方的国家划分中，以及在地区、地域、邻近区域之间的公共竞争中。在天主教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和对家庭的从属关系作为社会的自然秩序，已经被认为在历史上是先于一种政治共同体（作为意大利认同核心）的建立的。公民理念在文化领域中从属于家庭认同，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已经控制了国家。在社会关系是基于对公社的和家庭的认同的意义上，认同的“种族”成分是强大的，但在界定作为集体认同的主要单元的国家时，它却是弱小的（法西斯时期除外）。<sup>[5]</sup> 这种国家认同相对脆弱的结合和对公民权的承诺，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直到近来都没有出现对文化差异的争论。荒谬的是，文化领域中天主教的统治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宽容在血亲意义上的种族差异，但公社的和家庭的纽带力量却保持着对文化差异不能容忍的倾向。

近来关于公民权的争论已经表明了在欧洲国家的国家认同上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已经被认为是由于欧洲作为超国家的结合 (Rex 1996b) 以及认同瓦解的现代性的“个体化”过程所引起的。例如，比力格 (Bil-

lig) 的《过时的国家主义》一文认为，当代的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争论、一种政治认同。另一位学者德兰特 (Delantey 1996) 对“老国家主义”和“新国家主义”加以区别，“老国家主义”把自己视为与其他的作为“重要他者”的民族国家是对立的，而“新国家主义”是一种排斥而非容纳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对福利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把自己视为与作为“重要他者”的移民是对立的。

与对“新”、“老”国家主义作比较不同，我们探讨的是在种族国家主义和公民国家主义之间加以区别的分析效用，这种区别是在阐述存在于一个国家背景中的极右势力的文化机会时的一种手段。这避免了近来的排外潮流膨胀为一种新的国家主义理论的危机，为经验分析敞开了道路。在我们的框架中，极右势力是一种抗议，它提出了一组种族中心主义的主张来反对存在于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国家主义概念。解释意大利和德国极右势力在战后的显著成功，需要我们分析关于国家认同（作为散漫的机会）的文化争论的国家事例，分析它们与进入跨时间的政治体制中的制度机会的相互影响。

## 德国：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局外者的极右势力

在德国极右势力的战后历史上，可以辨别出三个动员阶段。在盟军占领时期，大量的种族国家主义政党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些政党得到了前国家社会主义者和从东欧的德国领土上逃离或被放逐的德国人（所谓的被驱逐者联盟 (Vertriebenen) 的支持。他们的计划包括：反对盟军的再教育和消灭纳粹的政策，不承认战后德国的边界，关注更多的物质利益（例如被驱逐者联盟得职业和房子）。1949年盟军的政党许可制度取消之后，一个更明确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以社会主义帝国党 (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的形式出现。1951年它进入了不来梅港市 (Bremen) 和劳额萨克斯尼 (Lower Saxony) 的州议会，在后者那里获得了 11% 的选

票，在 35 个选区中占据了绝对多数。（Winkler 1994： 71）然而，它的发展到 1952 年突然结束，政党被联邦宪法法院（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取缔或解散，理由是它的计划“敌视宪法”。其他的国家主义政党继续发挥影响，但它们逐渐地失去支持，没有挺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种发展的理由是两方面的。第一，国家议会的进入标准的严格性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两倍，其目标明确，就是要将更小的右翼的竞争者从政治舞台中清除出去。原先的政党在一个联邦国家中不得不获得至少 5% 的选票，因为从 1957 年开始有了 5% 选票的要求。第二，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ies (CDU and CSU)）成功地整合了国家保守主义政党和被驱逐者联盟（Vertriebenen）组织的要求和人员。

在这种整合能力的理由中至少有一个是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显著的经济复兴是在基督教民主党的统治下获得的。如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Verba）1963 年做的跨国政治文化研究所揭示的，尽管德国人没有信仰民主主义，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渴望过去的独裁主义，但至少民主和社会市场经济已经被证实在“运转”。此外，与战前德国政治的许多其他特征不同，国家认同的种族国家主义概念继续极力把持公民权的立法和主要政党（在这一时期也包括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话语和计划。在冷战和德国分裂的背景下，改变所采用的公民权的种族概念（此概念将东德人和来自其他东欧国家的“种族意义的德国人”视为由西德国家代表的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可想象的。（Brubaker 1992： 168-71）自从反共主义被合法化后，甚至复仇主义者的情感也能够被纳入主流的政治学中，直到与盟军 1990 年的重新统一条约为止，德国一直没有承认战后的边界。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种族国家主义政党的逐步遏制政策，遵循了一种模式：对那些能够与主流政治文化中的种族国家主义因素相结合的人员和要求实行的抢先占据策略，与对那些超越这些限制的诉求和人员（更确切地说是新纳粹主义或反民主主义者）实行的压制策略相结合。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这种模式从那时起一直都是典型的。当主流政治的整

合能力下降的时候，极右势力的动员机会反而会增加。在极右势力的第二次动员时期，也就是与国家民主党（NPD）联合的那段时期，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国家民主党建立于1964年，在1966年至1968年间进入7个州的议会，获得10%的选票。这就是所谓的CDU/CSU与SPD的大联合（Grand Coalition）时期，在此期间，没有议会中的实际的对立，其中心政策是为左派和右派的新的竞争者创造空间。作为CDU/CSU和SPD——仅在几年前，它还将其描绘成共产主义的一个盟友——联合的一个结果，以及与东欧和德国民主共和国（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谨慎的步骤，基督教民主党不再能够包容极右势力的抗议。此外，国家认同的公民基础仍旧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一点由于1966-1967年经济衰退的冲击而变得明显，尽管有限范围的经济衰退与公民基础发展不足所引发的国家意识的危机并没有联系。而且，极右势力的全盛期终究没有持续多久。大联合瓦解以后，NPD没有达到5%的限制线（仅达到4.3%），随后就突然从所有的州议会中消失了。现在相反，CDU/CSU回到了右翼，与被驱逐者联盟（Vertriebenen）一起站在大规模示威的最前方，反对勃兰特（Brandt）政府的与东方和解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

在20世纪80年代，对已出台的保守的东方政策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共和党的出现。德国共和党是极右党派动员的第三次浪潮的主要组织者。这个政党是1983年由从CSU分离出来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建立的，这群人反对由CSU领导人及巴伐利亚（Bavarian）州长弗里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向GDR政权提供大量金融援助。德国共和党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巴伐利亚1986年的选举获得了3%的选票。1989年它进入了柏林州议会（7.5%）和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7.1%）。另一个极右政党，德国人民联盟（DVU），20世纪70年代从NPD中分离出来，在不来梅港市（Bremen）1987年的选举中获得了一定的成绩（3.4%）。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统一后的国家选举中，这些成绩并没

有被重复，极右政党加起来只获得了不足 2.4% 的选票。而且，这也是由已成立的右派促成的国家主义者的成功，而国家主义对于极右势力的动员机会而言是不利的。赫尔穆特·科尔 (Helmut Kohl) 反应灵敏地使用了东德示威者的标语“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这就夺去了极右势力的一个中心议题，其多数的潜在支持者都聚集到了科尔身后，他的政党是国家重新统一的获胜者。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在处理两次移民浪潮时，对于种族因素与德国国家认同的长期的关联性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为大规模的人民的移动注入了动力，这些移民运动主要由经济原因所引起，由东欧国家移向西欧，主要是移向德国。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避难所的寻求者来到这里；另一些人来是因为德国宪法对德裔移民 (Aussiedler) (重新定居者) 的特殊规定，德裔移民指的是几个世纪前迁移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说德语的人的后代。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会讲德语，但这些德国“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拥有一种自动恢复德国公民权的权利，他们获得了大量帮助他们融入德国社会的金融和社会资助。相反，在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下，进入的寻求避难者却被投之以公开的敌意。基督教民主党开展了一场媒体运动以限制寻求政治避难的宪法权利。不过，这种要求却遭到了自由民主党 (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 和 SPD (也就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左翼) 的强烈反对。政治精英内部的这种冲突为极右势力的活动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不仅体现在共和党和德意志人民联盟在几个州选举中的成功，也体现在一种反对外国人，尤其是反对寻求避难者的空前的暴力浪潮。

这波运动浪潮对于现存政党关于避难争论的深远进程，对于寻求避难者的权利的持续限制，都有着显著的强烈影响。时间连续性的分析已经表明，极右势力暴力水平的提高导致一种避难争论的加强，随之采用新的限制性立法。(参见 Koopmans 1996a, 1996c) 第一次暴力浪潮始于 1991 年 9 月在霍耶斯韦达 (Hoyerswerda) 的撒克逊镇 (Saxon town) 大

规模排外骚乱之后，随后联邦政府和州（Länder）做出了一项紧缩和加快避难申请程序的决定。一年以后，在罗斯托克（Rostock）类似的骚乱引发了第二次暴力浪潮，随之而来的是1992年12月在主要政党之间的一项协定，这项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沿着基督教民主党右翼最初要求的路线改变宪法。德国极右势力的这些成功因而显示出，暴力能够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富有成效的策略，这也是一项支持皮文和克罗沃德（Piven and Cloward 1977）和盖姆森（Gamson 1990）的发现的结论。

然而，政治精英内等级的结束和宪法权利对避难的严厉限制，再一次决定了极右势力的命运。在新的避难法令在1993年7月付诸实施之后，极右势力的暴力水平大幅度地下降，尽管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它仍保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线上。极右党派同样也丧失了阵地，在1994年的国家选举中，他们再次下降到很低的比例（1.9%）。除了抢先占有（或实质性的成功），加强镇压也可解释这种下降的原因。（参见Koopmans 1996b）在对避难权利进行限制的同时，极右势力最重要的国会权力之外的组织（extraparliamentary organizations）也被禁止了，禁止展示新纳粹符号的新法令被采纳了。而且，极右势力的各个政党受到国内安全部门日益增加的监督，积极分子受到开除公职的威胁。

此外，从运动结果的角度来看，情形是模糊的。作为一种存在于德国的话语与制度实践中的关于公民权和国家认同的强势种族要素作用的结果，极右势力的种族——国家主义要求对移民和对外政策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要求通过对实际动员的抢先占有与回应的混合而发挥作用。同时，极右势力通向政治体制的政治机会是被限制和受压制的。用盖姆森（Gamson）的术语来说，就是当德国极右势力十分成功地获得了新的利益——并且阻止了与德国公民权的种族概念相联系的实际利益丧失——它就接近于失去在政治体制内作为一种合法的行为者而被接受的可能。

这里有另外一种要素有助于解释德国极右势力的相对而言的缺点，这一要素对德国政治文化投之以一种更加肯定的态度，并且与意大利的



形势形成对照。越过西德发展的进程，一种关于国家认同的重要的公民——政治因素紧随着——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地与之对立——种族-文化传统而成长起来。如果一个人将近来的公共舆论数据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数据相比较，德国或者至少它的西半部分在政治文化上已经经历了一种转变，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对民主的满意度和对其制度的支持度，也包括政治参与和兴趣的水平，都可以和古典的自由民主政治相比较。（参见Klingemann and Fuchs 1995）在20世纪50年代，当被问及“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时，大多数的回答者提到的仍然是专制王国或者甚至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经济体制和“民族特征”被认为是“国家自豪感”的主要来源，目前，联邦共和的自由民主拥有广泛的支持，被认为在德国所有过的制度中是最好的（Greiffenhagen 1984）。因而，国家认同的一种新的、公民形式已经发展起来，这种形式被描述为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尽管更为晚近，当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对政治制度，尤其是对政治党派的不满已经有所增加时，政治厌倦（Politikverdrossenheit）在德国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不像在比利时、奥地利或意大利——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普遍。

然而，这个问题对前西德而言，显然比这个国家的东部更加真实，东德的居民几乎没有任何民主的经验，在那里，作为与统一进程相伴随的社会和经济混乱的一个结果，对政治体制的不满更加普遍。这当然是东德极右势力的毒性更大的原因之一。然而，在政党政治的水平上，极右势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东德选区成功地取得重大的进展。更准确地说，反体制的批评被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所规导，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前身是东德共产党（East German Communist Party），东德共产党对外来者持明确的肯定立场，这一立场是植根于社会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主义传统之中的。这种由极左派对反体制的观点进行整合的稳定程度仍然有待讨论。前东德经济危机的延续将为极右势力获得这种潜力而提供机会，这并非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暂时可以得出结论：国家认同中的种族——文化成分为



极右势力的某些种族中心主义思想提供了话语机会；同时，大多数德国人和政治精英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强烈认同形成了强大的阻力，抑制着直接反对自由民主的话语。如果一种极右势力在德国有生存空间，它将成为这样一个派别：将对适用于德国人种的民主的强烈认同，与一种排斥异族人种的图谋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仍然称此党派为极右势力，那么德国确实如此：前文所描述的方案是恰当的制度实践，也是现存保守派政见的重要组成部分。

### 意大利：极右势力在制度中的惊人进展

1994年，极右势力在意大利的选举中获得的一定程度的成功，在欧洲是前所未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民族权利（The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 Destra Nazionale）（MSI - DN）与北方联盟（the Lega Nord）（Northern League）是极右势力中首先参加民主选举，并作为较小的合作伙伴进入联合政府的党派。我们并不认为像意大利这样的事件是一种例外，而是认为，造成这样非比寻常的成功——极右势力获得认可——的因素，反映着影响政治运动（由这类集体行为者所发起的）的潜力的一般条件。下面的讨论涉及战后意大利极右势力动员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共和国时期；第一共和国垮台和1994年选举；1994年选举之后出现的第二共和时期。

长期以来，第一共和国政治文化的公民基础因政治学家们而声名狼藉，它在公民文化理论家的检验中彻底失败，公民文化理论家认为它是由异化（alienation）或非理性的信念所驱动的，或是以当前不存在的事物为导向的。（La Palombara 1965；Almond and Verba 1963）这种对意大利政治文化的片面看法没能解释第一共和国政治体系的持久性特点，以及为什么尽管在欧洲对民主有着持续的严重不满<sup>[6]</sup>，选民们仍继续承认其政治体系的实践具有充足的合法性。不考虑这种“合法性缺失（legitimacy gap）”，能说明政治体系稳定性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经济上的成功和

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1974-1975 年经济危机后，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 1976 至 1990 年间增长了 50% 以上，比欧洲成员国平均值高出 6 个百分点。(Ginsborg 1996: 21) 在关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舆论跟踪数据中，意大利人显示出的满意程度与其他欧洲人实际上是相同的。(Morlino and Tarchi 1996: 49)

基督教民主党 (Christian-Democratic) (DC) 控制的国家和它的公民之间的关系部分地解释了这个悖论——尽管长期存在合法性缺失，这种政治体系仍能存活。在一个国家中的庇护关系结构 (the clientelistic structuring of relationships) 由一个核心政党的认同所支配时，意味着人们是在政党之间而非在国家内理解自身利益的。甚至执政党的支持者也能够基于公民的理由谴责国家在供给上的总体缺失，而同时仍然对政党保持着忠诚。这些因素使那些认为意大利政治文化是“非理性”的主张相对化了，而且能使我们认同一种南欧或地中海的公民价值的变体。

值得提及的是，与德国相比较而言，在第一共和国宪法中表达的官方道德是一种反法西斯主义传统的合法表述。与德国的宪法爱国主义是近来的发展成果相反，这种官方道德在意大利第一共和国中是一直存在的尽管是从属型的文化密码，此一文化密码由“反抗的一代 (resistance generation)”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保存下来。(Ginsborg 1996)

第一共和国由基督教民主党统治了 45 年，在国内政党的协商过程中有组织地将意识形态的左右两极排除在外，组建了多个联合政府。通过一系列抢先反对被排除在外的左右两极的特殊策略，和通过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促进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督教民主党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对于意大利社会运动而言，在国家层面上很少有制度性的机会，尽管在地方层面上它们拥有有限的机会。意大利选举制度中严格的比例原则意味着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国会和上院中永远拥有议席，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辩论和委员会层面施加影响。<sup>[7]</sup> 从 1953 年到 1994 年，意大利社会运动承继了法西斯主义的萨洛共和党 (Fascist Salo Republic) 的人员、血统和遗产，在国家选举中获得了 4.5% 至 8.7% 的选票。这种成绩

是基于一系列明确的新法西斯主义政策之上的，这些政策包括：种族国家主义；权威原则；法律和秩序；要求扩大国家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作用；运用经济处罚和武装力量来维护公共秩序；抵制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多元的政党政治。意大利社会运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根据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分裂而被清晰地界定。在冷战时期，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Communist Party）（PCI）的出现对意大利社会运动形成了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这样一种刺激性的认同。

然而，行使权力的制度性机会受到了极为严格的限制，由于基督教民主党炽热的冷战反共情结以及“失败了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模式缺少合法性，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政治要求被漠视。战后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功基于一种强烈的法律和秩序的政治纲领。的确，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在任何人面前”（Fronte dell'Uomo Qualunque）（一场人民党的反传统政治的运动，在战后初期获得过短暂的成功）的组织动员方面的无能要归因于基督教民主党的抢先占据的策略。（Tarchi 1996）政治权力总是由处于意识形态中心的基督教民主党所控制，这为右派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使得意大利社会运动仅在发生政治危机时，能够填补空缺。1972 年对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选举支持达到顶点并不是偶然的，它尾随的是学生和工会的抗议和罢工。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国会控制之外的动员的螺旋式剧烈开展、年轻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和有组织的街头暴力，是左派和右派极端分子冲突的典型特征。（della Porta 1992）由于与在这些暴力动员浪潮中的右翼活动家保持着联系，后来又和追求一种“张力战略”（strategy of tension）的恐怖主义者联系在一起，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国会中的派系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启动了一场“进入”战略（“entryist” strategy）。它采用了自由多元主义的巧妙的掩饰，试图在政治框架内运作，同时与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力图推翻自由民主体制）的文化遗产保持着明确的联系。（Griffin 1996）虽然如此，政党体制下的国家统治权力仍对意大利社会运动的自由民主资质保持着不信任。如果由政治体制内组织资源的政治协商力量来评判的话，意大利社会运动只是一



种无足轻重的枝节问题。在整个第一共和国期间，意大利社会运动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激进分子的边缘性的前沿阵地存在。这些意识形态的激进分子致力于实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念。基督教民主党抢先占据战略的成功减弱了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法西斯主义怀旧版的强势潜能<sup>[8]</sup>。

被彻底地排除出统治性的政治框架和与统治性的政治框架在文化上的疏远，限制了意大利社会运动（MSI）发展出一种新右派的标志的机会，甚至在中立的政党体制国家的整合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社会抗议的浪潮挑战的时候，也是如此（della Porta 1996）。然而，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抗议者、反体制的挑战者和种族认同的遗传密码重要的携带者，一起成为了北方地方主义运动的发动者。

在地方抗议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例如力格·维尼达（Liga Veneta）表达了一种“地方种族主义的（ethnolocal）”集体认同来反对国家的经济支配权。他们的经济自主的要求将一种种族基础归因为区域上的归属理念（Diamanti 1993; D'Amato and Schieder 1995）。他们“想象了”一种由原始的纽带连结起来的地方性社群，来反对意大利国家的公民认同。在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的领导下，伦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将想象中的伦巴第（Lombardy）人的勤劳和创造性品质与腐败的核心州及南部的意大利人作以对比，核心州及南部的意大利人被污蔑为草泥坯块，被认为是懒惰和具有依赖性的。一种反体制挑战的种族中心主义基础从对南部意大利人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中获取营养，也演变为对外来移民和同性恋等文化差异上的不宽容。<sup>[9]</sup> 伦巴第同盟提炼出移民的种族差异，与意大利反对外来移民的暴力和排外的第一次浪潮是同时发生的。<sup>[10]</sup>

这些地方归属感的相对自主的表达，最终发展成一种更富政治策略的明确表述，在这种表述中地方被界定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地区的边界问题发展到了整个意大利北部，1990年形成了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这种情形为1992年联盟选举成功奠定了基础，在这次选举中，联盟在威尼托区（Veneto）获得了25.5%的选票，在伦巴

第获得了 23.6% 的选票。联盟发动了一场运动，反对核心州对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的渗透。它以脱离联邦相威胁，攻击政党体制的腐败和庇护关系，倡导联邦主义。

分析导致第一共和国垮台的原因不在我们的论述范围之内。然而，政党体制的崩溃可以看做为基于庇护逻辑和内部资源分裂所形成的国家的无能的产物，国家不能找到一种控制由社会再分配所引起的冲突的合法根据。（Statham 1996a, 1996b）在 20 世纪 80 年代快速发展，但内部的公共开支却超出了控制，政治精英的腐败和肆意挥霍加剧，1992 年 9 月，里拉（lira）就崩溃了。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它几乎被从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排除出去。（Ginsborg 1996）尽管长期存在公民文化合法性的缺失，政党体制的国家的整合能力仍然存活了下来，但最终还是垮下了。在政治腐败事件（Tangentopoli）中对政客、公务人员和商人进行的审判曝光后，第一共和国的垮台就成了一种国家的奇观。至 1993 年的年中，议会中有 447 个成员因行贿而被调查，总数达到 6 200 亿里拉，其中的 90% 被声称付给了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Statham 1996b）

除了由第一共和国的垮台给北方联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提供的制度性机会外，政治文化中的分裂和不确定性（这种分裂和不确定性曾被基督教民主党的霸权控制了如此之久）也为挑战者们提供了话语机会，使他们得以将框架整合进程引入到政治观念的主导性表述中。在由国家崩溃所导致的政治文化的真空过后，一个少有的竞争时期出现了，这种竞争在未来的挑战者中进行，这些挑战者试图填充政治领域右派认同的缺失。

荒谬的是，意大利社会运动已经将它的利益定位在政治体制的生存之中，而这种政治体制在战后时期曾将它排除在外。1993 年，意大利社会运动由于害怕从严格的比例代表制度中消失的耻辱，而不成功地反对选举制度中的变化（这种选举制度是由公民复决投票运动提议建立的）。在意大利政治文化的变化，尤其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和意大利共产党

(PCI) 改组为一个民主党，将意大利社会运动新法西斯主义的反体制挑战凸显为一种异教徒的错置时代的错误。与北方联盟相比较而言，意大利社会运动挑战者的主张与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危机并没有关联。甚至在1994年的选举中，意大利社会运动贴上了民族联盟 (Alleanza Nazionale) 的标签，他的政策方针仍然没有新的起色——他们有了一种清晰的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一种基于直接投票而不是议会的总统主义形式；国家在经济中的一种守护神的角色；通过一种国际协商使阜姆 (Fiume)、伊斯的利亚半岛 (Istria)、和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回到意大利。相比之下，北方联盟的挑战提供了一种对民族国家的失败的更为激进的批评。北方联盟的政策倡导通过财政手段和民主过程中的直接参与加强地方自治，为社会、经济和政府提供了一种联邦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路径。(Sznajder 1995)

北方联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在选举中获胜和进入政府的制度上的机会是由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 提供的，他吸收了基督教民主党的残余人员，试图重新组建一个倾右派 (center-right)。他通过与两个极右的挑战者签订选举协定实现了这个目的。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 (Forza Italia party) 就像一个商品一样，在几周的时间中通过他的电视网络进行包装和出售。(Statham 1996a, 1996b) 在1994年3月的选举中，意大利力量党获得了21%的选票，而民族联盟获得了13.5%的选票，北方联盟 (Northern League) 获得了8.4%的选票，组建了第二共和国的第一届政府。通过组建这两个联盟，贝卢斯科尼以一种清除左派、提高市场利率的策略，重组了倾右派。这种策略的一个侧面影响是使得极右的“挑战者”成为政治体制的“成员”。用盖姆森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获得了“接受 (acceptance)”，他们拥有了行使真正权力的可能。

贝卢斯科尼在建设优良政府 (pole for good government) 的旗帜下与意大利社会运动的结盟，是一种为获得民族团结的政治认同资源的获选策略，同时也是对法律、秩序和家庭的一种承诺。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意大利社会运动政治上的排外意味着它能够声称是在第一共和国中



的一个保持“双手纯洁 (clean hands)”的党派。贝卢斯科尼将意大利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合法的合作伙伴加以公开承认，这成为使得这个组织离开意大利政治文化中荒凉的隔离区的因素。在詹弗兰科·菲尼 (Gianfranco Fini) 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意大利社会运动在 1995 年的菲优吉会议 (Fiumi Conference) 上，提出了一个“后法西斯主义 (postfascism)”时代，努力阐释一种在政治体系中的主流的未来角色。<sup>[11]</sup>

贝卢斯科尼在追求自由 (“Pole for Freedom”) 名义下与北方联盟的结盟，是为了应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批评，更是为了应对脱离联邦或北方自治的威胁。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南部获得了很高的选举上的支持，在北方是北方联盟分裂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贝卢斯科尼通过协调两种不同的、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极右势力的挑战者，巩固了倾右派 (center-right) 的势力，这在选举上成功的，但在政务处理上却被证明是难以操作的，8 个月后，北方联盟的背叛导致了政府的解体。

相对于其他试图取代基督教民主党的右派而言，意大利社会运动和北方联盟 1994 年在选举上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与贝卢斯科尼的联合所提供的制度性机会。<sup>[12]</sup> 一旦北方联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 (在民族联盟的新形式下) 在新兴的第二共和国中成为政治体系的成员，他们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能力也就提高了。就两个党派能够动员种族中心主义的诉求 (种族中心主义的诉求在第一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中是被禁止的) 而言，这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北方联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动员已经促使移民的出现成为一个关涉由于文化差异而排除在外或接纳的公民权利的政治问题。先前，意大利倾向于将在劳动力市场非法移民的形成看做为一个需要更好的加以管理的技术问题。

在 1995 年，北方联盟明目张胆地在国家层次上将移民问题政治化为一个社会问题，北方联盟坚持如果没有极为严格的措施来限制移民，就拒绝通过迪尼 (Dini) 专家政府的预算。<sup>[13]</sup> 北方联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从一种敌视移民的气候中寻求利益，这种敌视移民的气候是由一个意大

利妇女被两个非法移民强奸这一事件的广泛宣传所引起，北方联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都非常积极地动员米兰（Milan）、佛罗伦萨（Florence）、都灵（Turin）当地的共同体来侵扰移民的住所和流浪者的定居点。北方联盟利用专家政府时期不稳定的权力平衡，在国家的层次上，挑战现行的移民政策。1990年的马尔泰利法（Martelli Law）颁布后，意大利的移民政策采取了一种社会融合的逻辑。这些政策标准为北方联盟所反对，北方联盟主张，将在意大利出现的非法移民视为罪犯<sup>[14]</sup>。北方联盟的要求包括：秘密而来的移民应被驱逐，应立即送到边界；那些试图重新进入而又被抓获的，应被判处长至3年的监禁；国家有权力判处那些拒绝出示证件的人以6个月的监禁。迪尼法令（Dini Decree）并没有同意北方联盟的所有要求，但它推行了迄今最为严厉的政策措施来反对移民。

这个例子表明，从挑战者到成员的转变，给予了极右势力以更大的能力，使之能将文化差异问题转化为关于公民权利的政治冲突。在关于如移民这样的论题上，北方联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最接近于对其政治要求获得一种“充分回应”的理想状态。极右势力的要求并没有直接转变为政策成果，但它通过团体网络进行动员的能力和就有争议的问题获得媒体注意的能力，为其他的政治角色设立了一套公共的议事日程，使之被迫加以回应。在意大利的案例中，移民问题政治化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针对移民和少数族群的一个更大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排外现象。这发生在一个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在之前已经展示了对外来者的宽容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移民问题的争论而已被植入意大利文化中的框架系统（framing），将意大利人和外籍人（extracomunitari）区分开来。在20世纪90年代，外籍人已经变成了一种对在民族共同体中拒绝给予成员资格的群体的轻蔑称呼，而意大利公民权的微弱的公民文化，在欧盟内部作为一种关于公民权的认同而获得了支持。北方联盟的要求是就公民权的国家概念中的这种框架整合而言的“文化工具（cultural tools）”的一种重要的提供者。



## 结 论

依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情形的研究证实了，在象征性的相互作用领域与战略上的相互作用领域作以区别的分析效用（这种相互作用在一种政治组织的挑战者和成员之间展开）。在意大利传统政党体制崩溃的背景下，在狭义的制度意义上的政治机会，对于解释意大利极右势力的动员成功和它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而被接受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德国极右势力向政治体制渗透的失败，与选举体制中的限制性障碍和它所遇到的组织和激进分子的压力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然而，仅仅使用这种路径，我们将忽略情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象征性领域（Symbolic realm）中的话语机会结构（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概念的引入，已经使我们能够说明，为什么尽管德国极右势力被从政治体制中排除出去，仍对官方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抢先占据的机制而发生，而不是作为实际动员的压力的结果出现。同样，在意大利，种族国家主义的挑战者缺少有利的话语机会可以解释，为什么民族联盟——战前法西斯主义的继承者——的参与在政府中的影响，在很多时期一直是相对有限的。在近来移民争论的背景下，北方联盟的种族地方主义挑战，能够从话语的和制度性的机会中获得最大的影响力。我们也许会将这样的话语的和制度性机会的不同结合体归结为由盖姆森（1990：29）所区分的四种类型的结果，如表1所显示的。

表1 话语的和制度性的机会和运动结果之间的关系

		话语机会结构	
		开放	关闭
制度性的机会结构	开放	充分回应	合作
	关闭	抢先占据	崩溃/边缘化

如果缺少话语的和制度性的机会，挑战者将发现它的理念和要求缺少支持，它也不能进入政治体制。尽管这并不必定导致挑战者的崩溃，如盖姆森的论述所表明的，但运动至少将被限制为一种文化的和政治的边缘存在。而当存在话语的机会，但政治体制是关闭的，此时挑战者将能够对公共讨论施加某种影响，但不能使自己成为政治游戏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德国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政治精英最可能采取的战略将是，通过吸收这些与统治性的利益和文化符号不相冲突的要求和挑战者的框架而抢先占据，同时将挑战者作为一个集体的行为者加以排除或者甚至是压制。在相反的情形下，存在制度性的机会，而话语的机会不太适宜，那么最有可能的回应是合作。这种精英战略给这些运动因素以某些进入政治体制的机会，如果这些因素愿意遵从游戏的现行规则的话，但这很少会造成实质性的让步。挑战者既获得机会又获得让步，这样的全面回应只有当既有制度性又有话语的机会时才能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极右势力有时接近这种两种机会兼有的理想状态——例如，北方联盟在关于移民问题进行政治争论时。然而，对官方政治的全面的有限影响（甚至当民族联盟和联盟北方联盟是政府成员时）仍然表明，存在重要的合作因素。

总而言之，话语的和制度性的机会都是必要的，但就一次真正成功的挑战而言，它们自身并不是充分的先决条件。一种开放的话语的机会结构会产生一种反主流文化，将不满的情感分散到大众之中，这对于政治精英的战略会依次产生某些影响，但仅仅当各种机会在制度水平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会使一场抗议性的社会运动获益。相反，制度性机会的展开，例如以一场政治危机的形式，将增加这些能够构建有益话语机会的挑战者成功的几率。对一个挑战者而言，这些机会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它的框架和集体行动作为一种与现存政治秩序不同的可靠而合法的选择方案而加以描述。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理论要点之外，大量阻止欧洲政治中极右势力的力量 and 影响增加的方法，也能从我们的讨论中得出。以我们的观点来看，

最恰当的反应方式并不是在战略领域进行压制或排除出国家体制。如德国的情况所显示的，极右势力能够对土著居民和没有直接进入国家体制内的移民共同体的关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对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一种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战略是，强化国家认同和公民权的公民基础，抵制复兴种族文化意义上的国家概念的诱惑。不幸的是，很多欧洲国家近来遇到了腐败丑闻和政府不称职的现象，如意大利就是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这种发展自然不适于强化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理念，这种发展因此也与这样一种观念不符，即在那些政治体系愈丧失信誉的国家（例如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极右势力愈为成功。此外，福利国家的持续衰落预示着将导致一个拥有很少公民社会权利的下层阶级的发展。而且，这样一个过程的可能结果是强化集体认同的种族国家主义资源，由这种种族国家主义资源填充由公民——政治容纳机制的腐蚀所形成的真空地带。

像这样的问题最可能变得与欧洲认同和欧洲公民权的概念构建联系得更为紧密，欧洲认同和欧洲公民权的概念构建当前远远落后于欧洲经济层面的一体化进程。现在，欧盟内部的寡头政治决策结构不允许公民的直接参与和施加影响，与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社会因素的滞后，难以激发公民-政治意义上的欧洲认同的形成。政策的目标反而是阻止从欧盟以外地区的移民，这种政策已经在宣布“欧洲堡垒 (Fortress Europe)”的到来，宣布在每个单个国家的内部，外来者的两个阶级“外籍者 (extracommunitarians)”与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民众之间会存在差异，分别享有不同的公民权利。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会造成对欧洲联盟 (Union-Europeans) 的这一想象共同体作以种族理解，这种种族理解隐含着潜在的能力，它能在国家和地方的水平上转变为盲目爱国者的情感和歧视。

## 注 释

[1] 这样的努力的限度能够很轻易地得到论证，这样的例子就在身边。极右派的种族国家主义框架，与对国家的种族完整性的客观威胁之



间的一致性是很重要的，我们认为极右派在那些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的地区是强大的，这种情况出现在在德国（外来人口 1992 年为 7.6%），而不是意大利（外来人口 1992 年仅为 0.9%；Eurostat 1994：8）。

[2] 极右势力动员经常采取以暴力对待少数族群和移民的形式，对极右势力动员的其他形式的详细解释，需要分别加以研究，强大的极右党派的存在与否在这种研究中将是一个解释性变量。（参见 Koopmans 1996d）

[3] 如我们在下一段落所讨论的，这两个假设分别被明确加以表述，由于国家概念经常是种族和公民因素的一种混合，在一种零和路径（zero-sum way）中，这两种因素并不必定相互关联。也要注意，我们使用的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运动概念，它包含了传统的政党活动，也包括无组织的暴力。从这种观点来看，社会运动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地位，它是同政治体系相对的、并进行挑战的局外者——这种地位经常但不是必须依赖制度之外的动员形式。

[4] 我们在这里借用了第亚尼（Diani）1996 年提出的“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概念。“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的传统概念（Snow et al. 1986；Tarrow 1994）阐释的是一个运动组织的价值与潜在选民的文化相联结的进程。第亚尼转而提出框架整合概念应限于“动员信息与政治环境的主要表现的结合上”。就我们目前的意图而言，这个定义是更为合适的，因为它在政治文化的背景之中确定框架进程的结果，这被认为是一个相互作用的领域，而不是为某一个集体行动者所拥有。

[5] 135 年前政治家马西莫·达泽里奥（Massimo d'Azeglio）说：“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这句评论经常被重复，是意大利政治文化内能引起共鸣的自我批评。（Griffin 1997）

[6] 1973 年至 1993 年间，对民主制度的运作相当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意大利人所占的百分比经常超过 24%，高于欧共体其他国家的百分比。（Morlino and Tarchi 1996：47）在 1987 年第 27 次欧洲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 poll 27）中，仅有 30.7% 的意大利人反映说，他们对他们

国家民主制度的运转是非常或相当满意的，这在 12 个成员国中的百分比是最低的。相比之下，西德位居第二，仅次于卢森堡公国 (Luxembourg)。西德人以 78% 的选票来表达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满意程度。(Flickinger and Studlar 1992: 9)

[7] 在国会中的出现并没有对分裂性势力起到限制性作用。例如，Veugelers (1994: 42) 注意到，意大利社会运动 (MSI) 与 FRI 合作，在国会中搁置了 60 多个修正案，而其最初的目的是阻止 1989 年提议的移民法的通过。

[8] 意大利社会运动在第一共和国中的新法西斯主义立场由两个研究的标题很好地表现出来：Il polo escluso，“被排斥的派别 (The excluded pole)” (Ignazi 1989)；Cinquant'anni di nostalgia，“50 年的怀旧恋情 (Fifty years of nostalgia)”。(Tarchi 1995)

[9] 根据官方的数据，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在意大利，种族主义者针对移民的暴力水平是比较低的。这个事实促成了官方的神话，即作为一个有着移民传统的国家，意大利人对移民是宽容的。(Balbo and Manconi 1992) 然而，在意大利北部，针对意大利的南方移民的歧视和仇外的暴力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使这个神话蒙羞。最近的 1989 年，一个南方的移民被北方人殴打致死。(Ford 1991: 67)

[10] 根据内政部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的官方数据，在警方的记录中，针对外来者的暴力和过激事件在 1990 年达到了一个清晰的顶点。(OECD 1995) 在意大利，针对移民的仇外动员浪潮“晚近”的出现，可以归因为外来移民为 1.4% 的相对低的人口比例，相比之下，在 1990 年，德国为 8.2%，法国为 6.4%，英国为 3.3%，(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2: 131) 也可以归结为的相对较晚的移民潮 (和北欧国家相比)，意大利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第一次成为净余移民的国家。

[11] 格里芬 (Griffin) 在非优吉文本 (Fiuggi text) (1996) 中的精彩分析展现了，对法西斯主义遗产的一种借鉴是怎样同对意大利危机



(从意大利社会运动到 AN 的组织的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的危机) 的预见结合在一起的。意大利社会运动的转变是在政治认同层次上的, 而不是在组织结构和人员层次上的, 组织结构和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Ignazi 1995) 同样, 它的成员的价值已经被证明与它在选举中的支持者是相当不同的。(Baldini and Vignati 1996; Tarchi 1996)

[12] 拉·瑞特 (La Rete) 领导的政党基于公共道德的公民基础上形成, 反对国家和黑手党 (Mafia) 的腐败, 这样的党派的失败, 表明第一共和国的终结是一场政体崩溃, 而不是由一场社会运动所挑战的结果。对政治腐败事件 (tangentopoli) 的正义斗争是由一小撮地方官员中的反对派精英 (counter-elite) 进行的。拉·瑞特不能将这种挑战转化为一种可行的政治运动, 这证明了意大利文化中公民基础的匮乏。

[13] 北方联盟击倒了贝卢斯科尼的政府, 在 1994 年过了 8 个月以后回到了一种反体制的批评。贝卢斯科尼的政府被一个专家政府所取代, 这个专家政府有效地得到了左派联盟和北方联盟的支持。这给予了北方联盟相当大的影响立法的讨价还价的权力。

[14] 在意大利, 如此之多移民隐瞒身份, 这是一个国家在管理和政策上的失败。这个国家从移民的劳动中获益, 但却不规定移居者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说, 在第一共和国, 非法移民的存在被官方视为正常的, 被认为仅是一个需要加以更好管理的问题。



# 结语：社会运动从互动到结果

查尔斯·蒂利

贝纳利·卡尔坎 (Benali Kalkan) 出生于土耳其 (Turkey)，1982 年在没有正常证件的情况下进入了法国。之后的几年中贝纳利·卡尔坎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就职于一个自称合法的企业。他在法国顺利发展，而且娶了一位法国太太。但是他并没有获得在法国的合法居住权。因此，在到达后的 10 年中，他在一场生动的政治戏剧中成了一个主角。

1989 年，对于欧共体 (European Community) 关于外来移民的协议、来自非欧共体国家的移民的庇护请求的日益增长，和右翼民族阵线 (National Front) 反对外来移民的呼声，法国政府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对之做出了回应：法国政府宣布它将加快庇护申请的过程，并将那些没有合法居住权的隐藏的移民尽快驱逐出境。政府的举措危及到了没有获得合法居住权的移民的利益，例如贝纳利·卡尔坎。与移民和庇护问题有关的一个协会组织的领导者，立即开始广泛咨询、动员和鼓励，支持对政府的举措进行抵制。那些被拒绝的庇护申请人开始向协会总部求助。作为回应，那些与移民和庇护问题有关的组织为那些遭拒的申请者提供集体服务，并为他们而开始恳求政府官员。

不久，移民活动家们和种族主义的领导人用法国人的方式组织了一场社会运动：举行公共集会，吸引工会的注意，寻求媒体的报道，尤其是以公共的或其他方式将其请求提交给民族国家的代理人。1991 年，他们的主要要求是：全部接受 1990 年前来到法国的受拒者，全面审查所有 1990 年之后来到法国的人的档案。同时，这些领导人按照职业和民族

血统组织移民支持者。在这些活动家中，土耳其人和海地人表现（Haytian）最为突出。地区性的组织形成了全国性的联盟，它们的政治目标是在巴黎的政府。

那么贝纳利·卡尔坎呢？在受到波尔多（Bordeaux）（法国吉宏达（Gironde）省的省会，位于法国的西南部——译者注）警方逐出国境的威胁下，他开始了一次绝食抗议——被关押的土耳其武装分子常用这种方式向看守者施加压力。不久，另外 24 个土耳其人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波尔多的主教为这个城市的绝食抗议者们提供了一个房间，使得他们有了来自天主教堂的象征性的和实质性的支持。通过一个正在波尔多度假的联盟代表，抗议者们与致力于“外来移民团结”的全国性的社团联盟进行了联合，地方性的抗议者们很快就在阿莱斯市（Alès）、杜省欧丹库尔（Audincourt）、瓦德瑞尔（Val-de-Reuil）、圣迪济耶（Saint-Dizier）、牟罗兹（Mulhous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巴黎等地都有了同伴。

正如约翰纳·施密特（Johanna Simeant）（我现在的叙述得益于他对社会运动的详尽研究）所说：

诉诸绝食抗议似乎是受到被拒者所能获得的贫瘠的资源与支持的限制，他们不得不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资源和支持的作用。对这些被拒者来说，他们没有什么钱，在法国也几乎没有可供随意消耗的文化资本，他们通常住在最差的房子里，他们最主要的资源来自于致力于外来者和难民团结的社团组织的支持，一般来讲，正是这些社团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他们与包容性的社会成员的主要联系。（1993：194）

绝食抗议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它们：

- \* 使得团结的社团对被拒者的支持回到了犹豫不决的状态中；
- \* 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行为模式；
- \* 形成了一种策略，教职人员由此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很容易



地进行合作，而不是作出一种公然的政治上的选择；

- \* 引起旁观者的同情与支持；
- \* 吸引媒体的关注；
- \* 使得问题的缘由在全国范围内公开。

抗议者维持着日常的治安秩序，并以更人道而不是合法的方式重新对问题加以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绝食抗议的选择（与军事示威、袭击公共设施或政府官员、在工作场所罢工或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相比较而言）隐含了和政府官员的合作。

在波尔多市的官员们失去了耐心，试图解散抗议时，大主教在警方夺门而入之际及时赶到，抗议者联合起来拒绝转移到医院，国家电视台的相机录下了全过程。不久，国家政府同意将驱逐时间推迟3个月，并改进了审查程序。1991年5月25日，达成了临时协定，而在谈判时，大约1万名示威者为了被拒者的利益——很多被拒者也在其中——游行穿过巴黎。

对绝食抗议的关注，促使人们将谈判代表的问题提上了国事日程。社团活动家们涉入了对当地危险事件的控制和操纵之中，并且一小部分抗议者掌握了非凡的平衡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领导人的机动空间。绝食抗议者坚持他们的权利，宁愿去承担风险，而政府发言人则明确宣称政府实际上是由优异的知识所驱动的。那些团结组织的代表们和政府官员就问题进行了协商，并有了胜利的迹象，但是他们担心在绝食抗议者中出现死亡的情况，因此他们敦促绝食抗议者暂停他们的绝食行为，等待协商的结果。然而，许多抗议者强烈坚持用牺牲来换取利益和自治权，认为至少应该多坚持几天。

最后，政府领导人取得了胜利；大多数地区的抗议者在5月28日结束了抗议行为。但是，组织的代表们继续和政府进行谈判。最后的结果是1991年7月23日的政府法令。这个法令远没有达到社团的最大要求，对于在1989年才开始来到法国的大多数寻求庇护者来讲，尤其如此。但是，在这项法令颁布的时候，这场运动已经瓦解了。作为后续的行为，

新一轮的绝食抗议从 1991 年 9 月持续到了 12 月，1992 年初、1992 年 9 月也都爆发了抗议运动。但它们都没有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大的影响。到最后一轮的抗议，政府实际上已经有了使用武力解散绝食抗议者的足够信心。

贝纳利·卡尔坎、他的土耳其的抗议伙伴、波尔多大主教、各个公职人员、电视台记者、法国民众自选的人员和遍及全法国的活动家们，这些人正在参加一场众所周知的社会运动，这是一场改变国家的非法移民政策的运动。虽然本书关注的不是事件的原因而是社会运动的结果，但是若没有对其运动过程的充分描述和解释，是没有办法去追寻如此复杂的社会进程的结果的。我会努力去解释为什么这是对的。我也将尽力在目前关于社会运动的原因及影响的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阐述对社会运动作何种解释是合理的。

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描述和解释正在法国发生的团结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情况，我们必须消除两种错误观念。社会运动的活动家们自己或多或少的有意地宣扬了这两种错误的观点，因而这对解释上述社会行为具有关键性作用。第一种观点：社会运动是团结的、统一的群体活动，而不是行为的集合。第二种观点是：就像个人和团体有自己的生命史一样，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持续的、自我约束的生命史。

上述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易令人误入歧途的。尽管社会运动经常促进现存群体的发展，也创造了关于它们过去的一致经历，(agreed-upon stories) 但是没有分析家能够想象仅群体和经历导致了运动的产生，就像观看足球比赛的观众不能想象比赛是一支足球队的独自表演。对所有的经历来说，它所能够告诉球队的是球队的光荣过去或先前一个奖杯决赛的反复争夺。一场比赛之所以成为一场比赛是由于两支球队、裁判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不用说教练、记者和联盟的官员。同样，社会运动也是由多个不断变化的行为者的有限制条件的、偶然的、相互的表演构成的。

社会运动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我们以明显存在于 1989 年到 1992

年法国团结运动 (French solidarity mobilization) 中的相互作用的形式来界定他们——社团和联盟的结构, 决心和关联性的公开展示 (如绝食抗议、示威游行), 通过大众传媒和秘密协商与政府官员接触, 呼吁不相关的公民的支持等等——那么, 在 19 世纪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社会运动的。即使我们坚持认为, 像新教改革 (Protestant Reformation) 或反对中国王朝延续的叛乱这样的动员中存在着相似的特征,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社会运动在 1800 年前是极少发生的, 之后成了西欧和北美普遍的政治活动 (在推广到地球其他地区之前)。然而, 在议会民主制推广到全世界的过程中, 它们迅速地奠定了自己作为提出集体要求方式的地位。

社会运动在与另外两种活动的紧密结合中形成, 这两种活动即选举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 它们同样要动用群体和历史经历, 但它们又不是由群体和历史经历组成的。的确, 社会运动从它们与选举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潜在关系中, 获得了它们作为提出诉求模式的效力。尽管这三者在时间安排、组织结构和协调方式, 以及参与者方面都不同, 但它们都是以同样一组集体要求为导向的、有着社会性联系的活动集合, 在此意义上, 它们都是合格的运动。

选举活动、利益集团政治和社会运动并不像有机体那样是由连续性的、独立的生命历史组成的, 但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塑造着连贯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 它们和战争、革命、足球赛、街头交易会、爵士乐即席演奏会等相似。它们都不是自生的团体, 它们都涉及许多复杂多变的因素, 它们先前的情形会制约它们后来的发展。历史的记录者和理论家们有时将战争、革命和其他事情的经历视作不断演变的自然史, 就像紫罗兰、蛤蜊、细菌这些生物的生命一样, 但这不应该迷惑我们, 迷惑社会运动的分析家们。

然而, 当我们接触到它时我们将如何鉴别它是一种社会运动呢? 它是以公众的名义对掌权者的一种持续的挑战, 公众生活在掌权者的司法权之下, 而社会运动通过反复公开展示公众的价值、统一、数量和承诺, 对掌权者进行挑战。从最小的层面说, 社会运动包含了抗议者和掌权者

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提出诉求经常涉及到第三方，如其他的掌权者、强制性力量、同盟、竞争者以及作为整体的市民。这种定义将政变、内战、起义、家族世仇以及其他许多形式的政治争端排除在外。它与工业冲突、选举活动和利益集团政治一样，都包含了某些相同的相互作用，但这个社会运动的定义并不与这些活动的范围完全相同。例如，许多选举的进行，既没有对掌权者持续的挑战，也没有反复公开展示公众的价值、统一、数量和承诺。

没有社会运动是不依赖外界的。任何社会运动都至少包含三种不同的人群：一是掌权者，他们是利益诉求的对象，最低的诉求是容忍运动的存在；二是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从不起眼的赞助者到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通常由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联系在一起；三是追随的民众，代表他们的参与者正提出或支持利益要求。这三者之间的角色是相互转化的，活动家们可以从追随的民众中脱颖而出，一个人民党的掌权者也可以离开其同事而与提出利益要求的民众结盟。但有时他们也会保持着明显的区别，如反对堕胎者声称代表未出生者利益的时候。大多数社会运动也包含其他的人员，如反对社会运动的活动家、有竞争关系的掌权者、警察、以及同情运动的民众。三个不同群体——掌权者、参与者和追随的民众——由于利益要求的提出而产生持续的相互作用，再加上牵涉其中的其他党派，就构成了社会运动。

提出这样一个定义，我暂时并不是在宣称定义的要素阐明了人们所感兴趣的或是对其发展很重要的社会运动的所有方面，包括人们所选择的公共认同类型、吸纳新成员的社会网络空间、以及社会运动的活动日程与社会变革的大体关系等。相反，我是在做缜密的分析：定义所确定的根据相似的因果关系运作的一连串的事件，就因果关系而言，与定义所排除在外的毗邻现象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与它们的邻近事物在经验上也是有区别的。定义没有真、假之别，但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有意义的定义都使用经验方法把有着共同的因果特征的现象组合在一起，把在因果特征上有重大差异的现象相互区别。我对社会运动

所做的定义的效用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则。

许多社会运动的分析家都反对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我的定义太宽泛，太狭窄，或是聚焦于社会运动的虚假特征——简言之，我的定义与他们所感兴趣的不一致。作为分析对象的社会运动的重要影响，已经造成了两种界定上的冲突：一是这个概念扩展到类似的现象，这种类似的现象在另一个时代被称为反叛、思想潮流、宗教复兴或其他事物；二是解释的重点转移到与社会运动不断发生重叠的现象上，如意识形态变化、认同建构等。

试举一个值得注意的向认同建构转变的例子。关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美国俄亥俄州（Ohio）哥伦布市（Columbus）爆发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南锡·惠蒂尔（Nancy Whittier）宣称说：

为了全面开展女权运动并使之持久，我建议从与之相关的集体认同而不是它的正式组织来界定女权运动。我们看到的女权运动，不仅仅是通过由其自己建立的组织，而且通过女权运动的非正式的网络和群体，以及能把这个运动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领域的女权主义个体的传播。这些组织、社会网络以及个人之所以成为构成一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信念、实践和确证自身的方式，这些信念、实践和确证自身的方式建构着女权主义的集体认同……集体认同的一个核心强调所有社会运动不断变化的本质，认识到斗争不仅存在于与国家的冲突中，也存在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1995：23—24）

在惠蒂尔（Whittier）看来，社会运动不仅仅依赖于推进集体认同的结构和进程，它们本身也是由这些结构和进程所构成，而不是一些由相关的结构、进程和集体认同所支持的要求和集体行为。有了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就不会惊奇惠蒂尔认为女权运动应该以发展源源不断的参与者为中心，正是这些参与者重塑着他们通过斗争和日常实践所共有的认同。



然而，惠蒂尔把社会运动定义为创造认同的结构和进程，却存在四种逻辑上的批评：

它含蓄地指出“共同忠诚于一组信念、实践和确证自身的方式”，这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至少应该是加以解释和辩护的。

它缺乏一个标准来区分（1）惠蒂尔所描述的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女权主义活动家相互作用的种类，和（2）其他情况，如家庭成员、宗教联系、家长式企业或公民身份，所有这些都涉及对一组信念、实践和确证自身的方式的共同忠诚，但绝大多数的分析家都拒绝将它们视为社会运动；而且，绝大多数分析家都否认这些其他情况具有社会运动的基本因果特征。

它允许一场社会运动在没有任何公众挑战的情况下出现。

它是通过释义而不是通过经验调查来证明惠蒂尔的主要观点——“社会运动是通过一定时期的公众冷漠来保持和发展的”——是正确的。

虽然（这一情况不久就变得很明显）惠蒂尔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自己的政治过程传统中的社会运动理论家们已经被误解了，但我认为以上四种批评对她的定义来说是难以成立的。但是，无论如何，要提出一个有争议的定义——惠蒂尔的或者其他人的——使分析家们坚持存在一个一贯的因果领域；描述和证明在这个领域和相邻领域的界限；论证这个定义在经验上是可以操作的；展示这些因果规则在这个领域内解释这种现象的有疑问的特征。因为没有社会科学法律机构或者是最高法院来判定这些概念，所以我所能做的就只是使我提出的定义能有效的阐明社会运动与众不同的因果关系特征，然后，考察这些用以分析社会运动结果的因果关系特征的含义。

而且，我对社会运动的定义是：以在掌权者管辖下的民众的名义，通过不断地公开展示民众的价值、统一、数量以及承诺，而形成的对这些掌权者的持续的挑战。在近来的一些描述中，所确认的社会运动的表现包括公众集会、示威、游行、创立包含特殊目的的协会和协会联盟、

大众传媒的声明、传单、请愿、公开张贴或穿戴认同符号、采用特殊的标语口号等。在西方国家，早在 19 世纪初，这些因素就已存在。尽管游行示威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只是间歇性的发生（而且有时根本不发生），但示威准确地浓缩了社会运动所具有的一些显著特征：公共空间的占用；与当局或他们的代表进行交涉；集体身份的投射；支持共同要求的表述；以及确证价值、统一、数量以及承诺的表现。

毫无疑问，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从事着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看起来与示威是截然不同的。警察和当局定期参与社会运动的互动，但却很少以挑战者或示威者的身份出现。活动家们经常把精力花在策划联合行动，建立联盟，与竞争者斗争，动员支持者，建立集体认同，寻求资源，游说，以及从事其他能够保持集体挑战能力的活动。然而，这些活动并没有把社会运动的互动与其他一些广泛意义上的有争议性的政治活动，包括战争、竞选活动和革命阴谋等区分开来。社会运动突出的特征在于对当局持续的挑战，以及当局对此的回应。在此过程中，至少有一个挑战者公开地展现 WUNC：价值、统一、数量和承诺。

WUNC 挺重要的。自从社会运动作为大众争辩的独特形式出现并普及之后，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当局、镇压力量、同盟、竞争者和旁观者）已经私下根据下列公式为挑战者选定了一种标准的计分卡：

实力=价值×统一×人数×承诺

如果这四者当中任意一个值为 0，那么实力就为 0，挑战将失去可信度。但一个因素的高值可以弥补另外一个因素的低值。正如法国的绝食抗议所证明的，一小群的活动者通过同时冒险或牺牲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价值、统一、数量以及承诺，往往与一大群活动者通过签署请愿书，携带徽章或在明媚的下午上街游行的效果差不多。相关的运作规则是这样的：

价值：严肃，衣着得体，与牧师和其他权贵联合，道德权威的认可，之前不公遭遇的证据。

统一：统一的制服，行进或活动的一致，呼喊口号，唱歌，欢呼，

挽臂，穿戴或携带相同的标志，对共同日程或认同的直接肯定。

数量：公众空间的占据，请愿书的呈送，复合群体的表现（如邻近的各个协会），通过投票所取得的数量支持的直接宣言，成员题字和金钱支持。

承诺：对高代价或风险的活动的坚持，宣称做好坚持的准备，抵抗攻击。

虽然过去展现这些特征的方式准确地说存在着变化（例如，在19世纪晚期，在棍棒上做标记部分性地取代了相互识别的旗帜），但对价值、统一、数量以及承诺的强调，从早期的社会运动史上就一直坚持下来。对这一准则的背离主要发生在对透明度的追求和对差异的刻意声明上，正如当持异见的部分人通过抵制游行命令打破表面的统一，或者当同性恋的激进者违反传统的标准而装扮成异性。

价值、统一、数量和承诺为何如此重要？又是怎样发挥作用呢？社会运动活动最初的一个令人迷惑的特征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与袭击一个缴税人员，开除一个接受低标准工资的工人，或以低于价格要求卖光高价的烤面包相比，社会活动的互动呈现出巨大的独特性：简简单单的一个提出诉求的会议基本上不可能完成挑战者公开宣称的目标。社会活动提出诉求最多是使它的活动规划持续影响许多同时或反复举行的会议、示威、游行、请愿、声明以及其他与诉求的客体相互作用的形式。严格地将之视为代表了一定利益要求的手段——目的行为，那么社会运动是无效率的，甚至是自我挫败的。

那么为什么社会运动会以民众政治的重要形式存在几乎两个世纪之久呢？如南锡·惠蒂尔这样的认同理论家们凭直觉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却说错了它的含义。他们已经承认，社会运动倾注了很多精力去进行共同认同的建设，但他们却认为认同建设之所以吸引如此多的关注，是因为它的内在满足或它对在社会运动中的个人参与的直接效用。共同认同建设经常吸引个人并使他们致力于社会运动。然而就参与者从认同建设中获得的所有满足和效用而言，作为公共诉求提出形式的社会运动，能



说明其持续性的关键过程，实际上是集体性和政治性的。

社会运动把公众要求的提出与集体认同的创造、声明以及配置联系在一起。社会运动远不止于对征税者的攻击、对不守规则的工人的驱逐和对高价粮食的夺取，而是要在国家政治中有效地建立起一个重要实体和认同。它们声称存在一群有价值的、统一的、数量众多的、忠诚的，并受侵害的利益要求者。那些特性增加了潜在威胁的合理性，利益要求者将用此潜在威胁的力量进入、联合或破坏现存的政治体制。由此，社会运动与选举运动、利益集团政治历史性的结合起来了。从19世纪30-40年代的宪章运动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环保运动，社会运动已经依赖于公众集体认同的声明。

不管社会运动的活动家和分析家如何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认同几乎从未预先存在，只是等待被激活。从挑战者的角度进行考察，社会运动的效果部分地取决于两种难以理解的事情。首先，当价值、统一、数量和承诺增长时，彼此几乎必然会相互抵触。例如，要获得数量，通常会要求在价值、统一和/或承诺上的妥协。组织者目前的长期工作包括整合临时的联合，阻止冒险的战术，协商在参与者所带来的多个议事日程中，哪一个在集体行动中能体现公众的声音，尤其是，在公众面前隐藏幕后的斗争。组织者几乎总是夸大他们同盟的价值、统一、人数和承诺。法国团结运动的组织者与抵制者在维持他们的联盟时面对的恰恰是这样的困难。

第二，运动活动家努力将他们自己和（如果不同的话）他们所关心的对象，表现为一个紧密的群体，更适宜地说是一个有着长期历史和公众诉求形成的范围之外的内在联系的群体。尽管存在强有力的反面证据，法国团结运动的组织者试图将被拒绝者当做一个有一致性的整体来进行描绘。从那种意义上讲，活动家们同想要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相似，这些民族主义者为他们的民族建构着他们悠久、连续而独特的文化历史。因而，女权主义者将自身和过去在大街上和日常生活中追求权利的妇女们视为一体，公民权利运动的领导人在他们的人群范畴之内将阶级和宗

教差异最小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将绝大多数的人类视为永恒的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群体。

这两种难以理解的事情一直伴随着几种不同的民众。它们鼓励激进分子和支持者过高估计这样的可能性：追随者会为这项事业承担风险和代价，而他们的付出将会获得回报。它们也告诫当权者、被控者、反对者、竞争者以及旁观者要严肃地将运动视为一种会影响他们命运的力量。

从一小撮恐怖分子大胆组织的自我陶醉的实验，到恳求那些希望当局知道其意见的临时的参与者在请愿书上签字，在给予这些不同的观众以相应的关注时，运动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一场社会运动的过程中，这些取向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例如，从内部建设转向同竞争者和敌人的抗争。但是，作为一种公众诉求形成方式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其整体效果取决于可信赖的集体行动者的结构，这些行动者能够打破现存的政治安排。由于集体认同建设的过程经常将现存的网络结合在一起，并产生持久性的组织，众多的参与者、观察者和分析家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社会运动只是实现了之前存在的认同。

一般而言，如果我们考察政治认同的实质，社会运动与共同认同的独特关系将会变得更加清晰。一种认同首先是指一个行动者拥有共同社会关系的经历。一种政治认同是指一个行动者对于拥有共同社会关系的经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中，至少一方——包括三方——是政府或政府的代理人。政治认同通常会随着共有的关系和经历的公共表现而成倍增长。因而，在不同的时期相同的人会代表不同的人群，如工人、当地居民、少数民族、女性、市民、同性恋、派系和其他的把自己与其他人分开的人群。在每种情况下，他们都投身于建立价值、统一、人数和承诺的验证性的活动，举例来说，就是一起游行，佩戴徽标，咏唱团结歌曲，或者喊口号。

在明朗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在论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集体认同与镶嵌认同（embedded identities）是一致的，而镶嵌认同表达着人们的日常的社会生活信息——人种、性别、种族、地域、血统等等。我们知道

镶嵌认同并非源自于任何本能的满足、必然的性格、或感情的深度，而是因为它们在日常的社会交换活动中发挥作用。观察者们倾向于将源自于镶嵌认同的集体复仇、虚伪掩饰、设置障碍、相互控制等划分为“自发的”或“传统的”形式。当特定社会纽带和领域的选择性防御实际上是以他人为代价推动社会动员时，观察者们通常也把镶嵌认同的主要因果机制设想为个人自我意识的转化形式。尽管镶嵌认同通常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若其受到掌权者和敌人的攻击时，镶嵌认同，如宗教关系的、种族性的镶嵌认同将成为激烈而又广泛争论的基础。新教改革和苏联解体恰恰折射出了镶嵌认同的此种激发作用。

在其他条件下，人们会转向分离认同 (detached identity)，这些认同很少或从未支配日常的社会关系。分离集体认同通常包括协会的成员资格、所谓的民族、合法的人群类别 (譬如少数民族、种族、残疾人)。在这些情况下，参与者比镶嵌认同者们会更有选择性的求助于明显的社会纽带。一般来讲，政治家对于分离认同的激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贝丝·罗伊 (Beth Roy) 对孟加拉的 (Bengali) 村民怎样将当地的冲突重新定义为联合印度教徒 (Hindus) 反对穆斯林 (Muslim) 所做的分析，很好地说明了这样的政治家的调停动员：来自特定村庄的政治家们干预的越多，他们卷入国家政治的程度越深，他们通常援引的可认识的范畴也越多。

镶嵌的和分离的集体认同之间的区别是一个连续体的终结点。例如，“公民”的集体认同游移于二者——象征性地塑造雇主和工人间的关系与强烈地影响政治参与——之间，但是，对于其他的广泛的社会事务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镶嵌/分离认同的区别都否定了在政治学的争论中广泛使用的两种理解认同的普遍的 (也是矛盾的) 方法：要么作为先前存在的简单的激活物，甚至是作为基本的个人属性，或是作为在社会组织中很少或是没有基础的纯粹的逻辑建构。从镶嵌的到分离的，集体认同类似于语言的类型，促成着融洽的人际合作，但是在内容、形式以及适用性方面却是依情况而不断变化的。

通过讨论、内部的组织或特权的获得，分离认同得到了加强。分离认同在日常的社会关系中也会变得很明显，但分离认同是从别处开始的。在从1903年到1981年的政治变动中，南非国家形成并认可了在社会事务中突然大量出现的各种种族概念。最终，这个国家和它的多个代理者在所有人口中划分出祖鲁族人（Zulu）、科萨人（Xhosa）、南非白人（Afrikaner）和有色人种（Coloured）等族群，这些族群已经在日常的社会关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Ashforth 1990；Marks and Trapido 1987）因此，最初的分离集体认同变成了镶嵌认同。

通过明确种族边界，促进共同行动，社会运动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分离认同镶嵌于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和军队老兵在内的社会生活之中。这个过程也朝其他方向运转，推广和分离镶嵌认同，如当一个商铺的木匠们、另一个商店的机械师以及第三个商店的水管安装工作为一般的工人而联合在一起。然而，区别的重要性在于：认同的镶嵌或分离的程度强烈地影响着他们可资利用的知识数量、社会纽带关联的强度、各事项的冲突程度、不同场景竞争程度的舒缓和因此而来的不同组织策略的有效性。

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当向国家领域的重要转变正改变着民众政治时，镶嵌的和分离的认同之间的区分，与地方性的争论和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差别大体上是相对应的。（Tarrow 1994；Traugott 1995）在诉求提出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中，如让人蒙羞的仪式（如喧嚣的音乐 e.g., donkeying, Rough Music）、夺取成果、焚毁雕像等，人们通常配置集体认同是根据在社会生活中的流行事务：户主、木匠、邻居等等。我们通常称这些相互作用的形式为地方的（parochial）和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因为他们通常在社会关系的地方性网络中发生，付诸实践和理解方式也都针对那些地方性网络。他们也经常会采用一种保护性的形式，依赖请求享有特权的仲裁者来调节与更疏远的当权者的关系。

然而，在示威游行、竞选运动和公众集会中，参与者常常是作为政党的支持者、协会成员、公民和相似的独立集体身份出现的。这些标着

国家的、模式化的、自主的诉求提出的类型，都把注意力放在国家问题和诉求客体上，放在他们从一个场景或问题转换到另一个的标准上，以及参与者与掌权者们（掌权者们是参与者在日常的社会联系中所看不到的）直接对话的频率上。这种差异暗示着在包括参与者们、动员模式和组织行为自身在内的社会关系中的悬殊差别。这种从地方的、特殊主义的、通常是保护性的诉求形成形式，向自主的、国家的、模式化的诉求提出形式的转变被表述为社会结构上的深刻变革。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国家的、自主的、模式化的相互作用形式能够成为一个典范，诉求的提出者就可以在其他方面利用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如协调 19 世纪的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在特定地区或城市（如从 1848 年起在许多城市发生的斗争），甚至在公司内部（如工人们断断续续地采取街头罢工的形式来获得外部支持）。模式化促进了诉求形成模式从他们的试验场向深远的社会领域的转变。

在欧洲，这些诉求提出的主要模式的转变，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时间和速度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区域接连发生。总之，它构成了有争议的事项（repertoire）中最引人注目的变更。争论的事项类似于将特定的对话者组合彼此联系起来的对话集：远远小于政党所能容许的或政党的利益所要求的技术能力，也远不如通过彼此相互提出要求而产生的事项形式和变化丰富。就像会话，如果运作良好，他们就会呈现不断创新的特点，这些创新密集发生，足以在先前创立的模式下获得戏剧效果和可理解性；一种完全老套的言论或诉求提出模式除了作为一个笑话外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但是没有利用现存文化会话的言论或诉求提出模式也是无法与它的观众紧密连在一起的。就像通过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发展而成的经济制度，却在一些特定时间大大限制了经济关系的形式，事项会限制集体行动和相互作用的潜在可能性。（Nelson1995）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游行示威作为一种提出诉求的方式，其发展趋势是活动家们、警察、旁观者、竞争对手和政治官员以明确的方式组织、预测，并对也以这种方式提出的诉求做出回应，这与扔炸弹或贿赂的方

式形成的诉求形成了强烈对比。(Favre1990) 罢工、静坐、群众会议和其他的诉求提出方式将明确的认同相互联系起来，推动着不断的创新，最终改变着结构，但他们也积累起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知识、法律和实践标准。简单说，事项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并对文化成果有着并具有强大约束力的文化产品。

社会运动形成了一种特殊版本的国家的、模式化的、自主的活动事项，一个包含协会和联盟结构、公众集会、游行、请愿、游说、媒体表现和有关的各种互动形式。尽管存在着对直接行动的反复讨论，但社会活动家们通常避免以攻击、夺取、占有和所提要求的立即实现等方式采取直接行动。相反，他们通常将他们的共同努力集中在：

宣称在政治体制中存在一个流动性集团，具有有价值的、统一的、为数众多的、信守诺言、人员受欺凌的特点；

宣传那个集团对一个项目可能有的贡献，而此项目是需要公众加以认识和/或行动的；

推动当局启动该项目，以对抗集团的行动所造成的威胁（潜在的或明显的），集团的行动会破坏现有的政治安排；

说服当局意识到集团是一个合法的政治角色，当局自身也是集团所授权的对话者；

产生或改变运动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以及运动参与者与其他政治人物之间的联系；和改变运动的参与者和局外者对政治可能性的共同理解。

这些活动往往会对社会运动中的个人参与者随后的生活，以及将参与者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分别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社会运动的分析家通常都来自运动的参与者和同情者，是根据公开表达的要求来给运动的领导人在准备的积分卡上打分。马尔科·朱尼 (Marco Giugni) 的关于本书的导言以及本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假设活动家们提出了一系列集体要求，那么是什么决定着运动行为产生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些要求，或就此而言，结果是否阻碍它们的实现呢？

虽然社会运动的领导者通常确实是围绕他们公开宣布的活动项目组

织他们的公开事务，但社会运动仍必定会产生大量的预料之外的后果。而且，对于参与者来说，在公共权力事项方面，集体之外的影响明显也在增加。如果在 25 年前，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把接受（acceptance）与新的利益正确地强调为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必须在公共场合清楚表达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目标（1975），我们就会注意到核心要求都要涉及到他人的接受和福利——胎儿、犯人、可怕疾病的受害者、非人类的动物——而且，回顾以往，我们也会注意到，领导者和活动者经常争论残酷的社会运动的胜利成果，都不是在公共的、政治领域产生的，而是在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的重新定位方面。有时，运动的重大影响并不是通过他们项目的进步实现的，而是通过其他的后果——对参与者生活的改变、领导者之间的合作或甚至是重新加强压制——实现的。

社会运动也会在他们的项目之外留下一些副产品，有时这些副产品甚至互相矛盾的：新的警务人员和训练；相竞争的运动和组织的产生；法律体系、协会和公开性的改变；活动家与其政府组织或政治党派间的合作；社会运动组织向压力集团的转化；其他社会运动为随后的挑战而创立的先例。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探究社会运动的后果是如此的困难与充满争议。影响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社会运动过程中活动家们的明确的要求，而且有时也否定这些要求。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标准，都很难用“成功”和“失败”来描述绝大多数的影响的。

社会运动后果的追溯还存在更为复杂的地方。掌权者的自主行动、其他利益团体的介入、环境的改变以及对非运动政治的挤压，所有这些都会在既定的社会运动的行为和利益方面产生影响。社会运动行为之外的影响必定也会产生某些效果，在这样的情形下，多重的因果链造成一种可能的影响的过剩。

图 1 把逻辑上的情形图表化了，这三个重叠的圆圈分别代表了（1）运动行为的所有影响；（2）运动活动家提出的所有公共要求；（3）外部的事件与行动的所有影响。空白处 A 表示公共要求的共同理由与运动行为的效果，代表着社会运动后果的普遍意义：运动行为导致运动要求

得以实现，或没有实现：我们扩大对堕胎行为的保护，我们就会失去我们运动中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我们的领导人会被暗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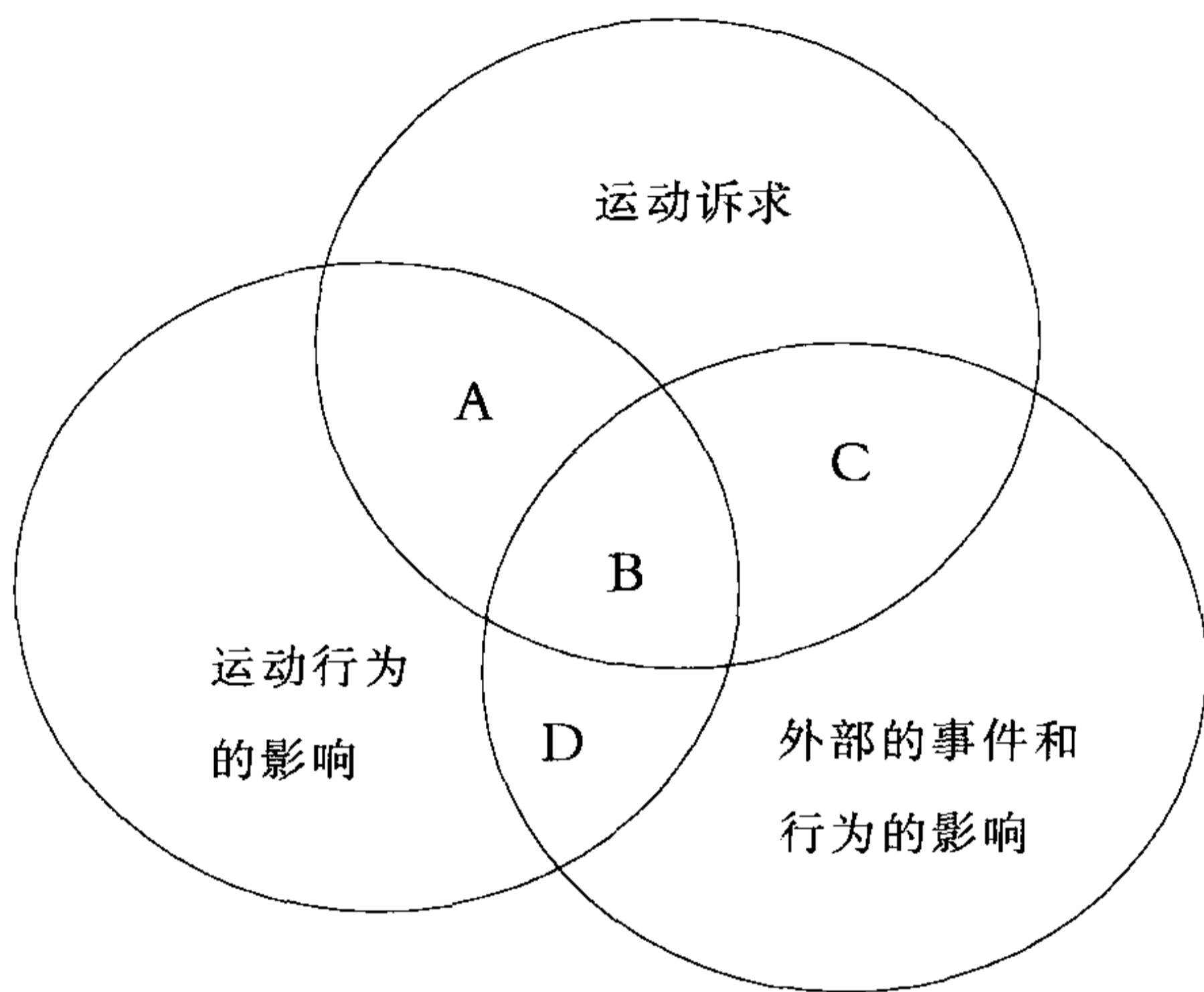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运动结果的确认问题

A=与运动诉求直接相关的运动行为的效果（但不是外部影响）

B=与运动诉求直接相关的运动行为和外部影响的共同效果

C=与运动诉求直接相关的外部影响（但不是运动的行为）所达成的效果

D=与运动诉求不直接相关的运动行为和外部影响的共同效果

然而，这个图表使一个分析者的逻辑错误立即变得明显了。B、C、D 处也都存在。没有归纳法——多变量的统计分析，是或否这种对比列表，有关结果的精密化——能解决这个问题，运动活动家通过对经验验证策略的详细说明所做的事后批评也不能解决，经验验证策略给予运动活动家的，会比他们所要求的还要多。归纳和移情的方法对于复杂问题的解释都会失败。

只有一种回应是可行的，那就是（1）建立清晰的因果过程理论，社会运动根据此因果过程产生它们的结果；（2）限制对这些理论产生的貌似合理的结果进行调查；（3）对结果的多个事例作逆向验证，观察假设



的因果链是否真正运作；（4）对运作中因果链条上的多个事例作正向验证，观察假设的结果是否发生及如何发生的；（5）检查链条内部各环节是否按理论规定的那样运行，这是中间步骤；（6）尽可能排除对结果所作的冲突性解释。

这六步解决方案与对社会运动结果的传统分析迥异，包括威廉·盖姆森的经典分析。威廉·盖姆森，寻求社会运动的属性与在其环境中的变化的一致性，而这种环境由社会运动的项目所要求的。它使社会运动的主要影响与运动的领导者提出的公共要求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无论如何，批判性的因果理论将不仅会涉及结果，也会涉及社会运动的相互作用。

我们需要处理这些复杂的因果理论吗？我们不需要。我先前提供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图表暗示了正确理论的一些可能的要素：分离认同的形成（正是由于分离认同，潜在领域得以存在于政治体制之中）、WUNC 的产生及其后果、集体互动（强化而不是破坏 WUNC）的反馈、合理的威胁——一个拥有 WUNC 的有组织的行动者将破坏已建立的政治安排、存在于现有的诉求提出事项（使戏剧变得可以理解）中的创新，等等。这不是在回顾历史和描述社会运动的解释性条件。但是这却是在强调只有有效的社会运动理论才能使分析家对社会运动的成果能够有准确的把握。

注：本章采用我的著作《持久的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的几段话，并且将我著作《作为政治表现的历史事件集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 as Historically Specific Clusters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s”）（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8 [1993-94]: 1-30）的观点作了尽可能的解释，使用了更丰富的例证。Marco Giugni, Francesca Polletta, 和 Viviana Zelizer 对我的之前的稿子给予了宝贵的批评。

## 参考文献

Abramowitz, Stephen I. , and Alberta J. Nassi. 1981. "Keeping the Faith: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of Activism Persistence into Middle Adulthood."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0: 507-23.

Aldrich, John H. 1995. *Why Parti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llison, Paul D. 1984. *Event History Analysis: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Event Data*. Beverly Hills: Sage.

Almond, Gabriel A. ,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menta, Edwin. 1991. "Making the Most of a Case Study: Theo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2: 172-94.

Amenta, Edwin, Bruce G. Carruthers, and Yvonne Zylan. 1992. "A Hero for the Aged The Townsend Movement, the Political Mediation Model, and U. S. Old -Age Policy, 1934 -1950.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308-39.

Amenta, Edwin, and Jane D. Poulsen. 1994. "Where to Begin: A Survey of Five Approaches to Selecting Independent Measures for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3: 21-52.



Amenta, Edwin, Kathleen Dunleavy, and Mary Bernstein. 1994. "Stolen Thunder Huey Long's Share Our Wealth, Political Mediation, and the Second New De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678-702.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rgersinger, Peter H. 1974. *Populism and Politics: William Alfred Peffer and the People's Part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Arnold, R. Douglas. 1990. *The Logic of Congressional A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sh, Timothy Garton. 1991. "Germany at the Fronti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7): 21-22.

Ashforth, Adall. 1990. *The Politics of Official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Aubert, Jean-Francois. 1983. *Exposé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 Suisse à partir de quelques affaires controversées*. 2d edition. Lausanne: Payot.

Auer, Andreas. 1989. *Le référendum et l'initiative populaires aux Etats-Unis*. Basel: Helbing und Lichtenhahn.

Avorn, Jerry L. 1969. *Up against the Ivy Wall: A History of the Columbia Crisis*. New York: Atheneum.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S. Baratz. 1970. *Power and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die, Bertrand, and Pierre Birnbaum. 1982. *Sociologie de l'état*. Paris: Grasset.

Balbo, Laura, and Luigi Manconi. 1992. *I razzismi reali*. Milan: Feltrinelli.

Baldini, Gianfranco, and Rinaldo Vignati. 1996. *Dal MSI ad AN: Una nuova cultura politica?* *Polis* 10 (April 1): 81-101.

Banaszak, Lee Ann, 1996. *Why Movements Succeed or Fail. Opportunity, Culture, and the Struggle for Woman Suffr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rber, Benjamin. 1984.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rkan, Steven E. 1984. "Legal Control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52-65.

Bashevkin, Sylvia. 1994. "Facing a Renewed Right: American Feminism and the Reagan/Bush Challeng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669-98.

———. 1996. "Tough Times in Review: The British Women's Movement during the Thatcher Yea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8: 525-52.

Bates, Tom. 1992. *The 1970 Bombing of the Army Math Research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Harper-Collins.

Battelli, Maurice. 1932. *Les institutions de démocratie directe en droit Suisse et comparé moderne.* Paris: 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n.

Baumgartl, Bernd, and Adrian Favell, eds. 1995. *New Xenophobia in Europe.*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Baumgartner, Frank R., and Bryan D. Jones. 1993. *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lush, Jewell, and Stephen M. David, eds. 1971. *Race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Praeger.

Berkowitz, William R. 1974. "Socioeconomic Indicator Changes in Ghetto Riot Tracts."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0: 69-94.

Betz, Michael. 1974. "Riots and Welfare: Are They Related?" *Social Problems* 21: 345-55.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Bindel, Julie, Kate Cook, and Liz Kelly. 1995.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Justice for Women: A Campaign for the 1990s." In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1990s*, edited by Gabriele Griffin, 65-76.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Bloom, David E., and James Trussell. 1984.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Delayed Childbearing and Permanent Child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21: 591-611.

Blum, Roger. 1977. *Die politische Beteiligung des Volkes im jungen Kanton Baseland (1832-1875)*. Liestal, Switzerland: KDMZ.

Blumrosen, Alfred W. 1993. *Modern Law*.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Bovenkerk, Frank, Robert Miles, and Gilles Verbunt. 1990. "Racism, Migration,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A Case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5: 475-90.

Brand, Karl-Werner. 1982.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Entstehung, Funktion, und Perspektive neuer Protestpotentiale*.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Breines, Wini. 1989. *Communit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New Left, 1962-1968: The Great Refusal*.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renner, Johanna. 1996. "The Best of Times, the Worst of Times: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pping the Women's Movement*, edited by Monica Threlfall, 17-72. London: Verso.

Brill, Harry. 1971. *Why Organizers Fail: The Story of a Rent Strik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ubaker, Rogers.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chman, Marlis. 1989. *The Script of Life in Modern Society: Entry into Adulthood in a Changing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ndy, McGeorge. 1989. "The Emperor's Cloth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20): 5-8.

Burk, Martha, and Heidi Hartmann. 1996. "Beyond the Gender Gap." *Nation* (June 10): 18-21.

Burstein, Paul. 1979. "Public Opinion, Demonstrations, and the Passage of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3: 157-72.

———. 1985. *Discrimination, Jobs,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1. "Legal Mobilization as a Social Movement Tactic."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1201-25.

———. 1993. "Explaining State Ac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Civil Rights: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6: 117-37.

———. 1998a. "Bringing the Public Back In: Should Sociologists Consider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Public Policy?" *Social Forces* 77: 27-62.

———. 1998b. "Interest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dited by Anne Costain and Andrew McFarland, 39-56.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Forthcoming. "The Impact of EEO Law: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In *Controversies in Civil Rights*, edited by Bernard Grofma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Burstein, Paul, Rachel L. Einwohner, and Jocelyn A. Hollander. 1995. "The Succes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A Bargaining Perspective." In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edited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275–9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urstein, Paul, and William Freudenburg. 1978. “Changing Public Policy: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Anti-War Demonstrations, and War Costs on Senate Voting on Vietnam War Mo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99–122.

Button, James. 1978. *Black Violenc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1960s Rio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9. *Blacks and Social Change: Impact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Southern Commu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yrne, Paul. 1996. “The Politics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Women in Politics*, edited by Joni Lovenduski and Pippa Norris, 55–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hn, Anne Hessian. 1971. *Eggheads and Warheads*. Cambridge: MIT Press.

Caldwell, Lynton K. 1984.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Emergence and Dimensions*.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Caldwell, Lynton K. , Lynton R. Hayes, and Isabel M. MacWhirter. 1976. *Citizens and the Environment: Case Studies in Popular A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armines, Edward G. , and James A. Stimson. 1989. *Issue 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roll, Susan. 1985. *Women as Candidates in American Poli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5. “A Mixed Verdict: The Impact of Women on the Crime Bil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Ill. , April 6–8.

Carson, Rachel. 1962.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astles, Stephen, and Mark Miller.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Macmillan.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1995. *News and Notes 2*. New Brunswick, N. J.

Charles, Nickie. 1995. "Feminist Politics,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State." *Sociological Review* 43: 617-40.

Chong, Dennis. 1991.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ristmann, Gabriela. 1996. "Zur kommunikativen Konstruktion und Rekonstruktion einer kologischen Moral." Ph. D. dis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akultt der Universitt Konstanz.

Clark, Robert Charles. 1977. "The Morphogenesis of Subchapter C: An Essay in Statutory Evolution and Reform." *Yale Law Journal* 47: 90-162.

Clemens, Elisabeth S. 1993. "Organizational Repertoire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omen's Group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 S. Politics, 1890-192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755-98.

———. 1997. *The People's Lobby: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lements, Kevin. 1988. *Back From the Brink: The Creation of a Nuclear-Free New Zealand*. Winchester, Mass.: Allen and Unwin.

Cloward, Richard A., and Frances Fox Piven. 1984. "Disruption and Organization: A Rejoinder." *Theory and Society* 13: 587-99.

Cockburn, Cynthia. 1977. *The Local State: Management of Cities and People*. London: Pluto.

Cohn, Samuel. 1993. *When Strikes Make Sense—and Why: Lessons from Third Republic French Coal Miners*. New York: Plenum.

Colby, David. 1982. "A Test of the Relative Efficacy of Political Tac-



tics.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 741-53.

Collins, Evelyn, and Elizabeth Meehan. 1994. "Women's Rights in Employment and Related Areas."

In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Law in Britain*, edited by Christopher McCrudden and Gerald Chambers, 363 /'07.

Oxford:arendon.

Commoner, Barry. 1958. "The Fallout Problem." *Science* 127: 1023-26.

Connelly, Marjorie. 1996. "Portrait of the Electorate: The Vote under a Microscope."

<<http://search.nytimes.com/web/docsroot/library/politics/elect-port.html>>. Available December 1996.

Cooney, Teresa M., and Dennis P. Hogan. 1991. "Marriage in an Institutionalized Life Course: First Marriage among American 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178-90.

Cooper, Mice. 1996. *Paradoxes of Peace: German Peace Movements since 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ortright, David. 1991. "Assessing Peace Movement Effectiveness in the 1980s." *Peace and Change* 16: 46-63.

———. 1993. *Peace Works*. Boulder, Colo.: Westview.

Costain, Anne N. 1992. *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 A Political Proce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ostain, Anne N., and Steven Majstorovic. 1994. "Congress, Social Movements, and Public Opinion: Multiple Origins of Women's Rights Legisl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7: 111-35.

Craig, Gordon A. 1988. *Geld und Geist: Zürich im Zeitalter des Liberalismus, 1830-1869*. Munich: Beck.

2011

- Cronin, Thomas E. 1989. *Direct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Recal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urti, Theodore. 1885. *Geschichte der Schweizerischen Volksgesetzgebung*. Zurich: Schrter.
- Curtius, Julius. 1919. *Ueber die Einführung von Volksinitiativen und Volksreferendum in die neuen Verfassungen der deutschen Staaten*. Heidelberg.
- Dahl, Robert. 1961. *Who Gover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67. *Pluralist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flict and Consent*. Chicago: Rand-McNally.
- .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ussell J. 1994. *The Green Rainbow: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Western Eur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mato, Gianni, and Siegfried Schieder. 1995. "Die Lega Nord: Zwischen ethnischer Staatsbürgerschaft und fderalem Projekt." *PROKTM* 98: 53-68.
- Daniels, Roger. 1971. *The Bonus March: An Episod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 Darcy, Robert, Susan Welch, and Janet Clark. 1995. *Women, 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DeBenedetti, Charles D. 1990. *An American Ordeal. The Antiwar Movement of the Vietnam Era*. Syracuse, N. Y.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ey, Gerard. 1996. "Beyond the Nation-Stat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A Response to Rex."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 no. 3.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socresonline/1/3/1.html>>.
- della Porta, Donatella. 1992. "Spirals of Revenge: Biographical Ac-

counts of Left-Wing and Right-Wing Radicals in Italy. ” *Politics and the Individual 2*: 87-98.

——. 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Movimenti collettivi e sistema politico in Italia, 1960-1995*. Bari, Italy: Laterza.

——. 1998. “Police Knowledge and Protest Policin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Italian Case. ” In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ited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Herbert Reiter, 228-5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Dieter Rucht. 1995. “Left-Libertarian Movements in Context: A Comparison of Italy and West Germany, 1965-1990. ”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229-7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Herbert Reiter, eds. 1998.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merath, N. Jay, III, Gerald Marwell, and Michael T. Aiken. 1971. *The Dynamics of Idealism*.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Deploige, Simon. 1898. *The Referendum in Switzerl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Diamanti, Ilvo. 1993. *La Lega: Geografia, storia e sociologia di un soggetto politico*. Rome: Donzelli Editore.

——1996. “The Northern League: From Regional Party to Party of Government. ” *The New Italian Republic: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Berlusconi*, edited by Stephen Gundle and Simon Parker, 113-29. Lon-

don: Routledge.

Diani, Mario. 1996. "Linking Mobilization Frame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sights from Regional Populism in Ita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053-69.

Dibbern, John David. 1980. "Grass Roots Populism: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a Frontier Community."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Dietz, Thomas, and Linda Kalof. 1992. "Environmentalism among Nation-Stat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6: 353-66.

Disney, Jennifer, and Joyce Gelb. Forthcoming. *Women and Politics*.

Dobash, R. Emerson, and Russell E. Dobash. 1992. *Women, Violence,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and Aaron Wildavsky. 1982. *Risk and 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owney, Gary L. 1988. "Reproduc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Negotiating Nuclear Power: 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nd Emergency Core Cooling."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8: 231-64.

Downs, Anthony. 1972. "Up and Down with Ecology: The Issue-Attention Cycle." *Public Interest* 28: 28-50.

Dunlap, Riley E., and Angela G. Mertig. 1996. "Weltweites Umweltbewusstsein: Ein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Theorie." In *Umweltsoziologie*, edited by Andreas Diekmann and Carlo C. Jaeger, 193-218. *K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no. 36.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Dunlap, Riley E., and Rik Scarce. 1991. "The Polls-Poll Trend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Protec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 651-72.

Duyvendak, Jan Willem. 1995. *The Power of Politics: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Fra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Duyvendak, Jan Willem, and Ruud Koopmans. 1995.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uclear Energy Issue."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Hanspeter Kriesi,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Marco G. Giugni, 145–6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asterlin, Richard. 1980. *Birth and Fortune*. New York: Basic Books.

Edelman, Murray. 1964.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77. *Political Language: Words That Succeed and Policies That Fai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hrenreich, Barbara, and John Ehrenreich. 1969. *Long March, Short Spring: The Student Uprising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Elder, Glen H. , Jr.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8. "Family History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ransitions: The Family and the Life Cour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Tamara K. Hareven, 17–6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lder, Glen H. , Jr. , and Avshalom Caspi. 1990. "Studying Lives in a Changing Society: Sociological and Personalogical Explorations." In *Studying Persons and Lives*, edited by A. I. Rabin, R. A. Zucker, R. Emmons, and S. Frank, 201–47. New York: Springer.

Elman, R. Amy, ed. 1996. *Sexual Politic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New Feminist Challenge*. Providence: Berghahn.

Elster, Jon. 1983.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Arguments for Constitutional Choice: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Jon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 303–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ILY's List. 1996. "The Backlash Begins." Notes from Emily (March): 1–2.

Epple, Ruedi. 1979. "Die demokratische Bewegung im Baselbiet um 1860: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irektdemokratischen Institutionen im politischen System der Schweiz."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t Konstanz.

———. 1997. "Der Paradigmenwechsel im Abstimmungsverhalten: Aspekte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es Kantons Basel-Landschaft." *Swiss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31–56.

Epstein, Steven. 1996.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qual Opportunities Review. 1996. Nos. 67–70. Manchester, England: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rie, Steven E, and Martin Rein. 1988. "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Politics of the Gender Gap*, edited by Carol McClurg Mueller, 173–91. Beverly Hills: Sage.

Eurostat. 1994. *Migration Statistics, 1994*.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vangelista, Matthew. 1990. "Sources of Moderation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In *Behavior, Society, and Nuclear War*, edited by Robert Jervis, Philip Tetlock, et al. Vol. 2, 255–3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The Paradox of State Strength: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Policy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1–38.

Fascell, Dante. 1987. "Congress and Arms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65: 730–49.

Favre, Pierre, ed. 1990. *La manifestation*.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

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Fawcett Society. 1996a. "A Woman's Place." Towards Equality (autumn) .

———. 1996b. Working towards Equality: Annual Report, 1995/96. London: Fawcett Society.

Feagin, Joe R. , and Harlan Hahn. 1973. Ghetto Revolts: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in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Fendrich, James M. 1974. "Activists Ten Years Later: A Test of Generational Unit Continu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0: 95-118.

———. 1977. "Keeping Faith or Pursuing the Good Life: A Study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144-57.

———. 1993. Ideal Citize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endrich, James M. , and Alison T. Tarleau. 1973. "Marching to a Different Drummer: Occupational and Political Correlates of Former Student Activists." Social Forces 52: 245-53.

Fendrich, James M. , and Kenneth L. Lovoy. 1988. "Back to the Future: Adult Political Behavior of Former Student Activ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780-84.

Fenno, Richard E, Jr. 1973. Congressmen in Committees. Boston: Little, Brown.

Ferejohn, John A. , and James H. Kuklinski' eds. 1990. 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erree, Myra Marx, and Beth Hess. 1994. Controversy and Coalition: The Feminist Movement across Three Decades of Change. New York: Twayne.

Ferree, Myra Marx,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eds. 1995.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

ple University Press.

Flam, Helena, ed. 1994. *States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Flickinger, Richard S. , and Donley T Studlar. 1992. "The Disappearing Voters Exploring Declining Turnout in Western European Elections. "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5: 1-16.

Fligstein, Neil. 199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y: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of the Causes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Largest Firms, 1919-1979. "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311-3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ley, Marian. 1996. "Who Is in Control Changing Responses to Women Who Have Been Raped and Sexually Abused. " In *Women, Violence, and Male Power*, edited by M. Hester, Liz Kelly, and Jill Radford, 166-75. Buckingham,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Ford, Glyn, ed. 1991. *Committee of Inquiry on Racism and Xenophobia: Reports on the Findings of the Inquiry*. Luxembourg: European Parliament.

Forsberg, Randall. 1984. "The Freeze and Beyond: Confining the Military to Defense as a Route to Disarmament. " *World Policy Journal* 1: 287-318.

Fox, Stephen. 1985. *The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 John Muir and His Legac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Franzosi, Roberto. 1994. *The Puzzle of Strik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eeman, Jo. 1993. "Feminism vs. Family Values: Women at the 1992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onventions. "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6: 21-28.



Frei, Christoph. 1995. "Direkte Demokratie in Frankreich: Wegmarken einer schwierigen Tradition." *Kleine Schriften* 22. Liechtenstein: Liechtenstein-Institut.

Frey, R. Scott, Thomas Dietz, and Linda Kalof. 1992. "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ful American Protest Groups: Another Look at Gamson's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368-87.

Friedman, Debra, and Doug McAdam. 1992.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vism: Networks, Choices, and the Life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156-7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uchs, Dieter, and Dieter Rucht. 1994. "Support for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Fiv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A New Europe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Chris Rootes and Howard Davis, 86-111. London: UCL Press.

Fukuyama, Frank.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3-18.

Gabriel, Oscar W. 1996. "Rechtsextreme Einstellungen in Europa: Struktur, Entwicklung, und Verhaltensimplikationen." In *Rechtsextremismus: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edited by Jürgen W. Falter, Hans-Gerd Jaschke, and Jürgen R. Winkler, 344-60.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no. 27.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Gaddis, John Lewis. 1987.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Hanging Tough Paid Off."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45: 11-14.

Gale, Richard E. 1986.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Countermovement, and Governmental Agencie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9: 202-40.

Gamson, William A.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l. : Dorsey.

———. 1988.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cross Cultures*, edited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219–44. Greenwich, Conn. : JAI.

———. 1990.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2d ed. Belmont, Calif. : Wadsworth.

———. 1992.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53–7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amson, William A. , and Andre Modigliani. 1987.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3: 137–77.

———.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37.

Gamson, William A. , and Emilie Schmeidler. 1984. "Organizing the Poor." *Theory and Society* 13: 567–85.

Garrow, David. 1978. *Protest at Selma: Martin Luther King and 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elb, Joyce. 1983. "The Politics of Wife Abuse." In *Familie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edited by Irene Diamond, 250–62. New York: Longman.

———. 1987. "Social Movement 'Succ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In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267–89.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Feminism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rke-

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5. “Feminist Organization Succ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edited by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128–3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Gelb, Joyce, and Marian Lief Palley. 1987. *Women and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6. *Women and Public Policies: Reassessing Gender Politic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Gerhards, Jürgen. 1993. *Neue Konfliktlinie in der Mobilisierung öffentlicher Meinung: Warum die IWF Tagung in Berlin 1988 zu einem öffentlichen Streitthema wurde*. Berlin: Sigma.

Gilg, Peter. 1951. *Die Entstehung der demokratischen Bewegung und die soziale Frage: Die sozialen Ideen und Postulate der deutschschweizerischen Demokraten in den früheren 60er Jahren des 19. Jahrhunderts*. Affoltern am Albis: Weiss.

Ginsborg, Paul. 1995. “Ital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odern Italy* 1: 3–17.

———. 1996. “Explaining Italy’s Crisis.” In *The New Italian Republic: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Berlusconi*, edited by Stephen Gundle and Simon Parker, 19–39. London: Routledge.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4. “From Universality to Difference: Notes on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Left.”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Blackwell.

Giugni, Marco G. 1994. "The Outcomes of Social Movement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orking paper no. 197,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N. Y.

———. 1995. "Outcomes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Hanspeter Kriesi,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Marco G. Giugni, 207–3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8. "Was It Worth the Effort? The Outcom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371–93.

Gmiirr, Hans. 1948. "Die Entwicklung der Volksrechte in der Schweiz." *Die Volksrechte* 10: 15–30.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chweizerischen Verwaltungskurse an der Handels-Hochschule St. Gallen.

Goertz, Gary. 1994. *Contex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dfield, Michael. 1989. "Worker Insurgency, Radical Organization, and New Deal Labor Legisl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1257–82.

———. "Explaining New Deal Labor Policy" [reply to Skocpol and Finego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1304–15.

Goldstein, Leslie E. 1988.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Women: Cases in Law and Social Change*. 2d 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Goldstone, Jack A. 1980. "The Weakness of Organization: A New Look at Gamson's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017–42, 1426–32.

Goodwin, Jeff, and Theda Skocpol. 1989. "Explaining Revolu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489–509.

Gould, Carol. 1988. *Rethinking Democracy: Freedom and Social Cooperation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ld, Roger. 1991. "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187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716–29.

———.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ephen Jay. 1995. *Dinosaur in a Haystack*. New York: Harmony.

Graham, Kennedy. 1989.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s of States: New Zealand*.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Greiffenhagen, Martin. 1984. "Vom Obrigkeitsstaat zur Demokratie: Die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Politische Kultur in Westeuropa: Bürger und Staaten i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edited by Peter Reichel, 52–76. Frankfurt: Campus.

Griffin, Gabriele. 1995.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1990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Griffin, Roger. 1996. "The 'Postfascism' of the Alleanza Nazionale: A Case Study in Ideological Morph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 123–45.

———. 1997. "Italy." In *European Political Culture: Conflict or Convergence?* edited by get Eatwell, 139–56. London: Routledge.

Grodzins, Morton, and Eugene Rabinowitch, eds. 1963. *The Atomic Age: Scientists and National and World Affairs: Articles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945–1962*. New York: Basic Books.

Gross, Andreas. 1983. "Die direkte Gesetzgebung durch das Volk: Die Utopie des Karl Buerkli (1823–1901): Ein Beitrag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direktdemokratischen Institutionen im Kanton Zürich."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Lausanne.

Gross, Edward, and Amitai Etzioni. 1985. *Organizations in Society*. En-

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Gruner, Erich. 1968. *Die Arbeiter in der Schweiz im 19. Jahrhundert: Soziale Lage, Organisation, Verhaeltnis zu Arbeitgeber und Staat*. Bern: Francke Verlag.

Gurney, Joan N. , and Kathleen T. Tierney. 1982.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Look at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3: 33-47.

Gurr, Ted R. 1980. "On the Outcomes of Violent Conflict."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edited by Ted R. Gurr, 238-94. New York: Free Press.

Gusfield, Joseph. 1980.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f Linearity and Fluidity." In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edited by Louis Kriesberg, 317-39. Greenwich, Conn. : JAI.

Habermas, Jürgen. 1984. *Teoria dell'agire comunicativo*. Bologna: Il Mulino.

———. [ 1962 ] 1990.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 Suhrkamp.

Hahn, Harlan. 1970. "Civic Responses to Riots: A Reappraisal of Kerner Commission Dat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 101-7.

Haines, Herbert H. 1984. "Black Radicalization and the Funding of Civil Rights, 1957-1970." *Social Problems* 32: 31-43.

Hainsworth, Paul, ed. 1992.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New York: St. Martin's.

Hall, Peter. 1993.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 275-96.

Hansen, John Mark. 1991. *Gaining Access: 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 1919–198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rdin, Russell. 1982.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arne, Lynne. 1988. "From 1971: Reinventing the Wheel." In '68, '78, '88: *From Women's Liberation to Feminism*, edited by Amanda Sebestyen, 63–71. Bridport, England: Prism.

Hart, Vivien. 1994. "Redesigning the Polity: Women, Workers, and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igh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designing the Stat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uly.

Harwin, Nicola, and Thangam Debbonnaire. 1996. "WAF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olence, Abuse, and Women's Citizenship, Brighton, England, 11 November.

Havel, Václav.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Václav Havel et al., 23–86. Armonk, N. Y.: Sharpe.

Heijden, Hein–Anton van der, Ruud Koopmans, and Marco G. Giugni. 1992. "The West Europe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he Green Movement Worldwide*, edited by Matthias Finger, 1–40. Greenwich, Conn.: JAI.

Heineman, Kenneth J. 1993. *Campus Wars: The Peace Movement at American State Universities in the Vietnam Er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Held, David. 1987.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Hernekamp, Karl. 1979. *Formen und Verfahren direkter Demokratie*. Frankfurt: Metzner Verlag.

Hester, Marianne, and Lorraine Radford. 1996. "Contradictions and Compromises: The Impact of the Children's Act on Women's and Children's

Safety. ” In *Women, Violence, and Male Power*, edited by Marianne Hester, Liz Kelly, and Jill Radford, 81–98. Buckingham,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Heussner, Hermann K. 1994. “Volksgesetzgebung in den USA und in Deutschland. ” *Erlanger Juristische Abhandlungen* 43. Cologne: Carl Heymanns Verlag.

Hicks, Alexander, and Duane H. Swank. 1983. “Civil Disorder, Relief Mobilization, and AFDC Caseload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Piven and Cloward Thesis.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695–716.

———. 1992.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Welfare Spending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1960–82.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658–74.

Hilgartner, Stephen, and Charles Bosk.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Problem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53–78.

Hobsbawm, Eric.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frichter, Jiirgen, and Karlheinz Reif. 1990.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13: 119–6.

Hogan, Dennis P. 1981. *Transitions and Social Change: The Early Lives of American Me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ollinger, David A. 1996. *Science, Jews, and Secular Culture: Studies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ltzman, Abraham. 1963. *The Townsend Movement: A Political Study*. New York: Bookman.

Hopf, Ted. 1993. “Get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rong.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202–8.



Huber, Evelyn, Charles Ragin, and John D. Stephens. 1993. "Social Democracy, Christian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lfare State: Towards a Resolution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711-49.

Huberts, Leo. 1989.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ovements on Government Policy." In *Organizing for Chang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Bert Klandermans, 395-426. Greenwich, Conn.: JAI.

Hunt, Scott A., Robert D. Benford, and David A. Snow. 1994. "Identity Fiel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vement Identity."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edited by Enrique Larana, Joe Gusfield, and Hank Johnston, 185-20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usbands, Christopher T. 1994. "Cri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the 'New Moral Panics': Political Agenda-Setting about Definitions of Nationhood." *New Community* 20 (2): 191-206.

Huygen, Maarten. 1986. "Dateline Holland: NATO's Pyrrhic Victory." *Foreign Policy* 62: 167-85.

Ignagni, Joseph, and James Meernik. 1994. "Explaining Congressional Attempts to Reverse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7: 353-71.

Ignazi, Hero. 1989. *Il polo escluso: Profilo del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Bologna: Il Mulino.

———. 1995. "Alleanza Nazionale? il MSI riverniciato." *Ideazione* 1: 64-68.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Forty-Three Societies. ”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57-71.

Isaac, Larry, and William R. Kelly. 1981. “Racial Insurgency, the State, and Welfare Expansion: Local and National Evidence from the Post-war U. 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1348-86.

Jackson, Keith, and Jim Lamare. 1988. “Politics,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national Crisis: The ANZUS Issue in New Zealand Politics. ” In *ANZUS in Crisis: Alliance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ed by Jacob Bercovitch, 160-90. London: Macmillan.

Jinicke, Martin. 1992. “Condi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Succes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Europe*, edited by Martin Jachtenfuchs and Michael Strübel, 71-97.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 ed. 1996. *Umweltpolitik der Industrieliinder*. Berlin: Sigma.

Jinicke, Martin, and Helmut Weidner, eds. 1995. *Successful Environmental Policy*. Berlin: Sigma.

Jasper, James M. 1990. *Nuclear Politics: Energy and the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Sweden,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asper, James M. , and Dorothy Nelkin. 1992. *The Animal Rights Crusade: The Growth of a Moral Protest*. New York: Free Press.

Jasper, James M. , and Jane D. Poulsen. 1993. “Fighting Back: Vulnerabilities, Blunders, and Countermobilization by the Targets in Three Animal Rights Campaigns. ” *Sociological Forum* 8: 639-58.

Jenkins, J. Craig. 1981. “Sociopolitical Movements. ”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edited by Samuel I. . Long. Vol. 4, 81-153. New York: Plenum.

———.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527-53.

Jenkins, J. Craig, and Barbara Brents. 1989. "Social Protest,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ocial Reform: A Political Strugg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891-909.

Jenkins, J. Craig, and Charles Perrow. 1977. "The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s' Movements (1946-19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249-68.

Jennings, Edward T. 1979. "Civil Turmoil and the Growth of Welfare Rolls: A Comparative State Policy Analysi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7: 739-45.

———. 1983. "Racial Insurgency, the State, and Welfare Expansion: A Critical Comment and Re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1220-36.

———. 1987. "Residues of a Movement: The Aging of the American Protest Gen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367-82.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Niemi. 1981.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Hank,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1995.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Johnstone, Diana.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missiles*. New York: Schocken.

Jones, Bryan D. 1994. *Reconceiving Decision-Making in Democratic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ppke, Christian. 1993. *Mobilizing against Nuclear Energy: A Comparison of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rgens, Helge. 1996.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von Umweltpolitik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n *Umweltpolitik der Industrieländer*, edited by Mar-

tin Jnicke, 59-11. Berlin: Sigma.

Joseph, Paul. 1993. *Peace 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aldor, Mary. 1983. "Beyond the Blocs: Defending Europe the Political Wa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1-21.

Kaldor, Mary, and Dan Smith, eds. 1982. *Disarming Europe*. London: Merlin.

Kasher, Steven. 1996.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 Photographic History, 1954-68*. New York: Abbeville.

Katzenstein, Mary Fainsod. 1995. "Discursive Politics and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edited by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35-52.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eller, Evelyn Fox. 1992. *Secrets of Life, Secrets of Death: Essays on Language, Gender, and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Kelley, Stanley. 1983. *Interpreting Ele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lly, William R. , and David Snyder. 1980. "Racial Violence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among Bl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58: 739-60.

Kerbo, Harold R. , and Richard A. Shaffer. 1992. "Lower Class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 Response of the U. S. Unemployed, 1890-1940." *Social Problems* 39: 139-54.

Kessler-Harris, Alice. 1994. "Feminism and Affirmative Action." In *Debating Action: Race, Gender, 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edited by Nicolaus Mills, 68-79. New York: Delta.

Kevles, Daniel J. 1978. *The Physicists: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Key, Vladimir Orlando, and Winston W. Crouch. 1939. "The Initiative and the Referendum in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6, 1936-1939: 323-592.

King, Gary,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gdon, John. 1984.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Boston: Little, Brown.

Kitschelt, Herbert. 1986.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57-85.

———. 1990.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ited by Russell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179-208.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 1993.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Theor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8: 13-29.

———.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landermans, Bert, and Dirk Oegema. 1987. "Potentials,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19-31.

Kleger, Heinz, and Gianni D'Amato. 1995. "Staatsbürgerschaft und Einbürgerung oder: Wer ist ein Bürger Ein Vergleich zwische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der Schweiz." *Journal für Sozialforschung*, 35 (3-4): 259-81.

Kleidman, Robert. 1993. *Organizing for Peace: Neutrality, the Test*



Ban, and the Nuclear Freeze. Syracuse, N. Y.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Klingemann, Hans-Dieter, and Dieter Fuchs. 1995. *Citizens and th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noepfel, Peter, and Helmut Weidner. 1986.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Clean Air Polic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gional Comparative Study." *Policy and Politics* 14: 71-91.

Knopf, Jeffrey W. 1993. "Beyond Two-Level Games: Domestic-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Arms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599-628.

Klz, Alfred. 1992. *Neuere schweizer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Ihre Grundlinien vom Ende der Alten Eidgenossenschaft bis 1848*. Bern: Verlag Stmpfli.

Koopmans, Ruud. 1993.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Waves: West Germany, 1965 to 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637-58.

———. 1995. *Democracy from Below: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West Germany*. Boulder, Colo. : Westview.

Koopmans, Ruud. 1996a. "Asyl: Die Karriere eines politischen Konfliktes." In *Kommunikation und Entscheidung: Politische Funktionen öffentlicher Meinungsbildung und diskursiver Verfahren*, edited by Wolfgang van den Daele and Friedhelm Neidhardt, 167-92. Berlin: Sigma.

———. 1996b. "Dynamics of Repression and Mobilization: The German Extreme Right in the 199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onflict and Extremism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Ein Bokek, Israel, December 8-12.

———. 1996c. "Explaining the Rise of Racist and Extreme Right Violence in Western Europe: Grievances or Opportun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0: 185-216.

———. 1996d.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Chang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 28-50.

Koopmans, Ruud, and Jan Willem Duyvendak. 1995.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uclear Energy Issue and Its Impact on the Mobilization of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Social Problems* 42: 201-18.

Kowalewski, David, and Paul Schumaker. 1981. "Protest Outcomes in the Soviet Un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2: 57-68.

Krauthammer, Charles. 1989. "Universal Dominion: Toward a Unipolar World." *National Interest* 18: 46-49.

Krehbiel, Kenneth. 1991. *Information and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Kriesi, Hanspeter. 1989.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the Dutch Peace Movemen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2: 295-312.

———. 1995.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ts Impact on Their Mobiliz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167-9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6.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a Political Contex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edited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152-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iesi, Hanspeter, and Marco G. Giugni. 1996. "kologische Bewegung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Zwischen Konflikt und Kooperation." In *Umweltsoziologie*, edited by Andreas Diekmann and Carlo C. Jaeger, 324-49. *K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no. 36.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Kriesi, Hanspeter,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Marco G. Giugni. 1992.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Opportu-

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2: 219–4.

———.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Kuhn, Thoma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znick, Peter J. 1994.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Crisis of Science: The AAAS Confronts the War in Vietnam. ”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Landais–Stamp, Paul, and Paul Rogers. 1989. *Rocking the Boat*. Oxford: Berg.

Langdon, Julia. 1997. “Hallo Boys. ” *Guardian* (January 6): 6–7.

Lange, David. 1985. “New Zealand’s Security Policy. ” *Foreign Affairs* 63: 1000–1019.

La Palombara, Joseph G. 1965. “Italy: Isolation, Fragmentation, and Alienation. ”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pp, Ralph. 1965. *The New Priesthood: The Scientific Elite and the Use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Lasby, Clarence G. 1966. “Science and the Military. ” In *Scientists and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David D. Van Tassel and Michael G. Hall, 251–82. Homewood, Ill. : Dorsey.

Leslie, Stuart W. 1993.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Science: The Military–Industrial Academic Complex at MIT and Stan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ster . 1996. “Discrimination Law in 1996. ” *Equal Opportunities Review* 65: 25–29.

Liang, Hsi–Huey. 1992. *The Rise of Modern Police and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from Metternich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eberson, Stanley. 1991. "Small N's and Big Conclus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ing in Comparative Studies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Social Forces* 70: 307-20.

Liebeskind, Wolfgang-Amédée. 1952. "Un débat sur la démocratie genevoise." In *Mélanges Georges Sauser-Hall*, 99-107. Neuchâtel, Switzerland: Delachaux et Niesté.

———. [1938] 1973. "La république des provinces-unies des Pays-Bas et le corps helvétique." In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traditions nationales*, edited by Wolfgang Amédée Liebeskind, 286-309. Geneva: Georg.

Lipsky, Michael. 1968. "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1144-58.

———. 1970. *Protest in City Politics: Rent Strikes, Hous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Poor*. Chicago: Rand McNally.

Lo, Clarence Y. H. 1990. *Small Property versus Big Govern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fland, John. 1993. *Polite Protesters: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of the 1980s*.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Lohmann, Susanne. 1993. "A Signaling Model of Informative and Manipulative Politica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319-33.

———. 1994. "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al Cascades: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in Leipzig, East Germany, 1989-91." *World Politics* 47: 42-101.

———. 1995. "A Signaling Model of Competitive Political Pressur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7: 181-206.

Lovenduski, Joni. 1986. *Women and European Politics: Contemporary*

Feminism and Public Polic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1996. "Sex, Gender, and British Politics." In *Women in Politics*, edited by Joni Lovenduski and Pippa Norris, 1–1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venduski, Joni, Helen Margetts, and Stefania Abrar. 1996. "Sexing London: The Gender Mix of Policy Act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 August 29–September 1.

Lovenduski, Joni, and Vicky Randall. 1993. *Contemporary Feminist Politics: Women and Power i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wi, Theodore J. 1969. *The End of Liberalism*. New York: Norton.

———. 1971. *The Politics of Dis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9. *The End of Liberalism*. 2d ed. New York: Norton.

Lukes, Steven.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Luthardt, Wolfgang. 1994. *Direkte Demokratie: Ein Vergleich in Westeuropa*.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Lyttle, Bradford. 1988. *The Chicago Anti–Vietnam War Movement*. Chicago: Midwest Pacifist Center.

Mackay, Fiona. 1996. "The Zero Tolerance Campaign: Setting the Agenda." In *Women in Politics*, edited by Joni Lovenduski and Pippa Norris, 208–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millan, Stuart. 1987. *Neither Confirm nor Deny: The Nuclear Ships Dispute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Magraw, Katherine. 1989. "The Nuclear Weapons Policy Debate in the 1980s: A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Congr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Georgia, September 2.

Mansbridge, Jane J. 1992. "A Deliberative Theory of Interest Repre-

sentation. ” In *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 edited by Mark P. Petracca, 32–57. Boulder, Colo. : Westview.

Marini, Margaret Mooney. 1984a. “Age and Sequencing Norms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 *Social Forces* 63: 229–44.

———. 1984b. “Wom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Timing of Entry into Parenthood.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491–511.

Markovits, Andrei. 1983. “Ref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Elections in West Germany. ” *New German Critique* 58: 2–51.

Marks, Shula, and Stanley Trapido, eds. 1987. *The Politics of Race, Class, and Nation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London: Longman.

Marshall, Susan. 1995. “Confrontation and Co-optation in Antifeminist Organizations. ”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edited by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323–35.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Marshall, Thomas H.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ullo, Sam. 1994. *Ending the Cold War at Home*. Lexington, Mass. : Lexington Press.

Marwell, Gerald, Michael T. Aiken, and N. Jay Demerath III. 1987.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mong 1960s Civil Rights Activists. ”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 359–75.

Marwell, Gerald, and Pamela Oliver. 1993. *The Critical Mass in Collective Action: A Micro-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well, Gerald, Pamela Oliver, and Ralph Prahl. 1988. “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I.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502–34.

Mayhew, David. 1974.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3. "T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Insurg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735-54.

———. 1988. *Freedom Summer: The Idealists Revisit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The Bi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Activ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744-60.

———. 1992. "Gender as a Mediator of the Activist Experience: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453-76.

———. 1994. "Culture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edited by Enrique Larafia,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36-57.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Initiator' and 'Derivative' Movements: Diffusion Processes in Protest Cycles." In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edited by Mark Traugott, 217-39.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1988. "Social Movements." In *Handbook of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695-737. Beverly Hills: Sage.

———, eds.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Adam, Doug, Kelly Moore, and James W. Shockey. 1992. "Life-Course Constraints on Act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incinnati, Ohio.

McAdam, Doug, and Ronnelle Paulsen. 1993.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735-54.

McCaffery, Peter. 1993. *When Bosses Ruled Philadelphia: The Emergence of the Republican Machine, 1867-1933*.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41.

McCrea, Frances B., and Gerald E. Markle. 1989. *Minutes to Midnight: Nuclear Weapons Protest in America*.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McPhail, Clark. 1971. "Civil Disorder Participat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Recent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058-73.

Meehan, Elizabeth, and Evelyn Collins. 1996. "Wom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Britain." In *Women in Politics*, edited by Joni Lovenduski and Pippa Norris, 223-3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lucci, Alberto. 1982. *L' invenzione del presente*. Bologna: Il Mulino.

———. 1985. "The Symbolic Challenge of Contemporary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789-816.

———. 1988. "Getting Involved: Identity and Mobiliz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ited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329-48. Greenwich, Conn.: JAI.

———.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 Hutchins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rkl, Peter H. , and Leonard Weinberg, eds. 1993. *Encounters with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 Boulder, Colo. : Westview.

Messinger, Sheldon L. 1955.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a Declining Social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 3-10.

Meyer, David S. 1990. *A Winter of Discontent: The Nuclear Freeze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 1990-91. "How We Helped End the Cold War (and Let Someone Else Take All the Credit) ." *Nuclear Times* (winter): 9-14.

———. 1991. "Peace Movemen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 Research Agenda." *Peace and Change* 16: 131-61.

———. 1993. "Political Process and Protest Movement Cycles: American Peace Movements in the Nuclear Ag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6: 451-79.

———. 1994.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Nested Institutions: Protest and Policy in New Zealand's Nuclear-Free Zon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Ill. , April 14.

———. 1995. "Framing National Security: Elite Public Discourse on Nuclear Weapons during the Cold W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2: 173-92.

Meyer, David S. , and Nancy Whittier. 1994. "Social Movement Spillover." *Social Problems* 41: 277-98.

Meyer, David S. , and Sam Marullo. 1992.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ace Protest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14: 99-140.

Meyer, David S. , and Suzanne Staggenborg. 1996. "Movements, Countermovem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628-60.

Michnik, Adam. 1982. "We Are All Hostages." *Telos* 51: 173-81.

Midttun, Atle, and Dieter Rucht. 1994. "Comparing Policy Outcomes of Conflicts over Nuclear Power: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In *States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s*, edited by Helena Flam, 371-40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Mirowsky, John, and Catherine Ross. 1981. "Protest Group Success: The Impact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Social Control, and Context." *Sociological Focus* 14: 177-92.

Mishler, William, and Reginald S. Sheehan. 1994. "Popular Influence on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Respon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716-24.

Mckli, Silvano. 1994. *Direkte Demokratie: Ein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Bern: Haupt.

Modell, John E. 1989. *Into One's Own: From Youth to Adulth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7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oore, Kelly. 1996. "Organizing Integrity: American Sci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Science Organizations, 1955-197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592-1627.

Morlino, Leonardo, and Marco Tarchi. 1996. "The Dissatisfied Society: The Roo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0: 41-63.

Morris, Aldon D.,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1992.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ss, Frances. 1995.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The Rise of a Professional Women's Network in the 1990s." In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1990s*, edited by Gabriele Griffin, 171-81.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Mueller, Carol McClurg. 1978. "Riot Violence and Protest Outco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6: 49-63.

——, ed. 1988. *The Politics of the Gender Gap*. Beverly Hills: Sage.

Mukerji, Chandra. 1989. *A Fragil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üller-Rommel, Ferdinand. 1993. *Grüne Parteien in Westeuropa*.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Myrdal, Alva. 1982. *The Game of Disarmament*. New York: Pantheon.

Nagel, Joane. 1995. "Politics and the Resurgence of American Indian Ethnic Ident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947-65.

Nassi, Alberta J., and Stephen I. Abramowitz. 1979. "Transition of Transformation: Pers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Former Berkeley Free Speech Movement Activis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8: 21-35.

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s Organisations (NAWO). 1996. *1995 Annual Report*. London: NAWO.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45-1993.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77. *National Patterns of R and D Resources: Funds and Man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USGPO.

Neidhardt, Friedhelm. 1994. "Öffentlichkeit, öffentliche Meinung, soziale Bewegungen." In *Öffentlichkeit, öffentliche Meinung, soziale Bewegungen*, edited by Friedhelm Neidhardt, 7-41. *K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no. 34.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Nelson, Barbara J., and Kathryn A. Carver. 1994. "Many Voices but Few Vehicles: The Consequences for Women of Weak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me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edited by Barbara J. Nelson and Nazma Chowdhury, 738-5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Richard R. 1995. "Recent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about Economic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 48-90.

Neustadtl, Alan. 1990. "Interest-Group PACsmanship: An Analysis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Issue Visibility, and Legislative Impact." *Social Forces* 69: 549-64.

Nichols, Elizabeth. 1987. "U. S. Nuclear Power and the Success of the American Antinuclear Movement."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167-92.

Norpoth, Helmut, and Jeffrey A. Segal. 1994. "Popular Influence on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Com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711-16.

Norris, Pippa. 1996. "Mobilizing the 'Women's Vote': The Gender-Generation Gap in Voting Behaviour." *Parliamentary Affairs* 49: 333-42.

Nowotny, Helga. 1979. *Kernenergie: Gefahr oder Notwendigkeit: Anatomie eines Konflikts*. Frankfurt: Suhrkamp.

Oberholzer, Ellis Paxson. 1912. *The Referendum in America*. New York: Scribner's.

O'Connor, Robert E. , and Michael E. Berkman. 1995. "Religious Determinants of State Abortion Polic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6: 447-59.

Offe, Claus. 1985.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nging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Social Research* 52: 817-68.

O'Neil! , William L. 1971. *Coming Apart: An Informal History of America in the 1960's*. Chicago: Quadrangl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Paris: OECD.

———. 1995. *Immigrazione straniera in Italia: Rapporto annuale del Censis al Sistema di Osservazione Permanente sull'Immigrazione dell'OCSE*.



Rome: Censis.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ge, Benjamin I. , and Robert Y. Shapiro. 1983. "Effects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175-90.

———. 1992. *The Rational 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enti, Michael. 1970. "Power and Pluralism: A View from the Bottom." *Journal of Politics* 32: 501-30.

Pearce, Diana. 1990. "Welfare Is Not for Women: Why the War on Poverty Cannot Conquer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Wo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edited by Linda Gordon, 265-7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egg, Chris. 1990. "A 'Pretended Family.'" In *Surviving the Blues: Growing Up in the Thatcher Decade*, edited by Joan Scanlon, 156-71. London: Virago.

Perrigo, Sarah. 1996. "Women and Change in the Labour Party, 1979-1995." In *Women in Politics*, edited by Joni Lovenduski and Pippa Norris, 118-3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71.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New York: Vintage.

———.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Pantheon.

———. 1978.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etal Conditions: A Reply to Roach and Roach." *Social Problems* 26 (2) .

———. 1979.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 1980. "Doctrine in Command of Politics: A Reply to Roach and Roac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1.

——. 1992. "Normalizing Collective Protest."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301–2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2d ed. New York: Vintage.

Plotke, David. 1996. *Building a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Reshaping American Liber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nd, Elizabeth. 1990. "A Wall Destroyed: The Dynamics of German Unification in the GD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35–66.

Porter, Gareth, and Janet Welsh Brown. 1991.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orter, Jack Nusan. 1973. *Student Protest and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The Case of ROTC*. Chicago: Adams.

Price, Charles M. 1975. "The Initiative: A Comparative State Analysis and Reassessment of a Western Phenomeno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June): 243–62.

Price, Don K. 1965. *The Scientific E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incen, Thomas, and Matthias Finger, eds. 1994. *Environmental NGOs in World Politics: Link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London: Routledge.

Pugh, Michael C. 1989. *The ANZUS Crisis, Nuclear Visiting, and Deter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Jackson K. 1970. *Old-Age Politics in California: From Richardson to Reag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dford, Jill, and Elizabeth A. Stanko. 1996.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The Contradictions of Crime Control under Patriarchy." In

Women, Violence, and Male Power, edited by Marianne Hester, Liz Kelly, and Jill Radford, 65–80. Buckingham,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Ragin, Charles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 “The Logic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the Algebra of Logic.”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thropology* 1: 373–98.

Ragin, Charles C. , and Howard Becker. 1992.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ppard, William E. 1912. “The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Recall in Switzerland.”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10.

Rein, Martin, and D. A. Schoen. 1977. “Problem Setting in Policy Research.” In *Using Social Research for Public Policy Making*, edited by C. Weiss, 235–51. Lexington, Mass. : Lexington Books.

Reinelt, Claire. 1995. “Moving onto the Terrain of the State: The Battered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edited by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84–10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Rex, John. 1996a.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England: Macmillan.

———. 1996b.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emocratic Multi-cultural Stat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 no. 2.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socresonline/1/2/1.html>>.

Riger, Stephanie. 1994. “Challenges of Success: Stages of Growth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Feminist Studies* 20: 275–300.

Riker, William.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Prospect Heights, Ill. : Waveland.

Rindfuss, Ronald R. , C. Gray Swicegood, and Rachel A. Rosenfeld. 1987. "Disorder in the Life Course: How Common and Does It Matt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785-801.

Rindfuss, Ronald R. , and Craig St. John. 1983. "Social Determinants of Age at First Birt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 553-65.

Rindfuss, Ronald R. , Larry L. Bumpass, and Craig St. John. 1980.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s Women Occup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431-47.

Risse-Kappen, Thomas. 1988. *The Zero Option: INF, West Germany, and Arms Control*. Boulder, Colo. : Westview.

———. 1991a. "Did 'Peace through Strength' E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 162-88.

———. 1991b. "Public Opinion,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iberal Democracies." *World Politics* 43: 479-512.

Roach, Jack L. , and Janet K. Roach. 1978. "Organizing the Poor: Road to a Dead End." *Social Problems* 26 (2) .

———. 1980. "Turmoil in Command of Politics: Organizing the Poor."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1.

Rochon, Thomas R. 1988. *Mobilizing for Peace: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Ideas in Movement: Critical Communities, Movements, and Cultural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chon, Thomas R. , and Daniel A. Mazmanian. 1993.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8: 75-87.

Rochon, Thomas R. , and David S. Meyer, eds. 1997. *Coalition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Boulder, Colo. : Rienner.

Rosenfeld, Rachel, and Kathryn Ward. 1991. "The Contemporary Women's Movement." *Sociological Forum* 6: 471-500.

Roth, Roland. 1994. *Demokratie von unten: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auf dem Wege zur politischen Institution*. Cologne: Bund Verlag.

Rothstein, Bo. 1990. "Marxism,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Working Class Power: The Swedish Case."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317-46.

———. 1992. "Labor-Market Institutions and Working-Class Strength." In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edited by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33-5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wbotham, Sheila. 1996. Introduction to *Mapping the Women's Movement*, edited by Monica Threlfall, 1-16. London: Verso.

Roy, Beth. 1994. *Some Trouble with Cows: Making Sense of Social Conflic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ucht, Dieter. 1992.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s: Conceptualization and Proble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Joint Sessions, Limerick, Ireland, March 30-April 4.

———. 1993.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Needs, Forms, and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Group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edited by Duncan Liefferink, Philip Lowe, and Arthur Mol, 75-95. London: Belhaven.

———. 1994. *Modernisierung und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USA im Vergleich*. Frankfurt: Campus.

———. 1995. "The Impact of the Anti-nuclear Power Movement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Resistance to New Technology*, edited by Martin Bauer, 277-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Limits to Mobi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I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edited by Jackie Smith, Charles Chatfield, and Ron Pagnucco, 195–213. Syracuse, N. Y.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Rüdiger, Wolfgang. 1990. *Anti-nuclear Movements: A Worm Survey of Opposition to Nuclear Energy*. Harlow, England: Longman.

Russell, Lynne, Duncan Scott, and Paul Wilding. 1996. "The Funding of Local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Policy and Politics* 24: 395–12.

SAS Institute. 1996. *SAS/STAT Software: Changes and Enhancements through Release 6.11*. Cary, N. C. : SAS Institute.

Schaffner, Martin. 1982. *Die demokratische Bewegung der 1860er Jahre*. Basel: Helbing und Lichtenhahn.

Schattschneider, Elmer E.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Scheer, Robert. 1982. *With Enough Shovels: Reagan, Bush, and Nuclear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Scheff, Thomas. 1994. *Bloody Revenge: Emotions, Nationalism, War*. Boulder, Colo. : Westview.

Schramm, Sanford E, and J. Patrick Turbett. 1983. "Civil Disorder and the Welfare Explosion: A Two Step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408–14.

Schumaker, Paul D. 1975. "Policy Responsiveness to Protest-Group Demands." *Journal of Politics* 37: 488–521.

——. 1978. "The Scope of Political Conflic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traints in Contemporary Urban Protest."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 168–84.

Scott, W. Richard. 1994.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I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W. Richard Scott and John W. Meyer, 55–80.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Seaborg, Glenn T. , with Benjamin S. Loeb. 1981.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elton, Martin. 1994.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orter, Edward, and Charles Tilly. 1971. “Le déclin de la grève violente en France de 1890 à 1935.” *Le Mouvement Social* 79: 95–118.

———. 1974.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egenthaler, Hansjrg. 1993. *Regelvertrauen, Prosperitt, und Krisen*. Tübingen: Mohr.

Simeant, Johanna. 1993. “Le mouvement des déboutés du droit d’asile, 1990–1992.” In *Sociologie de la protestation: Les formes de l’action collectiv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edited by Olivier Fillieule, 181–208. Paris: L’Harmattan.

Skocpol, Theda.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3–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Response” [to Sparks and Walniu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720–30.

Skocpol, Theda, and Edwin Amenta. 1986. “States and Social Polic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 131–57.

Skocpol, Theda, and Kenneth Finegold. 1990. “Explaining New Deal Labor Policy” [reply to Goldfie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1297–1304, 1313–15.



Skocpol, Theda, Marjorie Abend-Wein, Christopher Howard, and Susan Goodrich Lehmann. 1993. "Women's Associations and the Enactment of Mothers' Pen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686-701.

Small, Melvin. 1988. *Johnson, Nixon, and the Doves*.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melser, Nell J. 1963.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Smith, Alice Kimball. 1965. *A Peril and Hope: The Scientists' Movement in America, 1945-194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ith, Anthony D. 1995.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Snow, David A. , E. Burke Rochford Jr. ,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81.

Snow, David A. , and Pamela E. Oliver. 1995. "Social Movements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and Consideration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Karen Cook, Gary Fine, and James House, 571-99. Boston: Allyn and Bacon.

Snow, David A. ,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ited by Bert Klau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197-218. Greenwich, Conn. : JAI.

———.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133-5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David, and William R. Kelly. 1976. "Industrial Violence in I-



taly, 1878–1903.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31–62.

———. 1979. “Strategies for Investigating Violence and Social Change: Illustrations from Analyses of Racial Disord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Mobilization Research. ”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Tactics, and Social Control*,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212–37. Cambridge, Mass. : Winthrop.

Solo, Pam. 1988. *From Protest to Policy: Beyond the Freeze to Common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 Ballinger.

Sorenson, Annemette. 1983.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after Marriage.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 311–21.

Southall Black Sisters (SBS) . 1996. *Annual Report, 1994–1995*. London: SBS.

Spalter–Roth, Roberta, and Ronnee Schreiber. 1995. “Outsider Issues and Insider Tactics: Strategic Tensions in the Women’s Policy Network during the 1980s. ”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edited by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105–27.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parks, Cheryl Logan, and Peter R. Walniuk. 1995. “The Enactment of Mothers’ Pensions: Civic Mobilization and Agenda Setting or Benefits of the Ballot?” [reply to Skocpol et al. ]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710–20, 728–29.

Squires, Judith. 1996. “Quotas for Women: Fair Representation?” In *Women in Politics*, edited by Joni Lovenduski and Pippa Norris, 71–8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ggenborg, Suzanne. 1988. “The Consequ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Formalization in the Pro–Choice Movement.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585–605.

———. 1991. *The Pro–choice Movement: Organization and Activism in*

the Abortion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rr, Paul. 1982.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Statham, Paul. 1996a. "Berlusconi, the Media, and the New Right in Italy."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 87-105.

———. 1996b. "Television New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Italy: Conflicts at the Media/Politics Interfac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511-56.

Steadly, Homer R., and John W. Foley. 1979. "The Success of Protest Groups: Multivariate Analys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8: 1-15.

Stimson, James A., Michael B. MacKuen, and Robert S. Erikson. 1995. "Dynamic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543-65.

Stone, Deborah A. 1988. *Policy Process and Political Reason*. Boston: Little, Brown.

Stss, Richard. 1989. *Die extreme Rechte in der Bundesrepublik: Entwicklung - Ursachen Gegenmaßnahmen*.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Sunstein, Cass R. 1988. "Constitutions and Democracies: An Epilogue."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Jon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 327-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73-86.

Sznajder, Mario. 1995. "Heirs of Fascism? Italy's Right-Wing Government: Legitimacy and Critic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71: 83-102.

Taft, Philip, and Philip Ross. 1969. "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 In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Hugh D. Graham and Ted R. Gurr,

281–395. New York: Bantam.

Talbott, Strobe. 1984. *Deadly Gambits: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alemate in Arms Control*. New York: Knopf.

Tarchi, Marco. 1995. *Cinquant'anni di nostalgia*. Milan: Rizzoli.

———. 1996. “After the Breakdown of the ‘First Republic’: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Italian Extreme Right?”

*Res Publica* 38: 385–96.

Tarrow, Sidney. 1989.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Mentalities, Political Cultur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174–20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Social Protest and Policy Reform: May 1968 and the Loi d’Orientation in Fra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5: 579–607.

———. 1994.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Verta, and Nancy Whittier. 1992. “Collective Identity in Social Movement Communities: Lesbian Feminist Mobilization.”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104–2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Analyt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Movement Culture: The Cul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edited by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163–8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hompson, E. E. 1982.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ntheon.

———. 1990. “History Turns on a New Hinge.” *Nation* (January 29):

117-18.

Thompson, E. E., and Dan Smith, eds. 1981. *Protest and Surviv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Through a Glass Darkly.” 1996. *Economist* (August 10): 51.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297-31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5. “To Explain Political Proces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1594-1610.

———. 1996. “Invisible Elbow.” *Sociological Forum* 11: 589-601.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ismaneanu, Vladimir. 1989. “Nascent Civil Society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Problems of Communism* 38: 91-111.

Trattner, Walter I., ed. 1983. *Social Welfare or Social Control? 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Regulating the Poor.”*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Traugott, Mark, ed. 1995.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Tuma, Nancy Brandon, and Michael T. Hannan. 1984. *Social Dynam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 1970. “UCS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 Overview.” *UCS Paper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1984. “Fifteen Years of UCS.” *Nucleus: A Quarterly Report* 6 (1): 2-9.

United Kingdom. Cabinet Office. Women's National Commission. 1990. *Women's Organisations in Great Britain, 1989-1990*.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0.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 USGPO.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73. *Employment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1950-1970*. Washington, D. C. : USGPO.

Valocchi, Steve. 1990. "The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Piven and Cloward Thesis." *Social Problems* 37: 191-205.

Veugelers, John W. P. 1994. "Recent Immigration Politics in Italy: A Short Story."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17: 33-49.

Walker, Jack L. , Jr. 1991. *Mobilizing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Waller, Doug. 1987. *Congress and the Nuclear Freeze: An Inside Look at the Politics of a Mass Movement*.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Wapner, Paul. 1996.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Urban Civic Pol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he War between the Sexes." 1994. *Economist* (March 5): 80-81.

Webb, Keith, Ekkart Zimmermann, Michael Marsh, Anne-Marie Aish, Christina Mironesco, Christopher Mitchell, Leonardo Morlino, and James Walston. 1983. "Etiology and Outcomes of Protest: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6: 311-31.

Weinberger, Caspar W. 1990.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in the Pentagon*. New York: Warner.

Welch, Susan. 1975. "The Impact of Urban Riots on Urban Expendit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741-60.

Whalen, Jack, and Richard Flacks. 1980. "The Isla Vista Bank Burn-

ers' Ten Years Later: Notes on the Fate of Student Activists." *Sociology* 12: 61-78.

———. 1984. "Echoes of Rebellion: The Liberated Generation Grows Up."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12: 61-78.

———. 1989. *Beyond the Barricades: The Sixties Generation Grows Up*.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hittier, Nancy. 1995. *Feminist Generation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Radical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icker, A. 1969. "Attitudes and Ac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Verbal and Overt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Attitude Objec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5: 41-78.

Willelms, H., M. Wolf, and R. Eckert. 1993. *Unruhen und Politikberatung: Funktion, Arbeitsweise, Ergebnisse, und Auswirkung von Untersuchungskommissionen in der USA, Grossbritannien, und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Wilson, James Q. 1961. "The Strategy of Protest: Problems of Negro Civic 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 291-303.

Winkler, Jürgen R. 1994. "Die Wählerschaft der rechtsextremen Parte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 bis 1993." In *Rechtsextremismus: Einführung und Forschungsbilanz*, edited by Wolfgang Kowalsky and Wolfgang Schroeder, 69-88.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 der Bundesregierung. 1996. *Globale Umweltveränderung: Welt im Wandel*. Berlin: Springer.

Wolfe, Leslie, and Jennifer Tucker. 1995. "Feminism Lives: Building a Multicultural Women's Movement in the US." In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 edited by Amrita Basu, 435-64. Boulder, Colo.: Westview.

Wolfle, Dael. 1989. *Renewing a Scientific Society: The AAAS from World War II to 1970*.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Worldwatch Institute, ed. 1992.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Zur Lage der Welt—1992. Daten für das Überleben unseres Planeten.* Frankfurt: Fischer.

Wrndl, Barbara, and Guy Fr.chet. 1991. "Institutionalization Tendencies in Ecological Movements." In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Comparing Recent Trend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edited by Simon Langlois, with Theodore Caplow, Henri Mendras, and Wolfgang Glatzer, 247–68. Frankfurt: Campus; Montreal: McGill–Queens's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John R. 1985. "PACs, Contributions, and Roll Call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400–414.

Yamaguchi, K. 1991. *Event History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Zald, Mayer. 1988. "The Trajector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10: 19–41.

Zelditch, Morris. 1978. "Review Essay: Outsiders'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514–20.

Zemans, Frances Kahn. 1983. "Legal Mobiliza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th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690–703.

Zimmermann, Ekkart. 1990.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Outcomes: Why Both Ends Fail to Mee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welf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adrid, Spain, July 9–13.



## 作者简介

埃德文·阿门塔 (Edwin Amenta) 是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他是《现代美国社会政策与制度政治学》一书的作者，他的许多论文都论及到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社会政策。他目前正在写作《汤森运动和美国金钱激进分子的影响》一书。

保罗·伯斯坦 (Paul Burstein) 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政治科学兼职教授。他曾研究过公民权利运动和女权运动对有关均等就业机会的国会活动和司法活动的影响，他对社会运动组织在民主政治制度中的作用感兴趣。他目前正在对社会运动组织、利益集团与政党进行系统的研究。

唐娜泰拉·黛拉·波尔塔 (Donatella Della Porta) 是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她曾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美国做过研究。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运动、政治暴力、恐怖主义、政治腐败、暴政、公共秩序和警方。她最近的著作包括《抗议管理：西方民主国家对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控制》(赫伯特·瑞特合作编辑, Minnesota, 1998) 和《社会运动、政治暴力与国家》。

乔伊斯·盖尔布 (Joyce Gelb) 是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和研究生中心的政治科学教授，是研究生中心激进主义妇女口述史项目的主任。她是《女权运动与政治：一种比较的视角》一书的作者，是《日本和韩国妇女》与《妇女与公共政策》两书的合著者。她的研究兴趣涉及到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妇女、女权运动、政治学和政策。

马可·朱格尼 (Marco Giugni) 是日内瓦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研究员。他是很多有关社会运动的著作和论文的作者或合著者。他是《Entre stratégie et opportunité》一书的作者，是《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Minnesota, 1995) 和《Histoires de mobilisation politique en Suisse》两书的合著者，是《从抗争到民主》的共同主编。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一个有关种族关系、公民身份和移民动员的跨国比较项目，他精通法国和瑞士的案例。

维维恩·哈特 (Vivien Hart) 是英国布赖顿市苏塞克斯大学研究美国的教授，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客座教授。她写作了许多比较美国和英国政治的论著。她最近的新书是《受我们宪法的约束：妇女、工人和最近工资》。她正致力于性别与宪法的国际研究。

路德·库普曼斯 (Ruud Koopmans) 是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运动与公共领域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他是多部有关社会运动的著作的作者或合著者，这些著作包括《基层民主：西德的新社会运动与政治制度》、《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Minnesota, 1995) 和《异议行动》。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一个有关种族关系、公民身份和移民动员的跨国比较项目，他精通德国的案例。

汉斯皮特·克里西 (Hanspeter Kriesi) 是日内瓦大学政治科学的正教授。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运动、比较政治、瑞士政治和直接民主。他是《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Minnesota, 1995) 的合著者。

道格·麦克亚当 (Doug Mcadam) 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是《政治过程与黑人暴动的发展：1930-1970》一书的作者。他写作的《自由夏日》一书在1990年获得C·赖特·米尔斯奖。他是《社会运动的比较视野》一书共同主编。

戴维·S·迈耶 (David S. Meyer) 是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和研究生中心的政治科学副教授。他是《不满的冬天：核冻结与美国政治》一书的作者。他是《社会运动社会》(与西德尼·塔罗) 和《联盟与政治运动》(与托马斯·罗尚) 两书的共同主编。他写作了很多有关社会抗议政治的

论文，目前正同苏珊·斯坦根伯格一起研究美国堕胎冲突中的运动/反运动的相互作用。

凯利·摩尔（Kelly Moore）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社会学助理教授。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涉及到社会行动、正式组织和科学社会学。她目前正在写作《反越战运动对美国科学的影响》一书。

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是英国坎特伯雷市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比较视野中的动员过程、社会运动和政治抗议。他主编了《社会运动研究：西欧和美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一书，与他人合著了《新社会运动与现代化：德国、法国与美国的比较》一书。

保罗·斯坦森（Paul Statham）是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运动与公共领域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对环境运动和媒体的研究。他发表了很多有关欧洲环境运动和意大利媒体与政治的论文。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一个有关种族关系、公民身份和移民动员的跨国比较项目，他精通英国和意大利的案例。

西德尼·塔罗（Sydney Tarrow）是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的麦克斯韦·厄普森教授。他是《运动中权力》（1998）一书的作者，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运动、抗议和抗争》丛书的副主编。他目前正在同道格·麦克亚当与查尔斯·蒂利合作研究抗争的动力。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科学，他从1954年就一直研究抗争政治，尤其是欧洲的抗争政治。

多米尼克·威斯勒（Dominique Wisler）是日内瓦大学政治科学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主题包括政治暴力、社会运动、警察和大规模游行示威。

迈克尔·P.杨（Michael P. Young）在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完成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社会学、宗教、社会运动、历史社会学。他的博士论文探讨了美国南北战争前单一问题的社会运动出现的斗争领域与集体行动的关系。

# 译后记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爆发了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不仅包括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新左派运动、环境运动、反核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而且还包括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自由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动物保护运动和平等对待艾滋病患者运动等等。这些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同传统社会运动相呼应，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道风景线。作为对社会运动实践的理论反映，西方学者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一个长期不衰的学术领域，一大批来自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每年都有大量的成果问世。虽然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却很少有人触及这一领域，相关的译介也不多。因而很有必要翻译和引介西方学者论述社会运动及其结果的经典著作，以期推动中国学术界对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

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纳入到常态政治的轨道上来，成为公民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的重要渠道。而在中国，类似于西方社会运动的底层社会抗争行为却没有被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中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利益分化的加剧，底层社会抗争事件呈逐年增加趋势，如果不能将其制度化，一旦政府控制能力下降，经济衰退，这些底层社会抗争行为就可能演变成“动乱”或“革命”。因而，值得人们注意尤其是中国政府注意的事实是：面对层出不穷的底层社会抗争事件，关键的问题已不是想办法如何阻止其发生，而是如何将其制度化的问题。

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社会抗争行为或集体行动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将社会抗争行为或集体行动制度化的社会。因此，我们要正确客观地看待当今中国发生的愈来愈多的底层社会抗争事件，不能盲目地把这些事件定性为“病态”的，而是要考虑如何把这些社会抗争行为或集体行动引导到制度化的常态政治中来。

西方的昨天也许是中国的今天，西方的今天也许是中国的明天。为了找到能使当今中国底层社会抗争行为或集体行动事件制度化的有效方法，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历史上和今天出现的社会运动及其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希望本书的翻译能推动这一研究的进展，给中国找到用制度化的方法来解决底层社会抗争行为或集体行动事件提供有益的借鉴。

翻译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仅需要译者具有较高的翻译能力，而且还需要译者有着对学术敬畏而一丝不苟的态度。从译出初稿到校对二稿、再到润色三稿和最后定稿，我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本译著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具体分工如下：导言、前言、导论、第一、二、三、八、九章、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由张等文翻译、孔兆政校对；第十章由孔兆政翻译；结论由孔兆政、吴文国翻译，张等文校对；第四、五、六章由马冰冰和张等文翻译、孔兆政校对；第七章由马冰冰和李妍翻译、张等文校对；孔兆政和张等文一起共同校对了全书的三稿，经过反复讨论解决译文中的难点后最后定稿。在此特别感谢张晓慧博士和胡永保硕士，他们认真通读了本书译文的三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瑕疵和不妥之处定会不少，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